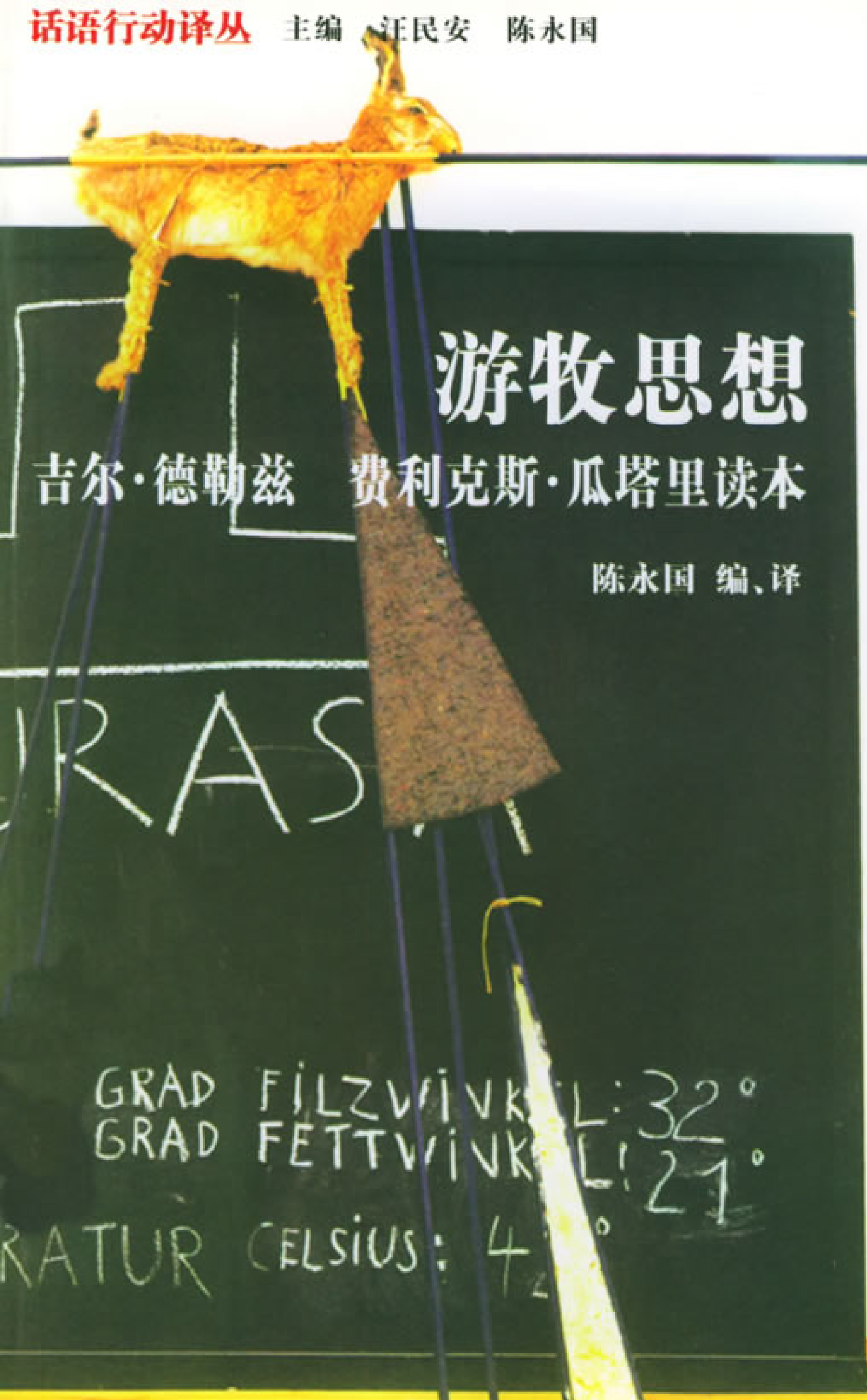
话语行动译丛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陈永国　编、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话语行动译从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陈永国　编、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牧思想/陈永国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
(话语行动译丛)
ISBN 7-206-04354-2

Ⅰ.游… Ⅱ.陈… Ⅲ.后现代主义—研究
Ⅳ.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3708 号

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编　　者:陈永国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师若夫　　责任校对:赵树人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710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2.375　　字数:3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354-2/B·158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25.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话语行动译丛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罗　钢	刘象愚	
主　　编	汪民安	陈永国	
编委会	马海良	汪民安	陈永国
	陈　越	赵京华	郭　军
	曹雷雨		

代前言：德勒兹思想要略

陈永国

哲学家创造概念。在这方面，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替代。德勒兹被公认为是创造概念的大师，而且，他创造概念的方式独特，在不同领域之间追踪概念，让这些领域既相互沟通，又保持相互间的差异，如在哲学与音乐之间，在音乐与文学之间，在文学与动物之间，等等。这种沟通能创造出第三个领域，既哲学的“生成音乐”（becoming-music），音乐的“生成文学”（becoming-literature），文学的“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等等。在这方面，作为游牧思想家的德勒兹（和瓜塔里）也是无人能够替代的。然而，复数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本来就可以说是“概念的朋友们”的。而如果他们在思想的谱系中都是“概念的朋友们”的话，那么，在德勒兹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面孔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德勒兹本人所说，如果不读柏拉图，笛卡尔，康德，海德格尔，以及其他人关于他们的思想的书，你又怎能“思想”呢？推而言之，如果不读德勒兹论休谟，尼采，柏格森，康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等人的思想的著述，我们又怎能理解德勒兹（瓜塔里）作为思想家在众声喧哗的哲学话语中的“口吃”（stutter）呢？德勒兹的著述是一种阅读，而这种阅读并不是在原著中寻踪索迹，寻找隐蔽的所指，领会终极的意义，而是通过“加速”和“减速”把论点和论据追踪到没影点（vanishing point），直到抓住“生成”疑点和问题的机器，介入改造和变化的理论，捕捉足以表达这种理论的语言，用纯粹“生成”的理论颠覆同一性的压制，用差异代替存在，用生成差异的重复取缔线性的时间序列，这才算真正完成了他所说的游牧式阅读（nomadic reading）。

于是，在德勒兹的思想游牧场上，我们看到休谟为他提供了超越经验主义的方法；斯宾诺莎帮助他解决了“一”与“多”的古老的哲学命题；而在移植现象学和现象学给予自然感知的特权这方面，柏格森充当了德勒兹的同谋。然而，柏格森的重复的记忆，也就是不能够永久回归的时间，并未能彻底说服德勒兹，致使他又带着疑虑去追问尼采。尼采的永久回归说（the eternal return）让德勒兹弄清了一件事，那就是重复（repetition）是某种方式的行为；它总是与某一独特的客体相关，即是说，这种重复中不包含相似性，不包含相同的因素。尼采所说的重复是一个例外（exception），一种僭越（transgression），一种差异（difference）。正是由于这种独特性，僭越性，无中心的差异性，尼采才将其命名为“权力意志。”然而，德勒兹认识到，这种“权力意志”并不是指被剥夺了权力的各方力量刻意追求和夺取权力的意志。力本身就是权力；权力本身就是意志；或者说，意志就是这种作为权力的力的表达。

然而，要建构一种真正的游牧思想体系，德勒兹必须首先建构一个关于纯粹生成和变化的理论体系，而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又必须包括一系列悖论和序列的构型。它必须大于以前所是的东西，同时又小于将要生成的东西。以往的表述性逻辑不足以处理这种纯粹的生成，而需要一种关于纯粹“事件”（events）的逻辑，生发“意义的逻辑”（logic of sense）。德勒兹了解到，自柏拉图以降，哲学就试图解释事件，说明变化、变形和生成的原理，但只是到了斯多噶时代，事件和生成的关系才第一次被明确地确定下来，人们才懂得思考生成就是思考事件。事件是由身体（body）引起的；而身体及其属性，身体性混合和非身体性事件，都存在于当下现实之中，影响着其他事件，促成了其他身体的新的混合。然而，身体不仅促成了实际发生的事件；它们还促成了虚拟的“事件。”这种虚拟的“事件”反过来又对身体发生一种“准因果式的影响。”就本体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而言，事件决不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情况，而总是已经发生过的或将要发生的情况。所以，事件总是逃避现在，总是由于这种逃避而在同时证实过去和未来。事件不表示本质或属性，而代表力（force）、强度（intensities）和行动（action）。事件并非先于身体而存在，而固存于、持存于、寄存于身体之中。此外，事件并不发生于主体，而先于主体和个体而存在。事件并不构成主体，而分解主体，事先设定一个意志，以便在事件状态（state of things）中寻求事件的永恒真谛。由此，实际事件中固存的虚拟事件（virtual events）就是所思想、所意志的东西。我们要在生活中体现价值，就必须时刻意志同时既是差异又是同一性的东西，把平庸升华为卓越，让伤口趋进于愈合，用战争消灭战争，以死亡抵抗死亡，通过重复走向自由。

二

德勒兹终其一生探讨“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并且始终自诩为哲学家。在他（和瓜塔里）看来，哲学不是探讨真理或关于真理的一门学问，而充其量是一个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过程，是创造概念的一个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梳理、重新安排视角。世界是在概念中并通过概念向我们显示的，所以，从事哲学研究就是借助概念重新审视世界，开创看待世界的新的视角。

哲学创造的概念（concepts）不同于它提出的命题（propositions）。命题是用于争论的单位。构成命题的词语组合都遵循一定的规则。虽然组合的数量可能是无限的，但单个词在任何两个组合中的重复都必须保持其语义上的独立性，正如任何不同组合中的句法结构都相对不变一样。在命题中，自我认同的词语单位根据不变的规则进行各种不同的组合，构成了由常量（constants）所控制的独立的变量（variants），或然性或新的可能性就是由这些变量的聚合（convergence）生发出来的。但这些可能性所指代的事物状态是外在于命题及其表述的。命题与事物状态，其各自的构成因素，必须是相互一致的：一个名词之于一个物，就如同一个命题之于一种事物状态一样。这就是说，同时存在着一种物的语法（grammar of things）和一种词的语法（grammar of words），这两种语法形成了一对一的对应。构成因素在一个层面上的关系反映它们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要获得的关系；物的系统与词的系统处于类比的关系中，而逻辑就是对这种类比的规训和整理，最终促成了再现（representa-

tion）。但物与词何以建立起这种类比或对应关系呢？又用什么方法或标准来衡量这种关系呢？经验的方法根据物在经验中呈现的秩序把表达与其指涉一致起来，其结果是一种对应的思想秩序。超越的方法认为物的呈现与外在于经验的一个基础的主体秩序相一致，因此，特定的现存主体决定着其有限的反映。在这两种情况下，基础（foundation）相似于它所建立的东西，而这种相似就是重复。在这个意义上，命题就是对重复的规范化。

但在德勒兹的理论中没有反映，没有一致性或对应性，因此也就没有再现性。所有这些，连同命题中的变量，常量，指代，类比，再现，可能性，相似性，经验的标准，超越的标准，基础与重复，都是思想的映像（images），都是他的概念予以攻击的对象。那么，他所说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概括起来，他的概念有三个相互交叉的基本特点：首先，概念与其他概念相交织，无论是在自身的领域内，还是在周围相关的领域内，概念都是由其他概念所定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哲学研究的对象就都是一种理论实践，都是概念的实践，必须根据它所介入的其他实践加以判断。其次，概念的构成因素之间固有一种统一性，这是概念的限定性条件。当异质性因素（heterogeneous elements）聚集于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与这些构成因素既相互区别又不可分离时，概念的统一性或一致性就发生了。最后，概念具有一种集约性（intensive nature），它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特殊的，而是一个纯粹简单的具有特性的力，每当跨越一个概念场（conceptual field）时，这个力都对那个场的其他因素和概念发生作用，回荡着震撼的颤音。

按此理解，概念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再现；它活动于其中的“场”（field）也不是单个领域，而是一个“平面”（plane）；它既是逻辑的，政治的，也是审美的，而概念就是这个“场”

上的一个“点”（point），与场上的所有其他变量相共存，没有固定的指向，而具有从一个层面向另一个层面跳跃的潜势。这个场上各个变量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这意味着独立的变量已经不存在了；变量之间已经相互不可分离了，而处于一种奇怪的共存但又可区别的状态之中。可以说，这样的“点”是非线性时间中的“时刻”（moments），是无界线空间里的“皱褶”（folds），它们只能在自身之内或向自身之外展开。这样的“点”不仅与其他“点”相区别，而且自身包含着差异的构成因素，是差异的极端表现。它们构成了纯粹内在性的“场”，在这个“场”上只有变量，没有常量，所以，这些“点”是运动的，变化的，生成的。显然，概念决不是给物贴上的标签或命名；概念决定思维的取向。而要理解思维是什么，我们不应该仅只撷取日常生活的资料，通过推演而从中得出结论，而要寻找极端的思维形式，如艺术、哲学和科学。哲学概念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概念，正如艺术和电影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一样。

三

概念不是命题，但这不等于说概念不能转化成命题。从构成上说，德勒兹的“概念”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首先，它的内在逻辑并不是命题式逻辑（propositional logic），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和有序的序列，因此不局限于线性发展，这样，其总体格局就是不可预测的。一个概念可以从一个场跳到另一个场，从一本书跳到另一本书，有时竟是巨大的跳跃，甚至消失在视界之外，在若干年或若干书之后才重现。但每一次重现（只要重

现的话）都必然创造一组新的与自身和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这就是说，概念本身不但可以移入新的环境，而且可以加快建造新环境的速度，从而跨越遗传谱系和学科界线。其次，移入新环境的概念自然成了它所指的那个环境的标与，与那个环境的各种因素处于对应的关系中，或用来指称那个环境与其他环境的关系，因此自动地、无法察觉地转化为命题。这就是德勒兹式的概念能够生产变量、必然要“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的内在原理。

从本质上说，德勒兹的哲学是关于生成的本体论。用以说明这种“生成学说”的具体例子是“块茎”（rhizome）概念，或“块茎思想”。“块茎”是德勒兹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其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善用比喻）的重要标识之一，也是他（和瓜塔里）所采用的重要论证方法之一。“块茎”是一种植物，但不是在土壤里生芽、像树一样向下扎根的根状植物。相反，“块茎”没有“基础”，不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地点。“块茎”在地表上蔓延，扎下临时的而非永久的根，并借此生成新的“块茎”，然后继续蔓延。如同马铃薯或黑刺梅树一样，一旦砍去了地上的秧苗，剩下的就只有“球状块茎”了。一个“球状块茎”就是一个“点”，“点”的链接就是这种生长过程的结果，这个生长过程也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生成”（becoming）。“生成”是一个运动过程。生成不是由事物状态决定的，并不“根植于”确定的事物状态之中，它不提出“你将生成什么?”的问题，因此也不涉及模仿或再现，因为思想并不构成对经验世界的再现，而构成与经验世界的“块茎”生长过程。

就方法论而言，“块茎”与传统的解释、阐释和分析模式毫无关系：德勒兹（和瓜塔里）拒斥语言学、文学批评和符号学模式的专制，因为它们都试图寻找表层之下隐蔽的深度，都试图在表象的背后挖掘出一个终极存在或此在（ultimate being

or presence），也正因如此，德勒兹（和瓜塔里）才开始了重读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浩翰工程。他（们）所感兴趣的恰恰是从未隐藏过的关系，不是文本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文本与其他客体、一个文本与其外部的关系。他（们）从不追问一本书是什么，能指和所指的意义是什么，所要理解的内容是什么。相反，他（们）追问一本书的功能是什么，与它所传达或不传达的强力是什么关系，它进入了怎样的繁殖，又引起了哪些自身的变形，最后，它又是怎样与“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达到聚合的。一本书为一个外部（outside）而存在；一本书就是一台文学机器（literary machine）；批评家（读者）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台文学机器与战争机器（warmachine）、爱情机器（love machine）、革命机器（revolutionary machine）等的关系。

毋宁说，写作不是指意活动，而是对现状甚至对未来进行勘察和图绘。文本的意义，它讲述的内容，它的内在结构，以及用以阐释它的方法，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它与外部的关系（包括读者、作者、文学和非文学的语境）。“块茎”结构不同于树状（arborescent structure）和根状结构（rhizomic structure）：树状结构用来比喻线性的、循序渐进的、有序的系统；根状结构假定一种隐藏的或潜在的统一性，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无中心的、非统一的。然而，“块茎”结构既是地下的，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显露于地表的多元网络，由根茎和枝条所构成；它没有中轴，没有统一的源点（points of origin），没有固定的生长取向，而只有一个多产的、无序的、多样化的生长系统。

总起来说，“块茎”基于关系，把各种各样的碎片聚拢起来；“块茎”基于异质性，把各种各样的领域、平面、维度、功能、效果、目标和目的归总起来；“块茎”基于繁殖，但不

是个性的繁殖，不是“一”的繁殖，也不是同一性的重复，而是真正的多产过程；“块茎”基于断裂，“块茎”结构中的每一个关系都可随时切断或割裂，从而创造新的“块茎”或新的关系；最后，“块茎”基于图绘，不是追踪复制，不是制造模式或建构范式，而是制造地图或实验。这种“块茎思想”与阐释学、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不探讨潜在的或隐蔽的深度，而注重实用的方面：何以让文本、概念、主体发挥作用，创造新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块茎思想”就是一种实用哲学（prgmatics）。

四

作为一种实用哲学，“块茎思想”实际上导致了力的重新组合（re-assemblage），不同因素在这种组合中协同作用，促成了一种新的统一。在“人—马—蹬”的组合中，人不再是孤立的人，而与马构成了一种新的人马共生的关系，一种新的战争组合。在这种关系中，人和马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即“生成异类”的变化。这种生成是不可感知的，察觉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实际看到的世界包含着虚拟的成分，如人眼看到的色彩实际上是光的流动，而色盲看到的实际光波却又是单色的，因此，感知的实际形式衍生于远较复杂的纯粹差异的流动。在德勒兹看来，生命就是从这种纯粹差异的流动开始的。这种纯粹的差异是生成的冲动，是要区别于他者的倾向。人类生存的世界，人类所能感知得到的存在，就是这种生成流动的“收缩”（contraction），而每一次收缩都有其自身的“绵延”（duration）。

然而，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感知不到生成；我们所感知

的只是一个超验世界（transcendent world），或一个由外部事物构成的世界；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感知感性本身所遗漏的东西，感知从时间流动的差异中产生的事件，感知艺术所呈现的特性，即“生成不可感知的东西”（becoming-imperceptible）。这种“生成”（和“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是德勒兹（和瓜塔里）著作中争议最大的一个概念。它的场所是无器官身体。无器官身体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空虚的无器官身体，如瘾君子，受虐狂，疑病症患者；另一种是充实的无器官身体，这是强力得以流通的地方，是权力、能量、生产得以发生的地方。无器官身体有别于身体组织，后者是单一的、统一的、有机的、心理的整体。据此，主体被分成克分子的（molar）和分子的（molecular），少数的（minoritarian）和多数的（majoritarian）。无器官身体，即便空虚的无器官身体，也从不拒绝生成。生成总是分子的，穿越和重新排列克分子“整体”（如阶级、种族、性别的划分），开拓一条道路，让能量从这些“整体”内部泄露出来。

这样的“道路”（paths）或称“逃亡路线”（lines of flight）共有三条：第一条是严格切分的路线，称作“分层”（stratification）或克分子路线（molar line），它通过二元对立的符码对社会关系加以划分、编序、分等和调整，造成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对立，把现实分成了主体与客体。第二条是流动性较强的分子路线（molecular line），它越过克分子的严格限制而构成关系网络、图绘生成、变化、运动和重组的过程。第三条与分子路线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但较之更具有游牧性质，它越过特定的界限而到达事先未知的目的地，构成逃亡路线，突变，甚至量的飞跃。

这些“道路”指的是从同一性的“逃亡”，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亚哈船长生成鲸，威拉德生成

鼠，汉斯生成马，狼人生成狼；这些都不是基于人类对动物的模仿，不是基于人类与动物的相象，更不是对动物行为的效仿，或用动物能力再现主体的想象或精神意念。生成，尤其是生成动物，涉及起中介作用的第三个条件，它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动物，而是与主体相关的其他事物；它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多多少少要与所论的动物有某种关系（如动物的食物），或与其他动物的外在关系，或主体用来控制动物的工具，或与所论动物的某种说不清的关系。

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生成动物不仅仅是精神分析学的问题，而是关于感知和生成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弗洛伊德可以从俄狄浦斯的视角把人类生命归结为对死亡的欲望，或向童年时代甚或原始场面的回归。弗洛伊德之后的欲望心理学也都把欲望解释为对所缺乏的、所丢失的或生命不可企及的东西的欲求和占有。德勒兹（和瓜塔里）并不把欲望与生命对立起来。生命就是欲望；欲望是生命通过创造和改造的扩展。因此，生成动物不是存在或拥有，不是要达到动物的某种状态（力量或天真），也不是要变成动物。生成动物是对动物运动、动物感知、动物生成的一种感觉；亚哈追捕白鲸并非出于某种特殊的商业赢利目的，也不是要证明他能战胜白鲸的英雄气魄和胆量，而恰恰是因为他为白鲸的反常性格所吸引——它的不可琢磨和人类无法理解的性格，这样，白鲸就成了“漂浮的能指”（folating signifier），代表着阻碍终极意义或终极理解的任何东西。在文学中，我们不必非得把动物看作是象征，非得解释它们的象征意义，如白鲸象征着大自然的力量，（卡夫卡的）甲虫象征着人类的扭曲和变形等等，而可以根据动物生成的概念从动物身上找到新的认识方式。

生成动物对文学和文学批评至关重要，但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这是

所有生成的根本和关键。所有生成都从生成女人开始，都必须经过生成女人才能实现。德勒兹（和瓜塔里）强调说，不仅男人要生成女人，女人也要生成女人。这大概是说，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生成女人都是颠覆同一性的过程。一般说来，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克分子实体（molar entity）是具有形体和器官、发挥某些功能、担当主体角色的女人。但生成女人不是要模仿这个实体（正如生成动物不是模仿动物一样），不是把自身改造成这个实体，尤其不是模仿或呈现女性形体，而是要通过放射粒子（particles）进入运动与静止之间的关系，进入微观女性（micro-femininity）的临近地带，从而在自身生产一种分子女人（molecular-woman）。

德勒兹（和瓜塔里）解释说，生成女人不是鼓吹某种形式的“双重性征”（double sexuality）。“双重性征”不过是把两性对立起来，加以内化的结果。生成女人是要解除对克分子实体的束缚，对其各个部分加以重新投资，以便充当利用无器官身体的其他粒子、流动、速度和强力。在文学中，这体现为“像女人一样写作，”甚至最具菲勒斯精神的作家，如劳伦斯和米勒，在写作中也不能不有生成女人的倾向，不能不依赖生成女人的过程。德勒兹（和瓜塔里）进而把所有生成说成是“少数的”和分子的，而不是多数的和克分子的。“少数”不是量的概念，而指分子过程，而“多数”则指依据权力关系进行的群体划分，即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之所以不存在生成男人（becoming-man），正因为男人是占统治地位的克分子实体。因此，生成女人涉及超越固定主体和稳定结构之外的一系列运动和过程，是逃离以女人为代价赋予男性以特权的二元系统的最佳路线。但这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未必是福音，因为生成女人意味着超越同一性和主体性，打破和开放逃亡路线，从而把同一性统辖在“一”之下的上千个微小性别（tiny sexes）“释放”出来。

五

第三条较具游牧性质的“逃亡路线”是从封闭的、等级的思想独裁的逃离，从独裁的符号系统强行的意义等级制的逃离，因此也是从作为“条纹”（striated space）或“网格”（grid space）空间的社会和文化现实的逃离，继而把思想带入一个“平滑”空间（smooth space），一个不是由意义的等级制而由多元性决定的王国。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思想就是从事这种“逃亡”的。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思想独裁主要是由特殊的符号系统造成的。每一个符号系统都是由异质因素构成的一个“个体性”（haecceity），而一个“个体性”就其个体聚合而言又是一个整体，包括气候，风，季节，时间，以及栖居于这些元素中的物、人和动物。人作为主体就是由这些个体性构成的，因此也是由作为意义和指意系统的符号系统所构成的。这样的符号系统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前指意符号”（pre-signifying signs）系统，它是多元的，多声部的，能防止普遍的暴政；第二个是“对抗指意符号”（counter-signifying signs）系统，它在性质上是游牧的；第三个是“后指意符号”（post-signifying signs）系统，它是主体得以构成的主体化过程。这三个系统可以混合起来，但由于它们与特定的组合相关，所以往往只有一个系统占主导。

此外，德勒兹（和瓜塔里）还区别了“偏执式的指意符号”和“情感的、主观的、独裁的后指意符号”，除运动的力度和方向不同外，这两种符号都是虚幻的，都是疯癫的表现。

“偏执式的指意符号”始于概念，由“围绕思想而组织起来的”力发展而来，因此是力的内化，并以此为基础来阐释世界。“独裁的后指意符号”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是以情感而非概念为表现的，而且与犹太教的历史遗产密切相关；犹太人逃离古埃及的奴役，进入荒漠，也就是向游牧生活方式的一次逃遁。但不幸的是，这种游牧因素后来被情感主观符号系统的独裁主义吞噬了。

真正的游牧符号系统（nomadic sign system）是对抗指意符号系统，这些指意符号包括希伯来文化的独裁主义，以及像国家机器（state machine）这样的统治机器。游牧就是生成。游牧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严格的符号限制。犹太人为了摆脱古埃及的限制而走上了游牧逃亡路线。德勒兹说，游牧生活犹如幕间曲（intermezzo），它肯定“中间”，高扬“生成”，否定一切关于起源的思想，并向一切抑制系统开动“战争机器”。游牧思想是一种反思想（anti-thought）。反对理性，推崇多元。它立志推翻“我思”（*cogito*），旨在建立一种外部思维（outside thinking）。它攻击总体性、欲变思想为“战争机器”。它抵制普遍的思维主体，结盟于特殊的个别种族。它不寄寓于有序的内在性（interiority），在外在元素中自由运动。它不依赖于骄横的同一性，驾驭着差异的烈马在旷野上任意驰骋。它不尊崇人为划分的主体、概念和存在这三个再现范畴，而用无限界的传导活动（conductivity）取代机械的类比。

游牧思想的空间不同于国家的空间，二者的关系就如同空气之于地球。国家空间（state space）是“条纹状的”、“网格式的，”其中的运动要受水平面引力的限制，因此只能在固定的“点”之间运行。游牧空间（nomadic space）是平滑的，开放的，其中的运动可以从任何一点跳到另一点，其分配模式是在开放空间里排列自身的“诺摩斯”（Nomos），而不是在封闭

空间里构筑战壕的“逻各斯”（Logos）。由此而引申开来的游牧艺术（nomadic arts；游牧科学［nomadic science］）也不同于皇家艺术（royal arts；皇家科学［royal science］）；游牧艺术利用物质（material）和力（force），而不是质料（matter）和形式（form）。皇家艺术借助不变的形式确立常量，规训和控制沉默而野性的质料；相反，游牧艺术试图把变量置于永久变化的状态之中。皇家艺术采取的是质料—形式模式，把形式强加于位于次要地位的质料之上；游牧艺术从不事先准备质料，以使其随时接受某种强制性的形式，而是用众多相关的特性构成内容的形式，构成表达的质料。

思想的平滑空间，思想的游牧式巡回，说到底也就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尼采的“快乐的科学”，阿尔托的“戴皇冠的无政府”，布朗肖的“文学空间”，以及福柯的“外部思想”。这至少说明了游牧思想可以呈现多种形式，就德勒兹和瓜塔里自己的看法，最平滑的平滑空间不是文学，不是哲学，而是数学和音乐。这等于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只要能打破成规，突破旧俗，挖掘出自己所用媒介的潜力，跨越挡在面前的一座座高原的话。

参考文献：

Deleuze, Gilles; 1973; *Proust and Signs*; trans. R. Howard;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Deleuze, Gilles; 1983;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 Tomlinson, London; Athloe.

Deleuze, Gilles; 1988; *Bergonism*; trans. C. Boundas, New York: Zone.

Deleuze, Gilles; 1990;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M. Lester, ed. C.

V. Bounda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1993; *The Deleuze Reader*; Ed. Constantin V. Bounda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1994;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96;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and Forward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uchanan, Lan and Marks, John, etc. (ed.); 2000; *Deleuze and Litera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Boundas, Constantin V. and Olkowsdki, Dorothea (ed.); 2000; *Gilles Deleuze and the Theatre of Philosopher*; London: Routledge.

Colebrook, Claire; 2002; *Gilles Deleuze*; 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Massumi, Brian; 1998; "Deleuze," in *A Companion to Continental Philosophy*; Critchley, Simon and Schroeder, William R. (ed.);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Sedgwick, Peter; 2001. *Descartes to Derrida: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Philosoph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Chapter 3.

目　　录

代前言：德勒兹思想要略 …… 1
柏格森的差异观念 …… 1
重复与差异 …… 27
自在的差异与虚拟性 …… 65
哲学的意义与任务 …… 74
假象与古代哲学 …… 79
什么是少数文学？ …… 111
块茎 …… 129
生成强度，生成动物，生成无感知 …… 162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 272

柏格森的差异观念[①]

差异的观念一定能够解释柏格森的哲学，反之，柏格森主义也一定能对差异哲学做出最大贡献。这样一种哲学始终作用于两个层面，方法论的层面和本体论的层面。一方面，问题是要确定事物之间本性的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归”事物本身，描述它们而不把它们简约为别的东西，掌握它们的实在。但另一方面，如果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事物的实在就在其本性的差异之中，那么，我们可以希望差异本身就是某事物，它有一个本性，将把存在传达给我们。这两个问题，方法论的问题和本体论的问题，永远相互指涉：一个是本性的差异问题，另一个是差异的本质的问题。在柏格森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二者相互依存，也发现了从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

本质上说，柏格森之所以谴责他的先驱者们，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本性的差异。这样一种批判经常出现，表明这是柏格森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主题。在存有本性的差异的地方，我们只保留了程度的差异。毫无疑问，有时也出现相反的谴责：在只有程度的差异的地方，我们引入了本性的差异，比

---

① Gilles Deleuze, trans. by Melissa McMahon, selected from *The New Bergson* (ed.) John Mullarke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3 – 64.

如，在大脑的所谓认知功能和脑髓的反射功能之间，在对物质的认知和物质自身之间。但是，同一个批判的第二个方面既没有第一个那样频繁，也没有第一个那样重要。为了判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追问哲学的目的。如果哲学与事物处于肯定的、直接的关系之中，那它就只能声称如实地抓住了事物本身，抓住了它与其他所有非事物的区别，就是说，抓住了事物的内在差异。反对的意见是：内在差异没有任何意义，内在差异的观念也是荒唐的；但同时还必须否认同类事物之间存有本性的差异。如果同类的个体事物之间存有本性差异，我们就必须有效地认识到那种差异本身不只是时空的，不是普通的也不是特殊的，简言之，它不外在于事物本身，也不超越事物本身。据柏格森所说，表明一般思想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纯粹功用的组合向我们呈现极端不同的给定事物，这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就在于："假定在检验以快乐的名义组合的各种状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状态之间除了是人所寻求的状态之外，别无共同之处：人将对同一类中的不同事物加以分类，因为人在这些事物中发现了相同的实用价值，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性的差异才早已成为解释事物的关键：我们必须从这些差异开始，我们必须首先重新发现这些差异。如果不抱任何偏见地看待作为内在差异的差异的本性，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假定同类事物之间存有本性的差异的话。因此，哲学要么自为地假定这种方式和这个目标（为了达到内在差异而假定本性的差异），要么就只能与事物构成否定的一般关系，以批评或概括告终，不管怎么说，这都只是一种外部反映状态。柏格森置身于第一种观点之内，提出了哲学的理想："为客体剪裁只适于这个客体的一个概念，人们几乎不能说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概念，因为它只适用于那一个事物。"事物与概念的这种统一是内在差异，是通

过本性的差异达到的。

直觉是差异的快乐。但这不仅是方法的结果产生的快乐，它也是方法本身。这样，它就不是一个独特行为，而向我们提出了行为的多元性，冲动和方向的多元性。直觉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决定本性的差异。而由于这些差异存在于事物之间，所以，这是可证实的一个分配问题，需要解决的分配问题。现实必须据其表现而区分，柏格森引用了柏拉图关于雕刻和优秀的厨师那段著名论断。但两个事物之间本性的差异还不就是事物的内在差异自身。我们必须把现实的表现与描写事实的文字区别开来，这些文字决定了另一种直觉冲动。而就与现实的表现的关系而言，如果柏格森哲学呈现为可证实的“经验主义”，那么，在与描写事实的文字的关系上，它就将呈现为“实证主义”，甚或一种或然论。现实的表现根据事物本性的差异分配事物，它们构成了一个微分。描写事实的文字是方向，每一个都被追踪到底，并在同一个事物身上聚敛。它们限定一个积分，每一个事实都构成一条或然的直线。在《精神—能量》中，柏格森向我们表明了在三条事实线索相聚的点上意识的本性。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灵魂的不道德位于两条事实线索相聚的点上。在这个意义上，直觉与假设不是对立的，而将其作为假设包容起来。简言之，现实的表现对应于一种切分，描写事实的线索对应于一种“再切分”。当然，在每一种情况下，它们都不遵循相同的路线，而重要的是感觉或感觉的取向，追寻那种聚敛或趋向一种聚敛。我们总能感觉到差异的两个方面：现实的表现给了我们事物之间本性的差异；事实线索向我们表明事物本身与其差异是同一的，物的内在差异与物是同一的。

因此，忽视本性的差异而热衷于样式就是背叛哲学。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些本性的差异。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一种科学面

前，它用程度的差异替代了本性的差异；也来到一种形而上学面前，它更特别地替代了强度的差异。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科学：我们怎样才能只看到程度的差异？“我们使质的差异融入包含着这些差异的同质性空间之中。”众所周知，柏格森诉诸需要、社会生活和语言、理智和空间的联合运作，这里的空间是理智从一种易感物质中创造的空间。简言之，我们用纯粹功用性的组合模式替代现实的表现。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功用不可能构成使功用成为可能的东西的基础。我们因此必须坚持两点。首先，程度具有一种有效的现实，而且，在一种并非空间的形式中，已经以某种方式被包容在本性的差异之中了：“在我们的质的区别的背后”，往往是数字。我们将看到，柏格森最新的思想之一是，差异本身有一个数字，一个虚拟的数字，一种用来数数的数字。于是，功用只解放和传播了包含在差异之中的程度，最终证明这种差异也不过是一种程度而已。但在另一方面，如果程度可以解放出来以构成差异自身，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经验状态中寻找这一转变的理由。空间呈现给理解力的，理解力在空间中发现的，是事物，产品，结果，而非别的什么。然而，在事物之间（在结果的意义上），除了比例的差异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在本性中存异的不是事物，也不是事物状态，不是品格，而是倾向。特殊差异的观念之所以不令人满意，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们所注意的并不是出现的品格，而是这些品格自身发展的倾向。“组合不能根据所具有的品格来定义，而应通过突出这些品格的倾向。”所以，柏格森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表明，倾向的重要性不仅与其产品相关，而且与这些产品在时间中的原因相关，而只有从产品本身开始，才能回顾性地获得这些原因：自在的物和具有真实本性的物在成为一个原因的结果之前表达一种倾向。总之，简单的程度差异将是脱离倾向、从其根本原因来理解的事物的准

确状态。原因实际上属于量的领域。比如，无论从其产品或从其倾向来考虑，仅就与动物大脑的关系而言，人脑将表明一种简单的程度差异，或全部的本性的差异。于是，柏格森告诉我们，从某一特定观点来看，本性的差异消失了，或者说，不可能出现。通过置身于这种观点之中，他谈及静止的和能动的宗教，我们将看到“两个事物之间表面上程度的过渡和差异，而实际上性质迥异”。事物，产品，结果，始终是混合物。空间所能展示的，智力所能发现的，只能是混合物，封闭与开放的混合，几何秩序和生命秩序的混合，认知与情感的混合，认知与记忆的混合……。必须理解的是，这种混合物无疑是性质不同的各种倾向的混合，但是，这种混合也是一种事物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不可能确立任何本性的差异。这种混合物正是我们从一种观点所看到的东西，根据这种观点，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同的。从定义上说，这种同质性就是混合，因为简单的东西总是在性质上有所区别的东西：只有倾向是简单的、纯粹的。这样，我们只能通过超越其产品而再次发现倾向来发现真正有所区别的东西。我们必须利用混合物所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即程度或比例的差异，因为我们得不到别的东西，但我们只能把它们用作这个倾向的尺度，以便达到用作特定比例的充足理由的那种倾向。“这种比例差异足以定义它所属的组合，假如我们能够确定它不是偶然的，而所涉及的组合则越来越倾向于强调这些特殊的品格。”

就形而上学而言，它所保留的除了强度差异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柏格森向我们表明了贯穿古希腊形而上学的这种强度视觉：由于这种形而上学把空间和时间定义为一种简单的张弛，对实在的减缓，所以，它发现实在自身之间只有强度的差异，因而将其置于完美与虚无这两个极限之间。我们将看到这种幻觉是如何产生的，又是什么促成了本性的差异的。我们已

经注意到，它与其说基于混合的观点，毋宁说基于伪观点、混乱、虚无。但伪观点、混乱和虚无仍然是混合的观点，而强度的幻觉是以空间强度的最后瞬间为基础的。说到底，只有一种虚假问题：这些问题的表达并不注重本性的差异。直觉的作用之一就是放弃其作用的任意性。

为了到达真正的差异，我们必须重返混合物分化自身的那个视点。倾向构成了相互间的双重对抗，构成了本性的差异。倾向才是主体。一个实在（être）不是主体，而是倾向的表达，此外，一个实在仅仅是一种倾向的表达，这是因为它与另一种倾向相对比。正是在这方面，直觉才呈现为差异或分化的方法：即把混合物分成两种倾向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是空间分析，不仅仅是对经验的描述，（表象上）也算不上是一种超验分析。它确实达到了给定目标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就是倾向—主体，它们本身就是以一定方式给定的，就是所经历过的。此外，它们同时既是纯洁的又是经验过的，既是活生生的又是经验过的，既是绝对的又是经验过的。本质的东西在于基础就是基础，但是，它仍然还是被经验过的，而我们知道柏格森是在多大程度上坚持生命冲动的经验性质的。我们把自身提高到作为一切可能的经验的条件的层面，但却又将这些可能的条件当作真实经验的条件：谢林已经给自己树立了这个目标，把他的哲学定义为一种高级经验主义。他的公式非常适合柏格森。如果这些条件能够而且必须通过直觉来捕捉，那恰恰因为它们是真正经验的条件，因为它们并不比被条件制约的东西宽泛，因为它们构成的概念与其客体是同一的。因此，柏格森哲学中含有一种充足理由的原则和不可识别性原则，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他所拒绝的是一种分配，这种分配把理性置于样式或范畴之中，把个体留在了偶然的领域，就是说留在了空间里。理性必须紧紧跟随个体，真正的概念必须紧紧跟随事物，

跟随对“此”的理解。为什么这样而非那样？柏格森经常提出这个差异的问题。为什么认知唤起这样的一种记忆而非另一种？为什么认知“搜集”一些常见的数据，这些数据而非另一些？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绵延的强度？事实上，理性一定是柏格森称之为细微差别的理性。心理生活中没有偶然事件：细微差别就是本质。只要适于客体本身的概念，即“独一无二的概念”，还没有被发现，那么，我们就可以满足于用几个概念解释客体，即用“认为这个客体参与其中的”的普遍思想来解释：那么，所捕捉不到的就是：客体是同一个样式的这种而非另一种，而在这种样式中，它拥有这些比例而非另一些。只有倾向才是概念与其客体的统一，客体和一般概念都不是偶然的了。但关于方法的所有这些细节看来都不能避开它所走向的死胡同。混合物必须分化为两种倾向：混合物自身比例的差异并不能告诉我们怎样发现这些倾向和分化的规律是什么。此外，这两种倾向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呢？这两种倾向不是相等的，它们具有不同价值，总是要有一个主导倾向。而只有这种主导倾向才决定混合物的真实性质，只有它才是独一无二的概念，纯粹的概念，因为它是相对物的纯洁性：另一种倾向是与其相妥协、相对比的不纯洁性。动物行为把本能作为主导倾向展示给我们，而人类的主导倾向是理智。在认知与情感的混合中，情感扮演的是不纯洁的角色，把自身与纯粹的认知混合起来。换言之，分化有右翼和左翼之分。我们用什么规则来确定它们？我们由此再度发现了柏拉图早已经遭遇过的一个难点。他如何回驳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即柏拉图式的差异方法不过是经不起一驳的三段论，不能确定用政治被分化的样式的哪一半去寻找所寻求的思想，因为它缺少一个中间条件。此外，柏拉图似乎比柏格森具有更好的装备，因为超验的善能有效地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柏格森一般拒绝终极性的帮助，他似乎想让

差异的方法达到自足。

这个难点也许是虚幻的。我们知道，真实的表达并不界定方法的本质和目的。毫无疑问，两个倾向之间本质的差异标志着两个事物之间差异关系的进步：但它仍然是一种外在差异，仍然存在于外部的差异。在这一点上，柏格森式的直觉并不缺乏可用作规则的外在条件，就可以达到完整，相反，它仍然呈现太多的外在性。不妨举个例子：柏格森表明，抽象时间是空间和绵延的混合物，而深刻的是，空间本身是物质与绵延的混合物，是物质和记忆的混合物。于是就有了把自身分化为两种倾向的这种混合物：物质实际上是一种倾向，因为它被界定为一种张弛；绵延是一种倾向，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收缩。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柏格森著作中关于绵延的所有定义、描述和性质，我们发现，性质差异终归不在两种倾向之间。最后，性质差异本身就是这些倾向之一，而且与另一个倾向相对立。那么绵延究竟是什么呢？柏格森关于绵延的论述始终离不开这一点：绵延就是区别于自身的东西。相反，物质是不区别于自身的东西，是重复自身的东西。在《时间和自由意志》中，柏格森不仅表明了强度是把自身分化为两种倾向的一种混合物，这两种倾向是纯粹的质和绵延的量，但更加重要的是感觉的属性，那种感觉是纯粹的质，而那个纯粹的质或感觉又在本质上区别于自身。感觉是在性质上而不是在规模上发生变化的东西。精神生活因此是其自身性质的差异：在精神生活中，总存在着没有一定数量或若干数量的他性。柏格森区别了三种运动：质的运动，广延的运动和进化的运动。但这些运动，即便是像阿基里斯式的纯粹转换，其本质仍然是变化的。运动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运动。简言之，绵延是所区别的东西，所区别的已不再是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东西了，而是与自身相区别的东西。所区别的东西本身成了一个实体，一种本质。柏

格森的论题可以这样表示：真正的时间是变化，而变化是本质。因此，性质的差异不再是两个事物之间或两种倾向之间的差异，性质差异本身是一个实体，将自身与另一种倾向相对立的一种倾向。分解这个混合物所得出的不仅仅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倾向，而是两种倾向之一的性质差异。同样，那种差异也因此变成了本质，运动已不再是事物的特点了，而是本身具有了本质特点，它不是任何事物的前提，没有什么运动着的客体。绵延，倾向，是自身与自身的差异；而区别于自身的东西即刻成为本质与主体的统一。

我们同时懂得了如何分化那个混合物，以及如何选择正确的倾向，因为在右边总是有与自身相区别的东西，也就是绵延，它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向我们揭示它的一个方面，它的一个“细微差别”。但我们还注意到，根据这种混合物，一个相同条件有时出现在右边，有时出现在左边。动物行为的分化把智力置于左边，因为绵延，即生命冲动，是通过它们表现为本能的，而在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中则出现在右边。但智力在变换立场时不能不把自身表现为一种绵延，这一次是在人性中：如果智力具有物质的形式，那么其感官就是绵延，因为它是统治物质的器官，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感官。绵延有几个方面是以细微差别的形式出现的，这不应该使我们惊奇，因为它是与自身相区别的。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追根问底，直到把物质看作是绵延的最后一个细微差别。但是，为了理解这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回忆一下差异已经变成了什么。它已不在两种倾向之间了，它本身成了其中的一种倾向，而且总是在右边。外在差异已经变成了内在差异。性质差异本身变成了一种性质。此外，它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实在的表达和事实的线索才相互指涉：对实在的表达也描画了事实的线索，这至少向我们表明了内在差异是它

们汇聚的界线，反过来，事实的线索也给了我们对实在的表达，比如，三条不同的直线的汇聚将在《物质与记忆》中把我们引向主体与客体的真正分配。性质差异只在表象上是外部的。甚至在表象上它也已经将自身区别于程度差异，区别于强度差异，区别于特殊差异。但在内在差异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必须做出其他区别。实际上，如果绵延本身可以呈现为本质，那就是说它是简单的，不可分化的。变化必须维持自身，不致自行化简为多元性，甚至化简为矛盾，或者他性。内在差异一定要区别于矛盾，他性和否定。正是在这里，柏格森的差异理论和方法区别于另一种差异理论和方法，即辩证的差异理论和方法，如柏拉图的辩证他性和黑格尔的辩证矛盾，二者都暗示着否定力量的在场。柏格森差异观念的原创性在于表明了内在差异并不、也不必达到矛盾、他性和否定的程度，因为这三个概念事实上没有它本身深奥，或许仅仅是这种内在差异的外在表现。如此看待内在差异，即看作纯粹的内在差异，达到纯粹的差异概念，把差异提高到绝对，这就是柏格森努力的方向。

绵延只是两个倾向之一，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之一；但是，就全部存在而言，如果它区别于自身，那么，它真的不包含另一半的秘密了吗？它怎么还能离开它与之相区别的自身的外部，即那另一种倾向呢？如果绵延区别于自身，那么，它所区别的东西就肯定仍然是绵延。这并不是像分化混合物那样去分化绵延的问题：绵延是简单的、不可分化的、纯粹的；而是别的问题：简单的东西不分化自身，它区别自身。自我区别是简单事物的本质或差异的运动。因此，混合物分解成两个倾向，一个是不可分化的，但不可分化的倾向却把自身区别成两个倾向，另一个是分化的原则。空间被分解成物质和绵延，但绵延将自身区别为矛盾和张弛，张弛是物质的原则。有机形式分解成物质和生命冲动，而生命冲动又分解成本能和智力，智

力是物质转换成空间的原则。混合物的分解和简单事物的区别显然不是相同的：差异方法把这两种运动结合起来。但现在我们必须就这种区别力提出问题。这将引导我们走向纯粹的内在差异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最终决定将表明区别于绵延的东西何以仍然是绵延。

在《绵延与同时性》中，柏格森把绵延归结为一股奇异的包容自身的力量，根据注意力的性质，这股力量既能把自身区别为不同的差异流，又可以使自身集中在单一的流动上。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虚拟性这个根本概念出现了，并将在《物质与记忆》中得到深入探讨：绵延，不可分化的东西，并不是确实不可分化的东西，而是在分化自身的过程中发生性质变化的东西，而发生这种性质变化的东西界定了虚拟性或主体。最终，我们将在《创造进化论》中找到必要的信息。生物学向我们展示了作用着的差异过程。我们之所以探讨差异概念，是因为它不能被化简为程度或强度，也不能化简为他性或矛盾：这样一种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其概念本身不是生物学的。生命是差异过程。在此，柏格森考虑的与其说是胚胎的差异，不如说是种属的差异，也即进化。在达尔文那里，差异和生命的问题在进化的概念中变成同一的了，尽管达尔文本人并没有真正提出生命差异的概念。依据某种机械方法，柏格森表明生命差异是一种内在差异。但是，那种内在差异也同样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决定：一个决定可能是偶然的，或至少它的存在相关于某一原因、目的或机会，这样它才暗示一种存在的外在性。此外，几种决定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联想的关系，或增补的关系。生命差异不仅不会成为一种决定，反而会成为它的反面。它本身将趋向于非决定。柏格森始终坚持认为生命形式的属性是不可预测的："不可确定的，即是说，不可预测的。"在柏格森那里，不可预测的和不可确定的并不是偶

然的，相反是本质的，是偶然性的反面。在把差异变成一个简单决定的过程中，我们要么把它交到偶然性的手上，要么就必然把它作为某事物的功能，而同时还将其置于与生命的偶然关系之中。但变化的倾向并非与生命处于偶然的关系中；此外，变化本身并非是偶然的，生命冲动“是变种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差异不是一个决定，而是在与生命的本质关系中的一种区别。毫无疑问，区别来源于生命在物质中遭遇的抵制，但它首先来源于生命本身携带的内在爆发力。“生命倾向的本质就是扩散自身，通过纯粹的成长事实创造不同的方向，每一个方向都将接受一定量的冲力”：虚拟性的存在在于它通过分解自身来实现自身，在于它被迫分解自身以便实现自身。自我区别是虚拟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运动。生命区别自身，这样我们才发现我们面前的不同的进化路线，而在每一条路线上我们都面对着原始程序。但它仍然只区别于它自身，以至于在每一条路线上，我们也将发现一些机器，一些通过不同方式获得的相同的器官结构。序列的偏差和一些机器的同一性：这就是整个生命的双重运动。区别的概念同时设定了虚拟的简单性，它于中实现自身的序列的偏差，以及它在这些序列中产生的基本结果的相似性。柏格森解释了何种程度上的相似才能成为重要的生物学范畴：它是区别于自身的同一性，它证明一个相同的虚拟在序列的偏差中实现自身，它表明变化中存在的本质就如同偏差表明的在本质中发生作用的变化本身一样。“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序列事件加在一起，有多大的可能性使两种完全不同的进化得出相同的结果呢？”

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柏格森又回到了这个区别的过程上来：二分法是生命的法则。但新的东西也随之出现了：除了生物学的区别外，还有一种正当的历史区别。毫无疑问，生物学区别在生命自身发现了生命原则，但它同样与物质

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的产品仍然是分离的，相互外在的。“它们所呈现的物质形式（种属）阻止它们相聚，以防把比它们更强烈的、更复杂的、更圆满进化的原始倾向再度恢复。”对比之下，在历史的层面上，正是在相同的个体、相同的社会里，通过分解而构成自身的那些倾向才得以进化发展。从那个观点来看，它们的进化是成功的，但却是在相同的存在中：人将尽可能朝着一个方向走，然后再转向另一个方向。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是因为柏格森在这样的文章中很少承认历史与生命的特殊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人，只有人，才能意识到差异，并将其提到自觉的高度。如果差异本身是生理的，那么，对差异的意识就是历史的。诚然，我们不必夸大对差异的这种历史意识的功能。按柏格森所说，这种意识与其说促成了新事物，毋宁说解放了旧事物。意识已经存在，随差异而存在，并存在于差异之中。绵延本身就是意识，生命本身就是意识，但这是据权利而言。如果历史就是激活意识的东西，或者说是激活自身、将自身置于事实之中的场所，那么，这仅仅是因为这种与生命相认同的意识是睡眠，是麻木的质料，是被抹掉了的意识，而不是根本没有意识。柏格森的意识根本不是历史的，历史只不过是意识在经历了质料之后重新出现的惟一地点。因此，在差异本身与差异意识之间原则上应该存有一种认同：历史永远只是事实。差异与差异意识之间原则上的认同是记忆；记忆最终将向我们表明纯粹概念的性质。

但是，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再次看到，区别的过程又是何以把柏格森的方法与辩证的方法区别开来的。柏拉图与柏格森之间的最大相似之处在于二者在思考差异的时候创造了一种差异哲学，而不是将其化简为矛盾，差异还没有达到矛盾点。但分离点，不是惟一的、而是最重要的分离点，似乎必然存在于柏拉图的终极原则中：只有善才能说明事物的差

异，让我们理解自在的事物，如苏格拉底坐在监狱里的著名例子所示。因此，在柏拉图的二分法中，善是选择原则。在柏拉图那里没有直觉，而只有善激发的灵感。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至少有一个文本是柏拉图式的：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他表明，为了重新发现对实在的真实表达，我们必须提出关于功能的问题。每一种才能都有什么用途？比如，“制造神话”的才能有什么用途？在此，物的差异来自它的用途，它的目的，它的目标，即善。但是，我们知道，对实在的切割或表述仅仅是方法的最初表达。主宰物的分配的显然是物的功能，物的目的，以至于在这个层面上，它们似乎从外部接受自在的差异。但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柏格森既批评了终极性概念，又没有阻止对实在的表述：物自身及其相对应的目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方面被看作它在空间中形成的混合物，另一方面被看作其纯粹绵延的差异和简单性。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谈论目的了：当差异成了物自身时，就没有必要说物从其目的性获得差异性了。因此，柏格森的差异概念使他能够避开对终极性的依赖，这与柏拉图恰好相反。我们也可以用柏格森的一些文本预测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而他实际上进一步发展的恰恰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不是柏拉图的。在柏格森那里，而且多亏了他的虚拟观，物首先与自身相区别。据黑格尔所说，物与自身相区别，是因为它首先区别于它所不是的东西，甚至于使差异达到矛盾的程度。对立与矛盾之间的区别在这里对我们无关紧要，矛盾只不过把整体呈现为反面。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的游戏取代了差异。“不能让人同时采取两种对立观点的这种具体现实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个现实并不涵盖在两个对立概念之下。”因此可以说，按照这两种观点，物得到了重构，比如，绵延就是一与多的综合。但是，如果柏格森反对柏拉图主义是因为它停滞在差异的静态的

外在观念上，那么，他反对矛盾的辩证法就是因为它仍然坚持纯粹抽象的差异概念。“[两个矛盾概念的]这种综合所能呈现的既不是程度的多样性，也不是形式的变种：它是或不是。”既不包含程度又不包含细微差别的东西是一个抽象物。因此，矛盾的辩证法本身缺乏差异，而差异则是细微差别的逻辑。最后，矛盾仅仅是柏格森所拒斥的许多回顾性幻觉之一。将自身区别为两种不同倾向的东西是一种虚拟，因此也是实现自身的绝对简单性。我们用这两种倾向的特殊因素将其作为对实在的东西加以构造，但这些特殊因素却只是其自身发展所创造的。我们认为绵延区别于自身，因为它首先是两种对立决定的产物。我们忘记了它区别于自身是因为它首先有别于自身。一切又回归到柏格森对否定因素的批判上来：在不加否定的情况下达到差异的概念，同时又不包含否定因素——这就是柏格森付出的最大努力。在对虚无或矛盾的批判中，以及在对混乱的批判中，他试图表明，用他者来否定现实只是肯定地实现虚拟，因而使虚拟同时包含否定和肯定。“在此，斗争仅仅是进步的表面。”因此，正是由于忽视了虚拟，我们才相信矛盾，相信否定。两个术语之间的对立仅仅是虚拟的实现，这个虚拟包含着两个术语：就是说，差异比否定、比矛盾深刻。

区别不管多么重要，它都不是最深刻的。如果是，那就没有理由谈论差异的概念了：区别是一种行为，一种实现。所区别于自身的东西首先是与自身不同的东西，就是说，是虚拟。区别不是概念，而是客体的生产，它们在概念中找到了理由。但是，如果不同于自身的东西真的必须是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么，虚拟就必须具有一致性，一种客观的一致性，以使它区别于自身，以使它生产这种客体。在题献给拉韦松的重要文章中，柏格森解释了用来确定颜色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抽取颜色的抽象和一般概念，从红色中抽取出使其变成红色的东

西，从蓝色中抽取出使其变成蓝色的东西，从绿色中抽取出使其变成绿色的东西：于是得出一个概念，由于许多客体拥有同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就成了一个类型。有一种概念和客体的二重性，而客体与概念的关系是一种涵盖的关系。于是，人们停留在空间区别的层面上，停留在外在于物的差异状态。另一种方法是用聚光镜透视颜色，把颜色聚集在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获得的是“纯白光”，“体现色泽之间的差异”。这样，不同的颜色便不再被涵盖在一个概念之下了，而变成了概念本身的细微差别或程度，差异本身的程度，而不是程度的差异。其关系也不再是涵盖的关系了，而是参与。白光仍然是普遍的，但却是具体的普遍，使我们能够理解特殊，因为它本身就位于特殊的极端。正如物变成了概念的细微差别或程度一样，概念本身也变成了物。我们可以说，它是普遍的物，因为客体在那里被不同程度地勾画出来；但也是一个具体的物，不是种类或一般性。严格说来，同一个概念不再有若干个客体了，由于概念与物本身相认同，于是，与其相关的客体之间便出现了差异，而非相似性。这就是内在差异：概念成了差异的概念。这种高尚的哲学目标要求什么呢？我们必须放弃在空间中思维：空间区别实际上“不包含程度”。我们必须用时间差异代替空间差异。时间差异的特殊性就是要使概念变成具体的物，因为物包含着许多细微差别或程度，它们自行出现在概念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才把差异以及概念置于时间之中。“事实上，如果精神的最卑贱功能就是把物绵延的连续时刻捆束起来，如果它因此而接触到物质，并因此而首先区别于物质，我们就能想象在物质与充分发展的精神之间存有无限的程度。”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区别是时间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区别是程度问题，但不是简单的程度差异。因此，我们看到，虚拟是何以成为纯粹的差异概

念的，这样一个概念又能变成什么：这样一个概念是程度或细微差别的可能共存。如果我们不管这种明显的悖论，而像柏格森那样称记忆为这种可能的共存，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生命冲动没有记忆深刻，而记忆又没有绵延深刻。绵延、记忆、生命冲动构成了概念的三个显然不同的方面。绵延是与自身的差异；记忆是差异的不同程度的共存；生命冲动是差异的区别。这三个步骤界定了柏格森哲学的系统结构。记忆的意义在于给绵延自身的虚拟性一种客观一致性，从而使其成为一种具体的普遍，使其实现自身。当虚拟性实现自身时，就是说，当它区别了自身时，它就通过了生命，呈现为生命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差异真的成了生命。但是，虚拟性只能用与它相共存的程度来区别自身。区别只是分离在绵延中共存的东西。在深刻的意义上，对生命冲动的区别就是差异自身的各个程度。而区别的结果则是与概念绝对一致的客体，至少作为纯粹的客体与概念相一致，因为它们实际上不过是概念本身的不同程度的补充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别的理论才没有细微差别或程度的理论那样深刻。

虚拟现在界定一种绝对肯定的生存模式。绵延是虚拟；这种虚拟或这种绵延的程度是真实的，因为这个程度区别自身。比如，绵延本身并不是心理的，但心理却代表绵延的某种程度，它在其他程度之间或当中实现自身。毫无疑问，虚拟本身是非活动模式，因为它的活动仅仅是区别自身，不再是自身，而同时又保持它的起源。但是，它正是在这方面才称得上是所是的模式。这是柏格森特别著名的一个命题：虚拟是纯粹的回忆，而纯粹的回忆是差异。纯粹的回忆是虚拟，因为在实际存在和已经实现的东西中寻找过去的标记是荒唐的，记忆不是对某事的再现，它什么也不再现，它就是实在，而如果我们必须要谈再现的话，那么，“它不再向我们呈现已经存在过的东西，

而只是现在所是的东西，……它是现在的记忆”；实际上，它大可不必形成和构成，不必等待认知的消失，它不是随认知而产生的。过去与作为过去的现在的共存是柏格森的一个本质命题。但是，根据这些特点，当我们说以这种方式界定的回忆是差异本身时，我们是在同时说两件事。一方面，纯粹的回忆是差异，因为任何一个记忆都不同于另一个记忆，因为每一个记忆当时都是完美的，因为它同时也总是将来的实在：差异是回忆的客体，正如相似性是认知的客体一样。为了接近事物之间各不相象的这个世界，做梦就足够了；纯粹的梦者决不会离开特殊，他只能捕捉差异。但回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差异，它携带差异；因为如果当下的要求真的引入了记忆之间的相似性，那么，相反，回忆也在当下中引入了差异，就是说，它把后续的每一时刻构成了新的东西。过去保留的自身就是“后续的时刻总是包含着的前一个时刻，即前一个时刻留给后续时刻的记忆”，根据这一事实，“内在绵延就是一个记忆的延续生命，它把过去延续到现在，不论现在是否明显包含着过去不断增大的形象，或者通过其不断变化的性质，证实在旧的性质所发展起来的那个性质背后拖着的不断加重的负担。”柏格森以不同于弗洛伊德但与弗洛伊德同样深刻的方式认识到记忆是未来的一个功能，记忆和意志只不过是同一个功能，只有能够记忆的存在者才能脱离过去，脱离自身，不重复自身，从而从事新的事业。这样，“差异”一词就既指作为实在的特殊，又指所构成的新事物。回忆既是根据与其相伴的认知的关系界定的，又是根据它所延长的后续时刻界定的。把这两种感觉结合起来，就产生一个奇怪的印象：同时既作用又被作用的印象。但是，因为我的认知已经是下一个时刻了，那么，这两种感觉又怎能不结合呢？

我们先来谈谈第二种感觉。我们知道这个有关新奇的观点

在柏格森关于未来和自由的理论中有多么重要。但我们将研究这个概念的最准确层面，即它所形成的时刻，似乎是在《时间与自由意志》的第二章。说过去保留在自身之内而被延长到当下，就等于说下一个时刻在前一个时刻还没有消失时就出现了。这设定了一个矛盾，而且是界定绵延的矛盾。与矛盾相对立的是纯粹的重复或物质：重复是某一当下的模式，只有当另一个模式消失时它才出现，是瞬间的自身或外在性，振颤，张弛。对比之下，收缩表指差异，因为就本质来说，在收缩状态下不能进行重复，因为它破坏了重复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差异是新的，是新事物自身。但我们怎样界定一般的新事物的出现呢？在《时间与自由意志》的第二章，我们将发现这个问题再次与休谟的名字联系起来。休谟追问一个纯粹的重复，相同情况的重复，虽然不能在客体中生产新的东西，却能沉思它在精神中生产的新的东西，并据此提出了因果律问题。这个“新的东西”，对 n 次幂的期待，就是差异。答案是：如果重复在观察它的精神中产生一种差异，那么，这是由人性的各种原则所使然，主要是习惯的原则所使然。当柏格森分析钟声或锤子的敲打时，他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问题，并以类似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在客体中生产的新东西只不过是在思考这些客体的精神中的一种“融合”，一种“相互渗透”，一种“组织”，即当下的一个事物出现时对尚未消失的前一个事物的保留，简言之，即在精神中发生的一种收缩。在休谟与柏格森之间甚至存在着进一步的相似性：同样，在休谟那里，类似的情况在想象中融合，而想象同时在理解中仍然是独特的；在柏格森那里，状态在绵延中融合，而绵延同时又保持着它们所缘自的某种外在性；柏格森正是根据这最后一点来说明空间的建构的。因此，收缩是在精神之内发生的，它就像是精神的起源，导致差异的产生。此后，而且只能在此后，精神再次出于自身的原因

呈现差异，它收缩，收缩自身，如在柏格森的自由论中所看到的。但是，只要抓住其起源的观念就足够了。

绵延与物质不仅在性质上不同，而且，所不同的东西是差异本身和重复。我们于是发现了以前的一个难点：性质的差异同时既出现在两个倾向之间，而且，更深刻的是，又是这两种倾向之一。这并不是差异惟一的两种状态，还有另外两种：特权的倾向，右手的倾向，它可以把自身一分为二，它可以区别自身，是因为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差异包含着程度。我们现在所必须要聚集起来的正是这四种状态：性质差异，内在差异，区别和差异的程度。我们的指导线索是：（内在）差异（在性质上）有别于重复。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陈述并未达到平衡：据说差异既是内在的，然而又区别于外部。如果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个结局的梗概，那是因为柏格森努力向我们表明了差异仍然是一种重复，而重复已然是一种差异了。实际上，重复，物质，的确是一种差异；这种摇摆非常特别，因为当一方正在消失时，另一方已经出现了。柏格森并未否认科学试图捕捉差异自身，而且几乎成功了；他在无限小的分析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努力，这是一种真正的差异科学。此外，当柏格森向我们表明生活在特殊之中的梦者仅仅抓住纯粹的差异时，他告诉我们，精神的这个领域再次与物质融合，做梦就等于解除利害关系，就等于中立。因此，把重复与一般性混同起来就是错误的，相反，一般性假定精神的收缩。重复不在客体中创造什么，它让客体保持原状，甚至保持客体的特殊性。重复确实构成客观种类，但这些种类本身并不是一般思想，因为它们并不包含许多相象的客体，而只向我们呈现以相同方式重复自身的一个客体的特殊性。因此，重复是一种差异；只不过它是始终外在于自身的一种差异，对自身中立的一种差异。相反，差异反过来也是一种重复。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就起源和起源的

行为而言，差异是一种收缩。但这种收缩的结果是什么呢？它产生否则便被重复的共存。精神的起源仅仅是相同因素的收缩，正是由于这一点它才是记忆。当柏格森向我们谈起记忆时，他总是谈到它的两个方面，第二个总比第一个深刻：记忆—回忆和记忆—收缩。在收缩中，被重复的因素与自身共存，繁殖自身，也可以说保存自身。收缩的程度正是以这种方式界定的，每一个程度在自己的层面上向我们呈现了因素自身的自我共存，也就是整体。因此，在被界定为自在的共存的记忆中不存在悖论。因为共存的各种可能的程度反过来又是共存的，构成了记忆。物质重复的相同因素在收缩中融合；这种收缩同时向我们表明某种新东西——差异，而程度就是这个差异本身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差异才仍然是重复；柏格森不断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因此，必须假定同一种精神生活要在不同的记忆故事中重复无数次，而同样的精神行为也必须在不同的高度进行"；锥体的各个部分就是"我们过去整个生活的许多次重复"。我们看到，在这种精神重复与物质重复之间仍有待于区别：我们过去生活的全部在同一个时刻无限地重复，而那种重复是虚拟的。此外，虚拟性不过是从这种原始重复获得一致性的。"这些平面……并不是作为一个叠加在另一个之上的现成品。相反，它们虚拟地存在，相当于正常的精神事物的那种存在。"在此，我们几乎可以说，对柏格森来说，连续和绵延的是物质，是共存："足够有力、与所有现实利益充分脱离的对生命的专注，将在一个未分化的现在中包含意识人的整个过去。"但绵延是一种虚拟的共存；空间是完全另外一种共存，一种真正的共存，一种同时性。界定绵延的虚拟共存之所以同时又是真正的连续，而最终，物质所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连续，毋宁说是同时性的简单物质，一种真正的共存，一种并置，原因就在于此。简言之，精神的各个程度就是许多虚拟的

收缩层面，或张力层面。柏格森的哲学是成功的宇宙学，其中一切都是张力变化，没有别的。绵延，由于是呈现给直觉的，能够显示为上千种可能的张力：显示为无限的张弛和收缩。柏格森责怪对立概念的纯粹综合只能呈现事物的整体，而没有程度或细微差别。相反，直觉让我们“在无限的可能的绵延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应该努力上溯或下溯的整个连续的绵延。”

作为特殊性的差异，和作为个性、不确定性和创造自身的新奇的差异：这两种差异概念能结合吗？这两种概念只能通过并在收缩的共存程度中结合。特殊性有效地将自身呈现为最大的张弛，一种传播，一种扩张；在锥体的各部分中，以个体形式携带记忆的正是底部。“当底部加宽时记忆越来越收缩，越来越具个性，各个部分也就呈现越来越相同的形式。”收缩越是张弛，记忆就越具有个性，就越相互区别和局部化。特殊存在于张弛或扩张的极限，它的运动将由它准备的物质自身来延长。物质和绵延是张弛和收缩的两个极端层面，如同绵延本身的纯粹过去和纯粹现在是回忆和认知一样。我们因此看到，现在将被界定为相象，甚或普遍性。生活在纯粹的现在的一个存在者将卷入这种普遍之中，“习惯之于行动就如同一般之于思想。”但以这种方式相对立的两个术语仅仅是共存的两个极端程度。对立只是两个极端程度的虚拟共存：记忆与所记忆的东西的共存，与相对应的认知的共存；现在只是记忆的最收缩的程度，它是最近的过去。我们因此可以在二者之间发现所有中间程度，即一般性的程度，或本身构成一般思想的程度。我们能看到物质在哪个程度上不是一般性：真正的一般性预设对相似性的认知，是一种收缩。一般的思想是能动的整体，一种摇摆：“事实上，一般思想的本质将不停地往返于行动的平面和纯粹记忆的平面之间”，“它包括从一个到另一个的双向流动。”但我们知道，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程度易于把这些极端重构为

区别的产物：我们知道，程度论是区别论的基础：两个程度在记忆中相互对立，这足以同时把中间程度区别为两种性质不同的倾向或运动。由于过去和现在是两种对立的程度，所以，它们在性质上不同，它们就是区别，是整体的分化。在每一个瞬间，绵延都将自身分化成两个对称的马镫，“一个回溯到过去，而另一个则向前跳入未来。”说现在是过去的最收缩的程度，也就是说它在性质上与过去相对立，是即将发生的将来。我们讨论的是差异的第二个概念：新事物。但这个新事物究竟是什么呢？一般思想就是这个整体，它把自身分化为特殊形象和具体态度，但这种区分本身仍然是程度的总和，这些程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一个极端置于另一个极端之中。一般思想就是把记忆置于行动之中的东西，就是把记忆与行为组织起来的东西，就是把记忆改造成认知的东西，更确切说，就是制造形象的东西，使衍生于过去的形象“越来越能够插入动力图表”的东西。把特殊置于普遍之中——这就是一般思想的功能。新奇，新事物，恰恰位于被置于普遍当中的特殊之中。新奇显然不是纯粹的现在：纯粹的现在就如同特殊的记忆一样，易于变成物质状态，不是由于其传播，而是由于其瞬间性。但是，当特殊降低为普遍、或记忆变成运动时，自动行为就让位于自觉的和自由的行为。新奇是一个存在者的特性，它于同时往返于普遍与特殊之间，将其相互对立起来，把后者置于前者当中。这样一个存在者同时也思想、意志和记忆。简言之，把差异的两个概念结合和再结合的东西是一般性的各个程度。

柏格森给许多读者的印象可能是模糊和不连贯。模糊是因为他最终告诉我们，差异是不可预测的，差异本身就是不确定性。不连贯是因为他似乎一个接一个地拿回了他所批判的每一个观念。他的批判涉及程度，但在这里，这些程度又回到了绵延的前沿，致使柏格森主义变成了程度哲学：“我们经过了无

数难以察觉的阶段［程度］，从时间流程中的一连串回忆到表明这些阶段的起源或可能的空间行动的运动”，记忆因此逐渐把自身改造成了认知。同样，自由也有不同的程度。柏格森式的批判尤其涉及到强度，但是，然后，张弛和收缩又被当作基本的解释原则：“在野蛮物质与最能进行反思的精神之间有各种可能的记忆强度，或最终变成同一事物的东西，即自由的各个程度。”最后，他的批判涉及否定与对立，但在这里，它们又与否定的观点一起被重新引进：几何秩序是否定的，它产生于“对真正实证性的反省”，产生于一种“干扰”；如果我们把科学与哲学加以比较，我们看到，科学不是相对的，而“涉及一种秩序的反面的现实”。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种不连贯的印象会得到证实。首先，柏格森的确回到程度的话题上来了，但讲的不是程度的差异。他的整个思想是：存在中没有程度的差异，而只有差异本身的程度。程度差异之前的各种理论恰恰混淆了一切，因为它们还没有看到性质的差异，它们已迷失在空间里，迷失在空间呈现给我们的混合物里。尚待解决的是，性质的差异最终是性质与自身的差异，以至于与它不同的东西只不过是其最低程度而已。这就是绵延，界定为自在的性质差异的绵延。当两个事物之间的性质差异变成了两个事物之一时，另一个就只是它的最后程度。自行呈现的性质差异恰恰是以这种方式实现两个极端程度的虚拟共存的。由于是极端，所以从一个向另一个的双向流动构成了中间程度。这些中间程度构成了混合原则，使我们相信程度的差异，但我们只能考虑它们自身，忘记它们重新结合的极端乃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事物，实际上是差异自身的不同程度。因此，所不同的是作为差异的程度或强度的张弛和收缩，物质和绵延。如果柏格森不是以这种方式回归一般的程度差异，他也就没有回归强度差异的视点。张弛和收缩仅仅是差异自身的程度，因为它们是对立的，迄今仍

然是对立的。作为极端，它们是相互的反面。柏格森责怪形而上学没有看到张弛和收缩是相互的反面，而相信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不动的、稳定的、永久的存在在裂变过程的两个强度不同的程度。事实上，差异也是以相同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来说明程度的，强度是由反面来说明的，同时也是反面的先决条件。一个稳定的、不动的存在并不是首要原则；我们必须开始的起点是收缩本身，而绵延的反面是张弛。在柏格森的著作中，我们总能遇到对发现真正的开端、即真正的起点的关注：因此，对于认知和情感，“而不是从情感开始，我们几乎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说明它是其所是，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们从行动开始。”何以说张弛是收缩的反面，而不说收缩是张弛的反面呢？因为进行哲学研究恰恰要从差异开始，而性质差异是绵延，其中，物质只是它的最低程度。差异是真正的开端；正是在这方面，柏格森至少在表面上背离了谢林；通过从其他事物开始，从某一稳定的、不动的存在开始，某个中立的事物被设定为首要原则，少被当作多，于是我们进入了简单的强度视野。但当他把强度置于反面之上时，柏格森似乎只通过回归到否定和对立而逃避了这个视野。但这种责怪也不是正确的。最后，两个性质不同的术语的对立只是包含着这两个术语的一种虚拟性的肯定实现。中间程度的作用恰恰体现在这种实现中：它们把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中，把记忆置于运动之中。因此，我们并不认为柏格森哲学中有什么不连贯的东西，相反，差异的概念被大大深化了。最后，我们也不认为不确定性是一个模糊概念。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偶然性，自由意志，总是表明与原因相关的一种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才赋予生命冲动以许多偶然性。他要说明的是，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先于原因而到来，我们的确要从事物本身开始，因为原因随后才能出现。但不确定性决不意味着事物或行动可以

是其反面。“行为可以是另一个样子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柏格森的要求是理解事物何以是此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能说明事物自身的是差异，而不是它的原因。“必须在行动本身的细微差别或性质中寻找自由，而不是在这个行为与非行为或过去的行为的关系中去寻找。”柏格森哲学是差异的哲学，是关于差异的实现的哲学：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自在的差异，它作为新奇而实现自身。

重复与差异[①]

重复不是一般性。重复和一般性必须在几个方面区别开来。每一个把二者混淆起来的公式都是令人遗憾的：比如，当我们说两件东西就像两滴水一样相象时；或当我们把“只有关于一般性的科学”这句话与“只有关于重复的科学”这句话相等同时。重复和相象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极端不同的东西。

一般性呈现两个重要秩序：相象的质的秩序和等价的量的秩序。周期和等量是其各自的符号。但无论如何，一般性表达一种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一个术语可以与另一个术语交换或替换。细节的交换或替换决定我们的一般行为。经验主义者把一般思想作为特殊思想提出来之所以没有错，原因就在这里，只要他们相信，其中每一个思想都可以被另一个特殊思想所替换，因为二者通过一个特定的词而相象。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重复只有在与不可替换的事物的关系中才是必要的行为，证明为合理的行为。作为行为的重复和作为观点的重复关怀不可互换的和不可替换的特点。反映，回声，替身和灵魂都不属于相象或等价的范畴；不可能交换灵魂就如同不可能替换

---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By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 - 27.

真正的双胞胎一样。如果交换是一般性的标准，那么，失窃物和礼物就是重复的标准。因此，二者间存在着一种经济差异。

重复就是以某种方式行动，但却是就独特的或独一无二的、没有相同或等价事物的东西而言。在外部行为层面上的这种重复就其自身而言也许发出一个更加隐秘的、予其以生机的震颤的回声，即这个独特事物内部的一个更加深邃的、内在的重复。这就是节日所具有的明显悖论：节日重复一种“不可重复的”东西。它们不为第一次节日增加第二次或第三次，而是将第一次发展到 n 次幂。就这个 n 次幂而言，重复将自身内化，并据此颠倒自身：如佩吉所说，纪念或代表巴士底狱陷落的不是巴士底日，而是巴士底狱的陷落，正是巴士底狱的陷落事先庆祝和重复所有的巴士底日。或者说，莫奈的第一幅百合花水彩画重复了所有其他的百合花水彩画。① 一般性，特殊事物的一般性，对立于作为独特事物之普遍性的重复。一件艺术作品的重复就仿佛一个没有概念的独特性，一首诗能被牢记在心并不是偶然的。头脑是交换器官，但心灵是重复的情感器官。（诚然，重复也与头脑有关，但恰恰因为它是重复的恐惧或悖论。）皮乌斯·塞尔维安正确地区别了两种语言：由平等的符号主导的科学语言，其中每一个术语都可以由其他术语来取代；和抒情语言，其中每一个术语都是不可替换的，而只能重复。② 重复总能被“再现”为极端的相象或完全的相等，但是，人们可以不同程度地从一事物过渡到另一事物，这个事实并不防止其种类的不同。

另一方面，一般性属于规律秩序。然而，规律决定的只是

---

① Charles Péguy, *Clio*, Paris: NRF, 1917, 33rd edn, pp. 45, 114.

② Pius Servien, *Principles d'Esthétique*, Paris: Boivin, 1935, pp. 3 – 5; *Science et Poésie*, Paris: Flammarion, 1947, pp. 44 – 7.

受规律控制的主体的相象，以及与用来指称其规律的术语的相等。规律表明的决不是基本的重复，而表明重复对于规律的纯粹主体——特殊主体——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规律使主体屈从于变化。作为空洞的差异形式，一个不可变的变量形式，规律迫使主体以自身变化为代价来阐释规律。毫无疑问，规律指定的术语中有多少常量就有多少变量，正如自然中有多少不变性和持续性就有多少流动和变化一样。然而，持续仍然不是重复。一种规律的常量反过来是一个较一般的规律的变量，正如最坚硬的石头在数百万年的地质层上已变成了松软的流体一样。所以，在每一个层面上，规律的主体只能在与大的永恒自然客体的关系中才能体验自身的无力重复性，并发现这种无力重复性已经包含在客体之中，在囚禁主体的永恒客体中反映出来。规律把水的变化与河的恒定结合起来。爱利·富尔在谈到瓦托时说："他把最短暂的瞬间性浸透于我们的注视以为是最耐久的事物之中，即空间和森林。"这是 18 世纪的方法。沃尔玛在 La Nouvelle Héloïse 中将此规定为一个制度：重复的不可能性，和所有特殊生物按照自然规律都必须屈从的作为一般条件的变化，都必须根据固定的术语来理解（而就与其他恒量的关系而言，就其他更一般的规律的功能而言，这些术语本身也无疑是变量）。这就是树林、岩洞和"神圣"客体的意义。圣普勒克司了解到，他不可能重复，不仅因为他自己的变化和朱丽的变化，还因为伟大的自然恒量，它们具有一种象征价值，同样把他排除在真正的重复之外。如果重复是可能的，那是因为奇迹而非因为规律。重复违背规律：违背规律的相同形式和等价内容。如果能够发现重复，哪怕是自然界的重复，那也是以违背规律的一股力量的名义，这股力量潜伏在规律之下，也许超越规律之上。如果存在着重复，那它即刻表达了与一般性相对立的独特性，与特殊性相对立的普遍性，与普通相对立的特

别，与变化相对立的自发性，以及与恒量相对立的永恒。在每一方面，重复都是一种僭越。它质疑规律，抛弃其名义或一般的个性，而热衷于更深刻的和更艺术的现实。

从科学实验的角度看，似乎很难否认重复与规律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必须追问在什么条件下实验才能保证重复。自然现象是在自由状态下产生的，在这种状态下，在大量的相象事物的循环中任何推断都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事物都反作用于一切其他事物，一切事物都相象于一切其他事物（相异性与自身的相象）。然而，实验构成了相对封闭的环境，其中，现象是根据少量选择的因素定义的（最少两个因素——比如，真空中物体的运动需要空间和时间）。因此，没有理由质疑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物理学已经是数学的，因为封闭的环境或选择的因素也构成了几何坐标的系统。在这些条件下，现象必然作为所选因素之间某一量的关系的等同物出现。因此，实验是用一个一般性秩序替换另一个秩序：一个等量的秩序替换一个相象的秩序。相象被打开，是为了发现一种等量，从而识别在实验的特定条件下的一个现象。在此，重复只出现在从一个一般性秩序到另一个秩序的过渡中，在这个过渡的帮助下——或在过渡的时刻——出现。仿佛重复在两个一般性之间或之下于瞬间出现。然而，这里也存在着把种类的差异错当成程度的差异的危险。因为一般性只再现或假定一种假设的重复："那么在相同条件下，就……"。这个公式表明，在相同环境中，人们总能够选择和保留相同的因素，这些因素表示现象的相等。然而，这并不说明是什么导致了重复，是什么构成了原则上的重复的范畴或重要性（原则上重要的是单一时间的 n 次幂，而无需经过第二次或第三次）。就本质而言，重复指在种类上不同于某一单独次幂的重复［ul］，而甚至在此时，为了出现，它也要利用从一个一般性秩序到另一个秩序的人为

过渡。

指望自然规律的重复是“斯多噶式”错误。聪明人必须皈依道德；把要发现促成重复的规律的梦想过渡到道德领域。总是有重新开始的使命，在日常生活范围内恢复的忠贞与重新承担的职责是不可分的。比希纳借丹顿之口说：

> 竟然如此厌烦。你先穿上衬衫，然后穿上裤子；你晚上拖着身子上床，早上再拖着身子下床；你总得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希望。数百万人都是那么做的，还有数百万人将效仿我们。此外，由于我们是由做同一件事的两半构成的，所以，每件事都得做两次。一切都非常讨厌，非常非常令人难过。①

然而，如果不能证明重申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能促成重申，不能给予我们自然规律借以排除我们的一种合法权力，那道德法则又有什么用呢？道德主义者们有时以下列方式提出善与恶的范畴：每当我们试图根据自然或作为自然存在进行重复（重复某一快乐、过去、激情）时，我们便投入到一种恶魔般的、已经遭罚的训练之中，这种训练只能以绝望或厌烦告终。对比之下，善提供了重复的可能，成功的重复和重复的精神性的可能，因为善依据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职责，作为道德存在，我们不能既作为这些存在的主体，又作为立法者。康德的“最高检验”如果不是用来判断理论上能够被再生产的东西的标准，换言之，可以以道德法则的形式加以重复而又没

① Georg Büchner, *Danton's Death*, transl. Howard Brenton, London: Methuen, 1982, p. 25. 译文根据法文版有所改动。

有任何矛盾的东西，那又能是什么呢？有责任感的人发明了一种对重复的“检验”；他决定理论上可以重复的东西。他以为他因此打败了恶魔和厌烦。此外，作为对丹顿的响应或回应，在康德的传记家们如此准确地描写的重复机器中，在他为自己制造的那些惊人的勋章中，和他每天有规律的散步中，难道不存在着一种道德主义吗？（在这个意义上，忽视盥洗时间，错过锻炼机会，这些行为都不能不无矛盾地被视为普遍规律，因此，也不能被视为正当重复的客体。）

然而，良知却遭受下面的含混：只能通过假定道德法则外在于、超越于、无关于自然规律的情况下才能构想良知；只能通过把自然法则的形象和模式回归给良知本身才能考虑道德法则的应用。结果，道德法则非但没有给予我们真正的重复，却仍然把我们留在一般性之中。这次，一般性不是自然的一般性，而是作为第二自然的习惯的一般性。不必指出非道德的或坏的习惯的存在：它是习惯的形式——或如柏格森常说的，养成习惯的习惯（全部义务）——本质上是道德的或采取了善的形式。进言之，在整个或一般的习惯之中，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两个主要秩序：相象的秩序，由于习惯还没有养成，所以行动的诸因素可以依特定模式加以改变；和等量的秩序，由于习惯已经养成，所以，行动的诸因素在不同环境下是等同的。结果，习惯从来不导致真正的重复：有时行动发生变化，得到完善，而意图保持不变；有时行动保持不变，而环境发生变化，意图也不同。再者，如果重复是可能的，那它只能出现在完善和统一这两个一般性之间或之下，证明一股相当不同的力量的存在，而冒着推翻这两个一般性的危险。

如果重复是可能的，那它就既对立于自然规律又对立于道德法则。有两个已知的方法用来推翻道德法则。一个是上升为原则：把法则作为次要的、派生的、借用的或“一般的”东西

提出挑战；将其作为二手原则加以谴责，这种二手原则扭转了一股原始力量的方向，或颠覆了一种原始权力。对比之下，另一个方法是通过降低到影响的层面推翻法则，人们往往对这些影响的细节予以过分完美的注意。通过采用道德法则，一个错误地顺从的灵魂设法逃避这个法则，品尝它假定禁止的那些乐趣。我们可以在所展示的荒诞性和规则的潜势中看到这一点，也可以在通过顺从表示蔑视的受虐行为中看到这一点。推翻法则的第一种方法是反讽的，其中，反讽作为原则、上升为原则和推翻原则的技巧出现。第二个是幽默，这是影响和下降的技巧，是中止和下落的技巧。重复在这种中止和这种上升中出现，仿佛当不再受到规律束缚时生存重新开始并“重申”自身一样。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吗？重复属于幽默和反讽；它在本质上是僭越或排除，总是揭示与规律涵盖之下的特殊相对立的一种独特性，与导致规律的一般性相对立的一种普遍性。

克尔恺郭尔和尼采共享一股力量。（为了构成牧师、反基督分子和天主教徒这个三幅相联的图画，还得加上佩吉。他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不仅使重复成为语言和思想特有的一股力量，一种高级的感伤力和病理学，而且成为未来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与他们每一个人相对应的是一部圣经，一出戏剧，戏剧的概念，和在这出戏中作为主角而重复的英雄：约伯－亚伯拉罕，狄奥尼索斯－查拉图斯特拉，圣芳济－克利俄。）他们之间存有相当大的、明显的、众所周知的分歧。但是，任何分歧都掩盖不了这一惊人的相遇，即一种重复的哲学：他们都把重复与各种形式的一般性对立起来。他们也不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重复”一词的：相反，他们都从字面上理解该词，并将其引入他们的文体。我们能够——或必须——首先把他们之间偶然雷同的重要命题罗列出来：

1. 把重复本身变成了新的东西：将其与一种检验、一种选择或选择性检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意志和自由的最高客体。克尔恺郭尔明确指出，这不是从重复中汲取新东西的问题，从中进行新的抽象的问题。只有思辨或精神才从外部“抽象”进行思辨。这是行为问题，把重复变成这样一种新生事物的问题；即是说，自由和自由的任务问题。就尼采的情况而言，就是通过把重复作为意志的客体而把意志从束缚它的一切事物中解放出来。毫无疑问，束缚意志的正是重复；但是，如果我们死于重复，我们也由于重复而得救，也由于重复而痊愈——主要是通过另一种重复而痊愈。死亡与拯救的一整个神秘游戏，生与死的一整个戏剧游戏，疾病与健康的一整个积极游戏，就都包含在重复之中了（查拉图斯特拉生病，查拉图斯特拉痊愈，这都是同一股力量所使然，这就是永久回归之中重复的力量）。

2. 结果，重复与自然规律对立起来。克尔恺郭尔宣称，他根本不谈自然界的重复，不谈循环和季节，交换和平等。此外，如果重复涉及意志的最内在因素，这是因为意志周围的一切都依据自然规律变化。依据自然规律，重复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原因，克尔恺郭尔谴责一切通过辨认立法原则从自然规律中获得重复的尝试，无论是伊壁鸠鲁式的还是斯多噶式的尝试，他都谴责为审美重复。可以说，尼采的情况并非如此清楚。但尼采的宣言还是清晰明白的。如果他在自然中发现了重复，这是因为他在自然中发现了高于支配规律的东西：按自身意志经历全部变化的一种意志，与规律相对立的一股力量，与地球表面的规律相对立的地球的内核。尼采把“他的”假设与循环的假设对立起来。他把永恒回归中的重复看作存在，但把这种存在与一切法律形式对立起来，与作为等量的存在和作为相象的存在对立起来。最深刻地批判规律观念的思想家怎么能

重新引进作为自然规律的永久回归的概念呢？如果满足于制定那种关于自然的老调，关于古代人熟知的自然的那种一般性，那么，这样一位古希腊鉴赏家怎么能证明他自己思想的天才出新呢？在两种情况下，查拉图斯特拉纠正了对永久回归的错误阐释：在愤怒的情况下，把矛头指向恶魔（“引力的精灵，……不要对此过分轻视”）；在仁慈的情况下，把矛头指向他的动物（“啊，小丑和手摇风琴……你已经从中奏起一首叠歌”）。这首叠歌就是作为循环或流通的永久回归，作为存在—相象和存在—等同的永久回归——简言之，作为自然动物的确实性和作为自然的感性法则。

3. 把重复与道德法则对立起来，直到它中止伦理学，成为超越善与恶的一种思想。重复作为孤独和独特事物的逻各斯，“私下思想家”的逻各斯。克尔恺郭尔和尼采都发展了公开与私下的对立，作为私下的思想家，思想家—彗星和重复的承载者，作为公开的教授和法医，其二手的话语通过中介进行，在概念的一般性中发现了道德源泉（试比较：克尔恺郭尔与黑格尔，尼采与康德和黑格尔，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比较佩吉与索邦）。约伯引起无限的冲突，亚拉伯罕引起无限的屈从，但冲突和屈从都是同一回事。约伯以反讽的方式挑战规律，拒绝一切二手解释，抛弃一般性，以便接近作为原则或作为普遍性的最独特的东西。亚伯拉罕幽默地顺从规律，但恰恰在那种顺从中发现了他的独生子的独特性，而律法则要求他奉献这个独生子。如克尔恺郭尔所理解的，重复是冲突和放弃这些物质意图所共有的超验的关联物。（我们在佩吉对圣芳济和热尔韦斯的双重塑造中发现了这两方面。）在尼采惊人的无神论中，对律法的仇恨和对仇恨的爱，进攻和默许，都是查拉图斯特拉的两副面孔，撷自圣经，反过来又针对圣经。进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看到查拉图斯特拉对重复进行的道德检验可

与康德媲美。永久回归说：不管你的意志想做什么，你都可以像意志永久回归那样意志它。这里有一种“形式主义”，从根本上推翻了康德，这样一个检验进而把重复本身变成超越道德的一种律法的惟一形式，而不是把重复与某一假定的道德法则联系起来。然而，在现实中，事情要复杂得多。永久回归中的重复的形式是残酷的直接的形式，是普遍性与独特性相结合的形式，它推翻了每一个一般规律，分解了中介，废除了屈从于规律的特殊。正如反讽与黑色幽默集于查拉图斯特拉一身一样，所以，永久回归集结了规律内部的和超越规律的东西。

4. 不仅把重复与习惯的一般性对立起来，而且将其与记忆的特殊对立起来。设法从一个被从外部思考的重复中抽取新东西的也许恰恰是习惯。有了习惯，我们只根据我们内心的、进行思考的一点点自我开展行动：正是这一点点自我在抽取新东西——换言之，从特殊案例的伪重复中抽取一般。因此，记忆也许能恢复在一般性中消解的特殊。这些心理运动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对尼采和克尔恺郭尔来说，重复是对习惯和记忆的双重谴责，而这些心理运动在重复面前消失了。这样看来，重复是对未来的思考：它既与古代的记忆范畴相对立，又与现代的习惯范畴相对立。正是在重复中和通过重复，忘却才成为一股积极力量，无意识才成为积极的和高级的无意识（比如，忘却作为一股力量是永久回归的已然经验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一切都在力量中得到了总结。当克尔恺郭尔把重复当作意识的第二力量时，“第二”的意思不是第二次，而是属于一个单一时间的无限，属于某一瞬间的永恒，属于意识的无意识，即 n 次幂。当尼采把永久回归当作权力意志的直接表达时，权力意志根本不是“要取得权力”的意思，恰恰相反：不管你意志什么，都要把它进行到 n 次幂——换言之，根据永久回归中思想的选择性运作，根据永久回归自身的重复的独特

性，把高级的形式分离开来。在此，在一切事物的高级形式中，我们发现了永久回归和超人的直接同一性。①

我们并不是在暗示尼采的狄奥尼索斯与克尔恺郭尔的上帝之间有什么相似性。相反，我们认为，二者间的差异是无与伦比的。而这恰恰构成了我们追问的理由：二者为什么在这个基本目标上，在重复的主题上，如此巧合，即便对这个目标有相当不同的理解？克尔恺郭尔和尼采都是给哲学带来新的表达方式的人。由于他们，我们冲口就可以说出生成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ecoming）。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运动是关键。他们都反对黑格尔，理由是他没有超越虚假的运动——换言之，即“中介”这一抽象的逻辑运动。他们想要把形而上学置于运动之中，置于行动之中。他们想要让它行动，让它进行直接的行动。因此，对他们来说，仅仅提出一种新的运动表征是不够的；表征已经是中介了。相反，这是在作品中生产的问题，生

---

① 在前面的比较中，我们指的是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一些著名文本。就克尔凯郭尔的情况来说，这些文本包括《恐惧与颤栗》和《重复》（ed. and transl. H. V. and E. H. Hong，198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两卷本出版）；《焦虑的概念》的重要注释（transl. R. Thomte, ed. H. V. and E.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日记和论文》中的段落（ed. H. V. and E. H. Ho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78）。关于记忆的批判，见 *Philosophical Fragments*；或 *A Fragment of Philosophy*, revised transl. H. V.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和 *Stages on Life's Way: Studies by Various Persons*, ed. and transl. H. V. and E.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关于尼采，见 *Thus Spoke Zarathustra*（尤其是 Part II, “Of Redemption”；和 Part III 中的 “Of the Vision and the Riddle” and “The Convalescent”，一段涉及查拉图斯特拉的疾病、谈论他的精灵；另一段涉及他的痊愈，与他的动物们对话）；transl. R. J. Hollingda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1；以及 1881 – 2 年的杂记（其中，尼采明确地把“他的”假设与循环的假设对立起来，批判了相象、平衡和同一性的概念），Cf. *La Volonté de Puissance*, transl. Bianquis, Paris: NRF, pp. 295 – 301. 最后，关于佩吉，见 *Clio*，和 *Le mystère de la charité de Jeanne d'Arc*, London: Hollis & Carter, 1950.

产一种能够影响外在于一切表征的精神的运动；这是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把运动本身变成作品的问题；是用直接的符号代替中介的表征的问题；是发明直接触及精神的颤动、旋转、涡流、引力、舞蹈或跳跃的问题。这是戏剧人的思想，是走在时间之前的导演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克尔恺郭尔和尼采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东西。他们不再以黑格尔的方式反映戏剧了。他们也不再建立哲学的剧院了。他们在哲学中发明了难以置信的与戏剧相等的东西，同时建立了这种未来的戏剧和一种新哲学。可以说，至少从戏剧的角度看，没有生产：无论是 1840 年左右的牧师职业和哥本哈根，还是瓦格纳的突破和拜罗伊特，都不是有利的条件。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当克尔恺郭尔谈到古代戏剧和现代戏剧时，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不再是反映的因素了。在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思想家，他经历了假面具的问题，体验到假面具的内在空虚，试图填充它，完善它，尽管是以“绝对的差异”——即是说，把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全部差异填充进去，据此创造一种幽默和信仰的戏剧。克尔恺郭尔解释说，信仰的骑士如此相象礼拜天的资产阶级，甚至能使人把他错当成一个资产阶级，这时，我们必须把这番哲学教导当作导演的指导，表明信仰的骑士应该如何表演。当他评论约伯或亚伯拉罕时，当他想象《阿格尼斯和特赖登》时，他显然以脚本的方式重写了那个故事。莫扎特的音乐甚至在约伯和亚伯拉罕的耳中回响；这是向这种音乐的格调“跳跃”的问题。“我只看到运动”，这是一个导演的语言，他提出最高级的表演问题，关于运动的问题，它将直接触及灵

魂，因此也是关于灵魂的问题。①

尼采更是如此。《悲剧的诞生》不是对古代戏剧的反思，反倒为未来戏剧奠定了实际基础，开拓出一条道路来，尼采仍然认为可以把瓦格纳推上这条道路。与瓦格纳的分裂不是理论问题，不是音乐问题。这关系到在尼采所梦想的戏剧中，文本、历史、噪音、音乐、光、歌曲、舞蹈和舞台设计等不同角色。查拉图斯特拉融会了要把恩培多克勒戏剧性地表现出来的两种尝试。此外，如果比才比瓦格纳优秀，那是从戏剧的角度而且是针对查拉图斯特拉的舞蹈而言。尼采责怪瓦格纳是因为他颠倒和曲解了“运动”，给了我们一种航海的戏剧，我们必须在那里淌水游泳，而不能走路舞蹈。《查拉图斯特拉》完全是在哲学中构思的，但也完全是为了舞台。其中的一切都被谱成了乐曲，被赋予了视觉形象，付诸于运动，被迫行走或舞蹈。不寻找高个子的呼喊的确切声音就无法阅读他的戏，不把开篇故事中走钢丝绳者的插曲搬上舞台也没法阅读序曲。有些时刻，这是描写可怕事物的轻歌剧；因此，尼采谈论超人的喜剧性格并不是偶然的。请记住借老巫师之口唱出的阿里阿德涅的情歌：这里两个面具叠在了一起———一个年轻女人的面具，就仿佛一个女像柱，刚刚被放在一个讨厌的老头儿的面具之上。演员必须扮演老头儿的角色，而老头儿又要扮演女像柱的角色。这对尼采来说，问题也是填充戏剧空间内部面具的内在空虚：通过繁殖叠加的面具，在这种叠加中刻写上狄奥尼索斯的全能，在永久回归的重复中插入真实运动的无限性和绝对差

① 比较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Crainte et Tremblement*，transl. Tisseau，Paris：Aubier，pp. 52－67）。真正的运动不是中介，而是“重复”，与黑格尔描述的抽象的、逻辑的、虚假的运动相对立。见 *Répétition*，transl. and ed. Tisseau. 佩吉也对“逻辑运动”予以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这种运动是保守的、累积的和资本主义的虚假运动：*Clio*，pp. 45ff. 这非常接近克尔凯郭尔的批判。

异的形式。当尼采说超人相象于博尔吉亚而非帕西法尔时，或当他暗示超人既属于耶稣会派又属于普鲁士兵营时，我们只能按实际意义来理解这些文本：这是一个导演在指导如何“扮演”超人的角色。

戏剧是真正的运动，它从戏剧所运用的全部艺术中抽取真正的运动。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故事：这种运动，以及运动的本质和内在性，都不是对立，不是中介，而是重复。黑格尔遭到了谴责，他提出概念的抽象运动，而不是自然和心理的运动。黑格尔用特殊之于一般概念的抽象关系代替理念中独特之于普遍的真实关系。因此，他仍然存在于“表征”的被反映因素之中，在简单的一般性之内。他再现概念，而不是戏剧性地表现理念：他创造了一个虚假的剧院，一种虚假的戏剧，一种虚假的运动。我们必须看到黑格尔如何背叛和曲解了直观的东西，以便把他的辩证法置于那种非内涵之中，以便把中介引入一种运动之中，而这种运动不过是他自己的思想及其一般性而已。相反，当我们说运动是重复、而这是我们的真正戏剧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进行“重复”的演员，因为他对角色还没有什么了解。我们心里装的是戏剧空间，那个空间的空虚，以及用符号和面具填充和确定那个空间的方式，演员就是通过这些符号和面具扮演一个扮演着其他角色的角色的。我们想到重复是如何从一个特点到另一个特点而编织起来的，包括自身内部的差异。（当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抽象的虚假运动或中介时，他发现自身被一种思想所吸引，他阐明而非发展了这个思想，本质上属于戏剧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就是戏剧，因此，重复，以及重复内部的悲剧和喜剧，便构成了运动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之下，“演员”和“主人公”生产了全新的历史。）重复的戏剧对立于再现的戏剧，正如运动对立于概念，对立于使运动回归概念的表征一样。在重复的戏剧中，我们经历了纯粹的力，

空间中的动力线，它们不加任何中介地作用于精神，将其直接与自然和历史相联系，与先于词语而言说的一种语言相联系，与先于组织化的身体而发展的姿态相联系，与先于面孔的面具相联系，与先于人物的精灵和幻影相联系——整个重复机器是一股“可怕的力”。

因此，谈论克尔恺郭尔与尼采之间的差异并不难。然而，在关于亚伯拉罕的上帝或查拉图斯特拉的狄奥尼索斯的终极本质的思辨层面上，甚至连这个问题也再没有提出的必要了。问题在于懂得“生产运动”是什么意思，重复或获得重复是什么意思。这是克尔恺郭尔所说的跳跃问题吗？还是尼采所思考的舞蹈问题呢？他不愿意把舞蹈与跳跃混同起来（只有查拉图斯特拉的猿猴，他的精灵，他的矮人，他的小丑，才跳跃）。[①] 克尔恺郭尔给了我们信仰的戏剧；他把精神运动，信仰的运动，与逻辑运动对立起来。他因此可以让我们超越一切审美的重复，超越反讽甚或幽默，同时又痛苦地意识到，他只能给予我们这样一种超越之审美的、反讽的和幽默的形象。尼采给予我们的是非信仰的戏剧，是作为自然的运动的戏剧，而且已经是残酷戏剧了。在此，幽默和反讽是自然不可或缺的基本运作。如果我们忘记这是被赋予一股力量的回旋运动，那么，永久回归又将如何呢？它将不是引起一般的同一性回归的永久回归，而是进行选择，既驱逐又创造，既破坏又生产的一种永久回归。尼采的主导思想是把永久回归中的重复置于上帝之死和自我消解之上。然而，这是信仰戏剧中的一种相当不同的联合：克尔恺郭尔梦想着一种重新发现的上帝和自我之间的联合。于是，各种差异接踵而至：精神领域里的运动，或大地的

---

①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Part III, “Of Old and New Law – Tables”, section 4: “但只有小丑才认为：‘人也能被跨越。’”

内脏，既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自我吗？它在哪里才能更好地防止一般性、防止中介呢？重复是超自然的吗？是超越自然法则之上的吗？或由于自然本身就优越于其自身的王国和自身的法则，因此是自然自身最自然的意志并作为自然而意志自身呢？克尔恺郭尔在谴责“审美”重复时难道没有把各种事物都混合起来吗？他所说的审美重复难道不是一种可归因于自然之一般法则的伪重复与自然自身的一种真正重复，各种激情的一种病理学重复与艺术和艺术作品中的一种重复的混合吗？现在我们无法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这已足以使我们对一般性与重复之间不可简约的差异进行戏剧性的证实了。

从行为的观点和规律的观点来看，重复与一般性是对立的。下面要说明的是从概念或再现的观点透视的第三种对立。姑且提出一个合法的问题：在理论上，一个概念可能是关于一个特殊现存事物的概念，因此具有一个无限内涵。无限内涵相当于一个等于 1 的外延。重要的是，这种无限内涵被假定为实际的，而非虚拟或纯粹不确定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以概念的时间形式出现的谓项才得以保存下来，并作用于它们所属的主语。无限内涵因此使回忆和辨认，记忆和自我意识成为可能（即便这两种能力本身不是无限的）。概念之于其客体的关系，就其所呈现的这种记忆和这种自我意识而言，被称作再现。由此可以得出一种庸俗化了的莱布尼茨主义。根据差异原则，每一种决定最终都是概念的，或实际上属于概念内涵。根据充足理由原则，每一个特殊的物总要有一个概念。根据不可识别之同一性的相互原则，每个概念只能有一个物。这些原则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作为概念差异的差异理论，或发展了作为中介的再现论。

然而，概念总是被阻隔在它的每一个决定或它所包含的每

一个谓项的层面上。只要作为一个决定，一个谓项就必须固定在概念中，同时变成物中的他者（动物变成人和马的他者，人类变成彼得和保罗的他者）。因此，概念内涵是无限的；由于变成了物中的他者，谓项就仿佛概念中另一个谓项的客体。但这也说明了每一个决定依旧是一般的，或决定一种相似性，以至于依旧固定在概念中，并合理地应用于无限事物的原因。在此，概念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的，在其实际应用中，其内涵延伸到无限，但在逻辑应用上，这个内涵却总是易于受到人为的阻碍。概念内涵的每一个逻辑局限都赋予它一个大于 1 的外延，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外延，因此，就一般性而言，任何现存的个体都不能与此时此地的内涵相对应（内涵与外延的逆反关系原则）。因此，被解作概念中的差异的差异原则并不反对、而恰恰允许以最大的空间理解相似性。甚至从难题的观点看，“有何差异?”的问题也总是变为“有何相象?”的问题。而最重要的，在分类中，种属的决定暗示并假定对相似性的连续评价。毫无疑问，相象并不是部分同一性，但这仅仅因为概念的谓项就其成为物中的他者而言并不是那个物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表明这种人为障碍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障碍之间的差异，必须把这另一种障碍称作概念的自然障碍。一个人提到纯粹简单的逻辑，但另一个人也可提到超验的逻辑或存在的辩证法。姑且假定，一个概念在特定时刻的内涵是有限的，但却在时空中强行给它指定一个位置——即是说，在正常情况下与等于 1 的外延相对应的一个存在。这时，我们可以说，一个种或属过渡到此时此地的一个存在，而没有增大内涵。在强加在概念之上的那个等于 1 的外延与其虚弱的内涵原则上所要求的等于 ∞ 的外延之间存有一个断裂。其结果将是一种“离散的”外延——即在概念方面绝对同一的、参与同一个独特存在

的个体的激增（双重性或孪生性的悖论）。[1] 这种离散外延的现象暗示概念的一种自然障碍，在种类上不同于逻辑障碍：它构成了存在的一种真正重复，而非思想的相象秩序。一般性总是指称概念的一股逻辑力量，而重复则检验概念的无力或实际极限，二者之间存有重大差别。重复是概念的纯事实，其有限内涵被迫作为有限内涵过渡到存在领域：我们能找到这种过渡的例子吗？伊壁鸠鲁的原子就是一个例子：在空间中定位的个体，它们仍然有一个贫乏的内涵，为了非离散性外延而构成，直到生成无限的相同形状、相同大小的原子。伊壁鸠鲁式原子的存在是大可怀疑的。但另一方面，词语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词语在某种意义上是语言原子。词语具有必然是有限的内涵，因为词语从本质上是一种纯粹以名词定义的客体。这里，我们有理由说概念的内涵不可能广延到无限：我们只用有限数量的词定义一个词的意思。然而，无法离开词语的言语和写作，便在此时此地给了词语一种存在；据此过渡到存在的一个属；在此，外延又是在扩散中形成的，在离散中形成的，在重复的符号下构成了语言在言语和写作中的真实力量。

问题是：除了这些发散的外延和有限的内涵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自然障碍？姑且假定一个带有不确定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内涵的一个概念。不管我们把那个内涵追溯得多远，人们也总是以为它涵盖了完全同一的客体。在实际的无限之中，概念足以将其客体与每一个其他客体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概念可以不确定地追溯其内涵，总是包含着众多的客体，这种客体的多元性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这里，概念就是同一性——

---

① Michel Tournier 清楚地区别了这种发散性内涵的公式和现象，见 *Les Météores*, Paris: Gallimard, 1975. 英译 *Gemini*, transl. Anne Carter, New York: Doubleday, 1981.

对于相互区别的客体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同一性。因此，我们必须识别这些客体之间非概念性差异的存在。在只被赋予不确定性属性的客体与纯粹时空的或对立的、非概念性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对称客体的悖论），最清楚地表明这种关联的人是康德。[①] 然而，这些决定恰恰只是重复的数字：空间和时间本身就是重复的环境；而真正的对立并不是最大限度的差异，而是最小限度的重复——被简约为二的一个重复，向自身发出回声、回归到自身的一个重复；已经找到了定义自身的手段的一个重复。于是，重复就作为没有概念的差异而出现，不确定地逃避连续的概念差异的重复。它表现现存事物特有的一股力量，直观的现存事物的一种顽固性，它抵制每一种概念说明，不管这种说明多么深入。康德说，无论你在概念中走得多远，你总可以重复——即是说，创造与概念相对应的若干客体，或至少两个客体：一个为左翼，另一个为右翼，一个为多数，另一个为少数，一个为肯定，另一个为否定。

如果我们认为带有不确定性内涵的概念是自然的概念，那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况。这样的概念总是在别的事物之中：它们不在自然之中，而在思考自然或观察自然、并为自然再现

---

① 康德的确对概念进行了无限说明。但这种无限仅仅是虚拟的（不确定的），所以，从中得不出有力的立论来提出不可辨认原则。相反，根据莱布尼茨，一个（可能的或真正的）存在物的概念内涵实际上是无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莱布尼茨在《论自由》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上帝才能看到，而不是最终的分析，因为没有最终……）。当莱布尼茨用“虚拟”一词描写事实真理中谓项的内在性时（如在《谈形而上学》第8节中），应该把“虚拟”解作与事实相反的意思，只不过指的是“被包裹的”，“复杂的”或“有印象的”，这决不排除事实。在严格意义上，虚拟的概念实际上是由莱布尼茨提出来的，只不过用来指一种必然真理（非相互命题）；见 Leibniz, *On Freedom*,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transl. and ed. Leroy E. Loemker, 2ed edn,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1969, pp. 262 – 6.

自身的精神之中。正因如此，人们才说自然是异化的精神，或异化的概念，与自身相对立。与这些概念相对应的是那些本身缺乏记忆的客体——本身既不占有也不回忆自身的时刻。问题是：自然为什么重复？因为它是超越部分的部分，是瞬间的精神。新奇的事物过渡到再现自身的精神：因为精神拥有记忆或培养习惯，它能构成一般概念，从它所反思的重复中汲取新的事物、抽取新的概念。

具有有限内涵的概念是名词性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内涵但没有记忆的概念是自然的概念。但这两种情况仍没有穷尽自然障碍的例子。举一个带有无限内涵、被赋予记忆但缺乏自我意识的个别观念或特殊表征为例。其内涵表征实际上是自在的，记忆就在那里，包含着一个行为、一个场面、一个事件或一个存在的全部特性。然而，出于确定的自然原因而缺失的是自为的意识或认识。记忆中缺失的是回忆——甚或说缺少记忆的运作。意识在我与表征之间确立了一种关系，它比“我有一个表征”这样的表达要深刻得多：它把表征与那个我关联起来，仿佛与一个自由官能相关联一样，这个官能不想把自身局限于它的任何一个产品之内，但对它来说，每一个产品都已经被认为和看作是过去，即内在意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刻。当缺少认识意识或记忆运作时，自在的知识只能是其客体的重复：它是表演出来的，即重复出来的，展现出来的，而不是被认识的。这里，重复是作为自由概念的无意识出现的，作为认识或记忆无意识和表征无意识出现的。给这样一种障碍寻找自然原因乃是弗洛伊德的任务：压抑或抵制，这使重复本身成为一种可证实的“束缚”，一种“强制”。这就是第三种障碍，涉及到自由的诸概念的一种障碍。而从一种特定的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能够发现重复与意识、重复与回忆、重复与认识之间一种逆反关系的原则（“埋葬”或被埋葬客体的悖论）：人们回

忆得越少，就越少地意识到对过去的回忆，就越多地重复这个过去——回忆和运作记忆，是为了不重复记忆。[①] 认识中的自我意识作为未来的官能或未来的功能、新事物的功能出现。回归的惟一死者是被匆忙地埋葬、而且埋得过深、没有给予必要的尊敬的人，哀悼证明的与其说是记忆的过分，毋宁说是记忆运作的无能或失败，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有一种悲剧的重复和一种喜剧的重复。实际上，重复总是出现两次，一次以悲剧结局，另一次以喜剧告终。在戏剧中，主人公之所以重复恰恰因为他与一种本质的无限的认识相分离。这种认识在他的内心，浸透他的身心，作用于他，但像某种潜在的东西，像受阻的表征一样作用。喜剧与悲剧之间的区别与两个因素相关：第一个是被压抑的认识的本质——在一种情况下是直观的自然认识，常识的简单表达，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是可怕的神秘知识；结果，第二个因素就是人物被从这种认识中排除的方式，即“他并不知道他知道”。一般说来，实际的问题是这样的：这种未知的知识必须再现为对整个场面的沐浴，浸透着戏剧的全部因素，自身包含着精神和自然的全部力量，而同时，主人公又不能将其向自身再现出来——相反，他必须把它表演出来，演示出来，重复出来，直到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认识”的敏锐时刻。此时，重复与再现相互遭遇，

---

① Freud,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 Through (Further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 - Analysis, II)”, 1914, in James Strachey (transl. and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ond Freud*, 24 vols., London: Hogarth, 1953 - 73 (1958) vol. 12, pp. 147 - 56. 对心理重复的这一否定阐释（人们重复是因为人们犯了错误，因为人们没有运用记忆，因为人们缺乏意识，因为人们没有本能）在 Ferdinand Alquié 那里得到了最有力的发展，见 Ferdinand Alquié, *Le désir d'éternit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3, chs 2 - 4.

相互融合，但却没有混淆两个层面，一个在另一个之中并在被另一个维持之时反映自身，因此，舞台上再现的认识和演员重复的认识被视为是同一的了。

发散的、异化的、压抑的，这是自然障碍的三种情况，分别与名词性概念、自然的概念和自由的概念相对应。然而，在所有情况下，再现的概念同一性或相同性被揭示出来以说明重复：重复被归于那些实际上不同但又严格地分享同一个概念的因素。因此，重复就是差异，但却是绝对地没有概念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无厉害关系的差异。“实际上”、“严格地”和“绝对地”等词指的是自然障碍的现象，与只决定一般性的逻辑障碍相对立。然而，一个重要的不足损害了这一整个努力。只要为不同客体发掘绝对的概念同一性，这就意味着一种纯粹否定的解释，一种缺席的解释。这种缺席应该内在于概念或表征自身的本质之中，这个事实并不改变什么。在第一种情况下，重复发生，因为名词性概念自然具有一个有限内涵。在第二种情况下，重复发生，因为自然的概念必然缺少记忆，它们本身就是异化的、外在的。在第三种情况下，重复发生，因为自由的概念是无意识的，而记忆和表征仍然是被压抑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重复的东西只是由于没有内涵、没有记忆、没有认识或没有意识才重复的。总起来说，概念及其伴随的表征（记忆和自我意识，回忆和认识）的不充分性是假定用来说明重复的。于是概念中就缺少以同一性形式出现的每一个立论：这些立论只对重复进行了名词性的定义和否定的解释。毫无疑问，与简单的逻辑障碍相对应的形式同一性可能与真正的同一性相对立，因为这种同一性出现在自然障碍之中。但自然障碍本身要求一种肯定的超概念力量来解释这种障碍，并据此解释重复。

姑且回到精神分析学的例子上来：我们重复是因为我们压抑……。弗洛伊德对这样一个否定图式并不满意，其中，重复是通过记忆缺失来说明的。当然，从一开始，压抑就被看作是一股积极力量。然而，他从快乐原则或现实原则中借来这种积极性：这只是一种派生的积极性，对立的积极性。弗洛伊德主义以《超越快乐原则》为转折点：弗洛伊德发现死亡本能与破坏倾向无关，而与进攻性有关，但这却是直接考虑重复现象的结果。奇怪的是，死亡本能充当了重复的积极的原初原则；这是重复的领域和意义。它起到了超验原则的作用，而快乐原则只是心理学的。由于这个原因，它主要是沉默的（没有经验的），而快乐原则是喧闹的。于是便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似乎把心理生活中大多数消极因素聚集起来的死亡主题何以本身成为最积极的、超验的积极因素甚至于用来证实重复的呢？它是如何与一种原始本能联系起来的？但即刻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死亡本能是在什么形式下证实和规定重复的？说到底，这是重复与伪装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梦的工作或病症中发现的伪装——凝缩、位移、戏剧化——是否在淡化的同时又发现一种赤裸的、残酷的重复（同一性的重复）呢？从第一个压抑理论，弗洛伊德指出了另一条途径：朵拉详尽描述了她的角色，重复了她对父亲的爱，但只能是通过由他者扮演的其他角色，她本人也是在与那些他者（K，K 太太，女教师……）的关系中扮演那些角色的。这些伪装和变体，面具或服装，并未“超越”：相反，它们是重复本身的内在遗传因素，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这条途径可能会把对无意识的分析引向一个可证实的戏剧。然而，如果不这样做，那是因为弗洛伊德不能不使自己保持一个残酷重复的模式，至少是作为一种倾向的重复。当给伊德规定了固定这一属性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是从简单的力量对抗的角度理解伪装的；伪装的重复仅仅是自我与伊

德的对抗力量之间一种次要妥协的结果。甚至在超越快乐原则时，一种纯粹重复的形式也在继续，因为弗洛伊德把死亡本能解作回归无生命状态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支持一种完全物理或物质重复的模式。

死亡与物质模式无关。相反，死亡本能可以根据面具和服装来理解。重复实际上就是在构成自身的时候伪装自身，只能通过伪装才能构成自身。它不在面具之下，而是由一个面具到另一个面具构成的，仿佛以其变体并在变体内部从一个独特之点到另一个独特之点、从一个特殊瞬间到另一个特殊瞬间构成的。除了其他面具之外，面具不隐藏别的东西。没有所要重复的第一个术语，甚至我们童年时对母亲的爱也是重复其他成年人对其他女人的爱，相当于《追忆逝水年华》（*In Search of the Lost Time*）中的主人公重演了母亲 Swann 对 Odette 的爱。因此，从构成这个故事、并隐藏起这个故事的那个重复中没有什么重复的东西可以孤立或抽取出来。从伪装本身不能抽取或推断出明晃晃的重复来。同一个事物既伪装又被伪装。精神分析学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当弗洛伊德在某些方面放弃了关于真实的童年事件时到来的。为了取代浸透于死亡本能的幻想力量，童年的事件扮演了终极伪装的角色，而在死亡本能中，一切都被戴上了面具，都被伪装起来了。简言之，重复在本质上是象征的；象征或幻象就是重复的法则。差异借助伪装通过象征秩序被包含在重复中。所以，变体并非来源于外部，并不表明压抑的事例与被压抑的事例之间一种次要的妥协，因此，不能根据对立、颠倒或推翻的否定形式来理解。变体恰恰表明了差异机制，这些差异机制属于被重复的东西的本质和本原。我们甚至应该推翻重复内部“掩盖”和“揭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一种偏执式仪式或精神分裂原型被揭开的或赤裸的重复（同一性的重复）：重复的机械因素，明显重复的行为因素，为某一更

深刻的重复充当了掩盖，而那个更深刻的重复作用于另一个维度，一个秘密的垂直状态，其角色和面具都是由死亡本能提供的。宾斯万格尔在谈到精神分裂症时将此称作恐怖的戏剧。在这种戏剧中，“从未看见的”与“已经看见的”并不构成对立面：二者意指同一事物，而且相互寄寓。奈瓦尔的 *Sylvie* 已经把我们带入了这样的戏剧，还有 *Gradiva*，它如此接近奈瓦尔的灵感，以至于向我们表明了主人公既是这样一种重复，同时又总是在重复中以伪装出现的被重复的东西。在对偏执狂的分析中，死亡主题恰好在偏执狂控制了剧中所有人物的时候出现，把他们集中在一种重复之中，而“仪式”不过是这个重复的外部包裹。面具，服装，无论在哪里，被掩盖者都总是被揭去掩盖者的真实。面具是重复的真正主题。由于重复在种类上不同于再现，所以，被重复者不可能是被再现者：相反，它总是被意指者，被意指它的东西所掩盖，而它本身又掩盖着它所意指的东西。

我不重复因为我压制。我压制因为我重复，我忘记因为我重复。我压制，因为我只能以某种重复的方式体验一些事物或经验。我注定要压制阻碍我如此生活的东西：尤其是对生活加以中介的再现，它把生活与类似或相同客体的形式联系起来。厄洛斯和萨纳托斯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厄洛斯必须被重复，只能通过重复才能存活，而萨纳托斯（作为超验原则）则是把重复给予厄洛斯的人，使厄洛斯屈从于重复。只有这样一种观点才能使我们进一步弄清关于压抑之起源的模糊问题，如压抑的性质、原因、描述压抑的确切术语等。当弗洛伊德——超越“确切说来”影响到再现的压抑——表明有必要假定一种原始的主要关怀纯粹表现的压抑，或假定必然要体验那些冲动的方式时，我们相信他已经最接近重复的一种积极的内在原则。后来，他几乎确定这就是死亡本能的形式，而正是这一点解释了

（决不是被解释）“确切说来”的压抑中再现的障碍。正因如此，重复与回忆之间逆反关系的法则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只要它把重复依赖于压抑的话。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表明，为了阻止重复，只有抽象的（毫无情感的）回忆是不够的，构成一般的概念，甚至再现被压抑事件的全部特殊性，也是不够的：为了在认识与抵制之间、在再现与障碍之间建立活的联系，有必要在记忆所在的地方寻求记忆，直接置身于过去。因此，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简单记忆而痊愈，正如我们不仅仅由于失忆而患病一样。这里，如在别处一样，恢复意识并不重要。促使痊愈发生——或不发生——的更具表演性和戏剧性的运作有一个名称：转移。转移仍然是重复：主要是重复。[①] 如果重复使我们患病，它也使我们痊愈；如果重复束缚我们、毁灭我们，它也解放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它的“魔鬼”力量得到了检验。一切治疗都是驶向重复之海底的旅行。转移实际上与科学实验有几分相似，因为病人假定在特殊的人为条件下重复整个动荡的经过，把分析医生其人当作“客体”。而在转移中，重复并不像真实地扮演角色和选择面具那样去辨别事件、人和激情。转移不是实验，而是作为整个分析过程之基础的一条原则。角色本身在性质上是性爱的，但对这些角色的证实却要诉诸于最高原则和最深刻的判断，即死亡本能。实际上，对转移的反思是要发现“彼岸世

---

① 弗洛伊德尤其用转换来质疑他就逆反关系提出的普遍规律。见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0, Standard Edition, vol. 18, p. 19：记忆与再生产，回忆与重复，在理论上是对立的，但在实践中，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病人在治疗期间必须重新经历一些被压抑的因素：“所回忆的东西与再生产的东西之间的比例由病例的不同而不同。”坚持转换中重复之治疗和解放作用的人包括 Ferenczi 和 Rank, in *Entwicklungziele der Psychoanalyse*, Vienna: *Neue Arbeiten zur ärtzlichen Psychoanalyse*, 1924.

界”的一个决定性动机。在这个意义上，重复自身构成了我们的疾病与健康、我们的丧失与得救的选择性游戏。这个游戏何以与死亡本能相关呢？无疑是在接近米勒所说的一种意义上。在论兰波的一本卓著中，米勒说：“我意识到我是自由的，我已经历过的死亡使我获得了解脱。”①死亡本能的思想似乎是根据三个自相矛盾而又互补的要求理解的：给重复一个原始的、积极的原则，但也给它一股独立的伪装的能力；最后，给它一种内在意义，其中，恐惧与选择和自由的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了。

我们的问题关系到重复的本质。这是要说明重复何以不能用概念或表征中的同一性形式加以解释的问题；它在哪种意义上要求一个高级的“肯定性”原则的问题。这一探讨必须包容自然和自由的全部概念。考虑一下在这两个例子之间交界处一个描写性主题的重复：一个形象得到了再生产，而概念却仍然保持绝对地同一……。然而，现实中艺术家并不这样做。他们不把形象的例子并置起来，而是每一次都把一个例子的一个因素与下一个例子的另一个因素结合起来。他们把一种不平衡性引入能动的建构过程之中，一种不稳定性，只在总体效果中消失的某种不对称性或隔阂。在评论这样一个案例时，列维－斯特劳斯写道：“这些因素通过错位相互交织，而只有在结尾时，这个结构才获得稳定性，既证实了又暴露了构成这个结构的整个过程。”② 这些话表明了一般的因果概念。对艺术或自然的

---

① Henry Miller, *The Time of the Assassins*, London: Neville Spearman Ltd, 1956, p. 3.

②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transl.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3, p. 191.

因果关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在场的对称因素，而是那些缺失的、原因之中没有的因素；原因可能不像结果那么对称，这才是最重要的。此外，因果关系永远是推测的，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范畴，如果那种可能性并未在某一时刻得以有效实现的话。由于这个原因，因果的逻辑关系与传递信号的物理过程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这个过程，信号就不可能翻译成行动。我们所说的“信号”是一个秩序系统，其中的秩序大小不一，并被赋予不对称的因素；而“符号”则指在这个系统中所发生的事情，当这些不相干的因素之间发生交流时，符号就是在这些因素的间隙闪现的东西。符号实际上是结果，但却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作为符号表现生产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它又有取消符号的趋势。符号并不完全是象征秩序；但它通过暗示一种内在差异为这个秩序奠定基础（同时仍然保持其再生产的外在条件）。

“缺乏对称”这一否定表达不应使我们误入歧途：它表明这个因果过程的起源和实证性。它本身就是实证性。对我们来说，如那个描述性主题的例子所暗示的，为了区别两种重复，有必要打破因果关系的观念：一种重复只关注总体的抽象效果，而另一种则关注现行的原因。一个是静止的重复，另一个是能动的重复。一个是工作的结果，另一个仿佛是身体运动的“进化”。一个回溯到单一的概念，只在一个形象的普通例子之间留下了一种外在差异；另一个是内在差异的重复，把这种差异融入它的每一个时刻，从一个特征带到另一个特征。人们可以尝试把这两种重复归化在一起，说第一种与第二种之间的差异仅仅是概念内容的变化问题，或以不同方式表达的形象问题，但这不会辨别出每一种重复的各自系统。因为在能动的秩序中没有再现概念，也没有先存空间中被再现的形象。只有一个理念，以及创造了一个对应空间的一种纯粹能动性。

关于节奏或对称性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双重性。在代数对称与几何对称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前者指整数或分数系数，后者以比例或无理数比率为基础。静止的对称是立体的或六角的，而能动的对称是五角的，以螺旋线或几何级数脉冲的形式出现——简言之，以有生命的和必死的“进化”形式出现。现在，第二种对称位于第一种的核心；是关键的、肯定的、积极的步骤。在两个正方形的网络中，我们发现了从中心发射出来的辐射线，这个中心就是作为这些辐射线之不对称的极的五角形或五角星。这个网络就像是覆盖在框架上的一个织物，“但轮廓，那个框架的主要节奏，几乎总是独立于那个网络的一个主题”：这种不对称因素既作为对称形象的遗传原则，又是它们的反映原则。① 因此，两个正方形网络中的静止重复所回溯的是一种能动重复，是由五角形和“自然地刻写在那里的一系列递减的五角星”构成的。韵律一重复是对时间的正常修正，是相同因素的共时出现。然而，一个音段的存在仅仅是由音调和音强所决定的。但如果说音调是在相同的间隙里再生产的，那我们就误解了音调的功能。相反，音调和音强的价值就在于创造格律中相等的音段或空间之间的不平等或不相容性。它们创造出独特的音高，即总是表明一个多元节奏的特殊时刻。这里，不平等再一次成为最肯定的因素。韵律仅仅是节奏的包裹，是节奏之间的一种关系。不平等的音高的反复，语调变化的反复，节奏事件的反复，比普通同质因素的再生产要深刻得多。结果，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把韵律一重复和节奏一重复区别开来，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外部表象或抽象结果。一个赤裸裸的物质重复（同一性的重复）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发

---

① Matila Ghyka, *Le Nombre d'Or: Rites et Rhythmes Pythagoriciens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Paris: Gallimard, 1931, vol. I, p. 65.

生：即它内部隐藏着另一个重复，它在伪装自身的同时构成了这个物质重复和它自身。甚至在自然中亦然。共时的旋转不过是一个更深层运动的外部表象，旋转的周期只是抽象而已：一旦放在一起，它们就揭示了进化循环或螺旋式发展，其原理是一条可变的曲线，其运行轨道具有两个不对称的方面，仿佛分成左右两翼一样。正是在这个间隙中，而且是不应该看作否定的间隙中，生物一直在编织着它们的重复，同时接受生与死的礼物。

最后，再回到名词性概念上来：能用名词性概念的同一性来说明一个词的重复吗？举韵脚为例：韵脚的确是语言重复，但这种重复包括两个词之间的差异，并把那个差异铭刻在诗歌理念的核心，铭刻在它所决定的一个空间里。韵脚的意义也不在于其明显相同的间歇，而在于让声音价值服务于音调节奏，促使音调节奏独立于代数节奏，如我们在强韵脚中所看到的。至于单个词的重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一般化了的韵脚”，而不是严格重复的韵脚。这种一般化以两种方式进行：要么具有两个意思的一个词保证这两个意思之间的相象或自相矛盾的同一性；要么具有一个意思的一个词对其邻词产生吸引力，把一种非凡的引力传给它们，直到它们拿起指挥棒，变成重复的中心为止。雷蒙·鲁塞尔和查尔斯·佩吉都是文学的伟大重复者，都能把语言的病理学力量升华到更高的艺术层面。鲁塞尔使用含混词和同音异义词，用讲两遍的故事或双重客体填补了意义之间的距离。他据此克服了同音异义词的同音异义性，在重复中刻写了最大限度的差异，这是在一个词的心脏开拓出来的一个空间。鲁塞尔仍然把这个空间当作面具和死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两种重复，束缚的重复和拯救的重复——当然主要是从束缚中拯救。鲁塞尔创造了一种之后的语言（after – language），在这种语言中，当一切都已言说完毕后，

一切再度重复，再重新开始。[①] 佩吉的技巧有所不同：它不用重复代替同音异义性，而代替同义性；它关怀的是语言学家所说的共边功能而不是类似功能；它构成一种之前的语言（before – language），一种辉光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词语内部的内在空间是由微小的差异逐步创造的。这次，一切都导致年老和过早夭折的问题，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来证实重复的存在，即从束缚中进行拯救的重复。佩吉和鲁塞尔都把语言发展至极限：在鲁塞尔那里，是类似性和选择，即 billard 与 pillard 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在佩吉那里，是共边或结合，即著名的挂毯特征。二者都用把我们带入词语内部的垂直的区别性重复，代替所重复的普通词语的水平重复；都用从充溢的语言和文体理念中流出的一种实证性重复，代替产生于不充分的名词性概念或语言再现的缺席性重复。仅就语言总是在重复的情况下存在这一点而言，死亡何以能激发语言呢？

同一性的再生产不是身体运动的动力。我们知道，甚至最简单的模仿也涉及到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差异。此外，模仿在行为的习得方面仅起到次要的调节性作用。它可以纠正已经发生的运动，但不能纠正这些运动的刺激因素。学习不是在再现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与他者相遇）中发生的。符号至少在三方面

---

① 关于雷蒙德·鲁塞尔讨论的重复与语言的关系，以及重复与面具和死亡的关系，见 Michel Foucault, *Death and the Labyrinth: 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l*, transl. Charles Ruas, London: Athlone, 1987: “重复和差异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如此准确地相互适应，以至于无法区别孰先孰后……”（p. 24）；“这决不是试图开始的一种语言，而是已经说过的词语的第二种形式：这是受破坏和死亡踩踏的日常语言。……在性质上是重复的……，一种深刻的重复。这不是所重复事物的一个侧面，而是已经超越了非存在的激进事物，而且，由于它已经穿过了这片虚空，它已经是诗歌……”（pp. 45 – 6）。关于重复只束缚和拯救的双重性分析，见 Michel Butor, in *Répertoire*, *I*,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60.

涉及异质性：首先，在承载或发放符号的客体中，而且必然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仿佛有两个大小不同的秩序或离散的现实，符号便在这些秩序和现实之间闪射。其次，在符号自身之中，因为一个符号在承载它的客体的限阈内包裹着另一个“客体”，具体体现了一股自然力或精神力（一个理念）。最后，在它们引发的回应中，因为回应的运动不“相象于”符号的运动。泳者的运动并不相似于波浪的运动，尤其是我们在沙滩上重复的游泳教练的运动，与波浪的运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掌握教练的运动符号，才能学会对付海浪。之所以很难说明某人如何学习，其原因就在于此：有一种先天的或后天的符号实践，这意味着一切教育都含有美的东西，也含有致命的东西。有人说“按我做的做”，从这种人那里我们什么也学不到。而告诉我们“和我一起做”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才能发放将在异质性中发展的符号，而不是提出某些姿势让我们模仿。换言之，没有观念的原动力，只有感觉的原动力。当身体把它自身的一些特征与海浪的一些特征结合时，它便提出了重复的原则，但不再是同一性的重复，而涉及到他者——涉及到差异，从一个海浪和一个姿势到另一个海浪和另一个姿势，并在据此构成的重复空间中把那种差异进行下去。学习实际上就是构成与符号遭遇的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特征相互更新，重复在伪装自身时发生。实习总能导致死亡形象的产生，在这个空间的边缘上，在它所生成的异质性的帮助下，它创造死亡的形象。当符号消失在距离之中时，它面对着死亡，也恰好在这时，它最深切地打动我们。俄狄普斯所接收的符号一次来自太远的地方，一次来自太近的地方，而在这两个地方之间编织着那个罪恶的可怕重复。查拉图斯特拉也从要么太近、要么太远的地方接收“符号”，只有在最后的时刻他才预见到正确的距离，这将转变在永久回归中使他进入解放和救赎之重复

之中的东西。符号是真正的戏剧因素。它们证实了在词语、姿态、人物和所再现的客体之下作用的精神力和自然力。它们把重复表现为真实的运动，使之对立于作为抽象之虚假运动的再现。

当我们面对带有确切相同概念的同一因素时，我们谈论重复，这并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离散因素，这些重复的客体，与一个秘密主体，重复的真正主体区别开来，这个主体就是通过这些离散客体来重复自身的。重复必须解作代词性的；我们必须寻找重复的自我，重复事物内部的独特性。没有重复者就没有重复，没有重复的灵魂就不会有任何被重复者。结果，我们所要区别的不是被重复者和重复者、客体和主体，而是两种重复的形式。在每一种情况下，重复都是没有概念的差异。但在一种情况下，差异被视为外在于概念的；这是被同一个概念所再现的客体之间的差异，落入空间和时间的无厉害关系之中的差异。在另一种情况下，差异内在于理念；它作为纯运动展开，创造了对应于理念的能动的空间和时间。第一种重复是同一性的重复，由概念或再现的同一性来说明。第二种包括差异，并把自身包括在理念的他性之中，包括在“非表现”（a－presentation）的异质性之中。一个是否定的，通过概念中的缺失而发生；另一个是肯定的，通过理念的过剩而发生。一个是推测的，另一个是范畴的。一个是静止的，另一个是能动的。一个是结果的重复，另一个是原因的重复。一个是外延的，另一个是内涵的。一个是普通的，另一个是独特个别的。一个是水平的，另一个是垂直的。一个是发展的、被解释过的，另一个是被包裹的、需要阐释的。一个是旋转的，另一个是进化的。一个涉及平等、相容和对称，另一个基于不平等性、不相容性和非对称性。一个是物质的，另一个是精神的，甚至是自然的和大地的精神。一个是无生命的，另一个携带着

生死的秘密，奴役和解放的秘密，恶魔和神圣的秘密。一个是“赤裸的”重复，另一个是隐蔽的重复，在掩盖自身、伪装自身、给自身戴面具的过程中构成自身。一个涉及准确性，另一个把可靠性作为标准。

这两种重复不是独立的。一个是单个主体，是他者的内在性和核心，也是他者的深度。另一个只是外部包裹，是抽象结果。非对称的重复隐藏在对称的整体或效果之内；特征的重复隐藏在普通特征的重复之下；而同一性重复中的他者则无处不在。这就是秘密，是最深刻的重复：只有这种重复才能提供另一种重复的原则，为各种概念障碍提供理由。在这个领域中，如在 *Sartor Resartus* 中一样，被揭示的真理证明是被掩盖的、被伪装的或化装了的。由于这种重复并未被别的东西所掩藏，所以必然在伪装自己的过程中构成自身；它在伪装自身之前并不存在，因此，在构成自身的同时，构成了赤裸裸的重复，它就被包裹在这个重复之内。由此而产生一些重要的结果。当我们面对以伪装出现的、或把位移、加速、缓慢、变体或差异混合起来，以至于最终把我们引向远离起点的地方的一种重复时，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个混合状态，其中，重复不是纯粹的，而只是近似的：重复一词本身似乎具有象征的、类比的或隐喻的用法。当然，我们严格地把重复定义为没有概念的差异。然而，如果将其简约到依赖外在性的差异，那就错了，因为同一性的概念体现同一性的形式，无需证明它内在于理念，本身具有超越这个概念的符号、象征和他性的一切资源。上面举出的例子涉及各种各样的情况，从名词性概念到关于自然和自由的概念，而且，我们会由于把各种物质的和心理的重复混合起来，甚至会由于把原型的重复与物质领域中潜在的、象征的重复混合起来，而受到攻击。然而，我们希望已经表明了在每一个重复结构中所有这些例子的共存，表明了重复何以展示了同

一性因素，这些因素必然回溯到一个潜在的主体，它通过这些因素重复自身，在第一种重复的核心构成了一种“他者”重复。我们因此指出，这种他者重复决不是近似的或隐喻的。相反，它恰恰是每一种重复的灵魂，是每一种重复的法则、水标和构成性符码。它构成了每一种重复都包含的那种本质：没有概念的差异，非中介的差异。它既是差异的字面意义，又是其基本的精神意义。其物质意义产生于这个他者，仿佛一个蛋壳一样从这个他者分泌出来。

我们开始时区别了一般性与重复，然后又区别了两种形式的重复。这两种区别是相互联系的：第一种的结果只能在第二种中展开。如果我们满足于抽象地看待重复，认为它缺乏内在的东西，我们就仍然不能理解一个概念为什么不能、怎样才能不受到自然的阻碍，从而使与一般性毫无关系的重复发生。相反，当我们发现了重复的不折不扣的内在性时，我们就有了理解的工具，不仅把外部重复看作掩盖，而且能重新捕捉一般性秩序（并遵循克尔凯郭尔的意愿，继续调和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仅就内在重复能通过掩盖它的赤裸裸的重复投射自身而言，它所包含的诸多差异就似乎成了抵制差异、淡化差异、据“一般”规律改变差异的因素。然而，在规律的一般运作之下，总是存在着独特性的嬉戏。自然循环的一般性掩盖了通过这些一般性的相互干扰而出现的一种独特性；而在道德生活的习惯的一般性之下，我们发现了学习的独特过程。必须理解规律的领域，但要基于超越其自身规律的一个自然和一个精神，它们在大地和心灵深处编织着自身的重复，在那里，规律还不存在。重复的内在性总是受差异秩序的影响：只有当某事与某一其他而非自身秩序的重复相关时，重复才看起来是外在的，明显的，这个物本身才屈从于一般性范畴。正是差异与重复之间的不充分性导致了一般性秩序的产生。加布列尔·塔尔德就此

提出，相象本身不过是位移的重复：真正的重复直接对应于与自身程度相等的一个差异。塔尔德比任何人都详尽地阐述了一种新辩证法，在精神和自然中发现了要在差异与重复之间建立更加完善的对应关系的秘密尝试。①

只要我们把差异看作本质上的概念差异，把重复看作由同一个概念所再现的客体之间的外部差异，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以通过事实来解决。有重复吗？——有还是没有？每一个差异最终都必然是内在的、概念的吗？黑格尔嘲笑莱布尼茨，因为后者请贵夫人在花园里散步时进行哲学实验，看两片叶子能否有同一个概念。用法医专家代替贵夫人：任何两粒灰尘都不是绝对相同的，任何两只手都不具有相同的特征，任何两部打字机都不能打出相同的字来，任何两只左轮手枪都不以相同的方式命中……。然而，只要我们在事实中寻找个别原则的标准，我们就感到没有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何以如此呢？因为差异可以是内在的，但还不是概念的（如对称客体的悖论所示）。一个能动空间必须从与那个空间紧密相连的观察

---

① 在 *Lois de l'imitation*, Paris: Alcan, 1890 (transl. Elsie Clews Parsons, as *The Laws of Imit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03; republished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Publishing, 1962) 中，加布列尔·塔尔德表明，不同种属之间的相象可回溯到其物质环境的同一性；即是说，可回溯到一个重复过程，这个过程影响着比所论形式低下的因素。塔尔德的全部哲学，如我们后来所清楚看到的，都是建立在差异与重复的范畴之上的：在一种越来越“有力和有创造性的”、具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度”的运动中，差异同时既是重复的起源又是重复的归宿。塔尔德提议用这种差异性的和区别性的重复代替每一领域里的对立。鲁塞尔和佩吉都采用了他的公式：“重复是比对抗更有力而又省力的文体步骤，更适于更新主题”（*L'opposition universelle*, Paris: Alcan, 1897, p. 119）。塔尔德把重复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法国思想；而克尔凯郭尔则视其为一个纯粹的丹麦概念。他们都认为，重复导致一种辩证法的产生，它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者的角度，而非从一个外部位置来限定。有些内在差异在再现客体之前戏剧性地表现一个理念。这里，差异内在于理念，尽管它外在于再现一个客体的概念。康德与莱布尼茨之间的对立之所以看起来不那么强烈，是因为考虑到了他们两人的学说都含有能动因素。康德识别出了不能简约为概念秩序的外在差异，尽管理解力不把它们看作是“内在的”，但这些外在差异仍然是内部的，而且只能据其与整个空间的外部关系才能加以再现。① 换言之，根据某些新康德主义的解释，有一种逐步的、内在的、能动的空间建构，它必须先于作为一种外在形式的整体“再现”。在我们看来，这种内部生成的因素包含着内涵的量而非图式，应将其与理念而非与理解的概念相关联。如果外部差异的空间秩序与内部差异的概念秩序最终和睦相处，如康德的图式所示，那最终是因为这个内涵的差异因素，在特定时刻的这种综合性连续，首先以连续重复的形式在内部生成了对应于理念的空间。在莱布尼茨那里，外部差异与内部概念差异之间的亲和性已经诉诸于某一连续重复的内在过程了，这个过程的基础是一个内涵的差异因素，它在特定时刻为了生成内部空间而保证了那种综合性连续。

正如内在差异既不是内在的，也不是概念的，有些重复也不仅仅是外在差异。因此，我们处在一个较有利的位置来查找前面所说含混的根源。当把重复定义为没有概念的差异时，我们忍不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只有外在差异参与了重复；我们因此认为，任何内在的“新奇”都足以使我们离开重复本身，只能以所谓的类比与一种近似的重复达到调和。所有这些都不

---

① 关于既不是内在也不是概念的内部差异，见康德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ransl.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macmillan, 1933, section 13（注意 Verchiedenheit 与 innerlich Verchiedenheit 之间的对立）。

是事实。然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重复的本质，“没有概念的差异”究竟指的是什么，或它暗示的内在性的性质是什么。反之，当把差异定义为概念差异时，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足以明确这样的差异概念了。然而，这里我们还是不知道差异是什么，何谓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哲学的错误，从亚里士多德通过莱布尼茨到黑格尔，就在于把差异的概念与纯粹的概念差异混同了起来，就在于仍然用内容把差异刻写在一般概念之中。实际上，只要我们把差异刻写在一般概念中，我们就没有了独特的差异理念，而只有由再现中介的一种差异。因此，我们面对着两个问题：什么是差异的概念？——不能简约为简单的概念差异，但又要求有自己的理念，在理念的层面上要求有自己的独特性的差异？另一方面，重复的本质是什么？——不能简约为没有概念的差异，不能混同于由同一个概念所再现的客体的明显特征，但却能够证明理念的独特力量的重复？差异和重复这两个观念的相遇不再是假定的了：而必定产生于这两条路线的交叉和互涉：一条路线关注重复的本质，另一条关注差异的理念。

自在的差异与虚拟性[①]

迄今只有一个本体论命题：存在是单声部的。迄今只有一种本体论，即邓斯·司各脱的本体论，它只给了存在一个声音。我们说到邓斯·司各脱，因为他把单声部的存在提高到最细微的一点，尽管是以抽象为代价的。然而，从巴门尼德到海德格尔，所采用的都是同一个声音，都在同一个声音的回荡之中，这个回荡本身施展开了单声部的浑身解数。一个单个声音构成了存在的喧嚣。不难理解，存在，即便是绝对普通的存在，也仍然不是一个属。用命题的模式代替判断的模式就足够了。在被解作一个复杂实体的命题中，我们分辨出：意义，或命题所表达的内容；指称（在命题中自行表达的东西），表达者或指称者，它们都是数字模式——即是说，是区别性因素，用来标志着被赋予意义和指称的诸因素的特点。我们可以想象，名称或命题即便确切地指称同一个事物时也不具有相同的意义（如下面几个著名的例子：晨星和晚星，以色列和约伯，plan 和 blanc）。这些意义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真正的差别（distinctio realis），但却是没有数字的——更没有本体的——区别：形式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By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5 – 37 and 208 – 12.

的、质的或符号的区别。范畴是否可以直接同化这些意义——或更可能的是从这些意义中派生出来，这些问题暂且搁置一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想象若干在形式上不同但仍然指称存在的意义，仿佛指一个被指称的实体，本体论上的实体。诚然，这样一种观点不足以阻止我们把这些意义看作类似物，把存在的这种统一看作一种类比。我们还要附言说，存在，这个普通的指称，仅就它能表现自身而言，据说反过来以一个单一相同的意义表达了所有在数字上不同的指称者和表达者。在本体论的命题中，不仅在本体上被指称的东西与不同质的意义相同，而且，意义也在本体上与个体化模式相同，与数字上不同的指称者或表达者相同：本体论命题关系到这种（整个表达的）流通。

实际上，单声部的本质并不在于把存在说成是一个单一相同的意义，而是说以单一相同的意义表达其全部的个体化差异或内在形态。存在对所有这些形态来说是相同的，但这些形态并不是相同的。它对全体是“平等的”，但它们本身并不是平等的。它以一个单一意义表达全体，但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单声部存在的本质包括个体化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相同的本质，并不改变存在的本质——正如白色包括各种色度，但本质上仍然是白色一样。如巴门尼德的诗所暗示的，不存在两条“道路”，而只有存在的单一“声音”，这个单一声音包括它的全部模式，甚至最多样的、最驳杂的、最具区别性的。存在以一个单一相同的意义表达它所表达的一切，但它所表达的东西却有所不同：它表达差异自身。

就与个体化因素及其意义的关系而言，单声部存在中无疑还存有等级制和分配，而分配，甚至等级制，却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不可调和的接受。仅就分配问题而言，这两种接受类

似于“逻各斯”（logos）和诺摩斯（nomos）的情况。我们必须首先区别一种分配，这种分配意味着对所分配的东西进行分化：是对所分配的东西加以分化的问题。正是在这里，类比的法则才被判断为全能的。仅就常识和好意都是判断的品格而言，它们也被当作分化原则，宣称自身是最佳分配。这种分配通过固定的和成比例的决定进行，在再现内部，这些决定可以被归化为“属性”或有限地域。对区别部分（“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这种组织判断力来说，农业平均主义的问题可能非常重要。甚至诸神也各有其自己的地域，自己的范畴，自己的属性，并把极限和命运作为归宿分配给人类。于是，就一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叫做游牧分配，一种游牧的诺摩斯，没有财产、领地或工具。这里不再有分配物的分化，而只有在敞开的空间进行分配的人自身的一种分化——这是一个无限制的空间，至少是没有准确极限的空间。物与人无关，或不属于任何人，但人却散在于各处，覆盖了尽可能大的空间。甚至在涉及严肃的生命问题时，这也似乎是一个游戏空间，或游戏规则，与静止的空间和诺摩斯相反。填充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被分配，完全不同于分配这个空间。这是离谱的、甚至“谵妄的”分配，在这种分配中，事物跨越了单声部的、未被分配的整个存在领域。这不是据再现要求而被分配的存在问题，而是所有事物在简单的单声部存在（一与全体）内部被分化的问题。这样一种分配是恶魔的而非神圣的，因为恶魔的独特之处就是在诸神的行为领域之间钻空子，跳过障碍或栅栏，据此混淆属性之间的界限。俄狄普斯的合唱高喊道：“哪个精灵跳得最远？”这里的跳跃目睹了游牧分配引入静止的再现结构之中的那些未解决的困难。等级制亦然。等级制也据界限、据接近或相距原则的远近衡量存在者。但也有一种等级制从能力的观点考虑事物和存在者：这不是考虑绝对的能力大小问题，而只

是了解一个存在者最终能否“越过”或超越自身界限，将自身能力发挥到极限的问题，不管这个能力有多大。“达到极限，”这仍然事先假定了一个极限。这里，界限不再指在法律之下维持事物状态的东西，也不是指将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东西。相反，它指基础的东西，它据此被利用并利用它的全部能力；一旦与其所能做的东西相区别，傲慢便不再是简单的该诅咒的东西了，最小的也可以等同于最大的了。这种包裹的方法适用于一切事物，也适用于本质、质量等，因为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最大限度，在此，已发达的不同程度的多样性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包裹着这些多样性。这种本体的衡量方法接近于不可衡量的事物状态，而非接近第一种衡量方法；这种本体的等级制接近存在者的傲慢和无政府状态，而非接近第一种等级制。把所有精灵综合起来的恰恰是怪物。因此，“一切皆平等”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愉快，条件是它说的是这个平等的、单声部的存在中不平等的东西：平等的东西便即刻出现在一切事物中，无需中介或媒介，即便事物不平等地存在于这个平等的存在中。然而，在充斥着傲慢的地方，所有事物都处于绝对的临近状态，无论大小，卑贱还是高贵，它们无一参与存在，也不通过类比接受存在。因此，存在的单声部也意指存在的平等。单声部存在同时既是游牧分配又是顶极的无政府状态。

虚拟性[①]

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诉诸于虚拟性。在这个过程中，难道我

---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by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08 - 12.

们没有落入更接近未确定的而非确定的差异的一个模糊概念吗？然而，在谈到虚拟性时，我们希望避免的恰恰是这一点。我们把虚拟与真实对立起来：尽管不可能比现在更准确了，但这种说法必须纠正。虚拟所对立的不是真实而是实存。虚拟的东西就其虚拟性而言是真实的。普鲁斯特所说的共振状态恰恰可以用来说明虚拟性："真实而不实存，理想而不抽象"；象征而不虚构。实际上，虚拟必须严格定义为真实客体的一部分——仿佛客体自身的一部分存在于虚拟之中，它投身于虚拟之中就仿佛投身于客观维度一样。关于微分的叙述往往把微分比作"差异的一部分"。或按拉格朗日（Lagerange）的方法，提出数理分析客体的哪一部分表明所论的关系，并被认为是派生的。虚拟的现实包括微分因素和关系，以及与这些因素和关系相对应的特征。虚拟的现实是结构。我们防止给构成结构的因素和关系一种它们并不拥有的实存，防止从它们当中抽取出它们所拥有的现实。我们已经看到，相互决定和完全决定的一个双重过程限定了那个现实：虚拟决不是未被决定的，而是被完全决定的。当有人声称艺术作品浸透着虚拟性时，所唤起的并不是某种混乱的决定，而是由其遗传的差异因素，其"虚拟的"或"胚胎的"因素构成的一个被完全决定的结构。这些因素、关系变体和特征在作品或客体中共存，在作品或客体的虚拟部分中共存，而不可能使它指称超越其他因素的一个观点，即可能统一其他中心的一个中心。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同时既谈论完全的决定又谈论客体的一部分呢？决定必须是客体的完全决定，却只构成客体的一部分。按照笛卡儿在《给阿尔诺的回信》中提出的建议，我们必须小心把迄今完全的客体与迄今是整体的客体区别开来。完全的东西只是客体的理想部分，它与客体的其他部分（其他关系，其他特征）共同参与理念，但从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完全的决定所缺乏的是属于实存的

整个一组关系。一个客体可能是一个实体（ens），甚或是没有全部决定或并非实际存在的（非）实体。

所以，客体的另一部分是由实存所决定的。数学家们问道：由所谓的原始功能再现的另一部分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积分决不是微分（differentiation）的反面，而恰恰构成了原始的区分（differenciation）过程。微分决定了理念的虚拟内容，理念就是问题；而区分（通过局部积分）表达了这个虚拟部分的实现和问题的解决。区分就如同差异的第二部分，而为了表示客体的完整或积分，我们要求复杂的微分/区分概念，即 different/ciation 的概念。这里的 t 和 c 是区别性特征，或个人的语音差异关系。每一个客体都是双重的，而不使其两个部分相象，一个是虚拟形象，另一个是实存形象。它们是两个不平等的部分。微分本身已经有了自身的两个方面，对应于关系的变体和取决于每一变体的价值的特征。然而，区分反过来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涉及实现变体的质或各种属性，另一个涉及实现特征的数量或不同部分。比如，作为差异关系系统的遗传因子可以同时具体化为属和构成属的各个有机部分。一般说来，没有不指称一个空间的质，限定这个空间的特征对应于在那个质中具体体现的差异关系。拉威尔（Lavelle）和诺盖（Nogué）的著作表明了属于质和方式的空间的存在，这些空间是按照特征建构的，因此，质的差异总是包含在一个空间差异（diaphora）之中。此外，画家的反映让我们了解到关于每一种颜色的空间，以及这些空间在一件作品内部的排列。属的区别仅仅体现在每一个属的各个部分也是相区别的。区分总是属和部分的区分，但也是分隔或组织。那么，区分的这两个方面何以与前述微分的两个方面相关联呢？一个客体的两个不同部分何以能吻合呢？质和属具体实现了关系的变体；有机部分实现了相对应的特征。然而，它们相互吻合的准确性最好还是从两

个相互补充的观点来看待。

一方面，完全决定实现了奇点的微分，但只证明了这些奇点的存在及其分配。这些奇点的性质只能由相邻积分曲线的形式来说明，换言之，通过实存的或区分的属和空间来说明。另一方面，充足理由的本质方面——可决定性，相互决定，完全决定——在逐步决定中发现其系统统一。实际上，相互决定并不表示倒退，也不表示一个标识性时间，而是可证实的进步，在这种进步中，必须逐步保证相互的条件，并建立起关系。决定的完整性也意味着相邻领域的进步。在从 A 到 B 再从 B 到 A 的进程中，我们并未像在简单的重复中那样倒退到起点；恰恰相反，从 A 到 B 再从 B 到 A 的重复是一条进步轨道，或是整个问题领域的描写。那就像维特拉斯（Vitrace）的诗，其中每一个不同步骤（写作，梦想，忘却，寻找对立面，幽默，最后是通过分析重新发现）都逐步决定作为一个问题或一个多元结构的整首诗。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结构都根据这一逐步发展而拥有纯粹逻辑的、理想的或辩证的时间。然而，这个虚拟时间本身决定着一个区分的时间，甚或是实现的节奏或不同时间，这些节奏或时间与这个结构的关系和奇点相对应，而从这些关系和奇点的角度来看，决定从虚拟到实体的进程。在这方面，下面四个术语都是同义的：实现，区分，综合和解决。虚拟的本质就在于，实现就是被区分。每一次区分都是一种局部综合，或局部解决，然后，这些局部综合或解决再与总体解决或总体综合中的其他解决和综合关联起来。就有机物的情况来看，实现的过程之所以看起来既是局部部分的区分，是整体环境的总体构成，同时又是在有机物构成的领域内所提出问题的解决，原因就在于此。一个有机物如果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决那就什么都不是，正如其被区分的每一个器官一样，如眼睛解决的是光的“问题”；但是，在有机物内部，任何器官都必须

被置于一个内部环境之内，被赋予一种总体有效性或综合调节能力，否则便不能被区分。（这里，就生物的情况而言，对立与矛盾、障碍与需要等否定形式，比之将要建构的有机物或要解决的问题的迫切性，都是次要的和派生的。）

所有这些的惟一危险是，虚拟性可能会混同于可能性。可能性对立于真实性；因此，可能性所经历的过程是一次“实现”。对比之下，虚拟性并不对立于真实性；它本身就包含着完整的现实。它所经历的过程是实存的过程。这里，仅仅看到措辞的不同就是错误的：这是生存本身的问题。每当我们提到可能性和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把生存看作野蛮的爆发，总是在我们背后发生的一种纯粹行为或跳跃，屈从于全体的法则或不屈从任何法则。如果非存在已经是可能的了，已经包括在那个概念之中、具有那个概念所给予它的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全部特征的话，那么，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吗？生存与生存的概念相同，但却在那个概念之外。因此，生存必定发生在空间和时间之中，但空间和时间被看作是无厉害关系的环境，而不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生产的生存。差异不再是别的什么，而是由概念决定的否定因素：要么是可能性为了实现而相互强加的局限性，要么就是可能之于真实的现实的对立。对比之下，虚拟性标志着理念的特征：生存正是在现实的基础上依据内在于理念的时间和空间生产的。

可能性与虚拟性进而由这样一个事实区别开来：一个指概念中的同一性形式，另一个指理念中的纯粹多元性，把同一性当作先在条件根除出去。最后，仅就可能性向“实现”敞开这一点而言，它被解作真实性的形象，而真实性则被认为相象于可能性。当生存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用相象叠加相象时，之所以很难理解生存究竟为概念附加了什么，其原因就在于此。这就是可能性的缺点：正是这个缺点把可能性谴责为据事实生产

的，反动地按照与它相象的东西的形象构造的。相反，虚拟性的实存总是通过差异、趋异或区分发生的。实存打破了作为过程的相象性，就如同它打破了作为原则的同一性一样。实际术语从来不相象于它们所具体化的虚拟性：质和属不再相象于它们所具体化的差异关系，正如部分不再相象于它们所具体化的特征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实存和区分总是真正的创造。它并非产生于某一先存可能性的任何局限。如一些生物学家所示，谈论“潜力”与借助总体力量的简单局限性来定义区分是相互矛盾的，仿佛这个潜力与一种逻辑可能性是不可区分的一样。一个潜力或虚拟客体的具体化就等于在不相象的情况下创造与一个虚拟多元性相对应的趋异路线。虚拟性占据了有待完成的一项任务或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的现实：这个问题为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准备了条件，生成了方法，但并不相象于那个问题产生的条件。柏格森正确地指出，从区分的观点看，甚至在进化的趋异路线上出现的相象性（如作为“类比”器官的眼睛）首先也必须与生产机制中的异质性相关联。此外，差异对于同一性的服从，以及差异对于相似性的服从，也必然在同一个运动中被推翻。然而，这种没有相象性、甚或没有创造性区分的对应究竟是什么呢？把创造性进化与物质和记忆联合起来的柏格森图式是以巨大的记忆库开始的，它是由“锥体”的各个部分的虚拟共存构成的一个多元性，其每一个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的重复，同时又仅仅通过关系秩序和特征分配而与它们相区别。因此，这种记忆虚拟的实存以创造趋异路线为形式，每一条都对应于一个虚拟部分，都代表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但也是被区分的属和部分的特定环节所特有的关系秩序和特征分配的具体实现。虚拟领域中的差异与重复就是作为创造的具体化和区分运动的。因此，它们替代了可能的同一性和相象性，这种同一性和相象性只能激发一种伪运动，被解作抽象局限的虚假的实现运动。

哲学的意义与任务①

被近年来的实践誉为“结构主义者”的作者们也许只有下面的共同点：根本不把意义看作现象，而看作表面效果和位置效果，而且是由结构序列内部空洞的正方形的流通生产的（木乃伊的位置，国王的位置，盲点，漂浮的能指，价值零度，舞台下的或缺场的原因，等等）。结构主义，无论有意与否，都在赞颂有关斯多噶和卡罗尔灵感的新发现。结构实际上是生产非形体意义的机器。但当结构主义表明非意义及其永久位移生产了意义，而且产生于本身并不“意指”的诸因素的各自位置时，我们根本不应该将其与所说的荒诞哲学相比较：卡罗尔是这样做的；加缪不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荒诞哲学来说，非意义在与意义的一种简单关系中与意义相对立，所以，荒诞总是由意义的不足和缺乏（没有足够的……）来限定的。相反，从结构的观点来看，总是有太多的意义：由谬误作为自身的一个缺失而生产和多次生产的一种过度。一个零度音素由于没有确定的音位价值，所以，雅各布森就根据音素缺失的对

---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by Mark Lester with Charles Stiva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71 – 73, and pp. 179 – 180.

立而非音素本身来定义之。同样，非意义不具有任何特定意义，对立于意义的缺失，而非对立于它过度生产的意义——不保持一些人所简化的它与产品的简单排斥关系。非意义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在给予意义的过程中，它也是意义缺失的对立面。这就是我们必须解作“非意义”的东西。

最终，结构主义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错置了前沿。当重点从失败的本质转向意义观念时，哲学似乎划分出两个阵营：一个把意义与一种新的超验性、一个新的神龛和一个经过改造的天堂联系起来；另一个在人及其深渊，在新挖掘的深度和地下世界里发现了意义。热衷于雾霭蒙蒙的天空（科恩尼格斯伯格［Koenigsberg］的天空）的新神学家们，藏身于深山古穴的新人文主义者们，都纷纷跳将出来，以神—人或人—神的名义探讨意义的奥秘。有时很难把他们相互区别开来。但今天之所以不可能进行这种区别，首先是因为我们目前对这种不确定性话语已经厌倦，不知道是蠢驴驮人还是人驮蠢驴或驮他自己。此外，我们感觉到有人把一种纯粹的反意义强加于意义之上；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意义总是表现为原则，储存，保留，本原。作为天上的原则，据说它从根本上被忘却和掩盖了，而作为地下的原则，据说它被深深地涂抹、转移和异化了。但在涂抹和掩盖之下，我们肩负着重新发现和恢复意义的使命，在一个未得到充分理解的上帝身上，或在未得到全面探讨的人身上重现和恢复意义。今天回荡着一条可喜的消息，即意义从来不是什么原则或本原，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不是要发现的东西，要恢复的东西，要重新利用的东西；它是将用新的机器生产的东西。它不属于任何高度或深度，但属于一个表面效果，与表面效果不可分割，表面是它的正当维度。这并不是说意义缺乏深度或高度，而是说高度和深度缺乏表面，缺乏意义，或只能通过假定意义的一种“效

果”来拥有意义。我们不再追问宗教的“本原意义”是否存在于一个被人背弃的上帝身上，或存在于以上帝的形象异化的人身上。比如，我们不在尼采身上寻找一个颠覆或超验的先知。如果有哪位作者认为上帝之死或禁欲理想之自由堕落毫无意义，因为人的虚假深度、坏的信仰和愤恨将其弥补了过来，那就是尼采。他在别的地方，在（上帝和人都不说话的）格言和诗歌之中寻找新的发现，它们都是生产意义和勘察表面的机器。尼采开创了有效的理想竞赛。我们也不在弗洛伊德身上寻找人类深度和本原意义的探险者，而把他看作一个天才的发现者，无意识机制的发现者，意义就是借助这个机制而被作为非意义的功能生产出来的。我们怎能不感到我们的自由和力量既不寓于神圣的普遍性，也不寓于人的个性，而寓于那些比神还神圣的特征之中呢？这些特征与其说是作为主体的我们，毋宁说是作为客体的我们；它们具体地赋予了格言和诗歌以生命，赋予了永久革命和局部行动以生命。这些令人神往的机器就是民族和诗歌，他们当中有什么官僚因素吗？我们只要挥霍一点；我们只要来到表面；我们只要像鼓一样蹦紧我们的皮肤，“伟大的政治”就足以开始了。一个空洞的正方形既不是人的，也不是上帝的；那些特征既不是一般的，也不是个别的；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普遍的。所有这些都贯穿着流通、回声和事件，它们生产了更多的意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力量，是人所从未梦想过的，也是上帝所从未构想过的。今天的任务就是让这个空洞的正方形流通，让那些先于个体和非人格的特征说话——简言之，生产意义。

…… ……

哲学与本体论相融合，但本体论融合的是存在的单声部（类比始终是一个神学幻想，而非哲学幻想，适于上帝、世界和自我诸形式）。存在的单声部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存在，相

反，存在是多元的和有差异的，它们总是由一个分离的综合体生产出来的，它们本身是分离的和发散的（membra disjuncta）。存在的单声部意思是说，存在是声音，它言说自身，而且是以它所言说的每一事物的单一“意义”被言说的。它所言说的东西都不是相同的，但对它所言说的每一事物而言，存在是相同的。因此，对发生于大多数不同事物的每一件事来说它都是独特的事件，是所有事件的终极事件，所有形式的终极形式，它使自身内部所有分离的形式形成共鸣和分支。存在的单声部与分离性综合的积极使用相融合，这是最高级的肯定形式。如我们在理想的游戏中所见到的，这本身就是永久回归，是对某一单一时刻内的所有机会的肯定，是为进行全部投掷的一颗独特的骰子，是所有形式和所有时代的一个惟一存在，是所有存在物的一个惟一坚持，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惟一幻影，是每一声哼唱和大海中每一滴水的惟一声音。把存在的单声部，即言说自身的存在，与被言说的存在的伪单声部混淆起来，那将是一个错误。但与此同时，如果存在不发生就不能被言说，如果存在是所有事件于中相互交流的独特事件，那么，单声部就既指所发生的事，又指被言说的事。单声部意指既发生又被言说的事件：可归于一切事物状态的属性，每一个命题都可表达的内容。单声部是认识属性（noematic attribute）与语言表达的同一，事件与意义的同一。它不允许存在生存于模糊状态之中，那是它过去常常用于类比视角的状态。单声部提高和抽取存在，以便将其区别于它于中发生的状态和它于中被言说的状态。它从诸多存在者中抽取存在，以便把存在同时带给所有存在者，使其在各个时代降临在他们身上。由于是纯粹言说和纯粹事件，单声部让语言的内在表面（坚持）与存在的外在表面（超存在）相接触。单声部存在固存于语言之中，发生在事物身上；它用语言的内部关系与存在的外部关系相抗衡。单声部

存在既不是主动的，也不是被动的，而是中立的。它是超存在，即真实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所共有的最小存在。单声部存在是所有事件集于一体的空虚中的一个位置，是所有意义集于一体的非意义中的一个表达方式，是 Aion 的纯粹形式，是把事物与命题相关连的外在形式。简言之，存在的单声部有三个维度：表示所有事件的单一事件；既表示发生又表示被言说的同一个事物；表示不可能性、可能性和真实性的同一个事物。

假象与古代哲学[①]

1. 柏拉图与假象

“颠倒柏拉图主义”是什么意思？这是尼采为自己的哲学规定的任务，或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是他为未来哲学规定的任务。这个规定似乎要废除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然而，这样一项计划并不是尼采所特有的。对本质和现象的双重否定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或更准确地说，可以追溯到康德。尼采所说的是否是同一回事，这仍有疑问。此外，这一颠倒的公式由于抽象而处于不利地位；它没有清楚说明柏拉图主义的动机。相反，“颠倒柏拉图主义”必定是要把这种动机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追根溯源”——就如同柏拉图对诡辩论者追根溯源一样。在一般的意义上，理念论的动机源自一种挑选和择取的意志。这是“制造差异”的问题，是把“物”本身与其各种映象相区别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by Mark Lester with Charles Stiva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53 - 79.

的问题，把原件与复制品、把模式与假象相区别的问题。但所有这些表达都是相同的吗？只有当我们回到划分的方法上来时，柏拉图的规划才清楚显见，因为这种方法不仅仅是许多辩证程序中的一个。它聚集了辩证方法的全部力量，以便将其与另一种力量结合起来，从而再现整个系统。人们首先想要说的是，这种方法等于把一个种分成两类，以便把所研究的物包含在适当的类之下：这能说明《智者篇》中为了给垂钓者下定义而进行划分的过程。但这只是划分的表面，是其反讽的方面。如果认真对待这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异议就清楚了：划分是一个不正当的三段论，因为缺乏中间条件，这会使我们得出结论，垂钓属于获取的艺术，通过捕捉而获取的艺术，等等。

划分的真正目的必须到别处去寻找。《政治家篇》中得出一个初步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政治家是牧人者。但各种对手竞相出现：医生，商人，劳动者，他们都说："我是牧人者。"再者，在《斐德罗篇》中，问题是给谵妄定义，更准确地说，是甄别合理的谵妄或真爱的问题。许多虚构者再一次站起来说："我是获灵感者，是爱者。"因此，划分的目的根本不是把一个种分成类，而具有更深刻的含义，即选择宗系：区别虚构者；把纯粹的和污浊的、原真的与伪造的区别开来。这说明了人们何以经常用试金石来比喻划分的原因。柏拉图主义是哲学上的《奥德赛》，柏拉图的辩证法既不是矛盾的辩证法也不是对立的辩证法，而是对手的辩证法，情敌与追求者的辩证法。划分的本质并不在其宽度，不在对种的各个类的决定上，而在其深度，在于对宗系的选择上。这是要掩盖要求（虚构），把真虚构者与伪虚构者区别开来。

为达到这个目的，柏拉图再一次使用了反讽手法。当开始进行实际选择时，划分就仿佛放弃了它的选择任务一样，任由自己受神话的摆布。于是，在《斐德罗篇》中，灵魂循环的神

话似乎干扰了划分的进行。在《政治家篇》中，划分的工作也受到古代神话的干扰。这种逃避，这种逃避或放弃的外表，是划分的第二个陷阱，也即它的第二个反讽。事实上，神话什么也没有干扰。相反，它是划分的必要组成部分。划分的特点是要超越神话和辩证法的二重性，在自身内部重新把辩证法与神话力量结合起来。神话，由于其始终循环的结构，的确总是关于基础的故事。它允许建构一个模式，可以根据这个模式对不同虚构者进行判断。凡需要基础的东西，实际上总是一种要求或索求。要求基础者正是虚构者，他的要求可以判断为合理的，不合理的，或根本不合理的。因此，在《斐德罗篇》中，循环的神话说明，在灵魂形诸肉体之前，它们能够看见理念。同时，它提出一个选择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合理的谵妄和真爱只能属于灵魂，这些灵魂已经目睹了许多事物，它们内部有许多正在沉睡的、可以恢复的记忆。相反，这些感性的、易忘的、充满微屑目的的灵魂却被痛斥为伪虚构者。在《政治家篇》中也同样：循环的神话表明，把政治家定义为“牧人者”在字面意义上只适于古代的神；但从这个神话中却抽象出一条选择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城市里不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个神话模式。简言之，一种选择性的参与是对选择方法问题的回应。

参与充其量只能排在第二位。著名的拿破仑三分法就是由此推演出来的，即“未参与者，”已参与者和参与者。我们还可以用下列方式表达：基础，所向往的客体和虚构者：父亲，女儿和未婚夫。基础指以基本的方式占有某物的东西：某物一旦被参与，基础便放弃它，把它给予追求者，而追求者只是次要占有，只要他能通过基础的测验的话。已参与者基本上是未参与者所占有的东西。未参与者提供这种东西以供人参与，把已参与者提供给参与者：正义，正义的品格和正义之人。毫无

疑问，人们必须区别这种选择性参与中的各个等级，一个完整的等级制。难道没有人占有第三个或第四个等级吗？一个无限下降的等级，直到最终所占有的不过是一个假象，一个海市蜃楼，占有者本身也成了假象和海市蜃楼。事实上，《政治家篇》详细区别了这些等级：真正的政治家或合理的有志者，然后是有关人士，助手和奴隶，最后是假象和虚构者。最后两项遭到严厉的责骂——它们具体体现了伪虚构者的邪恶力量。

因此，神话建构了内在模式或基础检验模式，人们根据这个模式判断虚构者，衡量他们的虚构。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划分才能进行，划分的目的才能达到，而这个目的不是针对概念的说明，而是针对理念的真实可靠；不是针对类的决定，而是针对宗系的选择。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探讨划分的三个重要文本——《斐德罗篇》、《政治家篇》和《智者篇》——的宗系呢？其最后一篇并不包含作为基础的神话。道理很简单。在《智者篇》中，划分是采取悖论的方法进行的，不是为了评价正当的虚构者，而是为了追踪伪虚构者，为了界定假象的存在（甚或非存在）。智者本人就是假象的存在，是森林之神或半人半马的怪兽，或是到处干涉和影射的普罗透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智者篇》的结尾包含着柏拉图主义最非凡的冒险：作为探讨假象和俯瞰假象这一深渊的结果，柏拉图在瞬间发现，假象不仅仅是虚假的复制，而提出了复制和模式的标记问题。智者最后给出的定义使我们无从把他与苏格拉底区别开来——私下里通过短论进行工作的反讽家。没有必要把反讽发展到如此极致吗？难道不是柏拉图本人为颠倒柏拉图主义指出方向的吗？

我们首先从判断柏拉图的动机开始：把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理念与映象、原真与复制品、模式与假象区别开来。

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表达方式并非是同等的。区别在两种意象之间摇摆。复制品是次要占有者。它们是合理的虚构者，保证与原真的相象性；假象是伪虚构者，是以不相象性为基础的，暗示一种本质的歪曲或偏离。柏拉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意象—偶像的范畴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复制品—偶像，另一方面是假象—幻影。[①]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有利地位来定义柏拉图的总体动机：这关系到对虚构者进行选择，区别好的复制品与坏的复制品，或区别（总是合理的）复制品与（总是极不相似的）假象。这是保证让复制品战胜假象、压制假象、让假象永远处于埋没状态的问题，防止假象浮出表面、到处“影射”的问题。

理念与映象明显的二重性只在这个目标上呈现：确保两种映象之间的潜在区别，制定具体的标准。因为如果复制品或偶像都是好的映象，都是合理的，那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具有相象性。但是，不能把相象性看作是一种外在关系。它与其说是从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运动，毋宁说是从一事物到一个理念的运动，因为只有理念才能理解构成内在本质的各种关系和比例。由于既是内在的又是精神的，相象性便成了衡量假象的标准。复制品与某物相象，只是由于它与那物的理念相似。虚构者与客体保持一致，只是因为他（在内在精神上）也是按那个理念模铸的。他具有美好的品质（如正义的品质），只是因为他把自身置于本质（正义）的基础之上了。简言之，正是理念至高无上的同一性确立了复制品的完美假象，使其具有了内在的或派生的相象性。现在再来看一看其他映象，即假象。对于所要虚构的东西（物体，性质等），它们总是虚构得很不充分，总

① 《智者篇》，236b，264c.

是在一种侵犯、一种影射、一种颠覆的掩盖之下，“反对父亲”，而不通过理念。[①] 它们的虚构是不合理的，隐藏着作为内在失衡的一种不相象性。

如果我们说假象是复制品的复制品，是一种无休止地降低的偶像，一种无休止地松散下去的相象，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本质的东西，就是说，失去了假象与复制品之间的本质区别，或它们赖以构成一个单独划分的两个部分的那个方面。复制品是被赋予了相象性的一个映象，假象是不具有相象性的一个映象。在柏拉图主义启发之下的这种问答使我们熟悉了这个概念。上帝按自身的映象和相象性造人。然而，由于罪孽，人失去了相象性而保留了映象。我们都变成了假象。我们已经为了进入审美的存在而抛弃了道德存在。这番评论的优点在于它强调了假象的恶魔性质。毫无疑问，它仍然产生相象性的效果：但这是总体效果，完全是外部的，产生这种效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同于在模式内部作用的那些方法。假象是以分歧或差异为基础的。它把一种非相象性内化了。我们之所以不再根据它与强加于复制品之上的一个模式的关系来定义它，原因就在于此。这是同一性的模式，复制品的相象性都派生于此。如果假象仍然有一个模式，那就是另一个模式，是他者的模式，内化了的不相象性便从那里流淌出来。[②]

---

① 雅各·德里达在分析书写与逻各斯的关系时重新使用了柏拉图的比喻，提出了逻各斯之父，逻各斯本身和书写等说法。书写是假象，一个伪追求者，因为它通过暴力和阴谋手段占有逻各斯，甚至不通过父亲而移植了它。见“La Pharmacie de Platon,” *Tel Quel*, no. 32, pp. 12ff., and no. 33, pp. 38ff., trans. B. Johnson in *Disse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政治家篇》中也有同样的比喻：善，作为法律之父，是法律本身，也是不同的宪法。好的宪法是复制品；但是，只要它们通过逃避善而违背或颠覆了法律，它们就成了假象。

② 实际上，他者不仅是影响映象的一个缺点；它本身也像是一个可能的模式，与好的同一性模式相对立：见《泰阿泰德篇》，176e；《蒂迈欧篇》，28b。

仅以柏拉图了不起的使用者、生产者和模仿者的三位一体为例吧。如果使用者被放在这个等级制的最高级，那是因为他评价目的，可随意处置真正的知识，即模式或理念的知识。复制品可称作模仿，甚至可以达到繁殖这个模式的程度；然而，由于这个模仿是纯理性的，精神的，内在的，因此是由构成本质的关系和比例所控制的一种可证实的生产。好的复制品中总有一种生产运作，而与这种运作相对应的是正确的观点，即便不是知识的话。于是，我们看到，模仿注定要带有贬义，甚至带有仿造的意思，被用于假象，指相象性的外在的、非再生的效果，就是通过手段或颠覆所取得的效果。不再有正确的观点了，而是一种反讽的相遇，以代替一种知识模式，外在于知识和观点的一种相遇的艺术。① 柏拉图说明了这种非生产性效果是如何获得的：假象意味着观照者无法掌握的巨大维度、深度和距离。恰恰因为他无法掌握它们，他才产生一种相象的印象。这个假象含有区别性的视角；而观照者则成了假象自身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又受到他的视角的改造和扭曲。② 简言之，在假象中有一种生成性疯狂，或一种生成性无限，如在《斐里布篇》中，“或多或少总是在阐述一个观点，”总是在生成一个他者，不停地对深度进行破坏，同时能够逃避同等的、有限的、同一的或相似的：几乎总是同时的，但从来不是相等的。要强行限制这种生成，根据同一性来编排，并使其具有相象性——而且，对仍然对抗的那部分要尽可能深加压制，将其关闭

① 见《理想国篇》，10：602a.《智者篇》，268a。

② X. Audouard 表明，假象“是包含观照者视角在内的一些建构，所以，在观照者被发现的地方便产生了幻觉。……重点其实不在非存在的地位上，而在这种微妙的距离，在对真实映象的微妙歪曲上，而这种距离和歪曲恰好是在观照者所处的视点上发生的，从而使假象的构成成为可能——这就是智者的工作。”“Le Simulacre,” *Cahiers pour l'Analyse*, no. 3。

在海底洞穴里——这就是柏拉图主义要用偶像压制假象的目的。

就这样，柏拉图主义建立了哲学后来归为己有的一整个领域：充满了复制品—偶像的再现领域，不是由与某一客体的外在关系、而是由与模式或基础的内在关系所界定的一个领域。柏拉图主义的模式是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说正义就是正当性，勇敢不外乎有勇气，等等——抽象地把基础判断为以基本方式占有的东西。柏拉图主义的复制品是相象性：以次要方式占有的虚构者。与模式或原真的纯粹同一性相对应的是一种作为范例的相似性；与复制品的纯粹相象性相对应的是被称为模仿的相似性。然而，我们不应该以为柏拉图主义只是为自身而发展了这种再现权力的：它满足于保留这个领域，就是说，建立这个领域，选择这个领域，把一切可能模糊其界限的东西从这个领域中排除出去。毋宁说，把再现作为合理的、有限的、可排除的再现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再现贯穿并覆盖这一整个领域，从最高的种延伸到最小的类，而划分的方法则是传统的细目分类，这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还没有出现。我们还可以断定一个第三时刻，即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不再仅仅寻求建立再现的基础或使再现成为可能，也不再明确断定它是有限的。现在，人们试图将其呈现为无限的，赋予它对无限界的合理要求，使其既克服无限大，又克服无限小，从而既向超越最高的种的存在敞开，又向在最小的类之下的单一性敞开。

莱布尼茨和黑格尔天才地进行了这种尝试。但是，他们也没有超越再现的元素，因为同一性和相似性这一双重危机仍然保留着。简言之，同一性发现了一条无条件的原则，能够使其控制无限界：这就是充足理性；而相似性也发现了一条原则，能够应用于无限界：这就是汇聚或连续。事实上，按照莱布尼

茨提出的“共存性”概念，单子都被同化在单个点上，而围绕一个单个点汇聚的每一个序列又延伸到在其他单个点上汇聚的其他序列；这就是说，在这些单个点的周围，另一个世界开始了，因此，这些单个点将导致所保留的序列的分离。于是，我们看到莱布尼茨是怎样排除分离性的，即把它归入“非共存因素”，保留最大限度的汇聚或连续，并将此作为最可行的世界，也就是真实世界的标准（莱布尼茨把那些其他世界当作理由不充分的“虚构者”）。黑格尔也同样。最近有人指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辩证之圆才能围绕单个中心转动，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单个中心。① 无论是在单个中心的圆中，还是在汇聚的序列中，哲学一旦开始攻克无限界，就无法摆脱再现的元素。它所热衷的是一个虚假现象。它总是致力于完成同一项任务，即偶像学，并将其用于基督教的思辨需要（无限小和无限大）。总是以至高无上的终极性的名义，以一种本质现实甚或一种历史意义的名义，在虚构者中选择，排除离心和分离的元素。

美学正蒙受一种扭曲的二元性的折磨。一方面，它指把感性作为可经验的形式的一种理论；另一方面，它指把艺术作为真实经验的反映的一种理论。要把这两个意思结合起来，一般经验的条件必须成为真实经验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品就似乎真的成了实验。比如，我们知道有些文学程序（其他艺术也同样）允许同时讲述几个故事。这无疑是现代艺术品的本质特征。这根本不是从几个不同视点讲述同一个故事的问题：

---

① 关于黑格尔，阿尔都塞写道：“作为圆中圆，意识只有决定它的一个中心：一定还有带有其他中心的圆，解中心的圆，这样，意识中心才能受它们的效力的影响——简言之，意识的本质是由这些圆而多元决定的……” *Pour Marx* (Paris: Maspero, 1970), p. 101.

因为视点还是要服从于汇聚的规律。相反，这是不同的故事和分离的故事的问题，仿佛每一个视点都对应于一个独特的景观一样。而分离的序列既然是分离的，就的确有一种分离序列的统一。但它始终是被抛离中心的、只能在伟大的作品中才能成为一的一个混沌状态。这种未成形的混沌状态，如《芬尼根守灵》的伟大文字，不仅仅是混沌：它是证实的权力，证实一切异质序列的权力——它在自身内部把所有序列“纠缠”起来（所以，乔伊斯才对布鲁诺感兴趣，视其为复杂的理论家）。在这些基本序列之间产生一种内在共鸣；这种共鸣引发一种强制性运动，超越了这些序列本身。这些就是假象的特点，当假象打破锁链，上升到表面时，它便证实了其幻影般的力量，即它那被压抑的力量。弗洛伊德已经表明幻影至少产生于两个序列，一个是婴儿序列，另一个是青春期之后的序列。与幻影相关的情感内核将由假象所承载的内在共鸣来说明。死亡，生命的破裂或肢解等印象，将由携载这些印象的强制性运动的幅度来说明。这样，真实经验的条件和艺术品的结构就结合起来了：序列的分离，圆的解中心，包围这些圆的混沌状态的构成，内在共鸣和运动幅度，假象的入侵。①

通过把分离的元素或异质的序列置于交流之中而构成的这些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普遍的。它们是信号－符号系统。信号是一个结构，其中分布着潜在的差异，保证了分离元素的交流：符号是在两个层面的交界处、在两个交流序列之间闪现的东西。当然，所有现象都似乎与这些状况相对应，它们都基于一个构成性的不平衡、差异或不平等之中。一切物质系统都

---

① 关于现代艺术品，尤其是乔伊斯的作品，见 Umberto Eco, *L'Oeuvre ouverte* (Paris: Seuil, 1965). 关于分离序列和它们在混沌中心共鸣和交流的方式，见 W. Gombrowicz 在他的小说《宇宙》的前言中所做的深刻评论。

是信号的；一切性质都是符号的。然而，介于它们之间的序列仍然是外在的。同样，它们的繁殖状况也外在于现象。为了言说假象，异质序列有必要在系统内部真正内化，在混沌状态中缠结或纠缠。它们的差异必须是包容性的。毫无疑问，在共鸣的序列之间总是有一种相象性，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相象性的地位和位置。姑且考虑下面两个公式："只有相象的东西才有差异"和"只有差异才相象。"这是对世界的两种独特解读：一个让我们从以前的相似性或同一性的角度看待差异，另一个则让我们把相似性、甚至同一性看作重大分歧的产物。第一种解读恰恰界定了复制品和再现的世界，把世界设定为偶像。第二种与第一种相反，界定的是假象的世界，把世界本身设定为幻影。因此，从第二个公式的角度来看，假象赖以建立的原有分歧无论大小都无关紧要；基本序列之间可能只有稍微的差别。这足以说明构成性分歧是在自身内部判断的，而不是事先判断某种以前的同一性，也足以说明分歧正是衡量和交流的统一。因此，就只能把相象性看作是这种内在差异的产物。无论这个系统具有巨大的外部差异和极小的内部差异，或相反，这都无关紧要，只要相象是在曲线上产生的，而差异，无论大小，总是占据被如此解中心的系统中心的话。

所以，"颠倒柏拉图主义"就是要提高假象的地位，证实它们在偶像和复制品当中的权力。问题不再相关于本质－现象或模式－复制的区别了。这种区别完全作用于再现的世界内部。相反，这关系到对这个世界的颠覆——"偶像的黄昏。"假象不是低级的复制品。它潜藏着一股积极的力量，否定原真与复制、模式与繁殖。至少有两个分离序列在假象中达到内化

——这两个序列都不能指定为原真的，也不能指定为复制的。[①] 这甚至不足以引发他者的模式，因为任何模式都无法抵制令人眩晕的假象。除了所有视点所共有的客体外，不再有什么特权视点了。不可能存在着等级制，没有第二、第三……相象性维持下来，但却是作为假象的外在结果而被生产出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分离的序列之上的，并使这些序列产生了共鸣。同一性维持下来了，但却是作为把所有序列复杂地关联起来的规律而生产出来的，并使所有这些序列回归到各自的强制性运动的轨道上去。在颠倒柏拉图主义的过程中，相象性被说成是内化了的差异，而差异的同一性则被看作原始力量。同一性和相似性不再具有本质了，除非是仿造的本质，这就等于说是假象的功能。不可能再有什么选择了。这种非等级化的工作是共存性的一种凝缩，是事件的同时性。这是伪虚构者的胜利。它在面具的掩盖下同时模仿父亲、虚构者和未婚夫。但伪虚构者在与真理的假定模式的关系上不能说是伪的，正如仿造不能称为现象或幻觉一样。仿造就是幻影，就是假象作为机器——酒神机器——发生作用的结果。它与作为权力的虚假相关。伪（*Pseudos*），就是尼采所说的虚假的最高权力。通过上升到表面，假象使同一性和相似性、模式和复制品都置于虚假（幻影）的权力之下。它再现参与的秩序，固定了分配，确定了不可能的等级制。它建立了以游牧为布局、推崇无政府状态的一个世界。它决非建立新的基础，而是把所有基础隔绝开来；它确保一次普遍的崩溃，但却是一次快乐的、积极的事

---

① 见 Blanchot，“Le Rire des diuex，”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July 1965：“在这样一个宇宙中，映象不再与模式处于次要的关系之中，谎言声称是真理，也不再有什么原真的了，而只有永恒的闪光，在那里，本原的缺席在偏离和颠倒的光辉中扩散开去。”（103 页）

件，一次拆解："在每一个洞穴背后，还有另一个更深的洞穴敞开着，而在每一个表层之下，都有一个更硕大、更怪异的地下世界。在所有的基础之下，在每一个地面之下，底土都更加肥沃。"[①]这些洞穴已不再是苏格拉底的了，可人们又是怎样认出他来的呢？既然线索已经失去，那又用的是什么线索呢？他如何从洞穴中再走出来，又是怎样把自己与智者区别开来的呢？

说同一性和相似性是仿造的，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现象或幻觉。仿造指产生一种结果的能力。但这不是指仅仅在因果意义上的结果，因为因果关系在没有其他意义介入的情况下仍然完全是假设的，不确定的。这是指在信号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符号"，一件"服装"，甚或一个假面具，表示一个伪装的过程，而在每一个面具背后，还有另一个……如是理解的仿造是与永久回归不可分的，因为正是在永久回归中，偶像才得以颠倒，再现的世界才得以颠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仿佛把潜在的内容与显在的内容相对立。可以断定，永久回归的显在内容是与一般的柏拉图主义相一致的。它再现了造物主是如何以理念为模式组织混沌状态的，这个理念又是怎样把同一性和相似性强加于他的。在这个意义上，永久回归就是走向疯癫，而走向疯癫则是被控制的、单中心的、决心要复制永恒的。实际上，这似乎是创世神话中的情况。它根据那个映象确立了复制品，并把那个映象从属于相象性。然而，这个显在内容决不是要再现永久回归的真理，而是标志这个神话在一个不再支持它、已失去其秘密的意识形态中的利用和残存。我们能够清楚地回想起普遍的希腊精神，尤其是柏拉图主义，是如何讨厌潜

① *Beyond Good and Evil*, section 289.

在的永久回归的。① 尼采正确地把永久回归当作自己的不稳定的思想，只从酒神那里获得滋补，而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忽视或压制。当然，尼采曾有几次在显在内容的层面上发表声明：作为同一性的永久回归导致了相似性的回归。但是，在这个甚至没有超越季节之普遍规律的明显的自然真理与查拉图斯特拉的情感之间，人们怎能看不到那种比例失调呢？进言之，这些显在声明的存在只是为了干巴巴地接受查拉图斯特拉的拒绝。一次是对矮子，另一次是对动物，查拉图斯特拉谴责它们把本来深奥的东西变得平庸了，把本来属于另一种音乐的东西变成了一首“老叠歌”，把本来弯弯曲曲的东西变成了简单的圆环了。在永久回归中，必须要通过显在内容，但只是为了到达一千英尺以下的潜在内容（每一个洞穴背后的洞穴……）。于是，在柏拉图看来是无结果的东西本身却揭示了它的多层面具和无法排除的众多符号。

永久回归的秘密在于，它并不表示与将其隔绝开来的混沌状态相对立的一种秩序。相反，它只不过是混沌状态自身，或是确认混沌状态的权力。当乔伊斯表明循环的生命不能影响和引起一个“混沌宇宙”的旋转时，他是在阐述尼采的思想。永久回归用全然不同的东西代替了再现的连贯性，这就是它自身的混沌偏离（*chao – errance*）。永久回归与假象之间的联系如此深刻，以至于只能通过其中的一个才能理解另一个。只有分离的序列，因为它们是分离的，才回归：就是说，每一个序列都取缔了与所有其他序列的差异，所有序列都在无始无终的混沌中将其差异纠缠在一起。永久回归的循环在与一个始终被解中心的中心的关系上是一个始终离心的循环。克洛索乌斯基在

---

① 关于希腊人，尤其是柏拉图，在永久回归问题上的沉默，见 Charles Mugler, *Deux themes de la cosmologie grecque* (Paris: Klincksieck, 1953).

谈到永久回归时正确地把它说成是“一个学说的假象”：它的确是存在（Being），但只是当“存在者”（being）是假象时。[①] 假象必然要把某一相象性抛回到基本的序列上去，必然要把某一同一性投射到强制性运动上来。因此，永久回归实际上是同一性和相似性，但是，只要它们是被仿造的，是由模仿、通过假象（权力意志）的作用而生产的，在这个意义上，永久回归就颠倒了再现，打破了偶像。它并不事先假定同一性和相似性；相反，它构成惟一的相象性——无以匹配的东西的相象性。它是所有假象的惟一幻影（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它是证实偏离和解中心的权力，并把这个权力作为最高证实的对象。正是在伪虚构者的权力之下，所是才得以反复发生。但它并不让所有事物都回归。它仍然是有选择性的，仍然“做出区别”，但决不是以柏拉图的方式。所选择的东西是与选择相对立的所有程序；所排除的东西，不让它回归的东西，正是同一性和相似性的前提，假装要纠正偏离，重构圆的中心，或把混沌变成有序，并提供模式或进行复制的东西。就其悠久的历史而言，柏拉图主义只发生过一次，而苏格拉底则成了刀下之鬼。同一性和相似性一旦不再被仿造便成了简单的幻觉。

现代性是由假象的权力界定的。哲学不必为了进入现代而付出任何代价，正如它不必为了永恒而付出代价一样，但要从现代性中抽取出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这种不合时宜的东西与现代性相关，但又必须与现代性相对立——“并希望能有利于将来的一个时代。”哲学并不是在森林里或林荫道上杜撰出来的，而是在城市里，在街道上——甚至在最人为的城市

① Pierre Klossowski, *Un si funeste* (Paris: Gallimard, 1963), p.226. 又见 pp. 216–218. 克洛索乌斯基在此对《快乐的科学》中的第 361 节进行了评论：“仿造的快乐，作为权力爆发出来，压抑所谓的性格，有时将其压抑到窒息的程度。”

里和街道上。不合时宜的东西的获得要通过颠倒柏拉图主义而与最远的过去相关；通过作为现代性之批判锋芒的假象而与现在相关；通过作为冀望未来的永久回归的幻影而与将来相关。人造品和假象并不是同一回事。它们甚至相互对立。人造品总是复制品的复制品，最终将被推至改变性质、倒退到假象的程度（波谱艺术的时刻）。现代性的核心是对立的，在现代性已结清全部帐目的地方，人造品和假象是对立的，成为两种颠覆模式：两种虚无主义。一种是为了永久保留再现、模式和复制品的既定秩序而颠覆，另一种是为了把创造性的混沌制度化而颠覆模式和复制品，让假象发生作用，产生幻影。这两种颠覆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其中所有颠覆中最清白的，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颠覆。

2. 卢克莱修与假象

步伊壁鸠鲁的后尘，卢克莱修把哲学的思辨和实践目的确定为“自然主义”，以此奠定了他在哲学上的重要地位。

自然产物是与这些产物自身的多样性密不可分的。但把多样性理解为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据卢克莱修所说，以前的所有哲学都出了差错。① 在我们的世界上，自然的多样性体现为三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类的多样性；作为种的成员的个体的多样性；和共同构成一个个体的各个部分的多样性。特性，个

---

① 在卷一的整个批评部分，卢克莱修始终在寻找多样性的原因。卷二描写了多样性的不同方面。342 - 376，581 - 588，661 - 681，和 1052 - 1066。英译引自 *De Rerum Natura*，Cambridge：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性，异质性。不能显示其各个部分、地方、河流和居住其上的物种的世界是没有的。绝对与另一个个体相同的个体是没有的。母牛识别不出来的牛犊是没有的。无法区别的两个贝壳动物或两颗麦粒是没有的。由同质成分构成的身体是没有的——无论是植物还是河流，都包含着物质的多样性或元素的异质性，各种动物都能找到适得其所的营养。从这三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些世界本身的多样性：世界是无数的，往往属于不同的类，它们有时相似，但总是由异质元素构成的。

我们有什么权利做这种推导呢？自然肯定具有多样性和多元生产的原理。但是，多样性生产的原理只有在不把自身元素汇聚成整体时才有意义。我们不应该把这一要求读作循环的，仿佛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都想要说明多样性原则本身就是多。伊壁鸠鲁的命题完全不同：自然作为多样性生产只能是一个无限数，就是说，一个不能把自身元素加以汇总的数。任何综合都不能同时把自然的全部元素包括进来，不存在独一无二的世界或总体宇宙。自然（Physis）并不是对一、存在或整体的确定。自然不是集体的，而是分配的，以至于自然法则（与所谓的现实法则相对立）把各个部分分配开来，使之不能总体化。自然不是归属的，而是连接的：用“和”而非“是”来表达。这和那——交替和交织，相象和差异，吸引和偏离，细微差别和突然断裂。自然是小丑的斗篷，事实完全由实在的补丁和空洞的空间制作的。她既富饶又虚空，有存在又有非存在，其中每一个都在限制另一个的同时摆出无限的姿态。作为不可整除的数的一个加数，她时而相似，时而有别。自然的确是一个数，但不是整数。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标志着崇高的哲学多元论的开端。在给维纳斯－自然所唱的赞歌与给作为自然哲学之本质的这种多元论所唱的赞歌之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矛盾。确切说，自然是权力。物以这种权力之名逐一存在，不可能于

同时全部汇聚在一起。也不可能结合成一个综合体，在同一时间准确无误地再现自然。卢克莱修谴责伊壁鸠鲁的前辈们信仰存在、一和整体。这些概念是精神偏执，是信仰事实的思辨形式，也是一种虚假哲学的神学形式。

伊壁鸠鲁的前辈们把这个原理与一和整体相认同。但是，如果不是我们武断地以为与其他物体孤立开来的一个特殊的、易消亡的、易腐烂的物体，这个一又能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我们武断地以为把所有元素综合起来的一个特殊的、有限的、充满了孔洞的综合体，那又能是什么构成了这个整体的呢？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理解多样性与其生产。只有假定任何事物都可能产生于任何事物、因此有也可能产生于无，我们才能从一中生产多。只有假定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元素都是能够相互替换的对立因素，我们才能从整体中生产多。这只不过是换个方式说：一物通过改变其性质而生产另一物，有生于无。由于反自然主义哲学家不想考虑虚空，所以虚空便包含着万物。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一，他们的整体，都是人为的，非自然的，总是易腐烂的，转瞬即逝的，多孔的，易碎的，短暂的。他们宁肯说“存在是无”，也不愿承认既有存在又有虚空——在虚空中有简单的存在，在复合的存在中也有虚空。① 至于多的多样性，哲学家则用同一性或矛盾性取代之，而且往往同时使用二者。然而，物的自然是协调和分裂。这既不是同一性，也不是矛盾，而是相象和差异、构造和解构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是从关联、浓缩、震撼、相遇、共存和运动中产生的。”②

自然主义要求用高度结构的因果原则来说明多的生产，即

---

① 见卷一，657－669，753－762。

② 卷一，633－634。

在自然元素不同的、非总体化的构造和综合体内部的生产。

1）原子是必须加以思考的东西，而且是只能被思考的东西。原子之于思想就如同感性物体之于感官一样：他从本质上是思想的客体，给思想以食粮的客体，正如把感性物体置于感官之前一样。原子是所见之物的绝对现实。原子是不可见的，不是可见之物，本质上是隐藏着的，这由原子的自身性质所使然，而非由于我们感性的缺陷。首先，伊壁鸠鲁的方法是类比的方法：感性物体被赋予了可感的部位，但有一个最小限度的可感部位，代表着物体的最小部分；同样，原子被赋予了各个部分，这些部分是思想，但却是最小限度的思想，代表着原子的最小部分。不可分的原子是由最小的思想构成的，正如可分的物体是由最小的可感部件构成的一样。① 其次，伊壁鸠鲁的方法是过渡或转折的方法：在类比的引导下，随着可感物体的构造和解构，我们通过转折从可感物体转向思想，从思想转向可感物体。我们从理性转向感性，从感性转向理性，这是根据一个排除过程构思和确立的一系列步骤。

2）原子的数量是无限的，这恰恰因为原子是不构成总体的元素。但这个数不必是无限数，如果虚空也不是无限的话。虚空与物质空间是相互交错的，均匀分布的，因此，虚空和原子的总数本身是无限的。这个第三种无限性表示原子与虚空之间的基本对比。虚空中的上下运动产生于虚空本身与原子的对比；原子的重量（由上至下的运动）产生于原子与虚空的对比。

3）原子在下落时相互冲撞，这不是由于重量不同，而是由于克利纳门（*clinamen*）。克利纳门是冲撞的原因，它把一个

① 卷一，599－634，749－752。

原子与另一个原子关联起来。它在根本上离不开伊壁鸠鲁的时间论，而且是这个时间系统的本质部分。在虚空中，所有原子以相同速度下落：就重量而言，一个原子的速度与阻挡它下落的其他原子是一致的。在虚空中，原子的速度与它在最小连续时间内的单向运动相同。这个最小限度表示原子朝特定方向运动的最小时限，然后，当与另一颗原子相撞时，它便改变航道朝另一个方向运动。因此有了不亚于最小物质或最小原子的最小时限。就原子的本性而言，这种最小的连续时限指对思想的理解。它表达最快或最短暂的思想：原子的运动“与思想一样快。”① 但我们因此必须想象每一个原子的原初方向，这是决定原子最初运动方向的一种综合，没有这种综合，原子就不会发生冲撞。这种综合有必要在比最小连续时限还小的时间内完成。这就是克利纳门。克利纳门或偏向不是指倾斜运动，倾斜运动会突然发生，改变原子的垂直下落。② 它始终在场：不是次要运动，也不是对运动的次要决定，这种次要运动和次要决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生产出来。克利纳门是对原子运动方向的最初决定。它是一种自然倾向（*conatus*）——是基于排除法得出的物质的微分，因此也是思想的微分。用来描述它的术语的意思实际上源于下述：incertus 不是“不确定”的意思，而是“不可指示”的意思；paulum，incerto tempore，intervallo minimo 的意思是“在比最小的、可想到的连续时限还小的时间内”。

4）因此，克利纳门既不显示偶然性，也不显示不确定性。它显示完全不同的东西，即 lex atomi，意思是不可简约的多元原因或原因序列，把原因汇聚成整体的不可能性。事实上，克

---

① 见 Epicurus，*Letter to Herodotus*，61 – 62（论最小连续时限）。

② 卷二，243 – 250。

利纳门是决定因果序列的意义的，在那里，每一个因果序列都是原子的运动构成的，并在相遇中保持其彻底的独立性。在把伊壁鸠鲁派与斯多噶派对立起来的著名讨论中，这个问题并非与偶然性和必然性直接相关，而与因果律和命运相关。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派都肯定因果律（任何运动都是有原因的）；但斯多噶派也希望证实命运，即原因“在自身内部”的统一。对此，伊壁鸠鲁派表示反对，认为在证实命运时不可能不引入必然性，就是说，绝对地把结果相互关联起来。诚然，斯多噶派反驳说他们根本没有引入必然性，而恰恰是伊壁鸠鲁派如果不陷入偶然性和机遇就无法否定原因的统一。①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原因自身内部是否有一种统一。关于自然的思想必须要把原因汇聚成一个整体吗？伊壁鸠鲁派与斯多噶派之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在因果关系中造成的分裂不同。斯多噶派承认在物质原因与非物质结果之间存有本质的差别。因此，结果指结果，并构成了一种结合，而原因指原因，并构成了一种统一。相反，伊壁鸠鲁派根据影响到每一个原子的偏向证实物质因果序列中多元性的独立性，而且，正是在这种客观的意义上，才可以把克利纳门称作“机遇”。

5）原子的大小不同，形状也不同。但原子的大小不可能随意变化，因为这样，它会达到和超越最小的可感物体。它也不可能有无限变化的形状，因为形状的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对最小原子量的破坏，或对最小原子量的增殖，这在这个原子不变成可感物体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无限的。② 原子的大小和形状在量上不是无限的，但大小和形状相同的原子却是无限的。

---

① 这不是西塞罗的 *De Fato* 的主要命题。

② 卷二，483－499。

6）并不是每一个原子与另一个原子相遇时都结合：否则原子就会构成无限的结合。实际上，震撼产生的排斥力和结合力是相等的。只要形状允许，原子就结合。在挣脱了束缚的其他原子的打击下，它们的结合被解散，同时失去了构成其他复合体的因素。如果可以把原子说成是“特殊的种子”或精液的话，那是因为原子不可能以每一种可能方式结合。

7）由于每一种结合都是有限的，所以结合就是无限的，但任何一种结合都不能是由同一种原子构成的。因此，在另一个意义上，原子是特殊的种子——它们在一个体内构成多的异质性。然而，体内的不同原子就其重量而言往往是据其形状分配的。在我们的世界上，形状相同的原子聚集在一起，构成了大量的复合体。我们的世界分配其元素的方式是让地球占据中心，“表明”这些元素继而构成大海、空气、太空。[①] 自然的哲学向我们呈现了多与自身的异质性，也呈现了多与自身的相象性。

8）有多与多的生产的权力，但也有多的再生产的权力：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第二种权力是如何产生于第一种权力的。相象性发自这种多与其多样性中。在每一个时刻都失去元素、然后又找到同一形状的新元素的世界或身体是没有的。在时空中不具有相似性的世界或身体是没有的。任何合成实体的生产都假定构成它的不同元素本身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如果每一个元素只是虚空中惟一的种类或数量有限，它们就不会有汇聚的机会。但由于相似的元素在数量上是无限的，所以，如果它们的等同物没有恢复其角色、甚至没有再生相似的复杂实体的相同机会，它们就不能产生合成实体。[②] 这种或然性的讨论尤其适

---

① 卷五，499－454。

② 卷二，541－568。

用于世界。内在世界的身体也可使用再生产原则。它们事实上生于业已复杂的背景之中，每一个都在聚集最大量的相同形状的元素：构成我们世界的大地，海洋，空气，天空，岩浆或地层，并通过察觉不到的过渡相互关联起来。每一个确定的身体都占据着这些领域当中的一个。[①] 由于这个身体无休止地失去其构成元素，它深陷其中的那个领域便贡献出新的元素——无论是直接把这些元素奉献给它，还是在与其他领域交流的时刻通过一个固定秩序转达给它。此外，一个身体在其他地方、或在生产或滋养它的元素中也有许多与它相似的身体。[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卢克莱修承认因果律的最后一个方面：一个身体不仅生产确定的元素，就像生产它的种子一样；它还生于一个确定的背景，就像适于其繁殖的母亲一样。多的异质性构成了一种关于种子的活力论，但多的相象性构成了一种关于母亲的泛神论。[③]

从思辨的角度看，物理学是自然主义。物理学的本质是关于无限界的理论，是关于最小时空的理论。卢克莱修的头两部著作是与物理学的这一基本目的相一致的：确定哪些是真正无限的东西，哪些不是，把真正的无限与虚假的无限区别开来。真正无限的东西是原子的和，虚空，原子和虚空的和，形状和大小相同的原子的数量，与我们的世界相似（或相异）的世界或综合体的数量。并非无限的东西是身体和原子的部分，原子的大小和形状，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世界的或内在世界的综合。我们必须看到，在判断真正无限和虚假无限的过程中，物

① 卷五，128－131。

② 卷二，1068："*cum locus est praesto.*"

③ 卷一，168；卷二，708："*seminibus certis certa genetrice.*"

理学是以绝对肯定的方式运作的；同时，它正是在这里暴露了它对于实践和伦理学的从属关系的。（另一方面，当物理学提出假设命题时，如解释一个有限现象时，它与伦理学没什么关系。）① 我们因此要问，对真假无限的肯定判断何以从理论上是伦理学和实践的必要手段。

实践的目标是快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只给我们提供了压抑和避免痛苦的手段。但与痛苦相比，我们的快乐有更多的可怕的障碍：幻影，迷信，恐怖，死亡恐惧——可能会干扰灵魂的一切。② 人类的画卷是命运多舛的画卷，比痛苦还要可怕（甚至黑死病也不仅仅限于它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还有它所搅动的灵魂不安）。正是这种灵魂不安增加了痛苦，使其难以克服——尽管其根源更深刻，而且要到别处去寻找。它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产生于无限快乐的身体的幻觉，另一个是投掷到精神之中的灵魂自身的无限绵延的幻觉，这又毫无保留地让位于死后可能忍受无限折磨的思想。③ 这两个幻觉是相互联系的：对无限惩罚的恐惧是无休止的欲望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寻找西西弗斯和提提俄斯；“傻瓜的生活最终成为人间地狱。”④ 伊壁鸠鲁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说如果非正义是邪恶，如果贪婪、野心、甚至淫荡都是邪恶，那是因为它们传达给我们的是随时都可能遭受惩罚的思想。⑤

---

① 见伊壁鸠鲁，*Letter to Herodotus*，79.

② 卷二的前言是以下列对立为基础的：尽可能避免痛苦，无需更多的努力就可以做到。但要克服灵魂的躁动，则要求更深邃的艺术。

③ 卢克莱修有时坚持其中一个方面，有时坚持另一个方面：卷一，110－119；卷三，978－1023；卷六，12－16。关于无限的快乐，见伊壁鸠鲁，*Meditations*，20.

④ 卷三，1023。

⑤ 伊壁鸠鲁，*Meditations*，7，10，34，35.

在对这种灵魂动荡不加防御的情况下得到救助正是人的状况，或是这种双重幻觉的产物。“……事实上，没有抵抗，没有力量，因为永久的惩罚正是死后所要恐惧的。”① 对卢克莱修正如对后来的斯宾诺莎一样，宗教人之所以表现出两面性，原因就在于此。这种两面性就是：热烈与倦怠，贪婪与责备——一种导致犯罪的奇怪情结。因此，灵魂的不安源于我们未死时对死亡的恐惧，也源于我们对死犹未死的恐惧。这整个问题就是这种不安或这两种幻觉的来源。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光彩照人的、即便是晦涩难懂的伊壁鸠鲁理论的介入。身体或原子复合体从来没有停止发放特别微妙的、流动的、稀薄的元素。这些二度复合体共分两种：或是从身体深处发放出来的，或是自身脱离事物表面的（皮肤，外衣，包装纸，信封，或树皮——卢克莱修称之为假象、伊壁鸠鲁称之为偶像的东西）。由于影响到男性意向和女性意向，所以它们可以说明感官的属性。听、闻、尝和体温尤指从深度发放出来的东西，而视觉判断、形式和颜色则指表面的假象。但是，情况比这还要复杂，因为每一种感觉都似乎把深度信息与表面信息结合起来了。发自深度的信息通过表面，而表面的包装由于与物体相脱离，便由以前掩藏的层面取代了。比如，从深度发出的噪音，当在有孔的表面（嘴）找到发音的条件时，便发出了声音。相反，表面假象只有在有光时才能提供颜色和形状，而这种光则是从深度发射出来的。无论如何，发射和假象显然未被看作原子复合体，而被看作远处客体之上和之内的属性。发射和假象在通过感觉器官时推动着前面的气流，造成了距离。② 客体之所以被看作它必须被看作的样子，

① 卷一，110－111。

② 卷四，245－260。

原因就在于此。客体相对于假象和发射的状态，它们必须跨越的距离，它们遭遇的障碍，它们所屈从的扭曲，或它们位于中心的那个物体的爆炸。在漫长旅行的终点，视觉包装并非像开始那样鲜活；喊声也失去了特性。但是，与某一客体相关的存在属性是始终不变的。就触觉的情况而言——惟一不用中介就能把握客体的一种感觉——表面元素与深度有关，当我们触及客体时，所理解的东西就在它的最深处。①

既然客体的发射和假象已经脱离了客体，那么，客体的这个附加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我们看来，在伊壁鸠鲁哲学中，它们的地位是与时间理论分不开的。实际上，它们的本质特性是它们跨越空间的速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伊壁鸠鲁才以相同的公式表示假象和原子（也许尽管不是在相同的意义上）：它的运动“和思想一样快。”在这个类比的基础上，最小限度的感性时间就与最小限度的思想时间没什么不同了。恰恰由于原子的偏离发生在比最小限度的思想时间还小的时间内，所以它已经在可想的最小时间内发生了，同样，假象的发射是在比最小限度的感觉时间还小的时间内发生的，所以，这些假象已经存在于可感的最小时间之内了，在它们到达我们之后似乎仍然存在于客体之中。“……在我们感知的一个时刻内，就是说，当一个词正被说出口时，理性认为那里还潜伏着许多次发声，所以，在特定的时刻，所有这些不同的映象全都呈现出来，各就其位。……”② 因此，假象是感知不到的。只有映象是可感的，映象传达属性，是由这个迅速的连续和许多相同假象的总合构成的。我们关于假象形成的速度的论述也适用于源自深度的发射，尽管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假象比发射迅速，在

---

① 卷四，265－270。

② 卷四，794－798。

可感的时间上，它们仿佛是多样秩序的微分。[①] 于是，我们看到了伊壁鸠鲁方法的创新性，即类比与分级这两种资源的综合。时间的理论及其“排除”性保证了这个方法的两个方面的统一。既有最小限度的可感时间，又有最小限度的可想时间，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个比最小限度还小的时间。最后，类比的时间，或时间的类比决定，是通过等级划分来组织的，这种等级划分引导我们从可想的领域走向可感的领域，反之亦然：1）比最小限度的可想时间还小的一个时间（由克利纳门导致的 incertum tempus）；2）最小限度的连续可想时间（原子按单一方向运动的速度）；3）比最小限度的可感时间还小的一个时间（由假象占据的 punctum temporis）；和 4）最小限度的连续可感时间（意象与之相对应，保证了客体的认知）。[②]

然而，还有一类，不同于深度发射，也不同于脱离事物表面的仿造。这就是幻影，它们保持着与客体的高度独立性和极端的灵活性，或者说是它们所构成的映象的极端不稳定性（因为它们不被客体发放的恒定因素所更新）。在此，映象似乎代表客体本身。这种新的假象有三种主要变体：神学的，梦幻的，色情的。神学幻影是由同时在天空中交叉的假象构成的，它们从云中构成巨大的映象——高山和巨人。[③] 不管怎么说，假象无处不有。我们不停地沉浸其中，仿佛被海浪击打一样。由于远离发放它们的客体，由于失去了与这些客体的直接联

---

① 比之深度发射，视觉假象有两个优势：恰恰由于它们自身脱离了表面，它们才不必改变秩序或形状，因此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它们运动的速度较快，因为它们几乎没有什么障碍。见卷四，67－71，199－209。

② 这种等级划分的类比显见于伊壁鸠鲁关于假象和原子的论述，即它们“和思想一样快”（*Letter to Herodotus*，48）；也显见于卢克莱修的论述，他把用来形容假象速度的表达用于虚空中原子的速度（卷四，206－208 和卷二，162－164）。

③ 卷四，130－142。

系，它们便构成了这些宏伟独立的偶像。这种独立更使它们易于变化；它们跳跃，它们言说，它们不断地改变语气和姿势。因此，如休谟后来所回忆的，开始信神时，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只有奇想和不断变化的激情。① 第二种幻影是由源自不同客体的特别微妙和脆弱的假象构成的。它们易于汇聚，凝缩和消散，太迅速、太稀薄，是视力所无法察觉的。但它们能够为男性意向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可见形状：半人半马的怪物，刻耳柏洛斯式的生物，和鬼魂；所有这些映象都与欲望或梦的意象相对应。这里不是说欲望是创造性的；而是说它使精神集中，使其在我们沉浸其中的全部微妙幻影中选择最适当的幻影。此外，与外界相隔绝的、在身体休眠时聚集或被压抑的精神，是向这些幻影敞开的。② 至于第三种，即色情的幻影，它们也是由派生于不同客体、易于凝缩的假象构成的（“在我们看来，女人面前的东西似乎变成了男人”）。由这些假象构成的映象无疑与色情的实际客体相关；但是，与其他需要不同的是，爱的客体既不能被吸收，也不能被占有。惟独这个映象就会反复激起欲望，这是不再表示连贯现实的一个海市蜃楼：“但人的面目和美丽的花朵除了空洞的映象外，没有什么可让身体享受的；而连这一点可怜的希望也往往被风刮走了。”③

时间本身是运动的。所以，我们才说思想的时间与虚空中原子的运动相关，感觉的时间与我们看到的运动映象相关，而这又使我们认识到原子复合体的属性。我们谈到了比最小限度的可想时间还小的一个时间，它与决定原子运动的克利纳门相

---

① 卷五，1169ff。事实上，卢克莱修诉诸于两种共存的因素——幻影的灵活性和天体的永恒性。

② 卷四，772ff，962ff。

③ 卷四，1094－1096。

关；比最小限度的可感时间还小的一个时间，它与作为映象的构成元素的假象相关（甚至这些元素的速度也是不同的——深度发射没有表面假象迅速，表面假象没有第三种假象迅速）。在所有这些意义上，运动构成了“事件”（伊壁鸠鲁所说的“征候”），与特性或属性相对立，所以，时间必须称作事件中的事件，“征候中的征候，”是由运动引发的。① 特性就是无法从身体中抽取或分离出来的属性：比如，原子的形状、维度或重量；表示原子性质的复合体的属性，没有这种性质，原子就不再是原子了（火的温暖和水的流动）。但事件表示所发生的情况，而不破坏事物的性质——因此，运动的程度与其秩序相协调（复合体与其假象的运动，或每一个原子的运动和冲撞）。如果生与死、构造与解构都是事件的话，那么，这是就比复合体秩序低贱的一个秩序的元素而言的，这个秩序的存在与运动在有限的相对时间内的变体相协调。

于是，我们可以回答关于虚假无限的问题了。假象本身是不可感知的；所感知的是在最小限度的可感时间（映象）内的聚集。原子在最小限度的连续可想时间内的运动证明是偏离的，但却是在比这个最小限度还小的一个时间内发生的。同样，映象证明是假象的连续和总合，这是在比最小限度的连续可感时间还小的一个时间内发生的。同样，克利纳门把思想引向了虚假的自由概念，假象把感性引向了意志和欲望给人的虚

---

① 见 Sextus Empiricus，*Adverus Mathematicos*，10：219。如我们在伊壁鸠鲁（*Letter to Herodotus*，68－73）和卢克莱修（卷一，440－482）的文本中看到的，关于事件的理论既丰富又模糊，也太简短。由于虚空是非物质的实体，所以，严格说来，事件也拥有非物质实体的地位。当然，它与假象有着本质的关系，而最终与原子的运动相关（471－477）。斯多噶派给事件以非常确定的地位，因为他们分裂了因果律，致使结果从本质上不同于原因：这与伊壁鸠鲁派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们是根据序列来划分因果关系的，而这些序列仍然保留着原因和结果的同质性。

假印象。速度使它们在最小限度的可感时间内得以存在和运动，根据这个速度，假象在它们所构成的映象中生产一种虚假无限的幻影。它们生产两种幻觉：无限快乐的幻觉和无限痛苦的幻觉——渴望与倦怠、贪婪与责备的这种混合标志着宗教人的特点。正是在第三种即幻影这种假象中，人们目睹了幻觉及伴随而来的神话的发展。在神学、梦幻、色情的混合中，爱欲所拥有的只是把它引向痛苦和折磨、甚至引向它希望无限延续的快乐的那些假象。我们信神，是因为那些假象似乎跳跃、变换姿势、大叫着给我们永久的惩罚——简言之，它们代表着无限界。

如果不严格区别真正的无限界和把一个寓于另一个之内的准确的时间把握，以及它们所暗示的向有限界的过渡，我们怎样才能防止幻觉呢？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意义。幻影于是成为快乐的客体，甚至在它们生产的结果之中，而且是最终成为如其所是的结果：迅速或敏捷的结果，依附于多样客体的外在干涉——连续性和共时性的一种凝缩。虚假的无限是精神烦恼的原则。自然主义哲学、科学和快感的思辨客体和实践客体在这里偶合：问题永远是抛弃幻觉、虚假的无限、宗教的无限以及宗教的无限于中得以表达的神学—色情—梦幻的神话。对于“哲学的用途何在?”这个问题，答案必然是：感兴趣于树立自由人的映象、抛弃为了攫取权力而需要神话和烦乱精神的所有那些力量的，除了哲学，还能有别的什么吗？自然与习惯并不是对立的，因为有自然习惯。自然与习俗并不是对立的：约定俗成的法则并不排除自然法则的存在，就是说，法律的自然功能是把不合法的欲望与伴随着这些欲望的精神烦恼对立起来。自然与发明并不是对立的，发明就是对自然本身的发现。但自然与神话是对立的。在描写人的历史时，卢克莱修向我们提供了

一种补偿的法则：人的烦恼并非来自习惯、习俗、发明或勤奋，而来自与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的神话，来自进入他的情感和工作的虚假的无限界。除了语言的起源外，又加上了火的发现，金属的发现，忠诚，财富和财产，其原理都是神话的；除了法律和正义，又加上了神的信仰；除了青铜和铁器的使用，又加上了战争；除了艺术和工业的发展，又加上了奢侈和疯狂。导致人之不幸的事件是与使这些事件得以发生的神话分不开的。在人当中区别相当于神话的东西和相当于自然的东西，在自然本身区别真正的无限和虚假的无限——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思辨和实践目标。第一位哲学家是自然主义者：他谈论自然，而不谈论神。他的话语不会把剥夺了自然的全部实证意义的新神话引入哲学。活跃的神是宗教的神话，命运是伪物理学的神话，而存在、一和整体则是完全浸透着神学的伪哲学的神话。

再没有比这更彻底的“解神话”了。神话总是表达虚假的无限界，表达精神的烦恼。自然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常数就是抛弃一切令人悲伤的东西，一切导致悲伤的东西，和一切需要悲伤以便行使其权力的东西。[①] 从卢克莱修到尼采，所追求和达到的都是同一个目的。自然主义使思想和感性成为一种实证的东西。它攻击的目标是否定的东西；它剥夺否定的全部权力；它拒绝给否定精神以用哲学说话的权利。否定精神从感性中制造现象；把智性与一或整体联系起来。但这个整体，这个

---

① 显然，我们不应该把对黑死病的悲剧式描写看作那首诗的结尾。它与疯癫和自杀的传奇吻合得天衣无缝。基督徒宣传这个传奇以便表明伊壁鸠鲁不幸的个人结局。完全可能，卢克莱修在生命结束的时候疯了。但回忆这些所谓的生活事实，从而得出这首诗的结论，把它看作有关作者“个人档案”的各种征候的集结（粗鲁的精神分析学），也同样是徒劳无益的。当然不能以这种方式提出精神分析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见爱丽丝历险记的第 33 序列。

一，只不过是思想的虚无，正如现象不过是感性的虚无一样。据卢克莱修，自然主义是一个无限数的思想，其全部元素并不是同时构成的；而就相反的情况而言，感觉的有限复合体也不是如此相加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证实的是多。多作为多是证实的客体，正如多样作为多样是快乐的客体一样。对一个不能将其元素构成整体的数来说，无限界是绝对理智的决定（完善）。但对一切已构成的东西来说，有限界本身却是绝对感性的决定（完善）。有限界的纯粹实证性是感官的客体，而可证的无限界的纯粹实证性则是思想的客体。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对抗，而有关联。卢克莱修为久远的未来确定了自然主义的含义：自然的实证性；作为实证哲学的自然主义；与多元证实相关的多元主义；与多样快感相关的感性主义；以及对一切神话的实践批判。

什么是少数文学？[①]

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没有涉及内容及其形式：低下的头和挺直的头，逃跑的三角形和直线。的确，在表达的领域内，低下的头与照片相关，挺直的头与声音相关。但是，只要不是出于其自身的缘故考虑形式和变形或表达的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出路，甚至在内容的层面亦然。只有表达才能给我们方法。卡夫卡提出了表达的问题，但不是以抽象和普遍的方式，而是将其与那些被认为是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东西相关起来，如华沙或布拉格的犹太文学。少数文学并非产生于少数族裔的语言。它是少数族裔在多数（major）的语言内部建构的东西。但无论如何，少数文学的第一个特点是，在这种文学中，语言受到解域化的一个高级协同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成了一条死胡同的标志，这条死胡同阻止布拉格的犹太人接近写作，把他们的文学变成了不可能性——写作的不可能性，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性，以其他方式写作的不可能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by Dana Polan, Forawrd by Réda Bensmaïa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p. 16 – 27.

性。[1] 写作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不稳定的或受压制的民族意识必然要通过文学手段得以存在（“文学斗争可能在最高层面上具有真实存在的理由”）。不用德语写作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布拉格的犹太人感到在他们与原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域之间有一段不可缩减的距离。用德语写作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德国人口自身的解域化，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族裔讲一种与大众相隔绝的语言，如“论文语言”或人造语言。对于那些既是这个少数族裔的一部分，同时又被排除出去的犹太人来说就更加真实，就仿佛“从德国人的摇篮里偷走孩子的吉卜赛人一样”。简言之，布拉格的德语是一种被解域化了的语言，适于陌生人和少数族裔使用。（这在另一种语境中可以比做今天讲英语的美国黑人。）

少数文学的第二个特点是，文学中的一切都是政治的。对比之下，在“多数”文学中，个别关怀（家庭、婚姻等等）与其他同样的个别关怀结合起来，社会环境仅仅作为环境或背景；正因如此，所有俄狄浦斯式的阴谋才既不是非有不可，也不是绝对必要，而只是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变成了一个阴谋。少数文学则完全不同。它的狭小空间迫使每个个别阴谋直接与政治关联起来。因此，个别关怀就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被扩大了的，因为在这个关怀中震颤着另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样，家庭的三角关系就与其他三角关系——商业的、经济的、官僚的、司法的——联系起来，这些关系决定着家庭关系的价值。卡夫卡表明少数文学的目标之一是“纯化父子间的冲突，并可能探讨那种冲突”，这已不是俄狄浦斯幻象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尽管有些事情常常可以通过沉思默想来解

---

① 见给布罗德的信，卡夫卡《书信集》，1921 年 6 月，第 289 页，和瓦根巴赫的评论《弗朗茨·卡夫卡》，第 84 页。

决，但还是达不到它与类似事情相联系的边界，在政治上人们一下子就能到达那个边界，事实上，甚至在边界出现之前人们就竭力要看到它，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这个限制性的界限。……伟大文学中暗地里进行的东西，构成了一个并非不可或缺的结构的东西，在这里则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里只不过是少数人感兴趣的转瞬即逝的事件，在这里则成了每一个人所关注的生死问题。”①

少数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在这种文学中，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实际上，恰恰因为才能在少数文学中并不多见，某一个性化的表达才不可能属于这个或那个“大师”，因而区别于集体的表达。实际上，才能的缺乏是有益的，使人想到的不是大师的文学，而是别的什么。每一个作者个别讲的话已经构成了一个共同行为，他或她所说或所做必然是政治的，尽管其他人并不同意。政治领域污染了每一个陈述。而最重要的是，由于集体或民族意识“在外部生活中往往是静止的，总是处于坍塌的过程之中”，所以，文学自身积极地肩负起集体甚至革命表达的角色和功能。正是文学促进了一种积极的尽管相互猜疑的团结，而如果作家处于边缘地带或完全在其脆弱的社区之外，那么，这种情况就使作家更有可能表现另一个可能的社区，为表达另一种意识和另一种感性创造方法，正如《调查》中的狗在孤独中呼唤另一种科学一样。因此，文学机器成了未来革命机器的驿站，这完全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是因为，只有文学才决定去创造集体表达的条件，而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其他领域都缺乏这个条件：文学是人民的关怀。② 卡夫卡无疑是据此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传达的信息并不指作为信息

---

① 卡夫卡《日记》，1911 年 12 月 25 日，第 194 页。

② 同上，第 193 页：“文学与其说是文学史的关怀，毋宁说是人民的关怀。”

之原因的表述主体，也不指作为信息之结果的陈述主体。毫无疑问，卡夫卡是根据传统范畴来思考这两个主体的：作者和主人公，叙述者和人物，做梦者和被梦者。[①] 但他很快就将拒绝叙述者的角色，正如他将拒绝作者的或大师的文学一样，尽管他崇拜歌德。老鼠约瑟芬放弃了个人唱歌的行为，以便融入“一大群人民英雄”的集体表述。这是从个别动物向那伙动物——七个犬科音乐家——或一个集体繁殖的运动。在《一条狗的调查》中，孤独的调查者的表达趋向于那 7 条狗的集体表述的代理行为，即便这种集体性已经不再或尚未给予什么。没有主体；只有表述的集体代理行为，而文学表达这些行为，只要这些行为不是外部强加的，只要这些行为仅仅作为即将到来的恶势力，或作为将被建构的革命力量。卡夫卡的孤独向他展示了今天历史中正在进行的一切。K 这个字母不再表指一个叙述者或一个人物，而是越来越像机器一样的组合，越来越具有集体性的一个行为者，因为一个个体在孤独中被闭锁在这个组合之中了（个体的东西只有与一个主体相关联才能与集体相分离，开始自身的生活）。

少数文学的三个特点是语言的解域化，个体与政治直观性的关联，以及表述的集体组合。我们也可以说，少数不再表指特殊的文学，而表指每一种文学的革命条件，它就在伟大的（或既定的）文学的心脏。甚至不幸生于拥有伟大文学的国家

---

① 见“乡村的婚礼准备”，卡夫卡《故事全集》：“只要你说‘一个人’而不说‘我’，那便没有任何意义”（第 53 页）。这两个主体在几页后又出现了：“我甚至不用亲自去乡村，那没有必要。我将派我穿着衣服的身体去。”此时，叙述者正像一只臭虫或甲虫那样躺在床上（第 55 页）。无疑，这是《变形记》中戈里高尔变成甲虫的源出之一（同样，卡夫卡将放弃见菲力斯的机会，而宁愿躺在床上）。但在《变形记》中，那个动物具有了一次真正变化的价值，不再是一个表述主体的静止状态了。

的人也必须用这个国家的语言写作，如捷克犹太人用德语写作，乌兹别克人用俄语写作一样。写作犹如狗在刨坑或老鼠在挖洞。写作就是发现自己未发达的地方，自己的方言，自己的第三世界，自己的沙漠。关于“什么是边缘文学?”和“什么是通俗文学？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等问题已有许多讨论。标准显然很难确立，如果不从较客观的概念——少数文学的概念——开始的话。只有从内部进行多数语言的少数实践才能对通俗文学和边缘文学等加以定义。①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真正成为集体的表达机器，真正能够处理和发展其内容。卡夫卡强调指出，少数文学完全能够控制其素材。② 为什么这是表达的机器？它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与语言的多重解域化有关；这是犹太人所处的境遇，他们在放弃乡村环境的同时也放弃了捷克语，但也是作为“论文语言”的德语所处的境遇。是的，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例子；可以把表达的这种解域化运动推向更远。但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一个是人工丰富这种德语，通过各种渠道使其膨胀，如象征主义、梦呓、神秘意义和隐蔽的能指。这是布拉格学派的方法，是古斯塔夫·梅林克和马克斯·布罗德等人的方法。③ 但这意味着依据原型、犹太教神秘哲学和炼金术为基础进行象征解域的一次绝望尝试，将加快与人民的决裂，将在犹太复国主义或“天国之梦”等活动中产生政治结果。卡夫卡将很快就选择另一种方法，或将发明另一种方法。他将选择实际的、贫乏的布拉格的德国语言。总

---

① 关于标准的难点和运用“次要文学地带”这样一个概念的必要性，见 Michel Ragon, *Histoire de la literature prolétarienne en France* (Paris: Albine Michel, 1974)。

② 卡夫卡《日记》，1911 年 12 月 25 日，第 193 页：“一个小民族的记忆不比一个大民族的记忆小，所以，能更彻底地消化现存的材料。”

③ 见瓦根巴赫《弗朗茨·卡夫卡》论“世纪转换时期的布拉格”，卓越地论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境遇和布拉格学派。

是朝着解域化的方向运动，直到冷静。由于语言枯燥乏味，那就让它发出新的强烈的颤音。把一种纯粹强化的语言运用与所有象征的、甚或意义的或简单的意指用法对立起来。达到一种完善的和未构成的表达，物质上强化的表达。（对这两条可选的道路，我们能不能在其他条件下在乔伊斯和贝克特的作品中发现相同的选择呢？作为爱尔兰人，他们都生活在少数文学的舒适条件之下。那是这种少数文学的光荣——成为所有文学的革命力量。乔伊斯作品中对英语和每一种语言的运用。贝克特作品中对英语和法语的运用。但前者始终通过鼓舞和多元决定发挥作用，导致了各种世界规模的解域化。后者借助枯燥和冷静，一种所愿望的贫穷，把解域化推向极端，以至于剩下的就只有强度了。）

今天有多少人生活在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当中呢？或不再甚或尚未了解自己的语言，而对他们被迫为之服务的多数语言一知半解呢？这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移民的孩子的问题，少数族裔的问题，少数文学的问题，但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如何让一种少数文学脱离自己的语言，让它挑战那种语言，使其走上一条革命路线呢？就自己的语言而言，如何成为游牧民、移民和吉卜赛人呢？卡夫卡回答说：从摇篮里偷走那婴儿，走那条钢丝绳。

无论贫富，每一种语言总是暗示口、舌、牙的一种解域化。口、舌、牙在食品中找到它们的原始地域。在献身于声音的表达时，口、舌、牙是在解域。因此，吃与说之间存在某种脱节，而除去表面现象，在吃与写之间也存在某种脱节。毫无疑问，人在吃的时候可以轻松地写，却不能轻松地说，但写进一步把词语变成了可与食品竞争的物。内容与表达之间的脱节。说，以及更重要的，写，就是戒斋。卡夫卡永远执迷于食品，而且执迷于最可口的食品，也就是动物或肉——执迷于

口，执迷于牙，而且是巨大的、不健康的、镶金的牙。[①] 这是卡夫卡与菲力斯之间的主要问题之一。戒斋也是卡夫卡作品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他的作品描写了漫长的戒斋史。屠夫仔细盘查过的饥饿艺术家在吃生肉的动物身边结束了艺术生涯，把参观者置于一个讨厌的选择面前。那些狗想要取代进行调查的猎犬的口，给它塞满了食物，这样它就不再会提问题了，但这里也有一个讨厌的选择："它们把我赶走，拒绝听我提问，那可能会更好些。不，它们不想那么做；它们事实上不想听我提问题，但那是因为我提出了这些问题，它们就不想赶我走了。"进行调查的猎犬在两种科学之间摇摆，一个是食品的科学——大地的低头的科学（"大地什么时候生产这些食品？"）——和音乐的科学，那是天空的科学和挺直的头的科学，如开始时七只音乐狗和结尾时唱歌的狗所展示的。但二者之间有一个共性，由于食品可以从上面掉下来，而食品的科学只能通过戒斋来发展，正如那音乐奇怪地没有声音一样。

一般说来，语言事实上通过意义的再分域来弥补它的解域。由于不再是感官之一，它就成了意义的工具。而正是意义，正确的意义，主宰着声音的指称（词所指的物或事物状态），而作为比喻意义，它主宰着矫揉造作的形象和隐喻（词在特定环境或条件下指称的其他事物）。因此，不仅有意义在精神上的再分域，也有物质上的再分域。同样，有一个与意义相关的表述的主体，和一个直接或间接与指称物相关的陈述的主体，只有通过二者间的差别和互补性语言才能存在。语言的

① 牙的主题常见于卡夫卡的作品中。一个屠夫祖父；在屠宰店里的街头教育；菲力斯的下巴；除了与菲力斯睡觉时，其他时间拒绝吃肉。见 Michel Cournot，"Toi qui as de si grandes dents，" *Nouvel Observateur*，April 17，1972. 这是论卡夫卡的最美的文本之一。在刘易士·卡罗尔的作品中也能见到吃与说的对立，和向无意义的逃逸。

这种普通用法可以说是广延的或代表性的——即语言的再解域功能（因此，《调查》结尾时唱歌的狗强迫主人公放弃绝食，就是一种再俄狄浦斯化）。

现在有些事情发生了：德语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处境，即作为与捷克语和意第绪语混合的一种流动语言，将给卡夫卡进行发明的机会。由于事物是如实的事物（“如实的事物，如实的事物，”这是卡夫卡极为珍重的一个公式，是事物实际状态的标志），所以他将放弃意义，只以隐含的意义表现；他将仅只保留意义的框架，或报纸剪裁。

由于表达了的声音是解域了的但在意义上可以进行重新分域的噪音，它现在听起来本身将不可避免地、绝对地被分域化。贯穿这个新的解域的声音或词语不再属于一种意义的语言，即便它衍生于这种语言，也不再是组织化了的音乐或歌，即便它看上去似乎是音乐或歌。我们注意到戈里高尔的哮鸣和模糊的词语，老鼠的呼哨，猴子的咳嗽，并不演奏的钢琴家，并不演唱或从不唱中生产歌的歌手，以及并不发出音乐但本质上却是音乐家的那几条音乐狗。无论在哪里，组织化的音乐都贯穿一条废除的直线——正如意义的语言总是贯穿一条逃跑的路线一样——以便解放一种活的具有表现力的物质，它为自身言说，不必被赋予任何形式。① 这种脱离意义、征服意义、积极地抵消意义的语言除了作为词语的发音，作为一种反映之外，已不再具有任何价值：“我只生活在一个小词的某处，在它的元音里……我暂时失去了我的无用的头脑。其开头和结尾

---

① 弗朗茨·卡夫卡《城堡》，Willa and Edwin Muir 译（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6）：“他注意到他们在和他说话，但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什么也没听到，而只有弥漫那个地方的噪音，在那噪音中，一种像是警报器的永远不变的尖叫声似乎在歌唱。”

的字母就是我的鱼一样的情感的开头和结尾。”① 儿童们熟练地做着重复单词的练习，而只模糊地感觉到它的意义，以便使其在周围震颤（在《城堡》的开头，学生们说话的速度很快，以至于人们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卡夫卡说，孩提时，他重复过父亲的一句话，以便让它在无意义的路线上逃走：“月末，月末”。② 本身没有意义的专有名词尤其适于这种练习。重音放在 i 上的 Milena，开始时使人想到“在波西米亚迷路的希腊人或罗马人，受到捷克人的侮辱，骗走了口音”后，又极近似地使人想起“被人抱出这个世界、抱出这个火坑的一个女人”，这里，其口音标志着一种总是可能的堕落，或相反，标志着“在沉重的负担之下你自己幸运地跳出的一步。”③

我们认为 Milena 这个名字的两种联想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即便是相对的、极端细微的差别：一个联想仍然将自身与一个奇异广泛的比喻场面相联系，另一个已经是高度集中的了，标志着名字自身内部包含着一个强力的门槛，要么跳过去，要么跌倒。如瓦根巴赫所说，“词是母体；它直接生产形象。”但我们怎样定义这一程序呢？关于意义，剩下的只够指导逃亡路线的了。不再用专有名词指称某物了，也不再用比喻意义赋予隐喻以意义了。但和形象一样，物不再构成任何物，而只是一系列强化的状态，是人们在一种或另一种意义上从高

---

① 卡夫卡《日记》，1911 年 8 月 20 日，第 61 - 62 页。

② 卡夫卡《日记》：“由于没有任何意义，‘月末’这个短语给我留下了一个可怕的秘密”，尤其是当每个月都重复的时候——卡夫卡本人暗示说，如果这个表达依然没有意义，那是因为懒惰和“弱化了的好奇心”。瓦根巴赫的一个消极解释暗示贫乏或无力。人人皆知的是，卡夫卡用这种消极暗示表现或隐藏其情感的客体。

③ 卡夫卡《给米莱纳的信》，第 58 页。卡夫卡对专有名词的执迷开始于他杜撰的那些名字，见卡夫卡《日记》，1913 年 2 月 11 日（《审判》中的名字）。

到低、从低到高进行强力赛跑的梯子或环路。形象就是这次赛跑本身；它已经变成了变化——人变成狗，狗变成人，人变成猴子或甲虫，反之亦然。我们已不再处于普通的、丰富的语言环境之中，如用狗一词直接指称一种动物，并在隐喻的意义上指其他事物（这样就可以说“像一条狗”）。① 1921 年的《日记》说：“隐喻是使我对文学感到绝望的事物之一。”卡夫卡故意扼杀所有隐喻，所有象征，所有意指，也同样扼杀所有指称。变形是隐喻的反面。不再有什么正确的意义或比喻的意义，只有属于词的范围之组成部分的状态的分布。物与他物只不过是遵循其逃亡路线的解域的声音或词所践踏的强度。在动物的行为与人的行为之间已不再存有相似性了，甚至不是什么简单的词语游戏的问题了。已不再有人或动物，因为他们在相互解域；在流动中，在可逆转强度的连续体中相互解域。相反，现在的问题是变化，包括作为一种强度差异的最大差异，障碍的跨越，上升或下降，弯曲或直立，词的声音。动物不“像”人那样说话，但却发出缺乏意义的语言的音调；词本身不“像”动物，但却以自己的方式爬行、嚎叫和徘徊，因为它们恰恰是语言狗、语言虫或语言鼠。② 要让这些序列震颤，那就让词向预料之外的内在强度敞开——简言之，一种对语言的非意指的强力使用。此外，不再有表述的主体了，不再有陈述的主体了。不再有作为狗的陈述的主体了，以及仍然“像”人

---

① 卡夫卡评论家在这方面的阐释是最糟糕的。他们通过隐喻解决一切：Mathe Robert 提醒我们，犹太人像狗一样，或举另一个例子：“通过把艺术家描写成一个要饿死的人，卡夫卡把他变成了一个饥饿艺术家；或，由于把他描写成寄生虫，卡夫卡把他变成了一条巨大的虫子。”（*Oeuvres completes*，Cercle du livre precieux，5：311）。在我们看来，这是文学机器的最简单概念——罗布－格里耶坚持要破解卡夫卡作品中全部隐喻。

② 见卡夫卡《书信集》，1902 年 2 月 4 日给 Pollak 的信，第 1－2 页。

一样表述的主体；不再有“像”甲虫一样的表述的主体了，陈述的主体依然是一个人。有的只是状态的循环，在必然是多元或集体组合的核心构成相互变化的循环。

布拉格的德语——枯萎的词汇和不正确的句法——是如何促进这种使用的呢？一般说来，“一种语言的内在张力”，不管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作强度或张量。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家威达尔·塞菲哈用强度指“允许走向概念极限或超越概念的任何语言工具，”标志着语言向其极端的运动，向之外或之前的一种可逆性的运动。[①] 塞菲哈充分表明了这种因素的多样性，它们可以是呈现各种意义的各种母词、动词或介词，以及表示痛苦的术语。[②] 也同样可以引述词语内在的声音，其不和谐的功能。一种少数文学的语言似乎特别发展了这些张量或强度。在分析受捷克语影响的布拉格德语的秀丽文字中，瓦根巴赫认为这种形式的德语的特点包括介词的误用，代词的滥用，可塑性动词的使用（如 Giben，用指“放置，坐下，安置，拿走”的序列，因此也成了强调成分），副词的繁殖和连续，充满痛苦的内涵的使用，口音作为词语内在张力的重要性，以及辅音和元音作为内在不和谐因素的分布。瓦根巴赫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一种语言的贫乏，都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出现，但又都创造性地用于一种新的冷静，新的表现

---

① 见 H. Vidal Sephiha，“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intensif，” in *Languages* 18 (June 1970)：104 - 20。我们从 J. - F. 利奥塔那里借用“张量”这个术语，用指强度与力比度之间的关系。

② Seohiha，“Introduction，” 107（“我们可以想象，表示痛苦、邪恶、恐惧、暴力等消极意义的任何句子都可以抛掉这个意义，以便保留其极限价值——即是说，其强度价值”：比如，德语中的 sehr，是源自中高地区的德语词，Ser 意思是“痛苦的”）。

力，新的灵活性和新的强度。① “我写的每一个词几乎都与下一个词相左，我听到辅音沉重地相互摩擦，元音则像吟唱表演中的黑人一样伴唱。”② 语言为了到达极端或极限而不再是代理性的了。痛苦的内涵伴随着这种形变，如戈里高尔痛苦的哮鸣或弗朗茨“独特和不可改变的”呼喊一样。想一想戈达尔影片中把法语用作LI语语言的情形。那里也有原型副词和连词的累积，这种累积构成了所有短语的基础——一种奇怪的贫穷，把法语变成了法语内部的一种少数语言；直接把词与形象相关联的一个创造过程；在与“够了，够了，他已足够了”这个极限强度相关联的序列结尾出现的技巧，和恰与一个全景镜头相偶合的一种普遍的强化，这时摄像机原地不动地旋转拍摄，使形象震颤。

对形象的比较研究也许比不上对语言的功能进行研究那么有趣，后者可以在同一组内进行跨语言的研究——双语甚或多语研究。由于惟个别语言的功能研究就能说明社会因素、力的关系和不同的权力中心，所以它能逃脱“信息”神话，以便把语言的等级制和命令式作为命令的传递、权力的实施或对这种实施的抵制加以评价。运用弗格森和冈珀兹的研究结果，亨利·戈达尔提出了一种四语模式：源于乡村或在乡村社区使用的本土语、母语或地域语言；工具的、城市的、政府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语言，用于生意经营、商业往来和官方传播的语言，第一种解域化的语言；指涉性语言，意义和文化的语言，导致文化再分域的语言；和神话语言，在文化的地平线上捕捉精神或宗教再分域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时空范畴具有明显的差别：本土语就在这里；工具语无处不在；指涉语就在那

---

① 瓦根巴赫《弗朗茨·卡夫卡》，第78－88页，尤其是78，81，88页。

② 卡夫卡《日记》，1910年12月15日，第33页。

里；神话语则在彼岸。但最重要的是，这些语言的分布随组合的不同而不同，而在一个组合内又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在欧洲，拉丁语在成为指涉语和神话语之前是工具语；英语在当今世界上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工具语）。① 用一种语言言说的东西不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言说，而可说和不可说的总体必然随每一种语言的不同而不同，随这些语言之间关联的不同而不同。② 此外，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边缘都是模糊的，界限都是变化着的，对这种或那种材料具有的功能都是不同的。一种语言可以对一种材料履行特定的功能，而对另一种材料则又履行另一种特定的功能。语言的每一种功能依次分化，携带着众多的权力中心。是各种语言的混合，根本不是各种语言的体系。当用法语做弥撒时，我们理解宗教融合的倡导者们何以愤怒地呼喊，因为拉丁语已被剥夺了神话功能。但古典主义者更落后于时代，他们呼喊是因为拉丁语的文化指涉功能也被剥夺了。他们以这种方式为这种语言行使的宗教或教育权力形式表示遗憾，因为现在它们已被其他形式取代了。在各个组合之间甚至存在一些更严肃的例子。地方主义的复兴，及其方言或土语或一种本土语的再分域——如何为一种世界规模的或跨国的技术政治服务呢？那种复兴如何为革命运动做出贡献呢？这些革命运动也充斥着它们试图赋予一种当代意义的古典词语。从瑟凡

---

① Henri Gobard, "De la vehicularité de la langue anglaise," *Langues modernes* (January 1972) and (*L'Alienation linguistique: analyse tetraglossique*, [Paris: Flammarion, 1976]).

② 米歇尔·福柯坚持把特定时刻语言中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区别开来（即使能够做到的话）。Georges Devereux（H. Gobard 引用说）分析了年轻的莫哈维印第安人，他们用土语极轻松地谈论性，但却不能用工具语言即英语轻松地谈论性；这不仅因为英语教师起到了压抑作用，而且有语言的问题（见 *Essais d'ethnopsychiatri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1970], 125 - 26）。

－施莱伯尔到布勒敦吟游诗人到加拿大歌手。而那还不是真正的界限划分，因为加拿大歌手也可以导致最反动的、最具俄狄普斯性质的再分域，啊，妈妈，啊，我的祖国，我的小屋，olé，olé。我们可以称此为一种模糊，一种混合的历史，一种政治局势，但语言学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也不想了解这一点，因为，作为语言学家，他们是“非政治的”纯粹的科学家。甚至乔姆斯基也只能通过勇敢地反对越战来弥补他的科学非政治主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哈布斯堡帝国的情形。帝国的垮台和堕落增加了危机，到处推行解域化运动，引来了各种复杂的再解域——古代的、神话的或象征主义的。我们可以随意从卡夫卡的同代人中举出下面的例子：爱因斯坦和他对宇宙表征的解域（爱因斯坦在布拉格教书，物理学家菲力普·弗兰克召开会议，卡夫卡出席会议）；奥地利的十二音位主义者们及其对音乐再现的解域（Wozzeck 中玛丽的死，或鲁鲁的死，或回声 si，在我们看来都遵循一条音乐路线，类似于卡夫卡当时所做的事）；表现主义的电影及其对形象进行解域和再分域的双重运动（具有捷克背景的罗伯特·威恩；生于维也纳的弗里兹·朗格；保罗·韦格纳和他对布拉格主题的运用）。当然，我们应该提到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①] 布拉格犹太人的特殊境遇与“四种语言”有什么关系？这些来自乡村环境的犹太人的本土语言是捷克语，但捷克语却逐渐被忘记和压抑；至于意第绪语，它往往受到蔑视或怀疑——卡夫卡告诉我们，它让我

---

① 关于布拉格学派及其语言学，见 *Change*，No. 3 (1969) and 10 (1972)。(的确，布拉格学派成立于 1925 年。但在 1920 年，雅各布森来到布拉格，当时，那里已经发动了 Mathesius 领导的、与 Anton Marty 相关的捷克语运动，后者曾在德语大学中教过书。从 1902 年到 1905 年，卡夫卡曾听过 Marty 的课，Marty 是 Brentano 的学生，曾参加过 Brentano 召开的会议。

们害怕。德语是城镇的本土语，国家的官方语言，进行交换的商业语言（但英语已经是这种交换所不可或缺的语言了）。德语——但此次是歌德的德语——具有文化和指涉功能（如较小程度上的法语）。作为一种神话语言，希伯来语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有关，仍然具有一场好梦的性质。对其中任何一种语言，我们需要评价地域、解域和再分域的程度。卡夫卡自己的处境：他是布拉格讲捷克语的几位犹太作家之一（而这种语言将对他与 Milena 的关系至关重要）。德语恰恰起到了本土语和文化语的双重作用，并总是把歌德抬出来作为样板（卡夫卡也懂法语、意大利语或许一点英语）。他到后来才学习希伯来语。复杂的是卡夫卡与意第绪语的关系。他与其说把意第绪语看作犹太人的一个语言地域，毋宁说将其视作重振德语语言的解域游牧运动。意第绪语中令他着迷的东西不是宗教社区的语言，而是公共剧院的语言（他将成为伊萨克·罗威巡回剧院的老板和经理）。[①] 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卡夫卡用意第绪语向抱有很大敌意的犹太资产阶级听众讲话，其效果相当惊人：意第绪语是一种令人敬畏而非令人蔑视的语言，“胆怯与一种根本的讨厌相混合”。那是一种缺乏语法的语言，充满了词的外壳，这些外壳迅速消逝、运动、移动，变为“把力的关系内化”的游牧民。这是移植到中高地区的德语的一种语言，因此从内部改造德语，这样，如果要将其译成德语，就必须破坏它。人们只能通过心灵“感觉”来理解意第绪语。简言之，这种语言的少数用法将使你陶醉：“然后，你将感到意第绪语的真正统一，如此强烈致使你感到恐惧，然而那不再是对意第绪语而是对你

① 关于卡夫卡与 Lowy 和意第绪剧院的关系，见布罗德《弗朗茨·卡夫卡》，第 110－16 页，和瓦根巴赫《弗朗茨·卡夫卡》，第 163－67 页。在这个哑剧团中，一定有许多低下的头和挺直的头。

自己的恐惧。尽可能欣赏这种自信吧!”①

卡夫卡并未通过捷克语进行再分域。他没有跨文化地使用德语的梦呓、象征和神话意义（甚至希伯来化的意义），如布拉格学派所示；也没有使用口语的、通俗的意第绪语。相反，利用意第绪语为他开辟的道路，他将其改造成独一无二的孤独的写作形式。由于布拉格德语受到若干程度的解域，所以他总是要走得更远，达到更大的强度，但却朝着新的冷静，新的和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异，一种无情的修正，一颗挺直的头。分裂的礼貌，水造成的陶醉。② 他将让德国语言选择一条逃亡路线。他将节制自身；他将撕掉布拉格德语自身试图隐藏的全部未开发的性质；他将让它发出一声极端冷静和有力的呼喊。他将从中拖出狗的嚎叫、猴子的咳嗽和甲虫繁忙的脚步声。他将把句法变成呼喊，让那呼喊包容这种干枯的德语的严格句法。他将把它推向文化和神话都无法拯救的解域，那将是绝对的解域，即便缓慢、僵化、凝结。缓慢而循序渐进地把语言带到沙漠。为了呼喊而使用句法，给予呼喊一种句法。

除了少数之外不存在任何多数的或革命的东西。恨所有大师的语言。卡夫卡对仆人和雇员的着迷（普鲁斯特也对仆人和仆人的语言持同样态度）。更使他感兴趣的是创造自己语言的可能性——假定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一种多数语言，或曾经是——一种少数的应用。他似乎是自己语言内部的陌生人；这就

---

① “An Introductory Talk on the Yiddish Language,” trans. Ernest Kaiser and Eithne Wilkins in Franz Kafka, *Dearest Fath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4), 381 – 86.

② 一个杂志编辑宣称卡夫卡的散文具有“一个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干净气息”（见瓦根巴赫《弗朗茨·卡夫卡》，第 82 页）。

是卡夫卡的伟大泳者的处境。① 即便是独一无二的，一种语言也仍然是一种混合，一种分裂的混合，一个丑角的服装，其中，非常不同的语言功能和不同的权力中心统统表现出来，把可说的与不可说的混淆起来。一个功能将被另一种功能淘汰，不同程度的地域和相对解域都将表现出来。即便是多数的，一种语言也只能有一种强化应用，使其沿着创造性的逃亡路线逃跑，不管多么缓慢，不管多么小心，这些逃亡路线现在都能形成一种绝对的解域。所有这些发明，不仅在词汇上，因为词汇无关紧要，还有清醒的句法发明，都只不过是为了像狗那样书写（但狗不能书写——的确如此，的确如此）。这就是阿尔托用法语所做到的——呼喊，喘气。塞利纳遵循另一条路线用法语所做到的，即最高音度的呼喊。塞利纳的句法革命从《长夜漫漫的旅程》开始，到《缓期死亡》，然后又从《缓期死亡》到《木偶剧团》。（然后，塞利纳除了自己的不幸之外便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换言之，他不再有写作的欲望了，只有赚钱的需要。而结果总是一样，语言的逃亡路线：沉默，被干扰，无尽头，或更糟。但到那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疯狂创造呀！一种什么样的写作机器呀！塞利纳的《长夜漫漫的旅程》受到如此的欢迎，以至于他在《缓期死亡》中走得更远。然后，在天才之作《木偶剧团》中，语言只不过变成了强度。他用一种“少数音乐”说话。卡夫卡也是一种少数音乐，一种不同的音乐，但总是由解域的声音构成，一种本末倒置的语言。）这些是真正的少数作家。是语言、音乐和写作的一次逃亡。我们称作波谱——波谱音乐、波谱哲学、波谱写作——的东西都是词

① “伟大的泳者”无疑是卡夫卡笔下最具贝克特特色的一个文本：“我必须承认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尽管付出了一切努力，还是听不懂你讲的那种语言的一个词。”

组。利用自己语言的多义性，加以少数的或强化的应用，把这种语言的被压迫性质与其压迫性质对立起来，发现非文化或未开发的弱点，一种语言借以逃亡的语言的第三世界地带，进入物的一个动物，开始运作的一种组合。有多少风格或文类或文学运动，即便是非常小的，也只有一个梦想：在语言中承担多数功能，将自身作为一种国家语言，一种官方语言（如今天的精神分析，它将成为能指、隐喻、词语游戏的母体）。创造相对的梦想：知道如何创造一个变化中的少数。（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的、指涉性文类的哲学还有希望吗？让我们利用这一时刻吧！此刻，反哲学正试图成为一种权力语言。）

块　　茎[①]

我们两人合作写了《反俄狄普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几个，所以就已经有了一大群。在此，我们使用了可供使用的一切，包括离我们最近的和离我们最远的。我们巧妙地用了假名，为的是不让人认出来。为什么隐藏自己的名字呢？出于习惯，纯粹出于习惯。让别人无法认出我们来。使人难以察觉，不是让我们自己使人难以察觉，而是让使我们行动、感觉和思想的东西难以察觉。也因为像别人那样谈话是好事，也说太阳升起来了，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说话方式罢了。所要到达的不是人们不再说我的地方，而是人们是否说我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的地方。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懂得他自己。我们一直被帮助、被激励、被繁殖。

一本书既没有客体，也没有主体；它由以不同方式形成的物质所构成，并在不同的日期、以不同的速度构成。给这本书赋予主体的属性就等于忽视了这些物质的作用，及其关系的外在性。解释地质运动就等于建构一个有益的上帝。在一本书

---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and Féle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y Brian Massumi (London an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3 – 25. Notes from pp. 528 – 9.

中，如在所有事物中一样，有许多表达或分隔的路线，有地层和区域；但也有逃亡路线，解域和抵制分层的运动。这些路线上可比较的流速产生相对缓慢和黏性的现象，或相反，产生速度和断裂。所有这些路线和可测量的速度，构成了一个组合。一本书就是这样一个组合，而作为这种组合它没有归属。它是一种多元性（multiplicity）——但我们还不知道当多（the multiple）不再有所归属的时候这种多元性会导致什么后果，即是说，它已经被提升到独立存在的地位。机器组合一方面面对地层，这无疑使它成为一个有机体，或意指的总体性，或可归属于一个主体的确定性；它还有另一面，面对一个无器官的身体，这个身体不停地拆解那个有机体，让非意指性粒子或纯密度在那里经过或循环，赋予自身以众多的主体，而给这些主体留下的仅仅是作为密度踪迹的一个名称。一本书的无器官的身体是什么呢？根据所论路线的性质，有几种身体，它们的特殊等级和密度，它们在一个“黏性平面”上的可能聚敛保证了它们的选择。在此，如在别处一样，测量单位是最重要的：把写作量化。一本书谈论什么与一本书如何制作，二者间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一本书也没有客体。作为一个组合，一本书只有它自身，与其他组合相联系，与其他无器官的身体相关。我们将永远不问一本书有什么意义，是所指还是能指；我们将不会在书中寻找要理解的东西。我们将询问它的功能是什么，与它输送或不输送密度的哪些其他物体有关，使得它拥有的其他多元性被插入和变形，它又是与哪些无器官的身体相聚敛的。一本书只能通过外部、位于外部才能存在。一本书本身是一台小机器；这台文学机器与战争机器、爱情机器、革命机器等——以及横扫所有这些机器的抽象机器——是什么（也是可测量的）关系?.我们由于过多地引用文学家而受到批评。但当写作时，惟一的问题是文学机器应该与哪一台机器相连接？为了工

作而必须连接。克莱斯特和一台疯狂的战争机器。卡夫卡和一台最不寻常的官僚机器。……（通过文学，人若变成了动物或植物那该怎么办？这当然不是文学上的意思。难道人不是首先通过声音而变成动物的吗？）文学是一个组合。它与意识形态没有丝毫关系。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从来就不存在。

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是多元性，路线，地层和分隔，逃亡路线和密度，机器组合和机器的不同种类，无器官的身体和它们的建构和选择，黏性平面，而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测量单位。地层测量仪，涂抹仪，密度单位回波振荡器，聚敛单位回波振荡器：所有这些不仅构成了写作的量化，而且把写作定义为总是对其他事物的测量。写作与意指无关。它与测量、绘图、甚至与尚未出现的领域相关。

第一种书是根—书（root - book）。树已经成了世界的形象，或者说，根成了世界之树的形象。这是古典之书，高尚的、指意的、主观的有机内在性（书的地层）。书模仿世界，正如艺术模仿自然一样：以它特有的程序完成自然所不能或不再能完成的事。书的法则是反映的法则，变成了二的一。当书的法则主宰世界与书、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分化时，它何以寓于自然之中？一变成了二：无论何时，当我们遇到这个公式时，甚至当毛将其当作策略而言说时，或以最“辩证”的方式加以理解时，我们面前展现的就是最古典的、最古老的、反映最透彻的、最令人讨厌的那种思想。自然并不以那种方式运作：在自然中，根是主根，有一个更多繁殖的、边缘的和循环的分支系统，而不是一分为二的系统。思想落后于自然。甚至作为自然现实的书也是一个主根，有中枢脊椎和周围的叶子。但作为精神现实的书，作为形象的树或根，无尽地发展变成二的一的法则，然后就是变成四的二的法则……二元逻辑是根—树的精神现实。甚至像语言学这样“先进的”学科也保留着根—树，

作为其基本形象，并因此与古典反映联姻（比如，乔姆斯基和他的语法之树，以 S 为起点，按二分法进行）。这就等于说，这个思想系统从未达到对繁殖的理解：为了按精神方法推算出二，它必须假定一个牢固的主要整体。在客体的方面，无疑可以按自然的方法直接从一走向三、四或五，但只能是在有一个牢固的主要整体的前提下，这个整体就是支持次根的主根。这并未使我们走出多远。二分法的二元逻辑只不过由连续的环之间的双单义关系所取代。作为枢纽的主根并不比二分的主根提供对繁殖的更好理解。一个在客体中运作，另一个在主体中运作。二元逻辑和双单义关系仍然是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对施莱伯尔病历的阐释中的幻觉之根）、语言学、结构主义、甚至信息科学的主导。

胚根系统，或束状根，是书的第二个比喻，我们的现代性愿意为它效忠。这一次主根败育，或顶尖受到破坏；次根的一种直接的、不明确的繁殖移植到它上面来，经历了一次繁荣的发展。这一次，自然现实使主根败育，但根的整体仍在，作为可能的过去或尚未到来的未来。我们必须追问反映性的精神现实能否通过要求一个更加综合的秘密整体，或一个更宽泛的总体，来弥补这种事物状态。且举威廉·巴罗斯的切割方法为例：把一个文本叠在另一个文本之上，构成了繁殖的、甚至是偶生的根（如切下的枝条），这是对所论文本的根的一个补充。在这个折叠的补充维度里，整体继续从事精神的劳作。大多数绝对的断简残篇之所以能代表总体或全部著作，其原因就在于此。促进系列多产或增进繁殖的大多数现代方法在某一特定方向是极为有效的，如线性的方向，而一个总体化的整体却断言坚定地朝向另一个循环或周期的维度。每当一种繁殖被置于一种结构之中时，它的发展便被抵消，它的所有法则被综合起来而加以简约。整体的败育者的确是天使的创造者，doctores an-

gelici，因为他们证实了一个的的确确是天使般的、至高无上的整体。乔伊斯的话，准确地说是具有“无数的根”，打碎了词语、甚至语言的线性整体，只不过设定了句子、文本或知识的周期性整体。尼采的格言打碎了知识的线性整体，只不过唤起了永久回归的循环整体，作为思想中的未知呈现出来。这等于说，束状根系统并没有真的打破二元论，只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在自然现实与精神现实之间，建立了一种互补性：整体始终在客体中受挫败和挫折，而一种新型整体却在主体中大获全胜。世界失去了中枢；主体甚至不再使用二分法了，但却登上了更高的整体，总是对客体起补充作用的多价的或多元决定的整体。世界变成了一片混沌，但是书仍然是世界的形象：胚根的混沌宇宙而不是根的宇宙。一种奇怪的神秘化：一本书的全部总体就是它的破碎存在。无论如何，不管这想法多么乏味，书都是世界的形象。事实上，说“多元万岁”还不足够，还很难提高那声呼喊。任何印刷的、词汇的甚或句法的智巧都不足以使人听到它的声音。多必须被制造出来，不总是靠附加一个更高的维度，而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凭借清醒的头脑，运用已经到手的一些维度——总是 n－1（一属于多的惟一方式：总是被减去）。建构从多中减一的减法；在 n－1 的维度上写作。这个系统可以称作一个块茎。作为地下支干的一个块茎绝对不同于根和胚根。球茎和根茎是块茎。有根或有胚根的植物在其他方面也许完全是块茎形态的：问题是，特定的植物生命是否完全是块茎性质的。甚至一些成群的动物也是如此。鼠是块茎。而就藏身、食物供应、运动、躲避和逃亡等功能来说，狐兔亦然。块茎本身呈现多种形式，从表面上向各个方向的分支延伸，到结核成球茎和块茎。如同老鼠成堆的情形。块茎中有最好的和最糟的：马铃薯和偃麦草，或野草。动物和植物，偃麦草是马唐。我们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如果我们不罗列出块茎

的一些特性，我们就不能说服任何人。

1 和 2. 连接和异质混合的原则：块茎的任何一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任何其他一点连接。这与树或根不同，树或根策划一个点，固定一个秩序。乔姆斯基模式的语言之树仍然从 S 点开始，然后按二分法进行。相反，一个块茎中并不是每一个特性都必然与一种语言特征相关：每一种性质的符号链都相关于非常多样的符码模式（生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这些符码不仅激活了不同的符号体系，而且激活了不同地位的事物状态。集体的表述组合在机器组合中直接发生作用；在符号体系及其客体之间进行一次根本性突破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当语言学声称只研究清晰的客体，而不提出任何关于语言的前提时，它仍然没有超出话语的范围，暗示着特殊的组合模式和特殊的社会权力类型。乔姆斯基的语法性，控制每一个句子的范畴符号 S，从根本上与其说是一个句法标记，毋宁说是一个权力标记：你必须建构语法准确的句子，你将把每一个陈述分成一个名词短语和一个动词短语（第一个二分法……）。

我们对这些语言模式的批评并不是说它们太抽象，恰恰相反，它们还抽象得不够，它们还不能发挥抽象机器的功能，即把一种语言与陈述的语义和语用内容联系起来，与集体的表述组合联系起来，与社会领域的整个微观政治联系起来。一个块茎不停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以及与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相关的状况之间确立联系。一个符号链就仿佛一个块茎，聚结着各种各样的行为，不仅有语言行为，而且有感知、模仿、姿态和认知行为：它本身没有语言，也没有什么语言的普遍性，有的只是一大堆方言、土语、俚语和专门用语。没有理想的说话者—听者，正如没有同质的语言群体一样。用韦因莱西的话

说，语言是“一种本质上异质的现实。”① 在一个政治多元体内部，没有什么母语，只有主导语言的权力接管。语言在教区、主教区、首都的周围稳定下来。它形成球茎。它通过地下的支干和水流，沿着河谷或铁路发展起来；它像一块油一样扩散开来。② 把一种语言分裂成内在的结构因素始终是可能的，这从根本上与寻根没有什么不同。一棵树总有它自己的谱系。这不是用来描写人的方法。相反，块茎的方法只能通过把语言分解成其他范畴和其他语域才能分析语言。一种语言从来不封闭自身，除非已经阳痿。

3. 繁殖原则：只有当多被实际当成一个实体时，即“繁殖”时，它才不再与一有任何关系，即作为主体或客体、自然现实或精神现实、形象或世界的一。繁殖是块茎的，并揭示树的伪繁殖，不管这些繁殖是什么。在客体中没有可用做枢纽的整体，或用来分化主体的整体。在客体中甚至没有流产的整体，或主体中的“回归”。一种繁殖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只有诸种决定因素，量值和维度。没有在性质上发生变化的繁殖，这些决定因素、量值和维度的数量就不能增加（因此，综合的法则随繁殖的发展而增加）。木偶戏的牵线，作为块茎或繁殖，不是连接在艺术家或木偶戏牵线人的所谓意志之上，而与神经纤维的繁殖相连接，这些神经纤维的繁殖在与第一个木偶相连接的其他维度里构成了另一个木偶。“把牵动木偶的牵线或垂线称作编织。可能有人反对说，它的繁殖在于演员的人

---

① [trans: U. Weinreich, W. Labov, and M. Herzog,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W. Lehman and Y. Malke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968), p. 125; cited by Francoise Robert, “Aspects sociaux du changement dans une gammaire generative,” Language, no. 32 (December 1973), p. 90.]

② Bertil Malmberg, New Trends in Linguistics, trans. Edward Carners (Stockholm: Lund, 1964), 65 – 67 (the example of the Castilian dialect).

格之中，这个演员把它投入到文本之中。不错；但演员的神经纤维依次构成了一个编织。它们通过灰色物质，通过网络，进入未区分状态。……其相互作用近似于编织者们在神话中纯粹为命运之神做贡献的活动。”① 一个组合恰恰是一次繁殖的各个维度的增加，必然在这次繁殖扩展其关联时改变其性质。在一个块茎内没有点或位置，即在结构、树或根中发现的点或位置。有的只是线。当格兰·古尔德加快表演的速度时，他并非仅仅在展示精湛的技艺，而是在把音乐的点变成线，从而使整个节目无限地繁殖。数字已不再是据其在特定维度内的位置衡量诸因素的一个普遍概念，而本身已经成为据所论维度变化而变化的一次繁殖（所论维度的领域要比附属于那个领域的数字组合重要）。我们没有测量单位，只有测量的繁殖或变体。只有当能指或某一相应的主观化程序在繁殖中接管权力时，整体的观念才出现：这就是中枢统一为客观因素或点之间的一组双单义（biunivocal）关系，或为在主体内遵循二元分化逻辑进行分化的“一”建构基础的情况。整体总是在一个空洞的维度里运作，这个维度是对所论系统（多元符码）的增补。问题是，一个块茎或繁殖从来不会给自身进行多元编码的，从来不把一个增补的维度置于其线的数之上，即置于附属于那些线的数的繁殖之上。所有的繁殖都是平展的，因为它们填充或占据了所有维度：我们因此可以谈论繁殖的一个黏性平面，尽管这个“平面”的维度随与其缔结的关联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繁殖是被外部限定的：被抽象路线、逃亡路线或解域路线限定的，并据此改变性质，与其他繁殖相关联。黏性平面（网格）就是所有繁殖的外部。逃亡路线标志着：繁殖所有效填充的有限量

---

① Ernst Junger, Approches; drogues et ivresse (Paris: Table Ronde, 1974), p. 304, sec. 218.

的维度的现实；增补维度的不可能性，除非繁殖被逃亡路线所改变；不顾维度的数量而展平单一黏性平面上或其外部的全部繁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本书的理想就是把一切都展示在这种外部的平面上，展示在同一页纸上、同一本书中：经历过的事件，历史的决定因素，概念，个人，团体，社会构型。克莱斯特发明了这样一种写作，一条断续的链条，其情感和可变速度总是以增减和变化与外部发生某种关系。开放的环。因此，他的文本在每一方面都与古典或浪漫之书相对立。古典或浪漫之书是由内容或主体的内在性构成的。机器之书攻击国家机器之书的一场战争。n 维度的平面繁殖是无意指的和无主体的。它们由不定冠词或分隔所标识（一些绊根草，一个块茎的一些……）。

4 无意指断裂的原则：与分隔不同结构或把单一结构切割开来的多意指断裂相对立。一个块茎可能断裂，在特定的地点粉碎，但却可以在旧的路线或新的路线上重新开始。你永远摆脱不掉蚂蚁，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动物块茎，在大部分被毁灭之后可以不断返回。每一个块茎都包含着分隔路线，块茎就是据这些分隔路线而被分层、分域、组织、指代或归属的。每一个块茎也包含着解域的路线，它就是不断沿着这些解域路线逃亡的。每当分隔路线爆裂成一条逃亡路线时，块茎就发生一次断裂，但逃亡路线却是块茎的一部分。这些路线总是相互联系着的。所以，永远不能设置一种二元论或二分法，即便是最基本的好坏之分也行不通。你可以制造一次断裂，画一条逃亡路线，然而你仍然会再次遇到对一切加以重新分层的组织，给能指恢复权力的构型，重构主体的属性——你所愿意重构的一切，从俄狄普斯的复活到法西斯主义的具体化。团体和个体都包含着等待具体化的微观法西斯主义。是的，绊根草也是一种块茎。好与坏只是一种积极的临时选择的产物，必须加以更

新。

解域的运动和重新分域的过程怎么能不相关、相联、相互纠缠呢？兰花通过构成一个形象来解域，一只寻踪索迹的黄蜂；但黄蜂又依据那个形象重新分域。然而，黄蜂还是被解域了，成了兰花繁殖机器的一件产品。但黄蜂通过传递花粉而对兰花进行了重新分域。黄蜂和兰花作为相异的因素而构成了一个块茎。可以说，兰花模仿黄蜂，以意指的方式（模仿，模拟，吸引等）再造黄蜂的形象。但这只在地层的层面上是真实的——两个地层之间的平行，使一个层面上的植物组织模仿另一个层面上的动物组织。同时，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进行着：根本不是模仿，而是捕捉符码，符码的剩余价值，增殖，可验证的变化，正在变成兰花的黄蜂，和正在变成黄蜂的兰花。每一种变化都把一方的解域变成另一方的重新分域。这两种变化相互关联，在密度的循环中形成驿站，进一步推进解域。没有模仿，也没有相似性，有的只是两个相异系列在逃亡路线上的爆炸，它们是由一个共同的块茎构成的，它已不再被任何意指所归属或征服。勒米·肖文说得好：这是“相互间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存在者的不平行进化。”① 更普遍地说，进化图式可能被迫放弃树及其繁衍的旧模式。在一定条件下，一个病毒可能与生殖细胞建立联系，作为一个复杂的细胞基因传播开来；此外，它可以逃亡，进入完全不同种类的细胞之中，但同时也携带着来自前一个寄主的“遗传信息”（如本文尼斯特和托达罗目前对 C 病毒的研究，即其与狒狒的 DNA 和与几种家猫的 DNA 的双重联系）。

进化图式将不再遵循树的遗传模式，即从最小差异到最大

---

① Remy Chauvin in Entretiens sur la sexualite, ed. Max Aron, Robert Courrier, and Etienne Wolff (Paris: Plon, 1969), p. 205.

差异的发展，相反，一个块茎直接在异质因素中运作，从一条已经区别开来的路线向另一条跳跃。[①] 再者，也存在着狒狒和猫的非平行进化；它们显然不是相互模仿或摩制而来（变成狒狒的猫并不意味着猫“扮演”狒狒）。我们用病毒构成一个块茎，甚或说，我们的病毒诱使我们与其他动物构成一个块茎。如弗朗索瓦·雅各布所说，由病毒或通过其他方法转移遗传物质，产生于不同种属的细胞的融合，其结果都与“古代和中世纪可怕的婚配”的结果没什么两样。[②] 不同路线之间的横向交流搅乱了树的谱系。总是寻找分子，甚至亚分子，即我们与之相联系的粒子。我们的生死与其说由遗传疾病所决定，毋宁说取决于我们多形态的、块状的流感，即有其自身遗传路线的疾病。块茎是反谱系的。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书和世界：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反，书并不是世界的形象。书与世界构成一个块茎，书与世界之间是一种非平行的进化。书保证世界的解域，而世界导致书的重新分域，书反过来又在世界中给自身解域（如果可能，如果它有这个能力的话）。模仿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概念，因为它

---

① On the work of R. E. Benveniste and G. J. Todaro, see Yves Christen, “Le role des virus dans l'evolution,” La Recherche, no. 54 (March 1975): “在经过细胞内的整合和提取之后，由于删除过程中出了错误，所以，病毒携带着寄主的 DNA 碎片，把它们传播到新的细胞中去：实际上，这是我们所说的‘遗传工程’的基础。结果，一个有机体的遗传信息可以通过病毒传到另一个有机体。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中，这种信息转移将是从较高级进化的种属向一个不太发达的种属的转移，或者是比较进化的种属的祖先。因此，这个机制就将按与古典进化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果这种信息转移证明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将用网状图式（用被区别之后的枝条之间的交流）取代目前使用的丛林或树的图式来表示进化”（p. 271）.

② Francois Jacob, The Logic of Life, trans. Betty E. Spillmann (New York: Pantheon, 1973), pp. 291 - 292, 311 (quote).

依赖二元逻辑描写性质完全不同的现象。鳄鱼并不繁殖树干，正如蜥蜴不能繁殖其周围环境的色彩一样。粉色的豹什么都不模仿，什么都不繁殖，它把它的颜色涂在世界上，粉色涂上粉色；这是它正在变成的世界，以如此的方式致使它自身变得无从察觉，无意指，产生断裂，即其自身的逃亡路线，始终遵循其“非平行的进化”。植物的智慧：甚至当植物有根时，也总是有一个外部，在这里，它们与别的物体构成块茎——与风，与动物，与人类（而且还有一个方面，即动物和人一样自身构成块茎）。“醉酒是植物在我们体内的一次胜利爆发。”总是借助断裂追随块茎；加长、延长、接续逃亡路线；使它多样化，直到你产生出 n 维度和断续方向的最抽象、最曲折的路线。连接解域了的流动。追随植物：你从限定第一条路线开始，这条路线包括围绕连续独体的无数趋同的圆；然后，你看到在那条路线内是否自动形成了新的趋同的圆，在界限之外和其他方向是否出现了新的点。写作，构成块茎，通过解域扩大你的地域，延长逃亡路线，直到它变成一部抽象机器，覆盖着整个黏性的平面。“先去看你的老植物，仔细观察雨水冲刷出来的河道。现在，雨水可能已把种子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观察溢流造成的裂缝，由此确定水流的方向。然后，找到在距你的植物最远点生长的植物。在二者之间生长的所有棘手的野草都是你的。以后，……你可以沿着这条路上的每一点顺着河道扩大你的疆域。”① 音乐总能播放出逃亡的路线，如同许多“变化性繁殖”一样，甚至推翻给音乐以结构并使其块茎化的那些符码；音乐形式，乃至其断裂和多产之所以可以比作一棵野草、

---

① Carlos Castaneda, 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88.

一个块茎，其原因就在于此。①

5 和 6。绘图和贴花原则：一个块茎对任何结构或生成模式都不负有义务。它更是任何关于生成轴或深层结构的思想所陌生的。一个生成轴就像是一个客观的中枢统一，连续的阶段就是依据这个统一组织起来的；一个深层结构更像是一个基本序列，可以分解成一些直接的构成因素，而产品的统一则要转换到另一个变化和主观的维度。这并不构成从树或根——中枢主根或簇生叶——的代表模式的起点（如，乔姆斯基的“树”与一个基本序列相关，代表其自身据二元逻辑的生成过程）。最古老的思想形式的一个变体。我们认为，生成轴和深层结构归根结底是无限的繁殖的踪迹的原则。全部的树逻辑就是踪迹和繁殖的逻辑。在语言学中如同在精神分析学中一样，其客体是一个无意识，它本身就是代表性的，就已具体化作被编码的综合体，沿着一个生成轴排开，分布在一个句法结构内。它的目标是描写一个实际状态，保持主体间关系的平衡，或探讨从一开始就已经在记忆和语言漆黑的隐蔽处潜伏着的一个无意识。它包括在多元符码结构或支撑轴的基础上寻找现成的东西。树展示踪迹，把踪迹分成等级；踪迹就好比一棵树的叶子。

块茎则完全不同，是一张地图而不是一个踪迹。制作一张地图，而非一个踪迹。兰花并不繁殖黄蜂的踪迹；它在一个块茎里与黄蜂一起构成一张地图。地图与踪迹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地图完全指向与真实相接触的一种实验。地图并不繁殖一

---

① Pierre Boulez, Conversations with Celestin Deliege (London: Eulenberg Books, 1976)：“你把一粒种子播在堆肥里，然后它突然像野草一样生长起来”（p. 15）；关于音乐生产：“一种流动的音乐，其中，写作本身使表演者不可能与脉冲的时间相一致”（p. 69）。

种自行封闭的无意识；它构造无意识。它孕育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移去无器官身体上的障碍物，最大限度地把无器官的身体敞放在黏性的平面上。它本身就是块茎的一部分。地图是打开的，它的所有维度都是可连接的；它是可拆解的，可颠倒的，可以进行不断的修改。它可以被撕破，被颠倒，适于任何一种放置方式，随意由个体、团体或社会构型重新制作。它可以画在墙上，被当作艺术品，被建构成政治行动或沉思。块茎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也许在于它总是拥有无数进口；在这个意义上，地洞就是一个动物块茎，有时清楚地把作为逃亡路线的通道与储藏室或生活层（参见麝鼠）区别开来。地图拥有无数进口，这与踪迹恰好相反。踪迹总是回到“原处”。地图与语言行为有关，而踪迹总是涉及一种公认的“语言能力”。与精神分析学和（把每一种欲望和陈述局限于一个生成轴或多元符码结构，在那个轴上制作无数单调的各个阶段的踪迹或那个结构的构成因素的）精神分析能力不同，精神分裂分析拒绝任何事先已追索的命运，不管它如何称呼这个命运——神性的，神秘解释的，历史的，经济的，结构的，遗传的或句法的。（显然，梅拉尼·克莱因不理解她的一个儿童病人小理查的地图制作，而只满足于现成的踪迹——俄狄普斯，好爸爸和坏爸爸，坏妈妈和好妈妈——而那个孩子则尽全力进行一次完全被精神分析学家所误解了的语言行为。）① 内驱力和作为部分的客体既不是生成轴上的各个阶段，也不是一个深层结构里的不同位置；它们是对问题的政治选择，是进口和出口，是那个孩子在政治

---

① 见 Melanie Klein, 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1)：战争地图在理查活动中的作用。[trans: Deleuze and Guattri, with Claire Parnet and Andre Scala, 在“话语的阐释”中分析了克莱因的理查和弗洛伊德的小汉斯, in Language, Sexuality and Subversion, trans. Paul Foss and Meaghan Morris (Sydney: Feral Publications, 1978), pp. 141 - 157.]

上即用其全部欲望的力量所活过的死胡同。

然而，通过把地图与踪迹加以比较，比作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难道不是又折回到简单的二元论上来了吗？踪迹难道不是地图的本质吗？与根交叉，有时与根融合，这难道不是块茎的本质吗？一幅地图不也包含着与其自身踪迹相似的多余现象吗？一种繁殖不也拥有各个层次，统一和总体化、一体化、模仿机制、意指的权力接管和主体归属就是扎根于这些层次的吗？甚至逃亡路线不也由于其最终的分离而繁殖它们本来就应拆解和智胜的那些构型吗？但其反面也同样真实。这是一个方法问题：踪迹总是要被放回到地图上的。这种运作和以前的运作决不是对称的。说踪迹繁殖地图，这是不准确的。相反，那就好比一幅照片或 X 光片，是通过选择或孤立开始的，通过着色或其他严格的程序等人工手法，即它旨在繁殖的东西开始的。模仿者总是创造模式，吸引模式。踪迹已经把地图转译成一个形象；它已经把块茎改造成根或簇生草。它已经根据属于它的意指和主观化的轴把繁殖加以组织、稳定和中立化了。它已经生成了块茎，将其结构化，而当它认为它在繁殖别的东西时，它事实上只在繁殖自身。踪迹之所以如此危险，原因就在于此。它插入多余的东西，把它们传播开来。踪迹从地图或块茎那里繁殖出来的不过是死胡同、障碍、刚出现的主根或结构的点。且来看一看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前者所曾经制造的都是无意识的踪迹或照片，而后者所曾经制造的都是语言的踪迹或照片，及其所暗含的全部背叛（毫不奇怪，精神分析学把自身命运维系在语言学之上）。看一看已经在小汉斯身上发生的一切吧。这是最纯粹的儿童精神分析的一个例子：他们始终不断地打破他的块茎，涂污他的地图，为他纠正地图，阻挡他的每一个出口，直到他开始向往他自己的羞耻和罪过，直到他们让羞耻和罪过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使他患了恐惧症（他

们把他从建筑的块茎中赶了出来，然后又从大街的块茎中赶了出来，他们把他根植于父母的床上，他们让他在自己身上长出小胚根，他们把他固定在弗洛伊德教授那里）。弗洛伊德显然考虑到了小汉斯的地图制作，但总是而且仅仅是再把这张地图投射到家庭照片上去。看一看梅拉尼·克莱因对小理查的地缘政治地图都做了些什么：她从那些地图中冲洗照片，制造这些地图的踪迹。打破那个姿态，或顺从轴的生成阶段或结构命运——无论哪种，你的块茎都将被打碎。他们会允许你活着和说话，但只能是在每一个出口都被堵住之后。块茎一旦被堵住，变成树状，一切就都结束了，不会再搅起任何欲望了：欲望总是依据块茎运动和生产的。每当欲望爬上一棵树时，内在的反响就会给它设下羁绊，使它跌落至死。另一方面，块茎依据外部的生产的副产品作用于欲望。

尝试另一种相反的但却非对称的运作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这里。把那些踪迹塞回地图，把根或树重新与块茎连接起来。就小汉斯的情况来说，研究无意识就等于展示他如何努力建造一个块茎，建造大街等；其中有他家的房子，有建筑和大街上的逃亡路线等。这些路线何以受阻，那个孩子何以被根植于家庭之中，何以被置于父亲之下拍照，何以被追溯到母亲的床上，然后，弗洛伊德教授的干涉又何以保证了能指的权力接管和情感的主观化，给那个孩子留下的惟一出路何以使他变成动物，被看作羞耻和罪过的出路（小汉斯要变成一匹马，一个真正的政治选择）。但这些死胡同必须总是被重新置于地图之上，据此向它们敞开可能的逃亡路线。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团体地图：表明在块茎的哪一点上构成一体化、官僚机构、领导、簇生等现象，哪些路线残存下来，即便是地下的，继续在阴影里制造块茎。德里尼的方法：为几个不同的孩子勾画一个孤僻孩子的姿态和运动的地图，把同一个孩子的几幅地图拼凑

起来。[1] 如果地图或块茎的本质果真是拥有许多通道，那么，如果采取必要的谨慎措施，一个人甚至可以通过踪迹或根—树进入这些通道（这里还必须避免任何善恶对立的二元论）。比如，一个人常常被迫走进死胡同，被迫带着意指的权力和主观情感工作，被迫在俄狄普斯或偏执狂等构型甚或更糟的、僵化的、向其他改造性运作敞开大门的地域里找到立足点。甚至精神分析学也不由自主地被用作立足点。相反，在其他情况下，一个人将直接依靠一条逃亡路线，使他能够截然打开断层，切掉树根，制造新的关联。因此，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图—踪迹，块茎—根束，以及解域化的各种协同因素。块茎中存在着树或根的结构；反过来，一棵树枝或树根的分叉也可能开始发芽，长成一个块茎。其坐标不是由暗含普遍性的理论分析所决定的，而是由构成繁殖或密度组合的一种语用学决定的。一个新的块茎可以在一棵树的心脏、在一棵树根的空心和一棵树枝的弯曲处构成。否则的话，使块茎生产得以继续的就是根—树的一个微小因素，一个簇生叶。会计和官僚政体借助踪迹运作：但它们还是开始发芽，伸出块茎的枝干，如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一个强烈的特性开始显示出来，一种幻觉认知，连觉，反常变化，或摆脱羁绊的形象嬉戏，向能指的霸权提出了挑战。就儿童的情况来看，姿态、模仿、顽皮和其他符号系统重又获得了自由，摆脱了“踪迹”的纠缠。即是说，摆脱了老师语言的控制力——这样一个微屑事件竟然打破了权力的局部平衡。同样，依据乔姆斯基的句法模式建构的生成性的树可以

---

① Fernand Deligny, Cahiers de l'immuable, vol. 1, Voix et voir, Recherches, no. 8 (April 1975).

向四面八方散开，依次构成块茎。① 构成块茎的形状就等于生产看起来像是根的枝干和细丝，或最好通过渗入主干而与根连接起来，但却将其付诸新的奇怪的用途。我们厌腻了树。我们不要再相信什么树、根和簇生叶了。它们让我们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所有树状文化，从生物学到语言学，都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除了地下的枝干和空中的根，除了溢外的生长和块茎，任何其他东西都不是美的、可爱的和政治的。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完全没有根的城市，带有枝干—运河的一座块茎城市。就与商业战争机器的关系而言，这里，功利与最大的疯狂联系起来。

思想不是树状的，而大脑也不是扎根的或分支的物质。被错误地称之为“树突”的东西并不保证神经元在一个连续纤维体内的连接。细胞之间的断裂，轴突的作用，突触的功能，突触的微小裂纹的存在，每一个信息跨越这些裂纹的跳跃，都使大脑成为沉浸在黏性平面或神经胶质上的一个多元体，一整个不稳定的或然系统（“不稳定的神经系统”）。许多人都在大脑里长着一棵树，但大脑本身毋宁说是一棵草，而非一棵树。“轴突和树突相互缠绕，仿佛缠绕刺藤的旋花，每一颗刺上都有一个突触。”② 记忆也同样。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生理学家把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大约一分钟）区别开来。二者间的区别不简单是数量的：短期记忆属于块茎或图表式的，长期记忆是树状的，中心化的（印痕，印迹，踪迹，或照片）。短期记忆决不屈从于对客体的临近律或接近律；它可以在一段距离之外

---

① 见 Dieter Wunderlich, “Pragmatique, situation d'enonciation et Deixis,” in Languages, no. 26 (June 1972), pp. 50ff.: MacCawley, Sadock, and Wunderlich's attempts to integrate “pragmatic properties” into Chomskian trees.

② Steven Rose, The Conscious Brain (New York: Knopf, 1975), p. 76; 关于货币，见 pp. 185 – 219.

行动，在一段长时间之后到来或回归，但总是处于断续、断裂和繁殖的状况。此外，这两种记忆之间的区别并不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临时理解模式之间的区别；它们并不掌握同一事物、记忆或理念。短期理念的光辉：写作时用短期记忆，因此用短期理念，即便阅读和反复阅读时用长期概念的长期记忆。在短期记忆中，忘却也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与瞬间，而是与神经的、临时的和集体的块茎相融合。长期记忆（家庭，种族，社会或文明）追索踪迹和转译，但它所转译的东西继续在它内部发生作用，不是瞬间地，而是在一定距离之外，在它的范围之外，以“不适宜的”方式作用。

树和根激发一种悲惨的思想形象，永远依据中心的或分隔的高级的“一”模仿多。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组枝干一根，那么，躯干就起到了对立分隔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次组合都是自下而上生长的：这样的分隔是一个“连接偶极”，与“单位偶极”相反，后者是由从单个中心辐射出来的辐条构成的。[①] 即便这些连接偶极本身是多产的，如在簇生叶系统中一样，但永远也不能超越一到二的繁殖和虚假的繁殖。再生，繁殖，回归，水螅和水母，都不能使我们走得更远。树状系统是等级系统，带有意指和主观化的中心，仿佛有组织的记忆一样的中央自动控制。在相对应的模式中，一个因素只能从一个更高级单位接收信息，只能沿着事先确定的道路接收主观情感。这显见

---

① 见 Julien Pacotte, Le reseau arborescent, scheme primordial de la pensee (Paris: Hermann, 1936). 该书分析和提出了树状形式的各种图式，这种形式不是作为纯粹的形式主义提出来的，而是作为“正规思想的真正基础。”它始终遵循古典思想。它代表所有“一—二”的形式，即偶极理论。……最近，米歇尔·瑟莱分析了各相迥异的科学领域中树的变体和序列：树是如何基于“网络”形成的。La traduction (Paris: Minuit, 1974), pp. 27ff.; Feux et signaux de brume (Paris: Grasset, 1975), pp. 35ff.

于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现存的问题中。这两种科学仍然死抱最古老的思维模式，把全部权力赋予一个记忆或中枢器官。皮埃尔·罗森斯蒂尔和让·珀蒂托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痛斥“指挥树的意象”（中央系统或等级结构），指出“承认等级结构的重要性就等于给树状结构以特权地位。……树状形式容许拓扑学的解释。……在一个等级制中，一个个体只有一个能动的邻居，他或她的上司。……传播的渠道都是事先设定的：树状系统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在一个指定的地点与这个系统融合在一起”（意指和主观化）。这两位作者指出，甚至当一个人认为他已经接近一种繁殖时，那也可能是虚假的——即我们所说的簇生叶——因为它在表面上的非等级表现或陈述，事实上只容许一种完全等级制的解决。著名的友谊定理就是一例：“如果一个社会中任何两个特定个人恰恰拥有一个相互的朋友，那么，就有一个个人是所有其他人的朋友。”（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问那个相互的朋友是谁。“在由无数对夫妇组成的社会里，谁是那个普遍的朋友？主人？牧师？还是医生？奇怪的是，这些想法与最初的原理相去甚远。”谁是人类的这个朋友？是提倡古典思想的哲学家吗？哪怕他是一个失败了的整体，只能通过他的缺场或主体性才能让人感觉得到的整体，同时又说我一无所知、一无是处的哲学家吗？）这两位作者谈论的是专制原理。这就是根—树原则，或根—树的结果：簇生叶的结局，权力的结构。①

这两位作者把这些中心系统与无中心系统相对比。无中心

---

① Pierre Rosenstiehl and Jean petitot, “Automate asocial et systemes acentres,” Communications, no. 22 (1974), pp. 45 - 62. 关于友谊定理，见 Herbert S. Wilf, The Friendship Theorem in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Welsh Academic Press)；关于一种叫做“团体犹豫”的类似理论，，见 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63).

系统是有限的自动控制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交流从任何一个邻居到任何其他邻居，枝干或渠道并不是事先存在的，所有个体都是可互换的，只不过在特定时刻由其状态所限定——这样，局部的运作就会协调起来，而终极的全球结果便在没有中央代理的情况下同步发生了。强度状态的能量转换取代了拓扑学，而“调节信息流通的图表在某种意义上则与等级制图表相对立。……图表没有理由成为一棵树”（我们始终称这种图表为地图）。战争机器或射击班的问题：n 个人是否需要一位将军才能设法一齐开枪？在一种无中心繁殖中将看到不需要将军的结论，这种无中心繁殖具有一些有限数的信号状态，从战争块茎或游击战的逻辑观点来看，这些信号状态表明相应的速度，而没有任何踪迹，没有对任何中央命令的复制。这两位作者甚至表明，这种机器繁殖、组合或社会，都拒绝把任何中心化的或统一的自动控制当作一种“非社会入侵”。① 在这些条件下，n 实际上总是 n－1。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强调指出，中心与无中心的对立的有效性不是作为事物的标识，而是作为应用于事物的计算模式。树与块茎可能是对应的，或可能长成一个块茎。的确，同一事物一般适于两种计算模式，或两种协调类型，但不能不经历一次状态的变化。再举精神分析学为例：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计算和治疗的实践上，把无意识从属

---

① Roesenstiehl and Petitot，“Automate asocial.”无中心的主要特点是，局部的首创精神单独与中央权力相协调，而详尽分析则是通过网络（繁殖）进行的。“人的档案之所以可以放在每一个人的家里保存，其原因就在于此，只有他们才能够提供最新描述和最新档案：社会本身只是可能的关于人的数据库。一个天生就无中心的社会拒绝把中心化的自动控制当作非社会入侵”（p. 62）。关于“射击班理论”，见 pp. 51－57. 无独有偶，梦想着盗用正规游击战技术的将军们也非常感兴趣于“以无数独立的轻量细胞为基础的···共时模式”的繁殖，这些模式在理论上只有最小限度的中央权力和“等级传递”；见 Brossollet，Essai sur la non－bataille (Paris: Belin，1975).

于树状结构，等级图表，重现的记忆，重要器官，法勒斯，法勒斯—树。在这方面，精神分析学不能改变其方法：它把自身专制的权力建立在关于无意识的专制概念之上。因此，精神分析学的活动余地是非常有限的。在精神分析学与其客体中，总有一位将军，总有一位领袖（弗洛伊德将军）。另一方面，精神分裂分析把无意识当作一个无中心系统，换言之，当作一个有限自动控制的机器网络（一个块茎），因此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无意识状态。这些话也可用来描写语言学；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正确地提出了建立“词语社会的一个无中心组织”的可能性。无论对陈述还是对欲望，问题决不是要根据一棵树的模式来约化无意识，阐释无意识，或赋予无意识以任何意义。问题是要生产无意识，同时生产新的陈述，不同的欲望：块茎恰恰是无意识的这种生产。

奇怪的是，树何以一直统治着西方的现实和全部西方思想，从植物学到生物学和解剖学，也包括真知学（gnosiology），神学，本体论，全部哲学……：根—基础，Grund，racine，fondement。西方与森林和砍伐森林有着特殊的关系；砍伐森林后的田野长满了种子植物，这些种子植物是基于树状种属的培育生产的；在歇耕的田地上豢养动物，这种豢养也选择构成整个动物树状的谱系。东方呈现的是另一幅图景：与大草原和花园有关（或在某些情况下与沙漠和绿洲有关），而非森林和田野；通过个体的破碎培养块茎；放弃或排除只限于有限空间的或被推向游牧的大草原上的动物豢养。西方：以某一所选谱系为基础的农业，包括大量可变的个体。东方：以衍生于广泛“无性繁殖”的少数个体为基础的园艺。东方，尤其是大洋洲，难道没有提供在每一方面都与西方的树模式相对立的一种块茎模式吗？安德列·豪德里克特甚至将此看作是西方超验道学或哲学与东方内在哲学之间对立的基础：播种和收获的上帝与栽

植和开垦的上帝之间的对立（栽植嫩枝与播撒种子之间的对立）。[①] 超验性：欧洲特有的一种疾病。音乐也不相同，正如性一样，大地的音乐是另一种音乐：种子植物，甚至双性的种子植物，都把性从属于繁殖的模式；而另一方面，块茎则是性的解放，不仅从繁殖而且从生殖器欲的解放。在西方，树自行栽植在我们体内，甚至使性别僵化、分层。我们已经失去了块茎，或草。亨利·米勒："中国是人类菜园子里的野草。……野草是人类的天敌。……在我们归属于植物、动物和星球的所有想象的存在中，只有野草过着最惬意的生活。的确，野草长不出百合花，造不出战舰，讲不出西奈山上的布道。……最终野草占了上风。

最终事物重又回到中国的状态。历史学家通常愿意把这种状况称作黑暗时代。草是惟一出路。……野草的存在只是为了填充耕种区留下的荒芜空间。最重要的是它在植物之间生长。百合花很美，白菜是食物，罂粟让人发疯——但野草遍地生长……：它表明一种道德。"[②] 米勒谈论的是哪个中国？旧中国？新中国？一个想象的中国？还是被置于一张变幻不定的地图上的另一个中国？

美国是一个特例。当然，它也免不了被树占领或对根的追寻。这甚至显见于文学中，在对民族身份的寻求中，甚至在对

---

① 关于西方的谷物农业与东方的块茎园艺，播撒种子与栽植枝条之间的对立，以及与动物豢养之间的对比，见 Andre Haudricourt, "Domestication des animaux, culture des plantes et traitement d'autrui," L'Homme, Vol. 2, no. 1 (January - April 1962), pp. 40 - 50, and "Nature et culture dans la civilization de l'igname: l'origine des clones et des clans," L'Homme, vol. 4, no. 1 (January - April 1964), pp. 93 - 104. 玉米和稻谷也不例外：它们是"块茎种植者后来才种植的"谷物，是用相同的方式种植的；稻谷最初可能是"芋头垄沟里的野草"。

② Henry Miller, in Henry Miller and Michael Fraenkel, Hamlet (New York: Carrefour, 1939), pp. 105 - 106.

欧洲祖先或谱系的寻求中（克茹亚克出发寻找他的祖先去了）。然而，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一切重要事情都采取了美国块茎的路线：跨掉派，地下组织，帮伙，与某一外部直接相关的旁系。美国的书不同于欧洲的书，甚至当美国人开始追随树时亦然。书的概念不同。《草叶集》。美国的方向也不同：寻找树状和回归旧世界，这种事情发生在东方。但也有一个块茎的西方，拥有没有祖先的印第安人，越来越模糊的疆界，变幻的、错置的边疆。在西方有一整幅美国“地图”，那里，甚至树也构成块茎。美国颠倒了方向：把东方置于西方，仿佛地球恰恰在西方画完了完整的圆一样；它的西方是东方的边缘。① （印度并不位于东西方之间，豪德里克特认为：美国是中心点和颠倒机制。）美国歌手帕蒂·史密斯唱出了美国牙科医生的圣经：不要寻根，顺着食道走……

难道不也存在着两种、甚或三种（或许还多）的官僚政体吗？西方的官僚政体：源自农业的、土地的官僚政体；根与田地；树以及树作为边疆的作用；征服者威廉的人口普查；封建主义；法国国王的政策；把财产作为国家的基础；通过战争、诉讼、婚姻解决土地争端。法国国王选择了百合花，因为它是根深而固守斜坡的一种植物。东方的官僚政体也同样么？当

---

① 见 Leslie Fiedler, The Return of the Vanishing American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68). 该书有一段关于地理及其在美国神话和文学中的作用以及相反的作用的精彩分析。在东部，人们特别寻求美国编码和与欧洲的重新编码（亨利·詹姆斯，艾略特，庞德等）；在南方，有关于奴隶制的多元符码，内战期间奴隶制和种植园的灭亡（福克纳，考德威尔）；在北方，有资本主义的解码（多斯·帕索斯，德莱塞）；而在西方，逃亡路线则起到了综合旅游、幻觉、疯癫、印第安人、认知和精神实验、边疆的变化和块茎的作用。（Ken Kesey 和他的“雾机器”，跨掉的一代等）。每一个伟大的美国作家都创造一幅地图，甚至是以自己的风格制作的；与欧洲的情况相比，每一个人制作的地图都与遍及美国的真正社会运动直接相关。菲茨杰拉德的整个作品中就充斥着地理方向的索引。

然，描写一个块茎和内在性的东方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然而，事实是，在东方，国家并不遵循树状图式，即按与事先确立的、树状化了的、根深蒂固的阶级相应的树状图式行事；它的官僚政体是由渠道构成的，比如，人们常说的“没有多少财力”的水利发电站，国家开辟了被开通和正在开通渠道的阶级（参照还没有人否定的威特福格尔著作的一些方面）。[①] 君主是一条河，而不是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仍然是一个点，一个树—点或根；他随激流而去，而不是坐在树下；菩提树本身变成了一个块茎；毛的河流和路易的树。这里，美国不也是在二者之间作用吗？在内部它采取灭绝和杀戮（不仅印第安人，还有农民），在外部则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资本的流动导致了一条巨大渠道的产生，带有直接“额度”的权力的量化，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从货币流动中获利（于是便有穷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然后又堕入贫穷的现实神话）：在美国，一切都聚合，树和渠道，根和块茎。没有普遍的资本主义，没有自身独立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位于所有社会构型的十字路口，它在性质上是新资本主义。它发明了东方的面孔和西方的面孔，并重新塑造了它们——全然是为了更糟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对所有这些地理分布的探讨是错误的。一个死胡同。这更好些。如果问题是要说明块茎也有其自己的、甚至更僵化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那么，这也很好：因为在此与彼之间没有二元论，没有本体的二元论，在好与坏之间没有价值的二元论，没有混合或美国的综合。块茎中存在着树结，根中有块茎的旁支。此外，块茎特有一些内在性和渠道化的专制构型，正如由树、空中的根和地下的枝干组成的超验系统中

---

① [trans: 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存在着无政府的构型一样。重要的是，根—树和运河一块茎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模式：第一个是超验模式和踪迹，即便产生自身的逃避；第二个是一个内在过程，它推翻那个模式，勾勒一张地图，即便构成自身的等级，即便导致一个专制渠道的形成。问题不在于地球上的这个或那个地方，或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更不是这个或那个思想范畴。问题在于一个永远建构或坍塌的模式，在于一个永远延长、断裂、再重新开始的过程。不，这不是一个新的或不同的二元论。写作的问题：为了准确地标识事物，不准确的表达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根本不可能避免，因为那是必要的步骤，或因为人们只能凭借近似值进步：不准确性决不是近似值，相反，它恰恰是正在进行的事物的通道。我们启用一种二元论只是为了挑战另一种二元论。我们使用一些二元模式只是为了进入向一切模式挑战的一个过程。每一次都需要精神矫正来破解我们并不想建构但又必须通过的那些二元论。通过所有那些二元论，我们得出了我们都试图得出的公式——多元主义 = 一元论，二元论是敌人，一个完全必要的敌人，相当于我们不断重新安排的家具。

我们且来总结一下一个块茎的主要特点：与树或树根不同，块茎把任何一点与任何其他一点联系起来，而其特点却不必与相同性质的特点相联系；它激活了非常不同的符号王国，甚至非符号状态。块茎既不能简约为一，也不能演绎为多。它不是变成二、甚或直接变成三、四、五等数字的一。它不是衍生于一的多，或附加给一的东西（n + 1）。它不是由单位构成的，而是由维度或运动方向构成的。它没有起始和结尾，而总是有一个中间，并从这个中间生长和流溢出来。它构成 n 维度的线性繁殖。这些维度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而可以在一个黏性平面上展开，一总是能从这里被抽取出来（n - 1）。当这种繁殖改变维度时，它也必然改变性质，经历一次变形。块

茎与结构不同。结构是由一组点和位置限定的，各个点之间是二元关系，而各个位置之间是双单义关系。块茎只由线构成：作为其维度的分隔和层次的线，作为最大维度的逃亡或解域的线，此后，繁殖将经历变形和性质的变化。这些线或地貌轮廓线不应与树状类的谱系相混淆，这些谱系不过是可以在点和位置之间局部定位的联系而已。与树不同，块茎不是繁殖的客体：既不是作为意象—树的外部繁殖，也不是作为树—结构的内部繁殖。块茎是一种反谱系学。它是短期记忆，或反记忆。块茎依据变体、扩张、征服、捕捉、旁支运作。与图表艺术、画画或照相不同，与踪迹不同，块茎与必须生产、必须建构的一幅地图有关。一幅地图总是可分离的，可连接的，可颠倒的，可修改的，有无数的进口和出口，有其自己的逃亡路线。置放在地图上的必须是踪迹，而非其对立面。与等级制交流模式和既定路线的中心（或多中心）系统相对比，块茎是无中心的，无等级的，无意指的系统，没有将军，没有组织记忆或中央自动控制系统，仅只由流通状态所限定。块茎的问题在于它与性的关系——但也存在着与动物，与植物，与世界，与政治，与书，与自然和人为事物的关系问题，这完全不同于树状关系：纯然“变化”的关系。

一座高原总是位于中间，不在开头，也不在结尾。一个块茎是由无数高原构成的。格雷戈里·贝特森用“高原”一词标识非常特殊的事物：一个连续的、自振的区域，其各种强度避免朝任何高潮点或外部终点发展。贝特森引巴厘文化为例：母婴之间的性游戏，甚至男人之间的争吵，都经历这种怪异强烈的稳定。“某种连续的强度高原用来代替［性］高潮”，战争或任何一个高潮点。把表达和行动与外界或超验目的相联系，而不是据其内在价值在黏性平面上对其加以评价，这是西方精神

令人遗憾的一个特点。[①] 比如，由不同章节构成的一本书具有高潮点和终点。一本书是由跨越微小缝隙相互交流的高原（像在大脑中一样）构成的，否则书中又能发生什么呢？我们说一座“高原”是通过表面的地下枝干与其他繁殖相关联的任何一种繁殖，目的是为了构成或延伸到某个块茎。我们在把这本书写成一个块茎。它由许多高原构成。我们给了它一个圆的形状，但只是为了笑。我们每天早晨醒来，我们每个人都自问他要处理哪座高原，在这儿写上五行，在那儿写上十行。我们有了幻觉经验，我们看着一行行文字像一队队微小的蚂蚁一样离开一座高原，走向另一座高原。我们画出聚合的圆。每一座高原都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都可以与任何其他高原连接。要达到多，就必须有一个有效地构造多的方法；任何巧妙的印刷，任何灵活的构词，任何混合或创造的词语，任何大胆的句法，都不能取代它。事实上，这些不仅只是纯粹用来播撒或散布一个统一体的模仿程序，这个统一体是为了一本意象—书而保留在一个不同维度上的。技术自恋主义。印刷的，词法的或句法的创造只在它们不再属于一个潜在统一体的表达形式时才是必要的，这时，它们自身成了所论的繁殖维度。我们只知道这方面的成功是罕见的。[②] 我们本人不能够成功。我们只使用词语，词语反过来为我们起到高原的作用。块茎学（RHIZOMATICS）= 精神分裂分析学（SCHIZOANALYSIS）= 地层分析学（STRATOANALYSIS）= 语用学（PRAGMATICS）= 微观政治学

---

① Gregory Bat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P. 113. 值得注意的是，“高原”一词是以对球茎、块茎和块茎的经典研究为基础的；见 M. H. Baillon, Dictionnaire de botanique (Paris: Hachette, 1876 - 1892).

② 如 Joelle de La Casiniere, Absolument necessaire. The Emergency Book (Paris: Minuit, 1973)，这是一本真正的游牧书。又见 Montfaucon Research Center 正在进行的研究。

(MICROPOLITICS)。这些词都是概念，而概念都是线，这就是说，维系于繁殖（地层，分子链，逃亡和断裂路线，聚合的圆等）的特定维度的数字系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为我们的概念宣布一个科学的名称。我们对科学性就像对意识形态一样不熟悉，我们所知的一切就是组合。而惟一的组合就是欲望的机器组合和表述的集体组合。没有意义，没有主观化：写作，直到 n 次幂（所有个性化的表达都深陷主导意指之中，所有意指的欲望都与被控制的主体相关）。就其繁殖来说，一次组合必然同时作用于符号流动，物质流动，和社会流动（独立于科学或理论著作中的任何概括）。现实领域（世界）、再现领域（书）和主体性领域（作者）之间的三元划分已不复存在了。相反，一次组合确立了一些繁殖之间的联系，这些繁殖是从每一个领域中抽取出来的，所以，一本书没有续集，没有作为客体的世界，也没有作为主体的一个或几个作者。简言之，我们认为我们以某一外部因素的名义是不能充分写作的。外部没有形象，没有意指，没有主体性。与外部会聚的书对立于作为世界意象的书。一本块茎一书，不是一本二分的、中枢的或簇生的书。永远不要扎根，或植根，不管避免颠倒旧的程序该有多么困难。“这些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不是从根上发生的，而是从中间的某处。让人试着去抓它们吧，让人试着去抓一叶草吧，抓紧它，它只能从中间开始生长。”① 这为何如此艰难？这直接涉及认知符号学的问题。看到中间的事物是不容易的，这不同于从下向上看，或从上向下看，或从左向右看，或从右向左看：试试看，你会看到一切都在改变。看到事物中和词语中的草是不容易的（同样，尼采说，格言必须“慎思”之；一

①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ed. Max Brod, trans. Joseph Kresh (New York: Schocken, 1948), p. 12.

座高原永远不会与栖居其上的母牛分离开来的，这些母牛也是空中的云）。

历史总是从固定的观点来撰写的，而且是以一部统一的国家机器撰写的，至少是一部可能的国家机器，即便它的题目是游牧民。所缺少的是一部游牧学，即一部历史的反面。在这方面，成功也是罕见的。比如，关于儿童十字军的主题：马塞尔·施沃布的著作繁殖了像是许多高原的叙事，其维度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然后是安德兹耶夫斯基的《乐园之门》（Les portes du paradise），只由一个未间断的句子构成；儿童的流动；走走停停、流离失散和匆匆忙忙的流动；所有儿童的忏悔的符号学流动，他们走到队伍前头逐个向那老和尚忏悔；欲望和性的流动，每个孩子都被爱所抛弃，或多或少为文多姆伯爵死后邪恶的鸡奸欲望所吸引；所有这些都循环往复地聚合起来。重要的不是这些流动究竟“是一还是多”——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一刻：存在着表述的集体组合，欲望的机器组合，一个在另一个之内，二者都被塞入了一个巨大的外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那个外部都是一种繁殖。一个较近的例子是阿曼德·法拉齐论第四次圣战的著作《错位》（La dislocation），书中，句子要么间隔加宽，排列松散，要么就拥挤在一起，相互共存，而字母和印刷也随着圣战越来越进入谵妄状态而呈跳跃态势。[①] 这些是游牧和块茎写作的模式。写作与战争机器和逃亡路线结合起来了，抛弃了地层，分隔，定栖，和国家机器。但为什么还需要模式呢？这些书难道不是圣战的“形象”吗？它们不也

---

① Marcel Schwob, The Children's Crusade, trans. Henry Copley (Boston: Small, Maynard, 1898); Jersy Andrzejewski, Les portes du paradis (Paris: Gallimard, 1959); Armand Farrachi, La dislocation (Paris: Stock, 1974). Paul Alohandery 就在施沃布的语境中谈到，在某些情况下，文学可以激活历史，并给历史指出“真正的研究方向”；La chretiente et l'idee de croisade (Paris: Albin Michel, 1959), vol. 2, p. 116.

保留一个统一体吗？在施沃布的书中是中枢统一体，在法拉齐的书中是流产的统一体，而在最成功的例子即《乐园之门》中，则是穿着葬礼服的伯爵的统一。还需要一个比圣战更深邃的游牧主义吗？一个关于真正游牧民的游牧主义？还是关于不再运动、不再模仿任何事物的游牧民的游牧主义？那些只聚合的人的游牧主义。书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充足的外部，并用这个外部在异质性中聚合而不是去再生产一个世界呢？文化之书必然是一个踪迹：本身已经是一个踪迹，同一位作者的前一部书的踪迹，其他的不管有多么不同的书的踪迹，既定概念和词语的无休止的踪迹，世界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踪迹。甚至反文化之书也仍然背负着过重的文化负担：但它将积极地利用这个负担，是为了忘却而非为了记忆，为了不发展而非为了趋于发展的进步，以游牧而非定栖方式，制作一张地图而非寻踪索迹。块茎学 = 波谱分析学（POP ANALYSIS）。即便人们除了阅读外还有其他事情可做，即便其中的学院文化或伪科学性的障碍仍然太痛苦或太沉重。如果把科学完全留给其自身的发明它就会彻底发疯。且看数学吧：它不是科学，而是怪物的俚语，是游牧。甚至在理论界，尤其在理论界，靠不住的和实用的框架都强似踪迹的概念，这些概念的突破和进步并不改变什么。察觉不到的断裂，并非意指的突破。游牧民发明了一台战争机器以与国家机器相抗衡。历史从未曾理解游牧主义，书从未曾理解外部。作为书和思想模式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逻各斯，哲学家—国王，理念的超验性，概念的内在性，精神的共和国，理性的法庭，思想的公务员，作为立法者和主体的人。国家假装成一种世界秩序，使人扎根。战争机器与外部的关系并不是另一个“模式”，它是使思想本身成为游牧的一次组合，书则是每一台活动机器的一个工作零件，一个块茎的一条枝干（反对歌德的克莱斯特和卡夫卡）。

写作直到 n 次幂，n－1 次幂，写出口号：制造块茎，不要根，决不要植物！不要播种，要栽植枝条！不要一或多，要繁殖！沿着路线跑，不要标示某一点！速度把点变成了线！[①] 甚至静止不动时也要加快速度！机遇的路线，臀部的路线，逃亡的路线。不要搬出内心的将军！不要只有思想，只有一种思想（戈达尔）。拥有短期思想。制作地图，不要制作照片或图画。作粉色的豹，这样你的爱就会像黄蜂和兰花，像猫和狒狒。正如他们所说的老人河：

他不种植土豆
不种植棉花
种植它们的人很快就被忘记了
但老人河却一直滚滚流淌

一个块茎无始无终；它总是在中间，在事物之间，是间存在者，间奏曲。树是亲缘关系，但块茎是联盟，独一无二的联盟。树强烈推行动词“to be”，但块茎的构架是连接：“and…and…and…”。这种连接携带着足够的力动摇和根除动词“to be”。你去哪里？你从哪儿来？你朝哪儿走？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制作一块干净的石板，再次从零开始，寻找一个开端或一个基础——所有这些意味着一个虚假的航海和运动概念（方法的、教学的、首创的、象征的一个概念……）。但是，克莱斯特、伦兹和比希讷却有另一种旅游和运动的方式：从中间

① 见 Paul Virilio, “Vehiculaire,” in Nomades et vagabonds, ed. Jacques Bergue (Paris: Union Generale d'Editions, 1975), p. 43, 论线性表象和速度造成的认知爆炸。

开始，通过中间，来来去去，而非开头和结尾。[①] 美国文学，还有英国文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这种块茎方向。它们懂得如何在事物之间运动，建立 AND 的逻辑，推翻本体论，打破基础，废除结尾和开头。它们懂得如何实践语用学。中间决不是平均；相反，这正是物体加速的地方。在事物之间并不表明从一事物到另一事物再回归原事物的一种可定位的关系，而是一个垂直的方向，清除一个又一个障碍的一种横跨运动，破坏了两岸并在中间加速的没有源头或终点的一股溪流。

① 见 Jean – Cristophe Bailly 关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描述，Introduction to La legende dispersee. Anthologie du romantisme allemand (Paris: Union Generale d'Editions, 1976), pp. 18ff.

生成强度，生成动物，生成无感知[①]

一个影迷的回忆。我想起那部优秀的影片《威拉德》(1972，丹尼尔·曼)。也许是一部B级影片，但却是一部优秀的非通俗影片：之所以是非通俗的，是因为主人公是老鼠。我对它的回忆不必是准确的。我来概要地讲一下这个故事。威拉德和专制的母亲住在一幢旧房子里。可怕的恋母氛围。母亲命令他打死一些鼠仔。他放生了一只（也许两只或几只）。在一阵激烈的争论之后，“活像”一只狗的母亲死了。一个商人盯上了这幢房子，威拉德有失去这幢房子的危险。他喜欢并放生了的那只头鼠，名叫本。本是个奇才。它有个同伴，是一只白毛母鼠。威拉德有空的时候总跟它们在一起。它们繁殖。威拉德把由本率领的鼠队带到商人的家，商人惨死。但他又愚蠢地把他最喜欢的两只老鼠带到了办公室，眼睁睁地看着雇员打死了那只白毛鼠。本逃跑了，走时狠狠地瞪了威拉德一眼。于是，威拉德的命运，即生成老鼠的命运，暂时停了下来。他尽一切努力与人为伍，甚至回应了办公室里向他示爱的一位年轻

---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and Féle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y Brian Massumi (London an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232 - 309. Notes from pp. 538 - 547.

女人，她极“像”老鼠——但不过是相象而已。一天，他请那女人到家里来，做好了婚姻和重温恋母情结的准备，这时，本突然充满愤恨地出现了。威拉德想赶走它，而结果却赶走了那女人：然后，他被本引到地下室，那里，无数只老鼠等待着把他撕成碎片。这像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决没有什么动人的地方。

故事的全部意义在于：一个生成动物不满足于相象性，相反，相象性将表明是障碍或停滞；老鼠的繁殖导致了生成的分子，生成的分子又破坏了家庭、职业和婚姻等伟大的克分子；有一个阴险的选择，因为与“受宠的”老鼠缔结了联盟，一种荒谬的和约；有一个组合制度，一个战争机器或犯罪机器，它可以达到自我毁灭；有非个人影响的流通，一股交替的流动，打断了意义投射和主观影响，构成了一种非人的性欲；还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解域化，阻碍了职业的、婚姻的或恋母的重新分域。（有可以“扮演俄狄浦斯，”扮演家庭，我的小狗，我的小猫等恋母动物以及对比之下把我们拉入不可抗拒的其他生成动物吗？或另一个假设：依具体情况，同一个动物能否发挥两种对立的功能和运动呢？）

一个自然主义者的回忆。自然史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对动物之间的关系加以概念化。这与后来的进化论非常不同，进化论是据谱系、亲缘、遗传和父子关系来定义的。如我们所知，进化论所论证的进化不必是通过父子关系运作的。但不可避免的是，它以谱系的命题开始。达尔文本人把关于亲缘的进化论命题和关于差异或相象性的总合和价值的自然主义命题当作完全不同的东西：同等关系的组合在祖先这方面可以展示高度变化的差异程度。恰恰因为自然史主要是研究差异的总合和价值的，它才能构想进步与倒退、连续与重要的断裂，而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进化，即遗传的可能性，其变化的不同程度是依外部条件而定的。自然史只能依据关系（A 与 B 的关系）而非依据生产（从 A 到 x）来思考。

但在关系的层面上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自然史从两方面构想动物之间的关系：序列和结构。就序列而言，我说 a 与 b 相象，b 与 c 相象，等等，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同程度地与一个单一的、明显的条件相一致，即作为一切序列背后的原则的完善或品格。这正是神学家们常说的比例类比。就结构而言，我说 a 之于 b 如同 c 之于 d，每一种关系都以自己的方式实现所论的完善：鳃在水下呼吸就如同肺在空气中呼吸一样；心脏之于鳃就如同心脏的缺乏之于［昆虫的］气管一样。……这是比例性类比。在第一种情况下，我有在同一个序列内和许多序列之间相互区别的相象性。在第二种情况下，我有在同一个结构内和许多结构之间相互相象的差异。第一种类比形式被当作最可感的和通俗的，要求想象力；但它所要求的那种想象力是认真的，它必须把序列中的分支考虑进去，填补明显的裂隙，避开虚假的相象性，逐渐生产真正的相象性，把进步和倒退或堕落统统考虑进去。第二种类比形式被认为是忠诚的，因为它要求理解的全部资源，一方面通过发现可以结合而构成一个结构的独立的可变因素，另一方面通过发现在每一个结构内部相互引发的互联因素，来界定相同的关系。序列和结构的两个命题固然不同，但在自然史中却总是共存的；它们在表面上相互矛盾，但在实践上却多多少少达到了稳定的妥协。[①] 同样，这

---

① 关于序列和结构的互补性，以及与进化论的区别，见 Henri Daudin, *Cuvier et Lamarck. Les classes zoologiques et l'idée de série animale*, vol. 2 of *Etud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naturelles* (Paris: Alcan, 1926); and Michel Fouf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Vintage, 1970).

两种类比在神学家的心目中共存于不同的等式之中。这是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都被看作是巨大的模仿：要么以存在链的形式，于中，存在者无论进步还是倒退，总是在相互模仿，通过逐渐获得的相象性达到较高的神性境界，视其为序列的模式和序列背后的原理；要么以镜像模仿的形式，对一切进行模仿，因为它本身就是其他事物模仿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是被有秩序的差异所模仿。（这是当时使进化—生产的思想成为可能的那种模仿论。）

这个问题决没有被我们抛在后面。思想是不死的。它们也不仅仅作为过时的东西而残存。在特定时刻，思想可能接近科学的阶段，然后失去那个地位，或移植到其他科学之中。它们的应用和地位，甚至它们的形式和内容，是可以改变的；然而，它们在这整个过程中却保留了本质的东西，跨越了位移，进入了新领域的分配之中。思想总是可以重新利用的，因为它们以前是有用的，但却是以最可变的现实模式。一方面，动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客体，也是梦、象征、艺术和诗歌、实践和实践应用的目标。另一方面，动物之间的关系相关于人与动物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成人与孩子的关系，人与元素的关系，人与物理和微观物理宇宙的关系。二重的“序列—结构”思想在特定时刻越过科学的临界；但它不是从那里开始的，现在也不停留在那里，不然就进入其他科学，如激活人文科学，研究梦、神话和组织。思想史永远不应该是连续的；它应该谨防相象性，但也应该谨防遗传或父子关系；它应该乐于标记一个思想所跨过的临界，它所走过的路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其性质或目标的改变。然而，从集体想象或社会理解能力的观点来看，动物之间的客观关系已经应用于人与动物之间的主观关系上了。

容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理论；它在梦中、神话中、

人类集体活动中分配给动物一种特别重要的角色。动物是展示进步—倒退这一双重序列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进步还是倒退都可能起到改造力比多（变形）的作用。研究梦的整个方法是从这里开始的；面对一个棘手的形象时，问题在于如何将其融入原型序列之中。那个序列可能包括女性、男性或婴儿系列，也包括动物、植物、甚至元素或分子系列。与自然史相对立，人现在不再是这个序列的突出条件了；那个条件可能是给予人的动物，狮子，螃蟹，捕鸟或虱子，这要依特定的行为或功能、根据无意识的特定要求而定。巴歇拉尔在对洛特雷阿蒙进行详尽的序列分析时写出了一本优秀的容格式著作，阐述了与形变发生共时效应的速度，相关于作为序列原则的纯粹进取性的每一个条件的完善程度：蛇的毒蛰，犀牛的角，狗的牙齿，鹰的喙；而在上面，有猎鹰和秃鹰的爪，蟹的钳，虱子的腿，章鱼的吮。在容格的全部著作中，一个模仿过程把自然和文化一起带到它的网中，他用比例类比的方法把序列及其条件，尤其是动物，置于中央的位置，保证了自然—文化—自然的转换循环：类比再现的原型。①

结构主义强烈谴责给予想象力的声望，序列中相象性的确立，整个序列中模仿的贯穿和执行，以及与这一终极条件的认同，这是偶然的吗？这最清楚不过地见于列维－斯特劳斯论图腾主义的著名文本：超越外部相象性而到达内部同源性。② 这已不再是确立想象的序列组织的问题了，而是理解的象征和结构秩序。这已不再是逐渐实现相象性，最终在神话参与的核心

---

① 见 Carl Jung,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trans. R. F. C. Hull (New York: Harper, 1962), and Gaston Bachelard, *Lautréamont* (Paris: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39).

② Claude Lévi－Strauss, Totemism, trans. Rodney Needha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p. 78.

达到人与动物的认同的问题了。这是组织差异从而达到关系对应的问题。动物是根据类的区别性关系或独特的对抗性关系分布的；根据所论的组合，这也适用于人类。在分析图腾制度时，我们不说这个组合的人与那个类的动物相认同。我们说 A 组 之于 B 组，正如 A' 类之于 B' 类。这个方法与前一个方法迥然不同：就两个人类组合而言，每一个都有其动物图腾，我们必须发现这两种图腾的关系类似于两个组合之间的关系——乌鸦与秃鹰之间的关系……

这个方法也适用于成人—孩子，男人—女人的关系等。比如，如果我们注意到军人与年轻女人有某种惊人的关系，我们并不想确立某一想象序列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相反，我们寻找条件来确立一种平等关系。于是，凡南特可以说，婚姻之于女人就如同战争之于男人。结果，在拒婚的处女与伪装成女人的军人之间就有了一种类似性。[①] 简言之，象征性理解用比例性类比取代了比例类比；用差异的建构取代了相象性的序列化；用关系的平等取代了条件的认同；用概念隐喻取代了想象的变形；用自然与文化之间不带相象性的、分配对应性的巨大断裂取代了二者间的伟大连续；用本身即原始而没有模式的模仿取代了对原始模式的模仿。一个男人决不会说："我是公牛，我是狼……"但他可以说："我之于一个女人就如同公牛之于母牛；我之于另一个男人就如同狼之于羊。"结构主义是一场伟大革命；整个世界都更加理性了。列维－斯特劳斯不满足于给结构模式以真正分类系统的全部声望；而把序列的模式贬降到黑暗的牺牲领域，并将其描写为幻觉的，甚至缺乏善意。正确的理解是：牺牲的序列命题必须屈从于图腾制度的结构命题。

---

① Jean－Pierre Vernant in *Problémes de la guerre en Gréce anciennne* (*Civilizations et société*, no. 11), ed. Jean－Pierre Vernant (The Hague: Mouton, 1968), pp. 15－16.

但在此，如在自然史中一样，原型序列与象征结构之间还是达成了许多妥协。①

一个柏格森主义者的回忆。从我们有限的观点来看，上述无一能满足我们。我们相信非常特殊的生成动物的存在，它们正践踏着人类，把人类扫地出门，既影响到人类，也影响到动物。“从 1730 年到 1735 年，我们所听说的都是吸血鬼。”显然，结构主义没有说明这些生成物，因为它的设计恰恰是要否定或至少不承认它们的存在：关系的对应并未附加到生成物上去。当结构主义遇到充斥于整个社会的这种生成物时，它只把它们看作堕落现象，代表着从真正秩序的偏离，与历时性的冒险相关。然而，在研究神话的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总是遇到这些迅疾的行为，人类借此成为动物，同时，动物成为……(成为什么呢？人，或别的什么？)。总是可以通过两种关系的对应来解释这些生成障碍，但最肯定的解释会使所研究的现象贫乏。这些生成物更像是故事片段，难道不该承认神话作为分类框架不能涵盖这些生成物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相信让·迪维诺的假设吗？他认为社会上充斥着“不规则”现象，不是神话秩序的堕落，而是勾画逃亡路线的不可减少的动力，暗示了神话之外的其他表现方式，哪怕神话为了阻止它们而按自身条件重新捕捉到了它们。② 除了牺牲和序列、图腾制度和结构这两

---

① 关于牺牲序列与图腾结构之间的对立，见列维－斯特劳斯，*The Savage Mi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pp. 223－228. 尽管对序列予以严厉批评，列维－斯特劳斯还是认识到了两种命题之间的妥协：结构本身意味着对亲和力的一种非常具体的影响（pp. 37－38），而且是以两个序列为基础的，结构在这二者之间组织了同源关系。特别指出的是，“生成历史”可能导致复杂化或堕落，用条件之间的相象性和认同取代这些同源关系。

② Jean Duvignaud, *L'anomie, Hérésie et Subnersion*（Paris: Ed. Anthropos, 1973）.

个模式之外，不是还有容纳其他模式的余地吗？比如，更加秘密的、更加隐蔽的模式：术士和生成（不是通过神话或仪式，而是通过故事表现的）。

生成并不是两种关系之间的对应。但也不是相象性，模仿，或认同。结构主义对序列的整个批判似乎是不可辩驳的。生成不是沿着序列进步或倒退。最重要的是，生成并不在想象中发生，哪怕如在容格或巴歇拉尔的著作中那样，想象已达到最高的宇宙或动力层面。它们完全是现实的。但这里所论的是哪个现实呢？如果生成动物并不包括扮演动物或模仿动物，那么，人类显然没有“真正”成为动物，就如同动物也没有“真正”变成别的什么一样。生成所生产的不过是它自身。如果我们说要么你模仿，要么你是，我们就落入了虚假的替换。真实的东西是生成本身，是生成区域，不是生成的东西所通过的所谓固定的条件。生成能够、也应该具备生成动物的资格，即便缺乏所生成的动物这样一个条件的话。人类生成动物是真实的，即便人类所生成的动物不是真实的；动物生成异类是真实的，即便动物所生成的异类不是真实的。所要澄清的一点是：一个生成物缺少不同于它自身的一个主体；它也没有条件，因为它的条件只能在被另一个生成物所接纳时才存在；这时，第一个生成物是第二个生成物的主体，第二个生成物与第一个相共存，并是第一个的区域。根据这个原则，生成有一个特殊的现实（柏格森关于不同“绵延”相共存的思想，这些绵延不论高于或低于“我们的绵延”，它们都在交流中）。

最后，生成不是进化，至少不是遗传和父子关系的进化。生成不通过父子关系生产什么；一切父子关系都是想象的。生成始终是与父子关系不同的一个秩序。它是联合。如果进化包括任何可证实的生成，那一定在共生现象中，共生现象不通过

任何父子关系就能使完全不同的等级和领域发生作用。有一个生成区域，它能迅速改变黄蜂和兰花，但任何黄蜂—兰花都不是从这个生成区域遗传下来的。有一个生成区域，它捕捉猫和狒狒，二者间的联合是由病毒 C 促成的。在嫩根与某些微生物之间有一个生成区域，二者间的联合是由叶子（块茎领域）中的综合物质促成的。如果新进化论具有创新性，那部分应归功于这种现象，其中，进化并不是从少加区别的东西到多加区别的东西的进化；其中，进化不再是遗传的父子关系的进化，变成交流的或传染的。因此，我们为异质条件之间的这种进化形式选择的术语是“内包”（involution），因为内包决不与倒退相混淆。生成是内包的，内包是创造性的。倒退是朝少加区别的东西的方向运动。但内包就是在作用的条件“之间”和在可分配的关系之下按自己的路线构成一个区域。

有两个理由说明新进化论是重要的：动物不是根据特性（类的，种的特性）界定的，而是根据不同环境中和同一环境内的居群（population）来界定的；运动不仅仅是、或根本上不是通过父子关系发生的，而是通过异质居群之间的横向交流发生的。生成是块茎，不是一棵可分类的或系谱的树。生成当然不是模仿，不是与某物认同；它不是倒退—进步；不是对应、确立对应关系；不是生产、生产父子关系或通过父子关系生产。生成是动词，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一种黏性；它不简约或回归到“现象”、“存在”、“等同”或“生产”。

一个术士的回忆，I. 生成动物总是一伙，一帮，一群，一个居群，简言之，一个多元体。我们这些术士熟知这一点。其他机构，况且相互迥然有别，完全可能给予动物以不同的评价。人们可以保留或抽取动物的某些特性：种和类，形式与功

能，等等。社会和国家需要用动物特性来划分人群；自然史和科学需要用特性区别动物本身。序列主义和结构主义都是根据相象性来划分特性的，或根据差异来组织特性的。动物特性可以是神话的，也可以是科学的。但我们对特性不感兴趣；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扩大、繁殖、占据、传染、群居的模式。我是军团。狼人迷上了望着他的几只狼。一只孤狼会怎样呢？一条鲸鱼，一只虱子，一只老鼠，一只苍蝇又会怎样呢？别西卜是魔鬼，但却是作为蝇王的魔鬼。狼从根本上说不是特性，或一些特性；而是一种生成狼（wolfing）。虱子是生成虱子，如此等等。一声独立于人群的求救和求证的呼喊是什么呼喊呢？弗吉尼亚·伍尔芙根据她所接近的人的不同生成关系，不是把自己体验为一只猴子或一条鱼，而是体验为一群猴子，一群鱼。我们不想说某些动物分帮分伙。我们不想与罗伦兹可笑的进化分类有什么瓜葛，根据他的划分，动物分低级群和高级社会。我们所说的是，每一种动物从根本上说都是分帮分伙的。动物具有帮伙模式，而没有特性，即便要对这些帮伙模式进一步划分。正是在这里人类与动物相遇了。我们不迷恋帮伙，繁殖就不生成动物。那么迷恋外部吗？或者说，我们所迷恋的繁殖已经与我们内部的繁殖关联起来了吗？在一部杰作中，H. P. 洛夫克拉夫特讲述了兰道夫·卡特的故事，他感到“自我”在眩晕，所经历的恐惧比灭绝人寰还糟糕：“卡特具有人和非人、脊椎和非脊椎、意识和无意识、动物和植物等形式。此外还有与大地生活毫无共同之处的卡特们，他们疯狂地穿越于其他星球、系统、星系和连续宇宙之间……与虚无相融合是和平的忘却；但自觉于存在，同时又知道不再与其他存在存有明显的区别。”也不是来自我们当中的所有生成，“那是痛苦和恐惧的无

名顶峰。”① 霍夫曼斯塔尔或钱多斯伯爵都迷上了奄奄一息的老鼠，正是在他内心、通过他、在他爆发的自我的网格中，“动物的灵魂向可怕的命运露出了牙齿。”② 不是怜悯，而是非自然的参与。然后，他内心里充满了一股奇怪的冲动：要么停止写作，要么像老鼠一样写作……如果作家是术士，那是因为写作是一种生成。写作中贯穿着奇怪的生成，不是生成作家，而是生成老鼠，生成昆虫，生成狼，等等。我们且来解释一下何以如此。许多作家的自杀说明了这些非自然的参与，这些非自然的动物交配。作家是术士，因为他们把动物作为我们在原则上惟一为之负责任的一个居群。德国前浪漫派卡尔·菲力普·莫里茨感到不是为将死的牛犊负责任，而是在将死的牛犊面前产生了责任感，使他对一种未名的自然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感觉——影响。③ 因为这种影响不是个人感情，也不是特性；而是投身于天晕地转的动荡之中的帮伙力量的体现。谁不晓得这些动物序列的暴力呢？即便仅仅是瞬间，它们也能灭绝人性，使人像啮齿动物一样刮擦面包屑，或给人一副猫科动物的黄眼睛。一种可怕的内包召唤我们走向一种未听说过的生成。这不是倒退，尽管倒退的碎片、倒退的序列会介入进来。

我们必须区分三种动物。第一，个性动物，家庭宠物，伤感的、恋母式动物，每一个都有自身微不足道的历史，“我的”猫，“我的”狗。这些动物引诱我们倒退，把我们拉入自恋的沉思之中，是精神分析学所能理解的惟一一种动物，能够在它

---

① H. P. Lovecraft, “Through the Gates of the Silver Key,” in *The Dream – Quest of Unknown Kadath*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0), pp. 191 – 192. ——英译注。

② Hugo von Hofmannsthal, *Lettres du voyageur à son retour*, trans. Jean – Claude Schneider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69), letter of May 9, 1901.

③ Anton Reiser (extracts) in *La légende dispersée. Anthologie du romantisme allemand*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s, 1976), pp. 36 – 43.

们背后发现一个爹爹、一个妈咪、一个小弟弟（当精神分析学谈论动物时，动物学会了嘲笑）：凡是喜欢猫狗的人都是傻瓜。然后是第二种：有性格或属性的动物；种、类或国家动物；伟大的神话所讲述的动物，以便从中抽象出序列或结构，原型或模式（不管怎么说，容格都比弗洛伊德深刻）。最后是比较邪恶的动物，帮伙或影响的动物，它们构成繁殖，生成，居群，故事……那么，能否同时以这三种方式对待动物呢？一个特定动物，虱子，猎豹，或大象，总有可能被当作宠物，当作我的小野兽的。而在另一个极端，任何动物都可能被当作帮伙或窝群；那是我们的方式，术士的方式。甚至猫；甚至狗。而牧人，驯兽者，魔鬼，都可能在帮伙中找到宠爱的动物，尽管不是以我们刚才讨论的方式。是的，任何动物都是帮伙，或能够成为帮伙，但不同程度的才能将决定是否易于或难于发现一个动物包含的（实际或虚拟的）多重能力或多重等级。派系，帮伙，兽群，居群，都不是低级的社会形式；它们都是影响和权力，控制处于生成过程之中的动物的内包结构，如人类控制动物的内包结构一样有力。

乔治·路易·博尔赫斯是以大量描写文化著称的作家，至少写出两部拙劣的著作，但它们的标题很好：首先是《丑闻通史》（A Universal History of Infamy），因为他没有看到术士在欺骗和叛国罪之间做出的根本区别（在叛国罪这方面，生成动物由此开始）；其次是《动物园传奇手册》（Manual de zoología fantástica），书中，他不仅采用了综合平淡的神话形象，而且解决了有关帮伙和相对应的人类生成动物的所有问题："我们有意从这部传奇中排除了人类的变形，人的狼化，人狼，等

等。”① 博尔赫斯只对特性感兴趣，甚至最不可思议的特性，而术士们知道，人狼是成帮伙的，吸血鬼也同样，而帮伙是相互改造的。可作为帮伙的动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帮伙不意味着父子关系吗？不又回到了特定属性的繁殖上了吗？我们如何看待没有父子关系或遗传生产的居群、繁殖和生成呢？如何看待没有统一祖先的繁殖呢？很简单，大家都清楚，但只能暗地里讨论。我们反对流行的父子关系、遗传关系的传播、以及通过性繁殖和性生产的居群。帮伙，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是通过传染、流行病、战争和灾难而大量繁殖的。与本身贫乏不育的混居一样，帮伙也产生于一种性结合，这种性结合本身并不繁殖，但却每次都重新开始，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地盘。非自然的参与或婚姻是使自然王国得以持续的真正自然。通过流行和传染的繁殖与遗传的父子关系毫无关系，尽管这两个命题相互混合，互为要求。吸血鬼并不是父子承传的，而是传染的。差别在于，传染和流行病涉及完全异质的因素：比如，一个人，一个动物，一个细菌，一种病毒，一个分子，一个微生物。或就块茎的情况而言，如一棵树，一只苍蝇和一头猪。这些结合既不是遗传的，也不是结构的；它们是王国之间的，是非自然的参与。这是自然运作的惟一方式——抵制自身。这与父子生产或遗传繁殖大相径庭；在父子或遗传繁殖中，所保留的惟一差异是同类内部两性之间简单的二元论，和跨代的微小改变。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有多少共生状态，就有多少性，传染过程中有多少因素，就有多少差异。我们知道有许多

---

① *A Universal History of Infamy*, trans. 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New York: Dutton, 1972); Jorge Luis Borges and Margarita Guerrero, Manual de *zoologìa fantástica*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a, 1957), p. 9. “人的狼化”是乌拉圭民间故事中的一个怪物，可以呈多种形体。——英译注。

存在者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经过；它们来自不同的世界，随风产生，围绕根构成了块茎；不能依据生产、而只能依据生成来理解它们。宇宙不能通过父子关系发生作用。我们只能说动物是帮伙，而帮伙是通过传染形成、发展和变化的。

这些具有异质条件、通过传染共同发生作用的繁殖进入一些组合（assemblages）当中；而正是在这里，人类实现着他们的动物生成。但我们不能把这些深深触动我们内心的黑暗组合与家庭和国家机器等组织混淆起来。我们可以说狩猎协会，战争协会，秘密结社，犯罪团伙，等等。生成动物是这些组织的正当行为。我们不希望发现家庭类型的父子制度，或国家或前国家的分类模式和属性，甚或宗教类型的序列组织。尽管这些现象和可能的混淆，这并不是神话的根源或应用地点。这些是有关生成的故事、叙事或陈述。因此，从异想天开的进化论的角度建立动物集体的等级制就是荒唐的，因为根据这种进化论，帮伙是低级的，受到国家或家庭社会的阻碍。相反，有一个本质区别。帮伙的起源完全不同于国家或家庭的起源；国家和家庭不断以其他内容形式和其他表现形式从内部作用于帮伙，从外部搅扰帮伙。帮伙既是动物现实，又是人类生成动物的现实。传染既是一种动物居群，又是人的动物居群的繁殖。狩猎机器，战争机器，犯罪机器，引发出各种类型的生成动物，它们都不是在神话中表现的，更不是在图腾中表现的。杜梅西尔表明，这种生成主要与战争人有关，但必须是外在于家庭和国家的战争人，必须是颠覆了父子关系和分类的战争人。战争机器总是外在于国家的，哪怕是当国家利用、挪用战争机器之时。战争人的整个生成意味着繁殖、快速、无所不在、变形和叛国、影响力。狼人，熊人，野猫人，每一种动物性的人，秘密结社，所有这些都激活了战场。但人在战争中利用的动物帮伙也同样，它们拖长了战斗，或利用了战斗。它们一起

把传染蔓延开去。[①] 这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人的生成动物，动物的帮伙，大象和老鼠，风和暴风雨，导致传染的病菌。单一的愤怒。战争在变成细菌之前包含着动物序列。人狼和吸血鬼就是在战争、饥荒和流行病中繁殖的。任何动物都可能在这些帮伙和相应的生成中被清扫；战场上，甚至在军队中都能看到猫。所以，我们所要区别的并不是动物的种类，而应是动物融入家庭制度、国家机器、战争机器等的不同状态（那么，写作机器和音乐机器又与生成动物是什么关系呢?）

一个术士的回忆，II. 我们的第一条原则是：帮伙和传染，帮伙的传染，这就是生成动物所走的路。但第二条原则所告诉我们的似乎恰恰相反：凡是有繁殖的地方，你也会发现例外的个体，而为了生成动物，你必须与这个个体结成联盟。孤狼也许并不存在，但帮伙要有领袖，帮伙的头儿，或现在孤独生活的被罢免的头儿，有孤独者，有魔鬼。威拉德有宠物，老鼠本，在一种首先是爱、然后是恨的联盟中，通过他与老鼠的关系而成为惟一的生成老鼠。《大白鲸》是最伟大的生成杰作之一；亚哈船长是一条不可抗拒的生成鲸，但却是绕过帮伙或

---

① 关于战争人，他与国家、家庭和宗教关系上的外在位置，以及他所进入生成动物和生成野生动物的过程，见 Dumézil，尤其是 *Mythes et dieux des Germains* (Paris: E. Leroux, 1939); *Horace et les Curiances* (Paris: Gallimard, 1942); *The Destiny of the Warrior*, trans. Alf Hiltebe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Mythe et epopee* (Paris: Gallimard, 1968 - 1973), vol. 2. 也可以援引对黑非豹人协会的研究；这些协会可能衍生于军人结社。但当殖民国家禁止部落战争之后，它们就变成了犯罪团伙，同时具有地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有关这一主题的最佳研究是 Paul Ernest Joset 的 *Les sociétés secretes des homes - léopards en Afrique noire* (Paris: Payot, 1955). 这些团体正当的生成动物在我们看来非常不同于在国家机器中以及图腾类型的前国家制度中出现的人与动物之间的象征关系。列维 - 斯特劳斯清楚地表明，图腾已经暗示了国家的胚胎，以至于超越了部落的界限（*The Savage Mind*, 1983）。

派系的生成鲸，与独一无二的、利维坦式的大白鲸直接结成了魔鬼联盟。总是有与魔鬼订立的契约；魔鬼有时作为帮伙的头儿出现，有时作为帮伙的最高权力出现。特殊的个体有许多可能的位置。卡夫卡是另一个真正生成动物的伟大作家，歌颂了老鼠社会；但老鼠歌手约瑟芬有时在帮伙中占据一个特权位置，有时占据帮伙之外的一个位置，有时又滑入或迷失在帮伙异常的集体陈述之中。[①] 简言之，每一个动物都有其异常的方面。我们且来说明：在帮伙或繁殖中被清扫的每一个动物都有其异常的方面。有人曾指出过 anomal（异常的）是法语中废弃的一个形容词，其词源完全不同于 anormal（不规则的）的词源：a - normal 是拉丁语形容词，在法语中没有对应的名词，指不符合规则或违背规则的东西，而 an - omalie 是一个已失去形容词的一个希腊语名词，指不平等的、粗糙的、简陋的、陡峭的地域边缘。[②] 不规则的东西只能根据种和类的特点来界定；但异常的东西却是与繁殖相关的一个位置或一组位置。因此，术士用过时的形容词“异常的”来指定帮伙中特殊个体的位置。人们总是与异常的大白鲸或约瑟芬建立生成动物的联盟。

在帮伙与孤独者之间，在大量传染与选择性联盟之间，在纯粹的繁殖与特殊的个体之间，在偶然的组合与注定的选择之间，似乎的确有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是真实的：亚哈选择了大白鲸，这是超越他自身而来自别处的一个选择，在这个选择中，他违背了捕鲸规律，按照这条规律，他应该先追逐帮伙。

---

① Kafka, “Josephine the Singer, or the Mouse Folk,” in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Franz Kafka*, ed. Nahum N. Glazer (New York: Schocken, 1983). ——英译注。

② Georges Canguilhem, *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trans. Carolyn R. Fawcett, intro. Michel Foucault (Boston: Reidel, 1978), pp. 73 - 74.

彭特西勒亚由于选择了阿喀琉斯而打破了帮伙的律法，这是女人的帮伙，母狗的帮伙。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异常的选择他们才进入了他们的生成动物，彭特西勒亚的生成狗，船长亚哈的生成鲸。我们这些术士们都知道，这些矛盾是真实的，而真实的矛盾却不能仅仅成为笑柄。其真正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异常？在与帮伙的关系上，异常究竟起什么作用？显然，异常不简单是一个特殊的个体；把个体与家庭动物或宠物相提并论的东西，如精神分析学所看到的，是俄狄浦斯化的动物，是父亲形象，等等。亚哈的大白鲸不是一个老女人所珍爱的小猫或小狗。劳伦斯的生成龟与伤感或家庭毫无关系。劳伦斯是另一个既使我们倍感困惑、又使我们崇拜至极的作家，因为他能够把写作与真实的、未听说过的生成物联系起来。但有人向劳伦斯提出了反对意见："你笔下的龟不真实！"他回答说："完全可能，但却是我的生成物，我的生成物是真实的，即便你没有办法进行判断，因为你只不过是家养的小狗……"① 帮伙中异常的选择性因素与所选的、家养的、精神分析学的个体毫无关系。异常因素也表明纯粹的种或类的特点；不是特殊的或独特的样本；不是具体的完美的类型；不是一个序列的突出因素；也不是一种绝对和谐的对应的基础。异常因素既不是个体，也不是类；它只有影响，而没有熟悉的或主观的感情，也没有特殊或重要的特点。人类温柔正如人类分类一样是它所陌生的。洛夫克拉夫特把"局外人"这个术语用于这种东西或实体之上，这就是物，到达并穿过边缘的物，线性的然而却是繁殖的

---

① D. H. 劳伦斯说："我讨厌人们告诉我没有这样的动物……如果我是长颈鹿，而描写我并说了解我的普通英国人都是规矩的小狗，那么，就表明动物是不同的……你不喜欢我。你显然不喜欢我这个动物。"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vol. 2, ed. Harry T. Moore (New York: Viking, 1962), letter to J. M. Murry, May 20, 1929, p. 1154.

物，“像传染病一样弥漫、沸腾、膨胀、泛沫、传播，这种无名的恐惧。”

如果异常因素既不是个体，也不是类，那是什么呢？它是现象，是分界现象。这是我们的假设：一种繁殖不是由构成其延伸的诸因素界定的，不是由构成其理解的特点界定的，而是由其“有意”包容的线和维度界定的。如果你改变维度，如果你加上或减去一个维度，你就改变了繁殖。因此，每一个繁殖都有一个界限；它决不是中心，而是围包的线或最远的维度，作为一种功能，它能够计算其他线和维度，在特定时刻构成帮伙的所有其他的线和维度（超越这条界限，繁殖就改变了性质）。这就是船长亚哈对大副所说的话：我与大白鲸没有过往，没有什么仇可报，正如我没有什么神话可上演一样；但我的确有一个生成物！大白鲸既不是一个个体，也不是一个种；他是界限，我必须打击他以便得到整个帮伙，抵达整个帮伙，越过这个帮伙。这个帮伙的成员只是想象的“仿制品，”这个帮伙的特点只是象征性实体；最重要的是界限——异常因素。“对我来说，白鲸就是向我压来的那堵墙。”那堵白墙。“有时我以为彼岸什么都没有。可那足够了。”① 异常因素是界限，这更容易使我们理解在与它所界定的帮伙或多样性的关系上它所占据的不同位置，以及一个着迷的我所占据的不同位置。现在甚至可能为帮伙建立一个分类系统，同时避免进化论易犯的错误，因为进化论只将这些帮伙看作低级的集体（而不考虑它们使之发生作用的特殊组合）。无论如何，帮伙有一个界限和一个异常位置，无论何时，在一个特定空间里，只要一个动物在线上或在划定界限的行为中，这时，帮伙内的其他成员就将位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 Chapter 36, “The Quarter – Deck.” ——英译注。

于其中的一半，左边或右边：这是一个边缘位置，以至于很难说异常因素是否仍然在帮伙内，或已经在帮伙外了，或在帮伙变换的边界上。有时，每一个动物都接近这条界限，或占据这个能动的位置，如在一群蚊子中，“每个个体都任意运动，除非它看到其余的［蚊子］也在同一个半空间里；这时，它会匆忙地重新进入这个团体。因此，在灾难发生时，一道屏障能保证局势稳定。”① 有时，划定和占据边界的是一个特殊动物，如帮伙的头儿。有时，边界被另一种性质的存在者所界定或重叠，它不属于这个帮伙，从来就不属于这个帮伙，代表着另一个秩序的力量，是驯服者、外来者，又具有潜在威胁。无论如何，任何帮伙都不能没有这种界限或异常现象。当然，各相迥异的力量也可以破坏这些帮伙，并在内部建立婚姻、家庭或国家，从而进入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交形式，用家庭感情或国家理性取代帮伙影响。中心或内部的黑洞起着关键作用。这就是进化论所看到的进步，人类帮伙在重新建构团体家庭主义甚或集权主义或帮伙法西斯主义时，也难逃这一险境。

术士们总是占据着异常的位置，在田野或树林的边缘。他们出没于边缘。他们位于村庄的边界，或在村庄之间。重要的是他们与联盟、与契约的亲和性，这给了他们与父子关系相对抗的地位。与异常因素建立的是联盟关系。术士们与作为异常力量的魔鬼建立同盟关系。过去的神学家在对性的两种诅咒之间划分了一道清晰的界限。第一种把性作为传播原罪的传宗接代的过程。但第二种把性作为一股联合力量，激励非法的联盟或可怕的爱情。这与第一种迥然有别，因为它倾向于阻止生

---

① René Thom,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 trans. D. H. Fowler (Reading, Mass.: Benjamin Fowler/Cummings, 1975), p. 319.

育；由于魔鬼本身没有生育能力，因此必须采取间接措施（比如，作为男人的女淫妖，然后成为女人的男淫妖，男人把精子传授给她）。当然，婚姻法会调节联盟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但甚至在那时，联盟也仍然保留着危险的传染力。利奇表明，尽管有表面上不赞成规则的所有例外，但术士首先属于他能通过联盟发生影响的一个联合团体：因此，在婚姻组合中，我们在父系一边寻找术士或巫师。而根据联盟关系是否获得永久性或具有政治意义，可以决定巫术的全部进化。① 为了在你自己家里生产人狼，只与狼相象或像狼一样生活是不够的：与魔鬼为伍必须伴随着与另一个家庭的联合，而通过反馈效果生产人狼的正是这种联合向第一个家庭的回归，这种联合对第一个家庭的反动。厄克曼和查特里安讲的有趣的故事《赶狼》汇集了关于这种复杂境遇的传统。②

“通过帮伙动物的传染”和“把异常因素作为例外的帮伙，”这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渐渐消失了。利奇满有理由地把联盟与传染、帮伙与流行病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了。在分析克钦巫术时，他写道：“人们认为巫术是通过女人准备的食物传播影响的……克钦巫术是传染的，而不是遗传的……它相关于亲和性，而非父子关系。”③ 联盟或帮伙是一种表现方式，表示构成内容的形式的感染或流行病。在巫术中，血属于传染和联盟的秩序。可以说，生成动物是巫术行为，因为（1）这意味着与魔鬼建立了最初的联盟；（2）魔鬼作为动物帮伙的界限

---

① Edward Leach, *Rethink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1), pp. 18 - 25.

② Emile Erckmann and Alexandre Chatrian, *Hugues - le - loup* (Paris: J. Bonaventure, n. d.). ——英译注。

③ Edward Leach, *Rethinking Anthropology*, p. 18. ——英译注。

而发生作用，人类进入这条界限，他或她的生成就通过传染在这条界限内发生；（3）这种生成本身意味着与另一个人类团体的第二次联盟；（4）这两个团体之间的新界限引导着帮伙内动物和人的传染。有完整的生成动物的政治学，也有完整的巫术政治学，都是通过组合得以详尽表现的。这些组合既不是家庭，不是宗教，也不是国家。相反，它们代表少数团体，或被压迫的、被禁止的、反叛的团体，或总是处于既定制度边缘的团体，由于处于外部，就是说，由于异常而更加显得隐秘的团体。如果生成动物采取了诱惑的形式，即在想象中唤醒了魔鬼，那是因为在起源和过程中，这种生成都伴随着与已经自行确立或试图确立的核心制度的决裂。

我们且来罗列一些混乱的现象，不是作为将要进行的混合，而作为将要研究的不同实例：战争机器中的生成动物，各种野人（战争机器实际上来自外部，外在于国家，军人被当作一股异常力量）；犯罪团伙中的生成动物，豹人，鳄鱼人（当国家禁止部落或局部战争时）；骚乱团体中的生成动物（当面对具有巫术性质的农民运动时，教会和国家便实行压制，建立一整套审判和立法制度把帮伙暴露给魔鬼）；苦行团体中的生成动物，温顺的隐士或野兽般的隐士（苦行机器处于异常的位置，位于逃亡线上，在教会的边缘之外，反对把教会建成一个帝国机构）；[①] 实践“神圣初夜”性仪式的社会中的生成动物，狼人，羊人等（声称联盟高于和外在于家庭秩序；家庭必须从他们那里赢得调节自身联盟的权利，根据互补的遗传关系决定

① 见 Jacques Lacarrière, *Les hommes ivres de dieu* (Paris: Fayard, 1975)。

联盟的权利，以及驯服这种奔放不羁的联合力量的权利）。①

当然，生成动物的政治学仍然是极端模糊的。因为社会，哪怕是原始社会，都总是利用这些生成本身来打破它们，将其简约到图腾关系或象征的对应关系。国家总是以国民军的形式利用战争机器，以便严格限制军人的生成。教会总是要烧死术士，或把隐士描写成被降伏了的圣人，其与动物的惟一联系仅仅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驯服关系了。家庭总是要避免它们所厌烦的魔鬼联盟，以便在自身内部调节适当的联盟。我们已经论述了作为领袖的术士，与专制主义事业联盟的术士，创造了驱魔的反巫术的术士，过渡到家庭和遗传关系的术士。但这宣告了术士之死，也宣告了生成之死。我们看到，在亨利·米勒的谴责中（“最好是假装成一个动物，比如一条狗，抓住时时向我扔来的骨头”），或在菲茨杰拉德的谴责中（“我想要当一个

① Pierre Gordon, *Sex and Religion*, trans. Renée and Hilda Spodheim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Publishers, 1949). 该书研究了动物人在“神圣初夜”仪式中的作用。这些动物人把一种仪式联盟强加在父子关系的社会之上，而他们本身则属于外部或边缘人物，是传染和流行病的大师。Gordon 分析了那些村庄和城市为了行使自己入会的权利，根据各自的承传关系组织联盟而与动物人进行的斗争（如与龙的搏斗）。在 Geneviève Calame - Griaule and Z. Ligers 的“L'homme - hyène dans la tradition soudanaise,”（L'Homme, 1, 2, May - August 1961, pp. 89 - 118）中，我们看到袋狼一人生活在村庄的边缘，或在村庄之间，警惕地观望着两个方向。一个或两个英雄在相互的村庄里都有未婚妻，他们征服了人—动物。似乎有必要把两个不同的联盟状态区别开来：从外部强加自身的魔鬼联盟，把自己的律法强加给一切承传关系的联盟（强行与魔鬼、与人—动物结成的联盟），和经双方同意的联盟，这种联盟符合承传关系，是在村里人战胜魔鬼、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后结成的。这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乱伦关系的意义。因为这不足以说禁止乱伦是要求普遍联盟的结果。相反，有一种联盟对承传关系如此陌生和敌视，以至于有必要采取乱伦的立场（人—动物始终有乱伦关系）。第二种联盟禁止乱伦，因为它只能通过跻身于两种独特的承传关系之间而屈从于承传关系的权利。乱伦关系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联盟战胜承传关系时，这是作为魔鬼权力的联盟；另一次是承传关系屈服于联盟、并在不同的谱系内分配联盟时，这是作为被禁止的承传权力。

好动物，如果你扔给我一根多肉的骨头，我甚至可以舔你的手”），生成不过生产了一条大看家狗。颠倒浮士德的公式：现在就成了过去，一个旅行学者的形式吗？仅仅是一条卷毛狗吗？①

一个术士的回忆，III. 不应给予生成动物以特殊的重要性。相反，它们是占据中间位置的环节。在最近处，我们遇到的是生成女人，生成儿童（与其他生成不同的是，生成女人拥有特殊的引介权力；这不是说女人是巫师，而是说巫术是通过这种生成女人施展的）。在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生成元素、生成细胞、生成分子、甚至生成无感知。女巫的扫帚通往哪个虚空呢？沉默的大白鲸要把亚哈引向何方呢？洛夫克拉夫特的主人公遇到了怪物，但他最终到达了连续的区域，那里栖居着无法命名的海浪和无法寻找的粒子。科幻小说经历了源自动物、植物和矿物生成到细菌、病毒、分子和难以感知的东西的整个进化过程。② 音乐正当的音乐内容被生成女人、生成子女和生成动物所利用；然而，在各种影响下，音乐也与乐器有关，在一种宇宙延伸中逐渐变成分子，而正是在这种宇宙延伸中，无声变成了有声，不可见变成了可见：燕雀不再是燕雀，而成了声分子。

如果药物实验对每一个人、甚至非使用者都发生了影响，那是因为它改变了时空的可见坐标，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微观宇宙，其中，生成分子接过了生成动物所未完成的任务。卡罗斯

---

① Fitzgerald, "The Crack - up," in *The Crack - up, With Other Uncollected Pieces*, ed. Edmund Wils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56). 浮士德的典故见 Goethe, Faust, Part I, lines 1323 - 1324. ——英译注。

② Richard Matheson 和 Isaac Asimov 在这种进化中都具有特殊意义（Asimov 广泛发展了共生的命题）。

·卡斯塔尼达的书清楚地描述了这种进化，更准确说是这种内包结构，其中，一只生成狗的影响被生成分子、微观的水、空气等所取代。一个人蹒跚地从一户走到另一户，最后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我只能对你说，你是流体，是由纤维制造的发光体。"① 全部所谓最初的旅行都包括这些临界和门，在那里，生成自身也在生成；在那里，人们依据现世的"时间"、地狱的循环、以及确定等级、形式和不同呼喊的旅行阶段来改变生成。从动物的吼叫到元素和粒子的哭泣。

就这样，帮伙或繁殖在不断地相互改造，相互跨越。人狼死后变成了吸血鬼。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生成和繁殖是同一回事。繁殖不是由其众多因素界定的，也不是由一个统一或理解中心来界定的。而是由它所具有的维度的数量来界定的；它是不可分的，每失去或增加一个维度都会改变它的性质。由于其变体和维度是内在于它的，所以，这就等于说每一个繁殖都是由共生的异质因素构成的，一种繁殖总是据其临界和门不断地把自身改造成一连串其他的繁殖。比如，狼人的狼群也变成了一群蜜蜂，一片肛门，一堆小洞和溃疡（传染的命题）：所有这些异质因素构成了"共生和生成的繁殖。如果我们想象出一个着迷的自我的位置，那是因为它所倚赖的、向突破点延伸的繁殖乃是另一个繁殖的连续，从内部作用于它、限制它。事实上，自我只是两个繁殖之间的一道临界，一扇门，一次生成。每一次繁殖都是由作为异常因素的界限所界定的，但却有一连串的界限，由界限（纤维）构成的一条连续线，繁殖沿着这条连续线发生变化。而在每一道临界、每一扇门处都组成新的帮伙吗？一个纤维从人延伸到动物，从人或动物延伸到分

① Carlos Castaneda, *Tales of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4), p. 159.

子，从分子延伸到粒子，一直到无法感知的东西。每一个纤维都是一个宇宙纤维。穿越无数界限的一个纤维构成了一条逃亡或解域的路线。显然，那个异常因素，那个局外人，具有几种功能：它不仅划定每次繁殖的界限，决定暂时的或局部的稳定性（在特定环境下尽可能带有最多的维度），不仅是联盟的前提，而联盟又是生成的必要条件，而且总是把生成的改造或繁殖的跨越带到逃亡线上的最远点。大白鲸是作为帮伙界限的那道白墙；它也是与魔鬼联盟的条件；最后，它是一无所有的可怕的钓线，跨越那道墙，把船长拖向……某处？拖向虚空……

我们所要防范的错误就是相信这一系列的跨越或改造中具有逻辑秩序。假定从动物到植物、到分子，再到粒子的进化具有遗传秩序，这已经走得过远了。每一次繁殖都是共生的；其生成把动物、植物、微生物、疯狂的粒子联结起来，构成整整一个星系。这些异质的东西，狼人的狼、蜜蜂、肛门、小伤疤等，也不具有事先构成的逻辑秩序。当然，巫术总是要给生成的某些改造编码。举一部浸透着巫术传统的小说即大仲马的《狼头儿》（Meneur de loups）为例，在第一个帮伙中，边缘上的人让魔鬼同意实现他的愿望，条件是他每实现一个愿望，就有一绺头发变红。我们看到的是头发繁殖，头发成了界限。人本身在狼的边界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作为这个帮伙的头儿。然后，当他不再拥有一丝人发的时候，第二个帮伙使他成为生成狼自身；这是一个无穷尽的生成，因为他在一年中只有一天是脆弱的。我们意识到在头发繁殖与狼繁殖之间总能推导出一个相象的秩序（像狼毛一样红）；但这种相象性始终是次要的（改造中的狼是黑色的，只有一绺白毛）。事实上，头发的第一次繁殖是生成红毛；而狼的第二次繁殖反过来成了人的生成动物。在二者之间有临界和纤维，有异质之间的共生或跨越。这就是我们这些术士运作的方式。不是遵循逻辑秩序，而是遵循

非逻辑的黏性或相容性。理由很简单。这是因为没有人、甚至上帝都不能事先说两条界限是否能串联起来，或构成一个纤维，一个特定繁殖是否能跨越界限进入另一个特定繁殖，特定的异质因素是否能进入共生状态，是否能构成连贯的、共同作用的、易于改造的繁殖。没有人能说明逃亡路线将从哪里穿过：它是否会受到阻碍，倒退成俄狄浦斯式的家庭动物，一条纯粹的卷毛狗？还是遭受另一种危险，转向一条废除、虚无、自我毁灭的路线，亚哈，亚哈……？我们都特别熟悉这条逃亡路线，也熟悉它的含混。风险总是有的，但总有可能撞上避免风险的好运。我们一个例子接一个例子地说明这条路线的黏性，换言之，我们可以说明异质因素是否在共生繁殖中发生有效的作用，繁殖是否通过生成的跨越进行了有效的改造。姑且举一个简单的例子：X 又开始练钢琴了。这是否是俄狄浦斯式地回归童年时代？这是否是一种死亡形式，一种有力的废除？这是否是一条新界限，一条积极的路线，将导致完全不同于生成或再生成钢琴家的其他生成？将推导出对以前囚禁 X 的所有组合的一种改造？这是否是条出路？是否是与魔鬼的联盟？精神分裂分析或语用学没有其他意义：制造块茎。但你不知道用什么来制造块茎，你不知道地下的哪一条根将有效地制造块茎，或进入生成，居住在你的荒漠上。于是就开始实验吧。

这容易说明吗？尽管对于生成和繁殖来说没有事先构成的逻辑秩序，但标准是有的，而重要的是，它们不能用于既定事实；它们可以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应用，它们足以引导我们渡过难关。如果繁殖可以通过在每个例子中决定维度数量的界限得以界定和改造的话，我们可以设想把它们放置在一个平面上的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构成了一条断续路线的界限。这种平面只是在表面上“减少”了维度的数量，因为它把全部维度聚集起来，以至于平面的繁殖——不管怎样都增加或减少维度数

量的繁殖——都在这个平面上留下了痕迹。洛夫克拉夫特正是试图以崇高和简化的字眼儿宣布巫术的决定："接着，海浪增加了力度，试图增进他的理解，使他与多形态的实体和解，他目前的碎片正是这个形态的无限小的部分。他们告诉他每一个空间形象不过是与某一维度相对应的一个平面相切的结果——如同从立方体上切下的一个正方形，或从球体切下的一个圆一样。因此，三维度的立方体和球体也是从相对应的四维度形态上切下来的，人只能通过猜测和梦想才能了解这些维度。这些四维度反过来又是从五维度的形态上切下来的，依次类推，直到令人眩晕的、无法达到顶端的、原型的无限界。"① 黏性平面决非把繁殖的维度数量减少到两个，而是把它们全部切断，使之交叉，从而使任何数量的繁殖与任何数量的维度相共存。黏性平面是所有具体形式的交叉。因此，所有生成都像术士的画一样写在了这个黏性平面上，这是为其提供出路的终极门口。这是防止它们受阻或偏离方向而进入虚空的惟一标准。惟一的问题是：特定的生成是否能达到这一点？特定的繁殖是否能如此坦平和保留它的全部维度，正如一朵被压扁的花仍然干涸地活着一样？在生成龟的过程中，劳伦斯从最顽固的动物动力论走向抽象的、纯粹的"绘制和切分"的几何学，然而又丝毫没有丢失动力论：把生成龟一路推向黏性平面。② 一切都变得不可感知了，一切都是黏性平面上的生成无感知，而这又恰恰是不可感知的东西得以看见和听见的地方。这是平面现象（Planomenon）或块茎球体（Rhizosphere），或标准块（Criterium），随着维度数量的增加，还会有其他名称。在 n 维度，它

---

① Lovecraft, "Through the Gates of the Silver Key," p. 197. ——英译注。

② 见 D. H. Lawrence,《龟》中的第一和第二首诗（New York: T. Selzer, 1921）.

被叫做超球体（Hypersphere），机械球体（Mechanosphere）。它是抽象图象，又由于它本身没有形式，所以也是抽象机器，每一次具体的组合都是一次繁殖，一次生成，一个环节，一次震颤。而这个抽象机器就是它们全部的交叉。海浪是震颤，像许多抽象的东西一样，是刻写在黏性平面上变换的界限。海浪是抽象机器。在《海浪》中，弗吉尼亚·伍尔芙——把全部生活和作品做成一个通道，一次生成，年龄、性别、元素和王国之间的各种生成——把七个人物混合起来：伯纳德、奈维尔、路易、吉尼、罗达、苏珊和珀西瓦尔。但这七个人物都有名字，都有个性，都表明一种繁殖（比如，伯纳德与鱼族）。每一个都既在这种繁殖之中又在它的边缘，同时又跨越它而进入其他繁殖。珀西瓦尔就像是包容最大数量维度的终极繁殖。但他还没有到达黏性平面。尽管罗达认为她看见他从海上升起，但那不是他。“当白色的胳膊放在膝盖上时，那是一个三角形；现在是直立的———一根柱子；现在是一个喷泉……大海在它后面咆哮着。它是我们所不及的。”① 每一次前进都像一道海浪，但在黏性平面上，它们是单一的抽象海浪，其震颤沿着逃亡路线或解域传播开去，穿过整个平面（伍尔芙小说的每一章开始之前都有对海浪、海浪的时间和海浪的生成的沉思）。

一个神学家的回忆。神学在下面这一点上是非常严格的：没有人狼，人不能成为动物。这是因为本质形式不发生任何变化；它们是不可异化的，只享受类比关系。魔鬼和巫师，以及他们之间的契约，都同样是真实的，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可怕的局部运动。神学把宗教法庭上用做模式的两种案例区别开

① Virginia Woolf, *The Wav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1), p. 139. ——英译注。

来：一个是尤利西斯的同伴的案例，另一个是狄俄墨得斯的同伴的案例；一个是想象幻觉，另一个是魔咒。在第一种中，主体相信他或她本人将变成动物，猪、牛或狼，旁观者也这样认为；但这是内部的局部运动，把感性映象带回到想象中来，向它们贩卖外部意义。在第二种中，魔鬼“呈现”真实的动物形体，甚至把降在它们身上的事故和影响转移给其他身体（如被魔鬼占身的猫或狼可以接受伤害，再转移到相应的人体上）。[①] 这就等于说，人在现实中并不能成为动物，但却有人类生成动物的魔鬼现实。因此，魔鬼确实是在进行各种局部转移。魔鬼是转移者；它转移液体、情感、甚或身体（宗教法庭不容许向魔鬼的力量妥协：女巫的扫帚或“魔鬼占有你”等）。但这些转移既没有跨越本质形式的障碍，也没有跨越物质或主体。

关于自然规律，有另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与魔鬼学没什么关系，但却与炼金术、更重要的是与物理学有关。这是偶然形式的问题，不同于本质形式和既定主体。因为偶然的形式屈从于或多或少的原则：多少有点仁爱，但也可以说多少有点白色，多少有点温暖。一度热可以发出不同于接受它的物质或主体的温暖。一度热可以与一度白色或另一度热合成，构成第三度不同于主体的独特而有个性的热度。一天、一个季节、一个事件有什么个性？较短的一天和较长的一天严格说来并不是延

---

① 见宗教法庭手册，*Le marteau des sorciers*（1486），ed. H. Institoris and J. Sprengler (Paris: Plon, 1973), vol. 1, p. 10, and vol. 2, p. 8. 第一个最简单的案例是关于尤利西斯的伙伴的，他们自以为并被认为变成了猪（或国王 Nebuchadnezzar 变成了一头公牛）。第二个案例比较复杂：狄俄墨得斯的伙伴不相信他们变成了鸟，因为他们死了，而是魔鬼占了鸟的身，把它们当成了狄俄墨得斯的伙伴的身体。澄清这一复杂情况的必要性是通过影响转移的现象来说明的；比如，外出打猎的伯爵砍断了狼的一只脚，回到家时发现并未离开家的妻子被砍断了一只手；或一个人痛打了一只猫，而伤口的确切部位却在女人身上。

续，而是延续的度，正如热、颜色都有度一样。因此，一种偶然形式具有由一些构成性个性构成的“纬度”。度，强度，是个体，是个体性（Haecceity），与其他度、其他强度合成，构成另一个个体。主体或多或少参与偶然形式，这个事实能说明纬度吗？但是，不同的参与度难道不意味着不能简约为主体属性的一个形式本身的摆动或震颤吗？此外，如果热的强度不是通过加法构成的，那是因为人们必须加上他们各自的主体；正是这些主体防止整体热量的增加的。更有理由说明强度的分布，确定“被畸形地变了形”的经度，与一个身体或一组身体相对应的各种速度、迟缓和度都是经度：一种地图绘制。[1] 简言之，在物质形式与确定的主体之间，在二者之间，不仅有魔鬼局部转移的全部运作，而且有个体性、度、强度、事件和事故的自然作用，它们构成的个性完全不同于接受它们的完美主体的个性。

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的回忆，I. 物质或本质形式已在许多不同方面受到了批判。斯宾诺莎的方法是激进的：认为元素不再具有形式或功能，就是说，它们是抽象的，即便完全是真实的。元素完全是根据运动和静止、迟缓和快速来区分的。元素不是原子；换言之，有限的元素仍然具有形式。它们也不是可被无限划分的。它们是无限小的，终极部分是实际存在的无限性，都被置放在同一个黏性或构成性平面上。它们不是由数量界定的，因为它们总是无限量的。然而，根据它们的速度或

① 许多论文论述中世纪的强度问题；关于运动学和动力学的构成问题，尤其尼古拉·奥雷姆的重要作用，见 Pierre Duhem 的经典著作，Le système dumonde (Paris: A. Hermann & Fils, 19130 – 1959), vols. 7 – 9 (*La physique parisienne au XIVe siècle*).

运动或静止关系，它们属于一个特定个体，这个个体本身可能是另一个个体的一部分，而这另一个个体又被另一个更复杂的关系所控制，依次类推，直至无限。因此有较小和较大的无限，但不是由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它们作为组成部分的构成关系决定的。因此，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无限繁殖，而整个自然界则是由无数个体繁殖而成的一个繁殖。自然的黏性平面就像一台巨大的抽象机器，抽象然而又是真实的、个体的；它的各个部件是不同的组合和个体，每一个都是无限数的粒子的聚合，进入了或多或少相互关联的一种无限关系之中。因此，自然的平面上存在着统一，可以同样应用于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人工的和自然的东西。这个平面与形式或形象无关，也与设计或功能无关。它的统一与深埋于事物之内的基础无关，也与上帝心中的目的或规划无关。相反，这是万物皆被置放其上的一个平面，就好像所有形式的交叉一样，就好像所有机器的功能一样；而其维度则随着它切割的个性的繁殖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一个固定的平面，上面的事物只能通过速度和迟缓来区分。一个与类比相对抗的内在性或单一性的平面。据说一具有所有多的单一意义。存在以单一的意义表现了所有不同的东西。我们所谈论的不是物质的统一，而是无限的变化，而这正是这个独特的生命平面上相互构成的部分。

居维叶与杰奥弗里·圣－希莱尔之间永无完结的争论：二者至少都同意抛弃相象性或想象的、感性的类比。但在居维叶那里，科学定义涉及器官之间、器官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因此，居维叶把类比推向科学阶段，使其成为比例性类比。据他所说，平面的统一只能是类比的统一，因此也是超验的统一，根据不可简约的、不可跨越的、异质的构成，如果不破碎而成为独特的分支，就不能实现。贝尔后来又加上了发展和区分的非交流类型。这个平面是隐蔽的平面（规划）组织，一个结构

或生成。杰奥弗里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他超越了器官和功能而深入到他所说的“解剖的”抽象元素，甚或粒子，进入不同结合的纯粹物质，根据速度和迟缓而构成特定的器官，发挥特定的功能。速度和迟缓，运动和静止，迟缓和迅速，不仅控制着结构形式，而且控制着发展类型。这个方法后来在一个进化论框架中重新出现，即皮埃尔的快速生成学和异速生长中的不同生长比率：作为运动实体的类既不早熟，也不迟缓。（甚至生育问题也不是形式和功能的问题，而是速度问题；父亲的染色体是否及时地融入了细胞核?）无论如何，有一个内在性的、单一性的、合成的纯粹平面，在这个平面上，一切都是既定的，在这个平面上，无形的元素和物质跳跃着，只能根据相互的速度加以区别，根据它们的关联和运动关系进入这个或那个个体化的组合。一个固定的生命平面，在它上面，一切都在骚动、缓速或加速。为了全部组合而促成的一个单一抽象的动物。为头足动物或脊椎动物准备的一个独特的黏性或合成平面；为了让脊椎动物成为章鱼或乌贼，它所要做的就是及时地把自身折叠成两半，以便迅速将其后背的每一半因素结合起来，然后把骨盆放在脖颈上，把四肢聚集到一端，就像“一个小丑把头和肩膀后仰，用头和手走路一样。”① 皱褶。这不再是器官与功能的问题了，不再是只通过类比关系和离心发展的类型就能控制其组织的一个超验平面的问题了。这不是组织而是合成的问题；不是发展或区别而是运动和静止、快速和慢速的问题。这是元素和粒子的问题，它们是否能及时通过、生成或跳到纯粹内在性的平面上来。而如果事实上组合之间有跳

① Etienne Geoffroy Saint – Hilaire, *Principes de philosophie zoologique* (Paris: Picton et Didier, 1930). 关于粒子及其运动，见 *Notions synthètiques et phisiologiques de philosophie naturelle* (Paris: Denain, 1838).

跃，有裂隙，那不是由于其本质的不可简约性，而由于总有一些元素没有及时到来，或在一切都结束之后才到来；因此，有必要穿过雾霭，跨越虚空，拥有时间的间隔和延误，这本身就是内在性平面的组成部分。甚至失败也是这个平面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努力构想这个世界，其中，一个单一固定的平面——我们将称之为绝对不动或绝对运动的平面——贯穿着相对速度的无形元素，它们根据速度和迟缓而进入这个或那个个体化的组合。由无名物质栖居的一个黏性平面，上面无数触摸不到的物质碎片都进入了不同的关联之中。

儿童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当小汉斯说“鸡鸡”的时候，他指的不是器官，不是有机功能，而基本上指一个物质，换言之，指一个集合体，其各种因素据其各种关联、其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和它所进入的不同的个体化组合而不同。女孩有鸡鸡吗？男孩说有。不是通过类比，也不是为了驱除阉割的恐惧。显然，女孩有鸡鸡，因为她们也便溺：一种机械功能而非有机功能。这非常简单：同样的物质具有不同的关联，不同的运动和静止关系，而就男孩和女孩的情况而言，也进入不同的组合（女孩并不站着便溺或不能便出很远）。火车头有鸡鸡吗？有，但却是在另一个机械组合中。椅子没有鸡鸡：但那是因为椅子的构成因素不能把这个物质融入它们的关系之中，或分解与那个物质的关系直到它屈服于别的什么，如一蹬梯子。有人曾指出，对儿童来说，“一个器官经历了上千次变化，”它“难以定位，难以辨认，它依次可能是骨头、发动机、粪便、婴儿、手、爹爹的心……”这决不是因为把器官当成了部分客体。而是因为这个器官恰恰是其各个因素根据其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构成的组合，以及这种关系把临近因素结合或分裂的方式。这不是泛灵论，也不是机械论（mechanism）；而是普遍的机器论（machinism）：由包含着无限数的组合的一台巨大的抽象机器所

占据的一个黏性平面。儿童如果不被看作问题机器，他们提出的问题就得不到很好的理解，所以，不定冠词才在他们的问题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肚子，一个孩子，一匹马，一把椅子，“一个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斯宾诺莎主义是哲学家的生成儿童。我们称一个身体的经度为特定关系中属于那个身体的粒子集合体；这些集合体根据界定身体的个体化组合的关系构成而互为组成部分。

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的回忆，II. 斯宾诺莎还有另一面。对于把无限的各个部分聚集在一起的每一种运动与静止、快与慢的关系而言，都存在着相对应的力度。对于构造、分解或改造某一个体的各种关系而言，都有影响到这个个体的相对强度，增大或减小其行为力度；这些强度来自外在部分，或来自个体自己的部分。影响是生成。斯宾诺莎问道：一个身体能做什么？我们称一个身体的纬度为影响，身体在特定的力度或在那个力度的限度内能够发生影响。纬度是由一定能量之下的强度部分构成的，而经度是由一定关系之下的广延部分构成的。同样，我们避免根据器官和功能界定身体，我们将避免根据种和类的特性来界定身体。相反，我们试图说明身体的影响。这种研究叫做个体生态学，也是斯宾诺莎书写一部真正的伦理学的意义所在。一匹赛马不同于一匹干活的马，一匹干活的马又完全不同于一头公牛。在定义动物世界时，封·于克斯屈尔寻找动物在个体化组合中所能够发生的主动的和被动的影响。比如，受光的吸引，虱蝇在树枝的顶端盘旋；一闻到哺乳动物的味道，便落将下来，扑到在树枝下经过的动物身上；它钻入动物的皮肤，至少能找到多毛的地方。仅三种影响；虱蝇利用其余时间睡觉，有时一睡就是数年，不顾巨大森林里所进行的一切。其力度实际上受到两个极限的限制：一个是尽情饱餐的乐

观极限，饱餐之后它将死去；另一个是它在等待饱餐时戒斋的悲观极限。据说，虱蝇的三种影响呈现种和类的特性，具有器官和功能、腿和喙。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这是真实的；但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却不然。恰恰相反，在伦理学中，有机特点衍生于经度及其关系，纬度及其程度。在了解了身体的功能之后，我们才对身体有所了解，换言之，我们了解了身体都有哪些影响，能否与其他影响合成，与另一个身体的影响合成，以毁掉那个身体，或被那个身体所毁掉，以与那个身体交换行为和激情，或与它联手共建一个更强壮的身体。

我们再一次回到儿童的话题上来。请注意他们是如何谈论动物的，是如何受动物所感动的。他们列出了一张影响名单。小汉斯的马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有感染力。它不是类的成员，但却是役马—面包车—街道这个机器组合中的一个因素或个体。它是由个体化组合中主动和被动影响的名单所界定的，而它本身就是这个组合的一部分：眼睛被蒙着，带着嚼子和笼头，傲慢的派头，有个大鸡鸡，拉重货，被鞭打，倒地，用腿刨地，咬，等等。这些影响在组合内部循环和改造：一匹马“能做”什么。它们的确有最大马力的乐观极限，但也有悲观的临界：一匹马跌倒在大街上！背上沉重的负担压得它站不起身来，还有过分的鞭打；一匹马要死了！——那时候这是常见的景观（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金斯基都曾哀悼过马）。那么，究竟什么是小汉斯的生成马？汉斯也被放在一个组合中：母亲的床，父系因素，房子，街对面的咖啡馆，附近的仓库，街道，上街的权利，这个权利的赢得，赢得这个权利的骄傲，但也有赢得这个权利时的危险，跌倒，羞辱……这些不是想入非非或主观臆想：这不是模仿一匹马的问题，“扮演”马的问题，与马相认同的问题，甚或不是体验怜悯或同情之感的问题。这也与组合间的客观类比无关。问题是，小汉斯是否能

给他自己的因素赋予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使他成为马的影响，且不说形式和主体了。有没有既不是汉斯的、也不是马的、目前尚且未知的、但却是汉斯的生成马的组合？比如，在这个组合中，马会露出牙齿，汉斯则露出别的什么，如脚，腿，鸡鸡，等等？这如何改进汉斯的状况？这将如何打开以前一直关闭着的出路？当霍夫曼斯塔尔思考一只老鼠临死时的抽搐时，那动物恰恰在他体内“对凶恶的命运露出了牙齿。”这不是怜悯的情感，更不是他所说的认同。这是涉及完全不同的个体的速度与影响的合成，一种共生；它使老鼠成为人的一个思想，一个热烈的思想，同时，人也变成了老鼠，在死亡的抽搐中咬牙切齿。老鼠和人决不是同一回事。但存在却以一种不再使用词语的语言，以一种不再具有形式的质料，以不再属于主体的一种影响，在二者身上表现了同一种意义。非自然的参与。但是，合成的平面，自然的平面，恰恰是为了这种参与，运用各种手段不断进行组合和分解的。

这不是类比，或想象的产物，而是黏性平面上速度与影响的合成：一个计划（平面），一个项目，甚或一个树图，一个问题，一个提问机器。夫拉基米尔·斯莱皮安在一个极其怪异的文本里提出了这个“问题”：我饿了，我总是饿。人不应该饿，所以我得变成狗——可怎么变呢？这不是模仿狗，也不是关系的类比。我必须成功地给我身体的各个部位赋予快慢的速度关系，这能使身体成为狗，既不通过相象性，也不通过类比，而在一种原创的组合中进行。狗本身不变成别的什么，我就不能变成狗。斯莱皮安想到用鞋来解决这个问题，鞋的制作。如果我把鞋穿在手上，那么，手的因素就会进入一种新的关系，结果就是我所寻求的影响或生成。但是，当第一只手穿上鞋子后，怎样才能系第二只手上的鞋子呢？用嘴，嘴在组合中也接受了新的用途，成了狗的口套，因为狗的口套现在是用

来系鞋带的。在这个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需要做的不是比较两个器官，而是把因素或质料置于一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将完全祛除器官的特殊性，使其生成另一个器官。但这种生成，虽然已经发生于脚、手和嘴，但还是要失败的。它败就败在尾巴上。尾巴也一定要赋予新的用途，被迫展示性器官和尾部附属物共有的因素，这样，前者将会用于人的生成狗，同时，后者将用于狗的一种生成，将成为组合之一部分的另一个生成。计划（平面）失败了，斯莱皮安在此犹豫不决。尾巴一方面是人的器官，另一方面是狗的附属物。它们的关系并未进入新组合中的合成。这正是精神分析学介入的地方，重新使用有关尾巴的一切陈词滥调，如母亲，童年记忆中母亲穿针引线的情景，那些具体的图象和象征性类比。[①] 但这正是斯莱皮安在这个优秀文本中想要使用的方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计划（平面）的失败正是计划（平面）本身的一部分：计划（平面）是无限的，你可以以上千种不同的方式开始；你总会发现有些事物太迟，有些事物太早，迫使你重新构造速度和迟缓关系，你的全部影响，重新安排总的组合。一个无限的事业。但还有一个方面使计划（平面）失败；这次是因为另一个计划（平面）全力回归了，打破了生成动物，把动物折回到动物，人折回到人，仅仅重新组织了因素之间的相象性和关系之间的类比性。斯莱皮安面对的是这两个危险。

我们想简要说明一下精神分析学：从一开始，它就经常遇到人类生成动物的问题：在不断经历这种生成的儿童身上，在拜物教中，尤其在不断面对这个问题的受虐狂中。至少可以说，精神分析学学者，甚至容格，都不理解、甚至不想理解这

---

① Vladimir Slepian, "Fils de chien," *Minuit*, no. 7 (January 1974). 我们已经对这个文本进行了非常简化的讨论。

种现象。他们在儿童身上就像在成人身上一样杀死了生成动物。他们什么都没看到。他们把动物看作本能的代表，或父母的再现。他们没有看到生成动物的现实，没有看到它是自行体现的影响，是以人为体现的本能，而不代表任何东西。除了组合本身之外没有其他本能。在两个经典文本中，弗洛伊德在汉斯的生成马中只看到了父亲，而在阿帕德的生成公鸡中，佛伦奇也只看到了父亲。马的蒙眼是父亲的眼镜，马嘴边上的黑毛是父亲的胡须，马踢腿代表父母在“做爱。”他只字未提汉斯与街道的关系，如何禁止他到街道上去，也没有说明看到“一匹傲慢的马，一匹蒙着眼拉货的马，一匹倒地的马，一匹被鞭打的马……”，对一个孩子来说都意味着什么。精神分析学对自然参与没有好感，对一个孩子所能安装的组合也不感兴趣。他安装组合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所有出口对他来说都是关闭的：一个计划（平面），不是幻想。同样，如果把受虐狂理解成生成动物，而没有别的解释，那么，就不会谈论痛苦、侮辱和焦虑等蠢话。要最充分地利用自然，总要牵涉到机器、工具、引擎，总要有手段和束缚。这是因为有必要废除器官，把它们搁置起来，这样，它们被解放了的因素就能够进入新的关系之中，由此将产生生成动物，和机器组合内部影响的流通。如我们在别处所看到的，这是面具、笼头、嚼子以及阴茎套的情况：其悖论是，在生成马的组合中，人压制了自身的“本能”力量，而动物则把它“后天获得的”力量输送给了人。颠倒，非自然的参与。女主人的靴子废除了作为人类器官的腿，使腿的因素进入了适合整体组合的一种关系之中：“这样，对我发生作用的就不再是女人的腿了。”① 但要打破生成动物，

① 见 Roger Dupouy, “Du masochisme,” *Annales Médico – psychologiques*, series 12, vol. 2 (1929), p. 405.

所需要的只是从中抽取一个环节，从中抽取一个时刻，不考虑其内在速度和迟缓，阻止影响的流通。这样，所剩下的就只有条件之间想象的相象性，或关系之间的象征性类比。这个环节指父亲，运动与静止之间的关系指爱欲的场面，等等。必须认识到，精神分析学不足以导致这种突破。它只导致了生成内部固有的一种危险。总是有发现“扮演”动物的危险，家庭的俄狄浦斯动物，米勒学狗叫，叼着一块骨头；菲茨杰拉德舔着你的手，斯莱皮安回到了母亲身边，或从 1900 年起就在色情贺卡上扮演马或狗的老头（而“扮演”一个野生动物将是最好不过的了）。生成动物继续冒着这些危险。

一个个体性的回忆。一个身体不是由决定它的形式所界定的，也不是由决定性的物质或主体、或它所具有的器官、或它所履行的功能所界定的。在黏性平面上，一个身体只是由经度和纬度界定的：换言之，就是在运动与静止、快与慢的特定关系下属于它的那些物质因素的总和（经度）；就是在潜在的特定力量或程度上它所能承受的强度影响的总和（纬度）。除了影响和局部运动、区别性速度之外，没有别的。这要感谢斯宾诺莎。他使人注意到了身体的这两个维度，并把自然的平面界定为纯粹的经度和纬度。纬度和经度是地图绘制的两个因素。

有一个个性化模式非常不同于个人、主体、事物或物质的模式。我们为其保留了个体性（haecceity）这个名称。[①] 一个季节，一个冬天，一个夏天，一个小时，一个日期，都有一个不缺少任何东西的完美的个体性，即便这个个体性不同于物或

---

① 该词有时写作“ecceity”，由 ecce（“这是”）派生而来，这是一个错误，因为 Duns Scotus 从 haec（“此物”）创造该词及其概念。但这个错误却颇有成效，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不同于物或主体的个体性模式。

主体的个体性。它们是个体性，是因为它们包含着分子或粒子之间的整个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将发生影响和受到影响的能量。当魔鬼学解释可怕的局部运动和影响的传播时，它也说明了雨、雹、风、传播瘟疫的空气或被有害粒子所污染的空气、以及有利于这些传播的条件。故事中一定含有不简单是替代的个体性，而且还有拥有自身地位、引导事物和主体变形的具体的个体化。在各种文明中，东方具有更多的由个体性而非由主体性或物质性导致的个体化：比如，俳句必须包含足以构成一个复杂个体的漂浮的诗行。在夏洛特·勃朗蒂的作品中，一切都依据风、物、人、脸、爱、词语。洛卡的“晚上五点钟”既是爱的降临又是法西斯主义的开始。那可怕的完美的五点钟！我们说“了不起的故事！”“真热！”“伟大的生命！”来指称独一无二的个体化。劳伦斯和福克纳作品中的时日，热度，白色强度，都是完美的个体性。一度热可以在纬度中与另一度结合，构成一个新的个体，如一个身体根据经度的不同而在这里是冷的，在那里是热的。挪威的煎蛋饼。一度热可以与白色强度结合起来，如仲夏里白色的天空。这决不是与永恒或绵延的个体性相对立的瞬间的个体性。撕掉的日历与永久保存的日历在时间上是相等的，尽管所论的时代不同。有些动物的生命不超过一天或一个小时；相反，最长寿的主体或客体可以活若干年。我们可以构想与个体性和主体或事物相等的一个抽象时间。在地质学与天文学的极慢和极快的速度之间，米歇尔·图尔涅置入了气象学，在那里，流星与我们同步生活：“云在天上构成形状，正如我脑中的映象，风吹着，就如同我呼吸，一道彩虹跨越地平线，因为只要我的心与生命相协调，夏天就会像假日一样漂过。”但在图尔涅的小说中，这种确实性只对一对孪生主人公而言，而且他们都是畸形的、被祛除主体性的、

已经获得了某种普遍性的，这是偶然的吗？① 甚至当时间抽象地相等时，生命的个体性也不同于拥有和支持这个生命的主体的个体性。这不是同一个平面：首先，这是黏性平面或主体性的合成平面，它只知道速度和影响；其次，这是全然不同的由形式、物质和主体构成的平面。而且不在相同的时间，不具有相同的时间性。永存（Aeon）：事件的不确定时间，只知道速度的漂浮的线，不断地分化着已经在那儿但同时又不在这儿的东西，同时既太迟又太早的东西，将要发生但又刚刚发生过的东西。时间（Chronos）：给物和人定位、发展一个形式、确定一个主体的时间长度。② 布莱兹区别了音乐中的速度和非速度：以价值为基础的形式和功能音乐的“脉冲时间”对立于漂浮音乐的“非脉冲时间”，这种漂浮音乐既是漂浮的又是机器的，除了运动中的速度和差异外，没有别的。③ 简言之，差异根本不在瞬间与永恒之间，甚至不在规律与不规律之间，而在两种个体性模式之间，在两种时间模式之间。

我们必须避免一种过分简化的调和，仿佛一方面有物或人的类型的形式主体，另一方面又有个体性的类型的时空坐标。你不会屈服于个体性，除非你意识到那就是你，你不过就是那。当面目变成了个体性时：“那似乎仅仅是时间、气候和这

---

① Michel Tournier, *Les meteors* (Paris: Gallimard, 1975), chapter 23, “L'âme déployée.”

② 关于“永存”与“时间”的对立，见 Deleuze, *Logique du sens* (Paris: Minuit, 1969), 尤其是 series 23, pp. 190 - 197. ——英译注。

③ Pierre Boulez, *Conversations with Célestin Deliège* (London: Eulenberg Books, 1976), pp. 68 - 71 (“把速度现象引进音乐是不可能的，音乐只通过电子计算，在……长度上以秒或微秒计算”。) P. 70.

些人所构成的奇异混合。”① 你是经度和纬度，无形的粒子之间的一组快慢速度，一组非主体化了的影响。你具有一天、一个季节、一年、一生（无论多久）的个体性——一种气候、一阵风、一场大雾、一块沼泽、一个帮伙（不论其规则）的个体性。或至少你可以拥有它，你可以接近它。晚上五点钟一阵风刮来了一群蝗虫。夜里外出的一个吸血鬼。月圆时显形的一只人狼。不应该以为一个个体性仅仅包括给主体定位的布景或道具，或给物或人奠定基础的附属物。这是在个体化集合中的整个组合，而个体化的集合就是个体性。经度和纬度、速度和影响所界定的正是这种组合，它独立于形式和主体，属于另一个平面。这是狼自身，是马，是孩子，他们不再是主体，而成为事件，在组合中与小时、季节、大气、空气、生命不可分割。街道与马合成在一起，正如气息奄奄的老鼠与空气合成一样，而野兽则与圆月合成。我们充其量能区别组合的个体性（只被看作经度和纬度的一个身体），和相互组合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也标志着在每个组合内生成的潜势（经度与纬度相交叉的环境）。但二者严格说来是不可分割的。气候，风，季节，小时，与追随它们、在它们当中居住、睡觉和醒来的物、动物或人同属于一个自然。这不能不加停顿地阅读：动物在五点钟追捕猎物。动物的生成夜晚，血的结合。五点钟就是这个动物！这个动物就是这个地方！“那条瘦狗在路上跑着，这条狗就是这条路，”弗吉尼亚·伍尔芙喊道。那就是我们需要感觉的东西。时空关系，决定，不是事物的谓项，而是繁殖的维度。街道是面包车—马这一组合的组成部分，就如同汉斯组合中它所

① Ray Bradbury, *The Machineries of Jo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4), p. 53.

开创的生成马一样。我们都是晚上五点钟，或另一个小时，甚或同时两个小时，同时既是乐观的又是悲观的，同时既是中午又是午夜，只不过分配的方式各不相同。黏性平面只包括交叉线上的个体性。形式和主体不属于那个世界。弗吉尼亚·伍尔芙穿过人群，走在出租汽车之间。散步是一种个体性；达洛威太太决不会再说，“我是这，我是那，他是这，他是那。”“她感到非常年轻；同时又老得无法形容。她像刀一样把一切都切成片；同时她又置身于外，观望着……她总是感到，哪怕活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① 个体性，大雾，怒视。一个个体性既不是开端，也不是结尾，既不是本源，也不是目的；它总是在中间。它不是由点制成的，而只由线制成。它是块茎。

而这不是相同的语言，至少不是语言的相同用法。如果黏性平面只有个体性内容，那它也有自己特殊的符号作为表现。内容的平面和表现的平面。这种符号主要是由专有名词、动词不定式和不定冠词或不定代词构成的。从本身摆脱了形式意义和个人主体化的符号学角度来看，不定冠词 + 专有名词 + 动词不定式构成了基本的表现链，与极小形式化的内容相对应。首先，动词不定式在时间上决不是不确定的；它表现永存所固有的那种漂浮的非脉冲时间，也就是纯粹事件的时间，生成的时间，表示相对速度和迟缓，独立于时间在其他模式中呈现的天文记时或年代顺序的价值。完全有理由把不定式作为生成的模式和时态，以与其他与时间相关的模式和时态对立起来，因为这些模式和时态构成了存在的脉冲或价值（动词“to be”恰恰是惟一没有不定式的动词，或者说，它的不定式仅仅是一个不确定的、空洞的表现，被抽象地用来指称确定的模式和时态的

---

① N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25), p. 11. ——英译注。

总和)。[①] 第二，专有名词决不表示主体；因此，根据主体是否属于不同于它所属分类形式的另一种性质，或仅仅是那种形式的终极行为，即分类的极限，而问其运作是否相象于类的命名就是毫无意义的。[②] 专有名词并不指称主体；名词也不具有专有名词作为形式或类的功能的价值。专有名词基本上指称属于事件、属于生成或属于个体性秩序的东西。它是军人和气象学家，掌握着专有名词的秘密，然后将其用于战略运作或飓风。专有名词不是时态的主语，而是不定式的动作者。它标志着经度和纬度。如果虱蝇、狼、马等都是真正的专有名词，那不是因为它们是标志这些动物的类和种的分母，而是由于构成它们的速度和填充它们的影响；是因为它们在自身内、在组合中经历的事件——小汉斯的生成马，人的生成狼，斯多噶派(和其他专有名词)的生成虱蝇。

第三，不定冠词和不定代词与动词不定式一样不是不确定的。只有在用于一个本身不确定的形式或用于一个可确定的主体时，它们才缺乏一种确定性。另一方面，当它们引入个体

---

① 古斯塔夫·纪尧姆曾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动词概念。他把一种包裹在“过程”之中的内在时间与相关于时代差别的外在时间区别开来（*Epoques et niveaux temporels dans le système de la conuugaison français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Université de Laval, Quebec, no. 4, 1955])。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极端各自对应于不定式—生成，即永存，和现在—生成，即时间。每一个动词都多多少少倾向于一极或另一极，这不仅依其性质，而且依其模式和时态的细微差别而定的，只有与两极同时对应的“生成”和“存在”例外。在研究福楼拜的风格时，普鲁斯特表明了福楼拜作品中的未完成时态表示不定式 = 生成的价值：*Chroniques*（Paris: Gallimard, 1927, pp. 197 – 199.）

② 关于专有名词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专有名词外在于分类的极限，并属于另一种性质，在何种意义上它处于极限但同时仍然是分类的一部分?），见 Alan Henderson Gardiner, *The Theory of Proper Names*, 2ed e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and Lévi – Strauss, *The Savage Mind*, chapter 7 (“Time Regained”), pp. 217 – 244.

性、事件时，它们不缺少任何东西，事件的个体化并不构成一种形式，不是由主体促成的。因此，不确定的东西就具有了最大的确定性：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孩子挨打了；一匹马跌倒了；……这里，起作用的因素在它们所构成的组合中经历了个体化过程，从而独立于它们的概念形式和它们所指之人的主体性。我们曾几次谈到儿童不是用不定式指不确定的东西，而恰恰相反，将其用作集体内部的一个个体化功能。正因如此，我们才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努力所惊呆，他们极力想要在不确定的东西背后找到确定的东西，一个所属格，一个人。当一个孩子说“一个肚子，”“一匹马，”“人是怎样长大的?”“有人在打一个孩子”时，精神分析学家听到的是“我的肚子，”“那个父亲，”“我长大能像爹爹那样吗?”精神分析学家问：谁挨打了?谁打的?[①] 甚至语言学也避免不了这种偏见，因为它离不开人格研究。根据语言学，除了不定冠词和不定代词外，第三人称的代词也缺少前两个人称所具有的、并被假定为一切表现之必要条件的明确的主体性。[②]

相反，我们认为，第三人称的不定式“他”和“他们”从这个观点看没有任何不确定的意味；它把陈述与集体组合联系

---

① 我们已经遇到过这类问题，精神分析学对儿童中不定冠词和不定代词的使用不闻不问：早在弗洛伊德时期就如此，尤其是 Melanie Klein（她分析的儿童中，如小理查，常常说“一个，”“某某，”和“人们”，但 Klein 不可思议地将这些表现强行变成了所属格的、人称的家庭用语）。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学中，只有 Laplanche 和 Pontalis 提到过不定式起着特殊的作用；他们反对进行任何过急的阐释归纳：“Fantasme originaire，” *Les temps modernes*，no. 215（April 1964），pp. 1861，1868.

② 见 Emile Benveniste 关于语言的主体和人格概念，*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 Mary Elizabeth Meek（Coral Gables，Fla.：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chapters 20（“Subjective in Language，” pp. 223 – 230）and 21（“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pp. 231 – 238），especially pp. 220 – 221，and 225 – 226.

起来，作为必要条件，而非与表述主体联系起来。勃朗肖正确地指出，“某人”（One）和“他”——某人要死了，他不愉快——决不取代主体的位置，反倒废除任何主体，而热衷于个体性的类型组合，这种个体性的类型导致事件的发生，因为它们是无形的，并不是由人促成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只能再次搏斗，而失去了说我的能力”）。① “他”并不指称一个主体，而勾画一个组合的树图。它并不赋予陈述以语码，并不像前两个人称那样超越陈述，相反，它防止陈述落入主体或意指星群的暴政，防止陈述落入空洞冗长的王国。它发出的表现链的内容能够组合成最大数量的发生和生成。“他们像命运一样到来了……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何以走得这么远？……”② 他或某人，不定冠词，专有名词，动词不定式：一个要生成马的汉斯，名叫狼的帮伙来看他，某人要死，黄蜂遇见兰花，他们来了德国佬。黏性平面上的分类广告，电报机器（我们再次想起中国诗歌的程序和最佳评论提出的翻译规则）。③

一个规划（平面）制定者的回忆。也许有两个平面，或两

---

① 莫里斯·勃朗肖的重要著作拒斥语言学中的“转换词”和人称代词。见 *L'entretien infini*（Paris: Gallimard, 1969），pp. 556 – 567. 关于“我不幸”和“他不幸”，或“我死”和“有人死”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差别，见 La part du feu（Paris: Gallimard, 1949），pp. 29 – 30, and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trans. Ann Smock（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pp. 90, 122, 126. 勃朗肖表明，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不定式与“庸俗的日常生活”无关，与其相关的则是人称代词。

② 第一句引自尼采，第二句引自卡夫卡。更多的引用见本书第 12 章：“1227: Treatise on Nomadology,” p. 353. ——英译注。

③ 比如，François Cheng, *Chinese Poetic Writing*, tranns. Donald A. Riggs and Jerome P. Seaton（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他分析了他所说的“被动程序，” pp. 23 – 42.

种把平面概念化的方式。平面可能是一个隐蔽原则，使所见成为可见的，所听成为可听到的，等等，它在每一个瞬间都使给予的被给予，成为这种或那种状态，这个或那个时刻。但平面本身却不是给予的。它在性质上是隐蔽的。它只能从它所生成的东西中（同时或连续地、共时或历时地）推导、演绎、判断出来。这种平面既是组织的规划（平面）又是发展的规划（平面）：是结构的或生成的，而且同时既是结构又是生成，有形组织及其发展的规划（平面），和进化发展及其组织的生成规划（平面）。这些只是平面的第一个概念的微妙意义。过分重视这些微妙意义会妨碍我们掌握更重要的东西；如此构想或构成的平面总是关系到形式的发展和主体的构成。一个隐蔽结构是形式所必需的；一个秘密能指是主体所必需的。由此看来，平面本身将不是给定的。它只存在于补充的维度，即补充它所生成的东西（n + 1）。这使其成了一个目的规划（平面），一个设计，一个精神原则。它是一个超验规划（平面）。它是一个类比规划（平面），要么因为它指定了一次发展的显著条件，要么由于它确立了一个结构的比例关系。它可能存在于神的精神中，或存在于生命的、灵魂的或语言的无意识之中：它总是从自己的结果中推导出来的。它总是推导出来的。即便据说它是内在的，那也仅仅由于它在类比意义上（隐喻或换喻意义上）缺场的缘故。树是种子给予的，但却不是作为一个规划（平面）的功能而给予的。这也适用于音乐。发展或组织原则并非自行出现，与所发展或所组织的东西并不直接相关：一个超验的构成原则并不属于声音的性质，并非自行或自为地“有声”。这打开了所有可能的阐释途径。形式及其发展，主体及其形成，都与一个作为超验统一或隐蔽原则而运作的规划（平面）有关。这个规划（平面）总可以描写为被撇开的部分，并未给予它所生成的东西。巴尔扎克，甚至普鲁斯特，不都是这

样描述其作品的组织或发展规划（平面）的吗？仿佛那是一种元语言一样。斯托克豪森不也因为不能把其声音形式的结构变成“可听的，”而决意将其说成是与形式相并存的吗？生命规划（平面），音乐规划（平面），写作规划（平面），所有这一切都是相同的：一个规划（平面）是不能这样给定的，而只能从它所发展的形式和它所形成的主体中推导出来，因为它正是为这些形式和这些主体而存在的。

于是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平面，或全然不同的平面概念。在此，不再有任何形式或形式的发展了；也不再有主体或主体的形成了。不再有结构，也不再有生成了。有的只是无形因素之间、或至少是相对无形的因素之间、各种分子和粒子的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速度和迟缓。有的只是构成了集体组合的个体性、影响、无主体的个体化。没有发展，但事情迟早总要发生，根据它们的速度合成而构成这种或那种组合。没有主体化，但个体性根据非主体化的力量或影响而构成。我们称这个只知道经度和纬度、速度和个体性的平面为黏性或合成平面（以对立于组织或发展的规划［平面］）。这必然是一个内在性和单义性的平面。因此，我们称其为自然的平面，尽管自然与它毫无关系，因为在这个平面上，在自然与人工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不管它有多少维度，它都没有为它所生产的东西的补充维度。只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成为自然的和内在的了。矛盾原则也同样：这个平面也可称作非矛盾平面。黏性平面可以称作非黏性平面。这是一个几何平面，不再与精神设计而与抽象设计有关。其维度的数量随着所发生的事情的发生而不断增长，但即便如此，它仍不失其任何平面性。因此，它是一个多产、居群和传染的平面；但物质的这种多产与进化毫无关系，与形式的发展或形式的遗传毫无关系。它更不是回归到某项原则的倒退。相反，它是一种内包结构，其中，形式常常被分

解，解放了时间和速度。它是一个固定的平面，一个固定的声音平面，或视觉平面，或写作平面，等等。这里，固定并不意味着不动：它是绝对的静止状态，也是绝对的运动状态，由此产生一切相对的速度，除了速度和迟缓没有别的。有些现代音乐家把据说主导了整个西方古典音乐的超验的组织规划（平面）与内在声音平面对立起来，后者总是伴随着它所生成的东西，把不可见的变为可见，在一种分子重叠中只携带着区别性速度：艺术品必须标志秒，秒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速度。[①] 甚或说这是解放时间的问题，永存的问题，一种漂浮音乐的非脉冲时间，如布莱兹所说，是一种电子音乐，其中，形式被纯粹的速度变化取代了。毫无疑问，约翰·凯奇第一个而且最完美地利用了这种固定的声音平面，证实了抵制一切结构和生成的一个过程，抵制脉冲时间或速度的一个漂浮时间，抵制各种阐释的实验，其中，沉默是洪亮的静止，同时也是绝对的运动状态。这也可用来形容固定的视觉平面：戈达尔就有效地把电影的固定平面发展到这种状态，使形式溶解，而存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合成运动之间速度的微小变体。纳塔利·萨劳特则在两个书写平面之间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一个是超验平面，用来组织和发展平面（体裁，主题，思想），并分配和发展主体（角色，人物，感情）；另一个是全然不同的平面，用来解放一个未名物质的粒子，让这些粒子通过形式和主体的“包裹”交流，只在他们中间保留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速度和迟缓和漂浮的影响，这样，在平面本身被观照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不可

---

① 见关于“重复的”美国音乐家，尤其是 Steve Reich and Philip Glass.

见的东西（微平面，分子平面）。[①] 所以，从合理抽象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使两个平面，关于平面的两种观念，看起来像是针锋相对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看到下面两个命题之间的差别：（1）形式的发展和主体的形成都是一个只能推导的规划（平面）的结果（组织—发展的规划［平面］）；（2）在无形的因素之间只有速度和迟缓，在非主体化的力量之间只有影响，这是一个平面在生成（黏性或合成平面）的同时必然发挥的功能。[②]

我们且来考虑一下 19 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三个例子：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首先，荷尔德林的超凡之作《许佩里翁》，如罗伯特·罗维尼所分析的，突出了季节型个体性的重要性。这些个体性以两种不同方式构成了“叙事的框架”（规划［平面］），以及在这个框架内发生的细节（组合和相互组合）。[③] 他还注意到季节的连续和同一个季节在不同年月的重叠消解了形式和人，产生了运动、速度、延搁和影响，仿佛随着叙事的进展，某些东西在逃离一种触摸不到的物质。也许还有与现实政治、与战争机器、与不和谐的音乐机器的关系。

克莱斯特：在作品如在生活中一样，他的一切都变成了速度和迟缓。连续的紧张僵化和极端的速度、令人昏厥的魔咒和

---

① Nathalie Sarraute, in *The Age of Suspicion*, trans. Marrie Jolas (New York: Braziller, 1963). 书中表明普鲁斯特是如何在两个平面之间被分裂的：他从人物中抽取“无形物质的微小粒子，”但也把这些粒子重新粘贴，构成一个连贯的形式，把它们放入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包裹之中。见 pp. 50, 94 – 95。

② 见阿尔托作品中这两个平面之间的区别。其中一个被作为一切幻觉的根源而被抛弃：*The Peyote Dance* (translation of *Les Tarahumaras*), trans. Helen Weav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6), pp. 12 – 13.

③ Robert Rovini, introduction to Friedrich Hölderlin, *Hypérion* (Paris: 10/12, 1968).

飞翔的箭。在战马背上睡觉，然后奔驰而去。从一个组合跳向另一个组合，在昏迷状态中跨越虚空。克莱斯特繁殖“生命的规划（平面），”但他的虚空和失败，他的跳跃、地震和黑死病总是包括在单一的平面上。这个平面不是组织原则，而是运输工具。未发展任何形式，未构成任何主体；影响被错置了，生成物迅速跃出，结合成区域，如阿喀琉斯的生成妇女和彭忒西勒亚的生成狗一样。克莱斯特精辟地解释了形式和人何以是引力中心在抽象路线上的错置、并借助这些路线在内在平面上的接合而产生的惟一现象。他迷上了熊。熊是无法愚弄的，因为它们那对残酷的小眼睛能看透表面，接触真正的“运动之魂，”气质或非主观的影响：克莱斯特的生成熊。甚至死亡也只能被概念化为对不同速度的基本反应的交叉。一颗爆炸的头骨，这是克莱斯特所执迷的东西之一。克莱斯特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与国家相对立的战争机器，与绘画或“图画”相对立的音乐机器。奇怪的是，歌德和黑格尔竟然痛恨这种新的写作。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规划（平面）应该是形式不可分解的和谐发展，是主体、角色和人物的规范形成（伤感的教育，人物在内部和本质的坚实性，发展形式和连续的和谐和类比，国家崇拜，等等）。他们的平面概念与克莱斯特的平面概念针锋相对。克莱斯特的以及荷尔德林的反歌德主义，反黑格尔主义。歌德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谴责克莱斯特同时确立了纯粹“静止不动的过程，”那就像一个固定平面，引入虚空和跳跃，阻止核心人物的发展，调动影响的暴力以引起极端的情感混乱。①

尼采以其他方式完成了相同的工作。不再有任何形式的发展或主体的构成了。他批判瓦格纳保留了太多的和谐形式，太

---

① 我们援引的是 Mathieu Carrière 未发表的克莱斯特研究。

多的说教角色或“人物”：太多的黑格尔和歌德。另一方面是比才，尼采说。……在我们看来片段的写作在尼采著作中并不非常重要。而重要的是速度和迟缓：不是慢写或快写，而是书写，无论还有其他什么意思，书写都是粒子间速度和迟缓的产物。任何形式都不能抵制它，任何人物或主体都不能活过它。查拉图斯特拉不过是速度和迟缓，而永久回归，永久回归的生命，是非脉冲时间的第一次具体的大解放。《看哪，这人》只是借助个体性达到的个体化。显然，如此构想的那个规划（平面）总是要失败的，但失败本身就是那个规划（平面）的必要组成部分：看一看为《权力意志》制定的众多计划吧。对某一特定的格言，总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引进元素之间新的速度和迟缓关系，使其真正改变组合，从一个组合跳到另一个组合（因此，主要问题不是片段）。如凯奇所说，失败是规划（平面）的本质。① 这恰恰因为它不是组织、发展或构成的规划（平面），而是非自觉的变形。或如布莱兹所说：“给机器编序，这样，每当它播放一个磁带时，就能生产不同的时间特性。”所以，规划（平面）——生命规划（平面），书写规划（平面），音乐规划（平面）——必然要失败，因为不可能对它矢志不渝；但失败就是规划（平面）的组成部分，因为规划（平面）要么扩大，要么减少，这要依它在每种情况下利用的维度而定（n 维度的平面性）。一台奇怪的机器，同时是战争机器，音乐机器，又是传染—生产—内包结构的机器。

---

① “你的第二部书的题目《从星期一开始的一年》从何而来?”“来自一伙朋友和我制定的一个计划，即从星期一开始计算到一年时，我们再来墨西哥会面。我们在一个星期六聚齐。我们没有实现那项计划。那是一种沉默形式。……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未能会面，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失败了。计划并不是失败。” John Cage and Daniel Charles, *For the Birds* (Boston: Marion Boyers, 1981), pp. 116 - 117.

两种平面之间的对立何以导致更抽象的假设？因为人们不断地从一个走向另一个，既没有注意到转变的程度，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自身，或只是在事后才发现的。因为人们不断地把一个平面建筑在另一个平面之上，或把一个从另一个中抽取出来。比如，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沉没漂浮的内在平面，把它埋在自然的深处，而不是让它自由地作用于表面，过渡到另一面，承担基础的角色，从组织的角度看不过是类比的原则，而从发展角度看则不过是连续的法则。① 组织或发展的平面有效地掩盖了我们所说的分层：形式和主体，器官和功能，乃是“地层”或地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黏性或内在平面意味着用最人工的手段对自然的一切层面进行分解。黏性平面是无器官的身体。粒子之间速度与迟缓的纯粹关系意味着解域运动，正如纯粹的影响意味着解主体性一样。此外，黏性平面并非先存于拆解这个平面的解域运动，也不先存于吸引它、使它上升到表面的逃亡路线，以及构成它的生成物。组织的平面不停地作用于黏性平面，总是试图堵塞逃亡路线，阻止或干扰解域运动，压制这些运动，重新给它们分层，在一个深维度上重构形式和主体。相反，黏性平面总是自行脱离组织平面，使粒子离开地层，通过速度或迟缓仓促地拼凑形式，通过组合或微组合打破功能。但是，这需要极大的警惕性才能防止黏性平面变成纯粹的废除或死亡平面，防止内包结构倒退到未加区别的状态。难道没有必要保留最小限度的分层，最小限度的形式和

---

① 所以我们才把歌德作为超验平面的例子。然而，歌德被当成了斯宾诺莎主义者；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研究揭示了一个内在的合成平面，这把他与杰奥弗里·圣－希莱尔联系起来了（而且常常有人指出这种相象性）。然而，歌德保留了形式发展和主体的构成教育这一双重思想；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内在平面已经跨越了另一面，到达了另一个极端。

功能，最小限度的主体，以抽取物质、影响和组合吗？

事实上，我们应该在两个平面之间建立的对立是两个抽象极之间的对立：比如，我们把基于声音形式及其发展的西方音乐的超验组织平面与由速度和迟缓、运动和静止构成的东方音乐的黏性内在平面对立起来了。与我们的具体假设相一致的是，西方音乐的全部生成，所有音乐生成物，意味着最小限度的声音形式，甚至最小限度的旋律和和谐功能；速度和迟缓是用来超越这些形式和功能的，而恰恰是速度和迟缓把形式和功能减少到了最小限度的。贝多芬以三或四个音符的相对贫乏的主题创造了最惊人的丰富的多声部。与形式分解（内包结构）携手并进的是一种物质的多产，但同时又伴随着连续的形式发展。舒曼的天才也许最惊人地说明了形式只是为了人们在物质上和感情上赋予它的速度和迟缓关系而发展的。音乐总是把形式和思想屈从于时间的改造、增加或减少、减速或加速，而这不仅仅是根据组织甚或发展的规律发生的。扩展和收缩微间隔时间在语码间隔内发生作用。瓦格纳和后瓦格纳音乐家在更大的程度上解放了声音粒子之间的速度变体。拉威尔和德彪西保留了足够的形式仅仅是为了打破它，影响它，通过速度和迟缓改变它。波列罗舞曲是一个经典例子：它近乎一种讽刺漫画，一种机器组装，保留了最小限度的形式，只是为了使其达到爆破的极点。布莱兹曾谈到小思想的多产，在运动和影响上发生作用的小音符的积累，通过附加速度指标来扫除一种简单的形式；这使人能依据内在简单的形式关系生产极其复杂的能动关系。肖邦的自由速度叠歌是不能再生产的，因为它在每一次演

奏时都具有不同的时间特点。① 这就仿佛一个由各种速度构成的巨大的黏性平面在永远扫除形式和功能、形式和主体，从它们身上抽取粒子和影响。保留着各式各样时间的一口时钟。

什么是一个姑娘？什么是一伙姑娘？普鲁斯特至少向我们一劳永逸地表明了她们的个性，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别的，都不是通过主体性而是通过个体性形成的，而且是纯粹的个体性。“逃亡者。”她们是速度和迟缓的纯粹关系，而不是别的。一个姑娘由于速度的关系迟到了：就等待她的人的相对时间而言，她做了太多的事情，跨越了太多的空间。因此，她的明显迟缓被改造成了我们等待时的飞快速度。在这方面，而且在整个《追忆逝水年华》中，斯万根本没有完全占据叙述者的位置。斯万不是粗糙的素描画家或叙述者的先驱，除非在次要的、极少的时刻。这些时刻根本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斯万始终是根据主体、形式、主体之间的相象性和形式之间的对应性来思想和感觉的。对他来说，奥黛特的一个谎言是一个形式，必须发现它秘密的主观内容，从而激起了业余爱好者的侦探活动。在他眼里，文特依的音乐是一种形式，它能使人想起别的什么，回忆起其他事物，与其他形式相呼应，无论是绘画、面孔或景色。尽管叙述者可能步斯万的后尘，但他仍然是一个不同的因素，处于一个不同的平面上。阿尔贝丁的谎言几乎是空洞乏义的；但反过来却易于与爱人眼里发射出来的粒子相融

---

① 关于所有这些（多产—分解，积累，速度指标，影响和能动作用），见 Pierre Boulez, *Conversations with Célestin Deliège*, pp. 21 – 22, 68 – 71. 在另一个文本中，布莱兹强调了瓦格纳鲜为人知的一个方面：不仅次要主题摆脱了与场面人物的从属关系，而且，发展的速度也摆脱了形式语码或“时间”的束缚（“Le temps re – cherché,” in *Das Rheingold Programmheft*, vol. I [Bayreuth, 1976], pp. 3 – 11）。布莱兹仰慕普鲁斯特，因为他是第一个理解瓦格纳式主题的这种漂浮性和可改造性的人。

合，这个粒子只为自身而存在，在叙述者的视听领域里转瞬即逝。这种分子速度是难以承受的，因为它表明一段距离，一种临近性，阿尔贝丁可能会在那里，而且已经在那里了。[①] 所以，叙述者的姿态主要不是侦探的调查姿态，而是（非常不同的一个人）囚犯的姿态。他怎样才能控制住速度，怎样才能在精神上（头痛）、在视觉上（一闪）承受得了呢？他何以为阿尔贝丁建造了一所监狱呢？斯万和叙述者的嫉妒也是不同的，正如他们对音乐的认识也不同：人们不再根据形式和可比较的主题来理解文特依的音乐了，因此，他逐渐变成了不可思议的速度和迟缓，它们在一个变化的黏性平面上、在音乐和回忆的平面上结合（正如瓦格纳的主题抛弃了一切固定形式和一切人格分配一样）。斯万拼命地要把事物的流动重新分域（奥黛特与一个秘密，绘画与一副面孔，音乐与布瓦·德·布罗尼），但他的努力却被加速的解域运动所取代，一台线性急速行驶的抽象机器，清除了一切面孔和景色，接着又清除了爱、嫉妒、绘画和音乐本身。而越来越强烈的协同因素则冒着消解一切和死亡的危险促进了这项工作。尽管取得了部分胜利，但叙述者却未能实现计划；那项计划根本不是要重获时间，或压制记忆，而是要控制速度，使之迎合他的哮喘的节奏。他所面对的是灭绝。但也可能有另一种结果，或者说是普鲁斯特使之成为可能的结果。

---

① 速度与迟缓的主题在 *The Captive* 中得到最广泛的展开："要理解它们所唤起的情感，而其他甚至更好看的人却没有唤起的情感，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运动的，给它们的人附加了一个符号，与物理学中表示速度的符号相对应……对这样的存在，这样的逃亡者来说，它们自己的本性和我们的焦虑维系在一起了。" vol. 3,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trans. C. K. Moncrieff, Terence Kilmartin, and Andreas may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pp. 86 – 87, 88.

一个分子的回忆。生成动物只是许多生成之一。可以为我们在自身发现的生成环节确立一个秩序或明显的进步；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植物或矿物；生成各种分子，生成粒子。纤维引领我们从一种生成走向另一种，当它们跨越临界、从门走过的时候把一种改造成另一种。唱歌或作曲，绘画，写作，都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要释放这些生成。尤其是音乐；音乐贯穿着生成女人，生成儿童，而且不仅仅在主题和思想的层面上：一小段叠歌，儿童游戏和舞蹈，儿童场面。乐器与配器充斥着生成动物，但在许多生成中，尤其重要的是生成鸟。分子拖长的不和谐音始终在场，即便随着正当音乐内容的价值的提高，乐器与其他因素的发展仍然极大地重视这些不和谐音：声音分子、粒子之间速度与迟缓的关系。生成动物一下子变成了生成分子。这提出了各种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从结尾开始：所有生成都已经是分子了。这是因为生成并不是要模仿或与某事或某人认同。生成也不是比例的形式关系。这两个类比都不能用于生成：不是对主体的模仿，也不是一个形式的比例。从所拥有的形式、所是的主体、所拥有的器官或所能履行的功能开始，生成就是要在所确定的粒子之间抽取运动与静止、速度与迟缓的关系，这最接近人所生成的东西和人借以生成的手段。这就是说，生成是欲望的过程。这个临近性或近似性原则是完全特殊的，并不引出什么类比。它尽可能充分地表明一个粒子的临近带① 或共同在场（zone of proximity or copresence），路易·沃尔夫森开创了一种奇怪的研究：一个精神分裂病患者，他把母语中的每一个句子尽可能快地译成声音和意思相似的陌生词；一个神经性

---

① 译自法文 voisinage，德勒兹和瓜塔里借自固定的理论。英语中的准确对应词是 neighborhood。——英译注。

厌食症患者，他匆忙跑向冰箱，撕开包装，拿出里面可吃的东西，尽可能快地塞满了嘴巴。[①] 要认为他需要借用外语的“伪装词”那就错了。相反，他从自己的语言中抓过不再属于那种语言形式的言语粒子，正如他从事物中抓过不再是构成营养物质的补充粒子一样。这两种粒子进入了一个临近带。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生成就是放射粒子，这些粒子构成某些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因为它们进入了一个特定的临近带。或者说，它将放射出进入那个临近带的粒子，因为这些粒子构成了那些关系。一个个体性是与取决于一个分子带的大雾和薄雾分不开的，一个微粒子空间。临近性是一个概念，既表示结构又表示量，标志着对同一个分子的从属，独立于所论的主体和所确定的形式。

舍雷尔和霍根海姆在重新思考狼孩的问题时提出了这一重要观点。当然，这不是真正的生产问题，仿佛那孩子“真的”成了一个动物；也不是相象性问题，仿佛那个孩子模仿实际养育了他的那些动物；更不是象征性隐喻的问题，仿佛那个被抛弃的或走失的孤僻的孩子仅仅变成了动物的“类比”一样。舍雷尔和霍根海姆正确地指出这种推理是错误的，是基于宣扬人类秩序不可简约的一种文化主义或道德主义：由于那个孩子没有变成动物，那他就只能与动物有某种隐喻的关系，这可以从孩子的疾病或厌世中推导出来。他们自己则诉诸于不定性或不确定性的客观地带，“共享的或不可辨别的东西，”“不可能阐明人类与动物之间界限的”一种临近性，这不仅见于孤僻的儿童中，而且见于所有的儿童。这就仿佛儿童独立于把他们导向成年的那种进化，在他们身上有其他生成、“其他同时的可能

① Louis Wolfson, *Le schizo et les langues*, preface by Gilles Deleuze (Paris: Gallimard, 1970).

性”的余地，这些其他生成和可能性并不是倒退，而是创造性的内包结构，目睹了“儿童的身体所直接体验到的一种非人性，”在“程序化身体之外”的非自然结合。人有一种生成动物的现实，尽管人实际上并未成为动物。因此，认为狗孩只是在形式构造的限度内扮演狗，而与另一个人想要做到但实际并不能做到的“狗行为”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见解毫无意义。所需要解释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儿童，甚至许多成年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生成动物，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动物达成一种非人性的默契，而非构成一个俄狄浦斯式的象征性群体。[①] 也不应该认为食草、吃脏物或食生肉的儿童仅仅是为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维生素或矿物质。这是构造一个动物身体的问题，一个由强度或临近带所界定的无器官身体。那么，舍雷尔和霍根海姆所说的这种客观的不确定性或不可辨别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比如：不要模仿狗，而要使你的微生物进入与别的东西的一种合成，致使从这个合成物中放射出来的粒子构成狗的运动和静止关系，或这些粒子所进入的分子临近关系。显然，这个别的东西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与所论的动物有或多或少的直接关系：它可以是这个动物的自然食物（脏物或蠕虫），或与其他动物的外在关系（你可以与猫生成狗，与马生成猴），或让动物屈服的器官或假体（口套或驯鹿），或甚至与所论动物不具有固定关系的东西。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我们已经看到斯莱皮安是如何通过用口套把鞋系在手上而试图生成狗的。菲力普

---

① René Schérer and Guy Hocquengham, *Co – ire*, *Recherche*, no. 22 (1976), pp. 76 – 82：见他们对 Bettelheim 的批判，后者认为儿童的生成动物仅仅是孤独癖的象征主义，表现的是父母的焦虑，而不是儿童的现实。见 Bruno Bettelheim, *The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加威举洛利托的行为为例：洛利托吃瓶子、陶器、瓷器、铁、甚至自行车，他宣布："我认为自己是半人—半动物。具有更多的动物性。我喜欢动物，尤其喜欢狗，我感到与狗息息相关。我的牙齿已成为狗的牙齿；实际上，当我不吃玻璃或铁时，我的下巴就会疼痛，就像一条小狗想要咬骨头一样。"① 如果我们把"像"这个字解释成一个隐喻，或指一种结构的类比关系（人—铁＝狗—骨头），我们就没有理解生成。"像"和许多词一样，当用于个体性时，当用来表现生成而不是所指状态或指意关系时，它的意义和功能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条狗可以用铁锻炼下颌，但此时它是把下颌用作一个克分子器官。当洛利托吃铁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使下颌进入与铁的合成之中，以至于他本人成了一条分子狗的下颌。演员罗伯特·德·尼罗在一个电视剧中"像"蟹一样走路；但他说这不是模仿蟹；而是把与蟹相关的东西与蟹的形象合成起来，与那个形象的速度合成起来。② 这一点对我们至关重要：不管用什么手段或元素，只要你放射微粒子，使其进入动物粒子的运动和静止关系，或相当于放射微粒子的进入动物分子临近带的东西，你就在生成动物。你只能分子地生成动物。你不会成为嗥叫的克分子狗，但通过嗥叫，即便不是以充溢的情感，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和构造，你也在放射一条分子狗。人并不成为狼或吸血鬼，仿佛改变了克分子的类一样；吸血鬼和人狼是人的生成，

---

① Philippe Gavi, "Les philosophes du fantastique," *Libération*, March 31, 1977. 从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必须得出的是对某种神经官能症行为的一种理解，这种行为是生成动物，而不是把生成动物贬降为对行为的一种精神分析阐释。我们看到这与受虐狂的关系（洛利托解释说，他的吃癖产生于某些受虐经历；Christian Maurel的一个优秀文本把生成猴与生成马结合起来，是两个极好的受虐例子。厌食症也可以从生成动物的角度来理解。

② 见 *Newsweek*, May 16, 1977, p. 57.

换言之，是合成中分子间的临近性，是放射出来的粒子之间运动与静止、速度与迟缓的关系。当然，人狼和吸血鬼都存在，我们对此毫不怀疑；但我们不希望与这种动物具有相象性或类比性，因为这是行动中的生成动物，是分子动物的生产（而“真正的”动物却落入了克分子和主体性的捕网）。如同霍夫曼斯塔尔的老鼠一样，恰恰在我们内部，动物露出了牙齿，花朵绽开了花瓣；但这是通过微粒子放射、通过分子临近性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模仿某个主体或形式的比例性完成的。阿尔贝丁可以永远模仿花，但恰恰是在她睡觉的时候，当她进入与睡觉的粒子的合成之中时，她的美才能展示出来，她皮肤的质地才能进入静止与运动的关系，把她引入分子植物的地带：阿尔贝丁的生成植物。而且，正是在她成为囚徒的时候，她才能放射出鸟的粒子。正是在她逃跑的时候，在她打开一条逃亡路线时，她才生成马，即便那是死亡之马。

是的，一切生成都是分子：人所生成的动物、花朵或石头都是分子集体，个体性，不是克分子主体、客体或我们从外部所认识、通过经验、科学或习惯所认识的形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必须说具有人性的事物也同样如此：有生成女人，生成孩子，但并不相象于作为清楚独特的克分子实体的女人和孩子（尽管让女人或孩子占据与这些生成物相关的特权位置是可能的——仅仅可能而已）。比如，我们所说的克分子实体是由她的形式所界定的女人，被赋予了器官和功能、并被指定为主体的女人。生成女人并不是模仿这个实体，甚或把自身改造成这个实体。然而，我们不可忽视一些男同性恋者之间模仿的重要性，或模仿的时刻，但与一些易装癖的真正改造比起来，还不那么显眼。我们所说的是，生成女人的这些无法沟通的方面首先必须看作是其他事物的功能：不是模仿或呈现女性形式，而是放射出进入微观女性的运动和静止关系或临近带的

粒子。换言之，生成女人是指在我们内部生产一个分子女人，创造一个分子女人。我们并不是要说这种创造是男人的特权，恰恰相反，作为克分子实体的女人必须生成女人，这样，男人也生成或也能够生成女人。当然，女人不可避免地要实施一种克分子政治，以期夺回自己的微生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主体性："我们女人……"成了表述的主题。但是，仅限于这样一个主题是危险的，这个主题如果不吸干源泉或不停止流动就不能发挥作用。生命之歌往往是由最干涸的女人吟唱，以其愤懑、权力意志和冷酷的哺育打动人的。正如一个感情枯竭的孩子可能会成为更好的孩子一样，他那里已不再流动着童年的河水。现已没有充分的理由说一种性别包含着另一种性别，本身必定向对方发展。作为概念，双性已与两性的分离没有什么区别了。微缩和内化这个二元机器是令人遗憾的，同时也使它更加糟糕。这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它。因此，有必要构思一种分子女人的政治，进入克分子的对峙，赢得这些对峙。

当有人特别就妇女写作向弗吉尼亚·伍尔芙提出问题时，她对"作为女人的"写作这种想法非常惊奇。写作应该产生一个作为女性原子的生成女人，能够跨越和注入整个社会领域，污染男人，并在那种生成中把男人清扫出去。非常柔软的粒子——但也非常坚硬，顽固，不可简约，不可战胜。英国小说界女人的兴起不放过任何男人：甚至像劳伦斯和米勒这样最有男性气概、最有阳刚之气的作家，他们不断地喷出和放射进入女人的临近区或不可辨别地带的粒子。在写作中，他们生成女人。问题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微生物、历史或在伟大的二元机器中把男性与女性对立起来的表述主体。根本的问题是身体——为了构造可对抗的微生物而从我们身上偷去的身体。这个身体首先是从女孩那里偷去的：不要再那样做了，你已经不是小姑娘了，你已经不是假小子了，等等。为了给女孩强加一个

历史或前历史，首先偷走了女孩的生成。然后是男孩的生成，但却是以女孩为例，把女孩作为他欲望的对象，因此也为他构造了一个对抗的微生物，一个主导的历史。女孩是第一个受害者，但她也必须起到样板和陷阱的作用。反过来说，这也就是作为无器官身体的身体、作为身体的一个微生物的重建何以与生成女人或分子女人的生产不可分割的原因。毫无疑问，在克分子或有机的意义上，女孩成了女人。但反过来，生成女人或分子女人也就是女孩本身。女孩当然不是由其贞洁界定的；她是由运动和静止、速度和迟缓的关系界定的，由原子的结合和粒子的放射界定的：也就是个体性。她从未停止在无器官的身体上徘徊。她是一条抽象路线，或一条逃亡路线。因此，女孩子们不属于年龄组合、性别、秩序或王国：她们渗透于各处，在秩序、行为、年龄和性别之间；在与径直跨越的二元机器的关系上，她们在逃亡路线上生产 n 分子的性别。走出二元关系的惟一办法是介于中间，在中间穿过，幕间表演——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其全部作品中倾注全力从未停止生成的就是这种幕间表演。女孩就好比生成区域，与每一个可能的对立项，男人，女人，儿童，成人保持着同时性关系。生成女人的并不是女孩；而是生成女人生产了宇宙女孩。特罗斯特是一个秘密作家，描画了女孩的形象，并将其与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她的速度，她自由的机器身体，她的强度，她的抽象路线或逃亡路线，她的分子生产，她对记忆的冷淡，她的直白性格——“不加任何掩饰的欲望。”① 圣女贞德吗？女孩在俄国恐怖主义中起到的特殊作用：携带炸弹的女孩，炸药的守护者吗？当然，

---

① 见 Trost, Visible et invisible (Paris: Arcanes) and *Librement mécanique* (Paris: Minotaure)：“如同一个尚未到来的人类组合的投射，她既生活在感性现实中，同时又生活在延长路线的理想之中。”

分子政治经由女孩和孩子发生作用。但同样确定无疑的是，女孩和孩子既不是从压制他们的克分子地位获得力量，也不是从他们所接收的微生物或主体性获得力量的；而从他们使之通行于性别和年龄之间的生成分子中，从儿童以及成人的生成孩子中，从女人以及男人的生成女人中。女孩和孩子并不生成；而生成本身就是孩子或女孩。孩子并不生成成人就如同女孩并不生成女人一样。女孩是每一种性别的生成女人，正如孩子是每一个年龄的生成青年一样。懂得如何变老并不意味着保持青春；而意味着从年龄中抽取粒子，速度和迟缓，流动和 n 性别，正是这些构成了那种性欲的女孩。一个生成孩子正是年龄本身，正如性欲，任何性欲，就是生成女人，就是女孩一样。这回答了那个愚蠢的问题：普鲁斯特何以把阿尔伯特变成了阿尔贝丁？

尽管所有生成都已经是分子，包括生成女人，但必须说明的是，所有生成都从生成女人开始，并经过生成女人的阶段。这是所有其他生成的关键。当参战的男人伪装成女人，伪装成女孩逃跑，作为女孩而隐藏起来时，这不是他生活中使他蒙羞的过渡性事件。隐藏，掩盖，是军人的一个功能，而逃亡路线吸引着敌人，穿过某物，并将其置于逃亡路线上。军人就在逃亡路线的无限界中诞生。尽管参战的男人具有女性气质并不是偶然的，但不应该认为这是结构的，或经过对应关系的调整的。很难看到“男人—战争”和“女人—婚姻”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对应是如何把军人与拒绝结婚的女人等同起来的。[①] 同样难以看到的是，军人社团中普遍的双性恋、甚或同性恋是何以说明这个现象的，它既不是结构的，也不是模仿的，而代表着

① 见 Jean – Pierre Vernant 建议的结构说明，*Problè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pp. 15 – 16.

男战士的重要异类。这个现象只能依据生成来理解。我们已经看到，男战士由于其愤怒和速度而在不可抗拒的生成动物中被清扫。这些生成把军人的生成女人，或他与女孩的联合，他与女孩的传染，作为其必要条件。男战士是与亚马逊人分不开的。女孩与男战士的结合并不生产动物，而是同时生产前者的生成动物和后者的生成女人，在同一个“区域”内，军人通过女孩的传染而生成动物，同时，女孩通过动物的传染而生成军人。在生成的非对称区域内，一切都纠缠在一起，于瞬间形成的一条之字型路。正是在双重战争机器的轨道上——很快就被国家所取代的希腊人的战争，和很快就消解了的亚马逊人的战争——阿喀琉斯和彭忒希勒亚，最后一位男战士和女孩中的最后一位王后，才选择了对方，阿喀琉斯成了生成女人，彭忒希勒亚成了生成狗。

原始社会中男人生成女人的易装癖仪式或女性人格化是不能用社会组织来解释的，社会组织把特定关系对应起来；也不能用心理组织来解释，心理组织使女人产生成为男人的欲望，正如它也使男人产生成为女人的欲望一样。① 社会结构和心理认同丢下了许多社会因素未予说明：由易装癖引发的各种生成的联系、释放和交流；作为结果的生成动物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这些生成对一种特殊战争机器的参与。这也适用于性欲：关于性别的二元组织说明不了性欲，正如单性内部的双性组织同样不能说明性欲一样。性欲导致了多种多样的婚姻生成；这就像 n 性别一样，是爱所穿越的整个战争机器。这并不

---

① 关于原始社会中的易装癖，见 Bruno Bettelheim（他提出了一种认同心理阐释），*Symbolic Wounds*（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4），尤其是 Gregory Bateson（他提出一种原创的结构阐释），*Naven: A Survey of the Problems Suggested by a Composit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s*, 2ed ed.（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是回归那些惊人的隐喻，如爱情与战争，引诱与征服，两性之战和家庭口角，甚或斯特林堡的战争：只有在爱情结束、性欲枯竭之后，这种情况才能发生。重要的是，爱本身就是一台战争机器，具有奇怪而有些可怕的力量。性欲是上千种性别的生产，那么多不可控制的生成物。性欲是通过男人的生成女人和人的生成动物实施的：粒子的放射。这当中不需要兽性化，尽管它可能出现，而许多精神分析的文献记载了有关这方面的趣闻逸事，尽管过分简化，往往离题，太具兽性。这不是“扮演”狗的问题，如明信片上的年迈绅士；更不是与动物做爱的问题。生成动物从根本上说是另一种权力，因为它们的现实并不在于人所模仿的动物或与人相对应的动物，而在于它们自身，在于顷刻间把我们清扫、使我们生成的东西——临近性，不可分辨性，它比任何驯化、利用或模仿都更有效地从动物中抽取一个共有因素：“野兽。”

生成女人是第一个量子，或分子裂片，继而是与它密切相关的生成动物，那么，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生成不可感知之物。不可感知是生成的内在目的，是其普遍公式。比如，马西森的《萎缩的人》经过自然的诸王国，滑动于分子之间，最后成了对无限界的无限沉思中的一个无法界定的粒子。保尔·莫兰的《蔡罗先生》首先逃离较大的国度，跨越最小的国度，从国家的阶梯上走下来，在利切滕斯坦建立了一个无名社会，他是这个社会的惟一成员，死时无人知晓，用他的手指构成了0粒子：“我是在水下游泳的逃亡者，全世界的步枪都向他开火……我决不能再作靶子了。”但生成不可感知是什么意思？在所有分子生成结束时到来，而这些分子生成又是生成女人的开始。生成不可感知有许多意思。那么，在（非有机的）不可感知、（非指意的）不可辨别和（非主体的）个人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回答是：像别人那样。这就是吉尔凿郭尔在关于“信仰骑士”的故事中所讲的那种生成的人：看着他，你所能发现的只是一个资产阶级，仅此而已。那就是菲茨杰拉德的生存方式：在一次真正的破裂之后，你成功地……像别人一样。不被感知决不是件易事。成为陌生人，甚至对你的看门人或邻居。如果“像”别人一样如此困难，那是因为这是生成的事。不是说让每一人都成为每一人（和每一物），创造每人/每物的生成。这要求禁欲，要求清醒，要求创造性的内包结构：英语的典雅，英语的构架，与许多堵墙混合起来，清除了被过分感知的东西，将被过分感知的东西。“清除所有那些垃圾、死亡和过剩的东西，”抱怨和悲伤，未得满足的欲望、辩护或请求，万物把我们每一个人根植于我们自身，根植于我们的道德之中。因为每人/每物都是克分子集合体，但生成每人/每物却是另一回事，是让宇宙与其分子元素发生作用。生成每人/每物就是创造世界，创造一个世界。通过清除的过程，你就不再仅仅是一条抽象路线了，或本身就是抽象的谜的一部分。正是通过结合，通过与其他路线、其他部分的连续，你才创造了覆盖在第一个世界之上的一个世界，它就像是一幅透明画。动物的优美，带保护色的鱼，秘密的种类：这种鱼身上布满了交叉的抽象线条，不象征什么，甚至不能说明其非有机的划分；但经过如此分解，由于未能得以表现，它用岩石、沙子和植物的线条创造了世界，变成不可感知的了。鱼就像中国诗人：不是模仿的或结构的，而是宇宙的。弗朗索瓦·程表明，诗人并不追求相象性，也不计算“几何比例。”他们只保留和抽取自然的重要路线和运动；他们只通过连续的或提倡的“特点”或“笔

触”进行创作。[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成每人/每物，使世界变成一个生成物，就是创造世界，创造一个世界或众多世界，换言之，是发现临近性或不可辨别的地带。宇宙是一台抽象机器，每个世界都是促使这台机器运转的一个组合。如果一个人把自身简化为一条或几条抽象路线，在别的路线上或通过与别的路线结合而延长，即刻地直接地生产一个世界，而且就是所生成的那个世界，这时，他就生成每人/每物。克茹亚克的梦，以及早已有过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梦，对于写作来说就相当于中国诗画中的线条。她说有必要“浸透每一个原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除一切相象性和类比，但也要“把一切都倾注其中”：清除一切超越那个时刻的东西，注入它所包括的一切——而这个时刻并不是瞬间的，而是个体性，人通过透明性滑入这个个体性，滑入其他个体性。[②] 在世界的黎明时分出现。这就是不可感知性、不可辨别性和非个人性这三种美德之间的联系。把自身简化为一个抽象的线条，一个特点，以便发现与其他特点之间的不可辨别之处，从而进入创造者的个体性和非个人性之中。因此，人就像一棵草：他把世界，把每人/每物变成了一种生成物，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必然交流的世界，因为他把阻止我们滑入万物并在万物当中成长的一切因素都压抑在内心深处了。他已经把一切都综合起来了：不定冠词，不定式的生成，以及他被简化后的专有名词。浸透，清除，置入万物。

运动与不可感知之物具有本质的关系。运动的性质就是不

---

① François Cheng, *Chinese Poetic Writing*, p. 13.

②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ed. Anne Olivier Bell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0), vol. 3, p. 209: “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我想要做的一切就是浸透每一个原子。”关于这些观点，我们参照了 Fanny Zavin 的一项未发表的伍尔芙研究。

可感知。感知只把运动当作活动的身体的移动或某一形式的发展。换言之，运动，生成物，速度和迟缓的纯粹关系，纯粹影响，都在感知的临界之上和之下。毫无疑问，感知的临界是相对的：总有一个临界能够抓住另一个临界所抓不住的东西：鹰眼……但充足的临界反过来也只能用作一种感知形式，一个被感知的、被辨别出来的主体。所以，自为的运动在别处继续发生：如果我们把感知序列化，那么，运动就总发生在最大限度的临界之上和最小限度的临界之下，扩大或缩小二者的间隔（微观间隔）。如巨大的日本相扑摔跤手一样，他们迈步太慢，出手太快，以至于无法察觉，所以，所感知的与其说是摔跤手，毋宁说是等待的无限迟缓（将要发生什么?），以及结果的无限速度（发生了什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近摄像或拍摄的临界；但在与摄影的关系上，运动和影响再次在上或下寻找藏身之所。当吉尔凯郭尔采纳那句了不起的座右铭“我只看运动”时，[①] 他仿佛令人惊奇地成了电影界的先驱，根据可变的速度和迟缓把一个爱情脚本（阿格尼斯和男人鱼之间的爱情）翻拍成不同版本。他有充分的理由说，不是无限的运动是没有的；而无限的运动只有通过感情、激情和爱才能发生，在女孩的一次生成中发生，但却不指涉任何种类的“中介”。这种运动是任何中介性的感知所捕捉不到的，因为它已经在每一个时刻发生，舞蹈者或爱人在倒地的那一刻，甚至在跳跃的瞬间，就发现他或她已经“醒来，在散步。”[②] 如作为逃亡者的女孩一样，运动是不能感知的。

---

①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trans.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04. ——英译注。

② 同上，p. 49。就运动和速度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风格和结构上，《恐惧与战栗》都是吉尔凯郭尔最伟大的著作。

然而，我们必须马上纠正一下：运动也“必须”是被感知的，而且只能被感知；不可感知的也就是可感知的。这并不矛盾。如果运动在性质上是不可感知的，那它总是与特定的感知临界有关，而这种特定的感知在性质上是相对的，因此起到中介的作用，促成了临界和感知对象的分布，使形式对于感知主体成为可感知的了。这是组织和发展的平面，是超验的平面，表现了可感知的东西同时没有使自身被感知，使自身没有能力被感知。但在另一个平面上，在内在性或黏性平面上，构造的原则本身必须被感知，只能与所构造的或所表现的东西同时被感知。在这种情况下，运动不再与躲避无限性的相对临界的中介相关了；它不顾速度或迟缓而接近一个绝对但却区别性的临界，与连续平面的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建构是一致的。可以说，运动不再是一种始终相对解域的一个步骤，而成为绝对解域的过程了。这两个平面之间的区别说明下面的事实，即在一个平面上感知不到的东西，只能在另一个平面上被感知。正是由于从一个平面向另一个平面达到跳跃，或从相对的临界向与之共存的绝对临界的跳跃，不可感知的东西才必然变成可感知的。吉尔凯郭尔表明，他称作信仰平面的无限性平面必须成为纯粹的内在性平面，它不断地、及时地向有限界施与、再施与，并反复收集：与无限地放弃之人不同，信仰的骑士或生成之人将得到女孩，作为“有限界明显的后裔，”他将得到有限界的一切，将感知不可感知的东西。[①] 感知已不再寓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之中了，而寓于作为那个关系之极限的运动中，寓于与主体和客体相关的时期中。感知将面对它自身的极限；它将置身万物，通过自身的临近性，作为寓于另一个个体性中的一

① *Fear and Trembling*, p. 61. ——英译注。

个个体性，一个个体性对另一个的理解、或从一个个体性到另一个的过渡而存在：惟一要看的就是运动。

奇怪的是，人们用“信仰”一词指内在性发生作用的平面。但是，如果骑士是生成之人，那就有各种各样的骑士。如果信仰的是一种毒品（完全不同于把宗教当作鸦片的思想），难道就没有毒品骑士吗？这些骑士声称，在必要的谨慎和实验状况下，毒品与一个平面的部署是分不开的。而在这个平面上，不仅有生成女人，生成动物，生成分子，生成不可感知物的结合，而且，不可感知的东西本身也必然在感知必然变成分子的同时被感知：到达洞口，物质间的微观间隔，隔断逃亡路线的颜色和声音，世界路线，透明和交叉的线条。[①] 改变感知；这个问题是以正确的方法提出的，因为它把“毒品”表现为丰富的整体，摆脱了次要的区别（如幻觉的或非幻觉的，硬的或软的，等等）。所有毒品从根本上说都与速度和速度的变化有关。使我们能够在所有毒品各不相同的情况下描写整个毒品组合的是制造这个整体的一条感知因果路线，所以，（1）不可感知的东西被感知；（2）感知是分子；（3）欲望直接利用感知和被感知的东西。美国的“跨掉的一代”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谈到了特别通往毒品的分子革命。接踵而来的是卡斯塔尼达的广泛综合。莱斯利·费德勒界定了美国梦的两极：挤在印第安人种族灭绝和黑人奴隶制这两个梦魇之间，美国人建构了一种心理上受压抑的黑人形象，作为影响的力度和影响的繁殖，而把社会上受压抑的印第安人形象作为感知的密度，即越

---

① Carlos Castaneda, *Journey to Ixtl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3), pp. 297ff.

来越敏锐，划分越来越精细，速度无限地迟缓或加快的感知。[1] 在欧洲，亨利·米肖似乎更愿意摆脱仪式和文明，制定了令人羡慕和细致的经验蓝图，根本没提与毒品相关的因果问题，而尽可能清楚地说明了毒品，将其与谵妄与幻觉区别开来。但在这里，一切又都重新连结起来了：如果我们说毒品消除了形式和个人，如果我们实现了毒品疯狂的速度和用后非同寻常的迟缓，如果我们将一个与另一个像摔跤手一样对峙起来，如果我们就感知商谈控制微观感知、微观运作的分子的力，就被感知的东西商谈在已不再属于我们的漂浮时间内放射加速或减速粒子的力，放射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个体性的力，那么，问题的提出也是正确的：解域，“我迷失了方向……”（对物、思想、欲望的感知，其中，欲望、思想、物已经侵入了所有感知：不可感知的最终被感知了）。剩下的就只有速度和迟缓的世界，它没有形式，没有主体，没有面孔。剩下的就只有一条之型路，好比“愤怒的赶车人甩响了鞭子，”把面孔和景色抽得粉碎。[2] 整个块茎的感知劳作，欲望与感知相融合的时刻。

这种特定因果律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诉诸于太概括的或外在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因果律就等于什么都没说。今天有关毒品的流行话语不过是挖掘关于快感和不幸，关于交流

---

① Leslie Fiedler, *The Return of the Vanishing American*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68). 费德勒解释了美国白人与黑人或印第安人通过逃避克分子形式和美国妇女的上升而结成的秘密联盟。

② Henri Michaux, *Miserable Miracle: Mescaline*, trans. Louise Varèse (San Francisco: City Lihgts, 1963), p. 87: “其恐怖就在于，我不过是一条线。在正常生活中，人是一个领域，能鸟瞰全景的领域……现在不过是一条线……我已经成了一条加速线。”见米肖的线条画。*The Major Ordeals of the Mind, and the Countless Minor Ones*,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米肖进一步发展了他对速度、分子感知和“微观现象”或“微观运作”的分析。

的困难，和总是来自别处的原因等概括。越是不能领悟深刻的特定因果律的人，就越是假装懂得所论的现象。毫无疑问，一个组合从来不包含因果的基础结构。然而，它的确而且在最大程度上包含了创造性的或特定因果律的抽象路线，即逃亡或解域路线；这条路线只能在与属于另一种性质的一般因果律相关联时才能付诸实践，但却不能用这些一般因果律加以解释。我们认为，毒品的问题只有在欲望直接利用感知、在不可感知的东西被感知的同时感知生成分子的层面上才能理解。因此，毒品是作为这种生成的动因出现的。这正是药品分析学介入的地方，它与精神分析学既形成比较又构成对比。精神分析学必须同时被看作一种模式，一个对比方法，又是一种背叛。精神分析学被当作一个指称模式，因为就重要的情感现象而言，它能够建构特定因果律的图式，使之摆脱普通的社会或心理概括。但这个图式仍然依赖于一个组织平面，它永远不能被自在地理解，而只能从外部推导，总是推断出来的，是感知系统所捕捉不到的：它叫做无意识。因此，无意识的平面就仍然是一个超验平面，保证和证实了精神分析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其阐释的必要性。这个无意识平面与感知—意识系统构成了克分子的对抗，又由于欲望必须被转移到这个平面上来，所以它本身与粗糙的容模有关，就仿佛一座冰山被淹没的部分（俄狄浦斯式结构，阉割的岩石）。因此，不可感知的越发不可感知了，因为它在二元机器中与被感知的东西构成了对抗。在黏性或内在性平面上，一切都不同了，在建构过程中它本身必然被感知：实验取代了阐释，现在，作为分子的、非比喻的、非象征的无意识是以微观感知给出的；欲望直接利用了感知的领域，不可感知的东西作为欲望本身被感知的客体，即“欲望的非比喻性客体”出现。无意识不再指超验组织平面的潜在原则了，而指黏性内在平面的过程，在建构的过程中自行出现。因为无意识必

须是建构的，而不是发现的。不再有什么意识—无意识的二元机器了，因为无意识所在之处或所生产之处也就是意识消失、被那个平面带走的地方。[①] 毒品给予无意识的恰恰是精神分析学一直使之恶化的内在性平面（著名的可卡因事件也许是一个转折点，迫使弗洛伊德放弃了研究无意识的直接方法）。

但是，如果毒品真的与这种内在的、分子的感知因果律相关，那么，我们就仍然面对着毒品是否确实成功地为行动划定了所必需的平面的问题。毒品的因果路线或逃亡路线常常被切割成最严格的形式碎片，最严格的从属关系，一口，一剂，贩毒者。甚至在最灵活的形式下，它也可以利用感知的轴性梯度和临界而向生成动物和生成分子运动，但甚至这也是在临界的相关语境中完成的，而临界只限于模仿黏性平面，而非把它引到一个绝对临界上去。如果速度和运动继续逃向别的地方，像飞快的鸟一样地观察事物又有什么用呢？解域是相对的，是对最绝望的分域的一种补偿，所以，不可感知的东西和感知继续相互追逐，而没有真正地结合。世界上的洞穴使得世界路线自行延伸下去，但逃亡路线却并非如此，而反卷回来，开始在黑洞中旋动；对每一个瘾君子来说，孔洞，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像一只蜗牛。向下而非向上。分子的微观感知事先就据毒品而被幻觉、幻象、虚假的感知、幻想或突发的偏执狂遮盖了。它们在每一个瞬间恢复形式和主体，像许多幻影或替身一样继续阻止这个平面的建构。此外，正如我们在罗列这些危险时所看到的，通过介入这样一种组合的其他因果律的影响，不

① 对弗洛伊德的名句“伊德所在之处就是自我将来所在的地方”的重写（*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Standard Edition*, vol. 22, p. 80），拉康也曾重写过这个句子，“The Freudian Thing,” *Ecrits*,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1977), pp. 128 - 129, 136)。——英译注。

仅黏性平面有被背叛或抛出轨道的危险，就连这个平面本身也在制造危及自身的危险，使其可能在被建构的同时被拆解。我们不再、它本身也不再控制速度了。非但让无器官身体丰富起来而流通各种强度，瘾君子反倒树立一个脆化的或空洞的身体，或一个患了癌症的身体：因果路线、创造路线或逃亡路线即刻变成了死亡和废除路线。静脉可怕的脆化，或鼻子的流脓——瘾君子的玻璃身体。黑洞和死亡路线，阿尔托和米肖的警告在这里汇聚（这些警告都比治疗和辅助中心的信息的、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心理学的话语更具有技术性和一贯性）。阿尔托：你不会避开幻觉、错误的感知、不知羞耻的幻想，或糟糕的感觉，就如同黏性平面上那么多黑洞一样，因为你的意识也将走向那条布满陷阱的道路。[①] 米肖：你将不能控制你的速度了，你将陷入不可感知与感知之间的疯狂竞赛，一场越来越循环的竞赛，因此一切都是相对的了。[②] 你将充满自我，你将失去控制，你将处于一个黏性平面上，在一个无器官身体里，但却总是修补它们，掏空它们，拆解你建造的东西，一堆不动的破布。这些说法比“错误的感知”（阿尔托语）或“糟糕的感觉”（米肖语）要简单得多，但这是最具技术性的东西：欲望内在的分子和感知因果律在毒品组合中不起作用了。瘾君子不断回归他们想要逃避的东西：对边缘存在来说是越发严格的一种分隔性，对基于化学物质、幻觉形式或虚妄的主体化的存在来说是越发虚假的一种分域。可以把瘾君子看作是不知疲倦地开辟新生活道路的先驱者或实验者，但他们的谨慎却缺乏谨慎的基础。所以，他们要么参加伪英雄的大军，去走无闻之死和永久疲惫的众生之路。要么就更糟，他们将要完成的只是试图

---

① Artaud, *The Peyote Dance*, pp. 12 - 14.

② Michaux, *Miserable Miracle* ("Remaining Master of One's Speeds," pp. 87 - 88).

做非瘾君子或前瘾君子所能恢复和受益的东西，其次才去纠正总是流产的毒品平面，通过毒品发现毒品并不足以建构一个黏性平面。瘾君子所犯的错误总是要再度从零开始吗？当应该中途停止、“中途”开始或从中间分叉时，他们是继续吸毒还是戒毒？要灌醉自己，但要喝蒸馏水（亨利·米勒）。要喝高，但要通过戒酒，“喝酒和戒酒，尤其要戒酒，”我是饮水者（米肖）。要达到“喝高或不喝高”的境界现已不再是问题了，问题恰恰是毒品是否已经充分地改变了时空感知的一般状况，致使非瘾君子成功地穿过了世界上的孔洞，遵循逃亡路线来到了不需要毒品而需要其他手段的地方。毒品不能保证内在性；相反，毒品的内在性能使人抛弃毒品。等着别人去冒险是胆小还是剥削？不，这是在改变手段的同时参与一种已在进行的事业。有必要选择正确的分子，水、氧、氮。这与模式没什么关系，所有模式都是克分子：有必要确定与促成和界定“临近性”（不可辨别性，生成等）有关的分子和粒子。生命组合，生活组合，在理论上或逻辑上对各种分子都是可能的，比如硅。但结果是，这种组合却不能与硅构成机器：抽象机器不允许它通过，因为它并不分配构成黏性平面的临近带。① 我们将看到，机器的理由完全不同于逻辑理由或可能性。人并不遵循一种模式，而要骑该骑的马。瘾君子没有选中正确的分子或正确的马。毒品太难控制，因此捕捉不到不可感知的东西和不可感知的生成物；瘾君子认为毒品会给他们那个平面，而事实上，那个平面还需要祛除自身的毒品，保持对速度和临近性的控制。

① 从有机化学的观点看硅的各种可能性，及其与碳的关系，见“Silicium,”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秘密的回忆。秘密与感知和不可感知的东西具有一种特殊的但却可变的关系。秘密首先与某些内容相关。内容对其形式来说太大……或者内容本身有一个形式，但那个形式被一个简单的容器、信封或盒子掩盖了，替代了，或取代了，以便压制形式关系。这些是出于不同原因而被判断为适合被孤立或伪装的内容。只要秘密与发现是对立的，如同二元机器中只有两个条件，秘密和发现，秘密和解密，列出这些理由（羞耻，财宝，神性等）的表格就只具有有限的价值。一方面，作为内容的秘密被对秘密的感知所取代，这种感知与秘密一样是秘密的。无论目的是什么，是告发，最后泄露，还是揭发，这都无关紧要。从轶事的角度看，对秘密的感知正是秘密的对立面，但从概念的角度看，对秘密的感知也是秘密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对秘密的感知必然会成为秘密本身：间谍，窥视者，讹诈者，匿名信作者，都与他们想要揭露的秘密一样秘密，不管其外部动机如何。总有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只鸟秘密地发现了这个秘密。总有比你的感知更精细的一种感知，对你的不可感知的事物的感知，能发现你的葫芦里究竟是什么药。我们甚至可以为那些有能力感知秘密的人设想一种保密职业。保密者不必参与秘密，但也维系于一种感知，因为他或她必须感知和窥探想要发现秘密的人（反间谍）。于是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其中，秘密向一种同样秘密的感知运动，本身试图成为不可察觉的一种感知。围绕这一点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物。接着是第二点：就像内容一样与秘密不可分割：即秘密的保守和传扬。同样，不管最终结局或结果如何，秘密总是要传扬出去的，而这反过来也是裹着秘密的尸衣的。作为泄密的秘密。秘密必须偷偷溜入、插入、进入公开论坛；它必须给公开形式施加压力，刺激已知主体行动起来（我们这里说的是“游说”类的主体，尽管进行游说的场所本身并不是秘密结社）。

简言之，秘密，也就是为了一种简单的容器而隐藏其形式的一个内容，是与两种运动分不开的，这两种运动偶尔干扰保密的过程，或背叛秘密，但仍然是秘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从盒子里渗露出来的东西，必须透过盒子或半开的盒子感知的东西。秘密是由社会发明出来的；它是一个社会学或社会概念。每一个秘密都是一个集体组合。秘密决不是不动的或静止的观念。只有生成是秘密；秘密有一种生成。秘密根源于战争机器；它是战争机器，正是生成女人、生成孩子、生成动物导致了秘密的产生。① 一个秘密结社总是作为战争机器而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研究秘密结社的社会学家已经总结出很多规律：保护，平等和分级，沉默，仪式，解个性化，中心化，自治，分隔化，等等。② 但是，它们也许没有充分重视内容运动的主控原则：（1）每一个秘密结社都有一个更加秘密的幕后结社，它感知到秘密，保护它，对泄露秘密的行为予以惩罚（这决不是为了用秘密的幕后结社界定秘密结社：当一个社会展示这种双重性，具有这个特殊因素时，它就是秘密的）；（2）每一个秘密结社都有自己的行动方式，这反过来也是秘密的；秘密结社可以通过影响、蠕动、滋生、渗露、挤压或看不见的辐射发挥作用；“口令”和秘密语言（这里并不矛盾；秘密结社要得以生存，就必须把普遍规划渗透到整个社会中去，就必须潜入所有的社会形式，干扰其等级制和分隔制；秘密的等级制相当于等级相同者的共谋，它要求其成员在社会中就像鱼儿在

① Luc de Heusch 表明，是战争人导致秘密的产生：他思想，吃饭，爱，判断，得出秘密结论，而国家人则致力于公开的一面。见 *Le roi ivre ou l'origine de Etat* (Paris: Gallimard, 1972)。国家秘密是后来才出现的概念，认为战争机器被国家机器所利用了。

② 特别重要的是 Georg Simmel。见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 Kurt H. Wolff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0), chapter 3.

水中一样畅游；但反过来，社会必须像环绕鱼儿的水一样，它需要整个周围社会的共谋）。这显见于各种各样的例子，如美国的民众团体和非洲的动物人：一方面，有秘密结社的影响方式，其领袖对其周围的政治或公共人物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还有秘密结社与一个幕后结社的重叠方式，这可能构成了杀手或保镖的一个阶层。① 影响和重叠，渗露与凝固，每一个秘密都在两个“离散”条件之间运作，在特定情况下，这两个离散条件可以连接或混合起来。孩子的秘密把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甚至达到了神奇的效果：秘密就是盒子里盛装的东西，秘密的影响和传播，对秘密的秘密感知（孩子的秘密并不是由简缩的成人秘密构成的，而必然伴随着对成人秘密的秘密感知）。一个孩子发现了秘密……

但秘密的生成迫使它不能仅仅满足于以简单的容器掩盖其形式，或满足于交换容器。秘密作为秘密就必须获得自己的形式。秘密从有限的内容上升到无限的保密形式。这就是秘密达到绝对不可感知的程度，而不是与所有相对感知和反应的相互作用相联系。我们从定义清晰、定位明确和属于过去的一个内容，转移到所发生的、不可定位的某事的一个先验的一般形式。我们从被界定为歇斯底里的童年秘密（内容）转移到被界定为特别强烈的偏执狂的保密状态（形式）。而这个形式展示了秘密的两个共存因素，秘密的感知和秘密影响的行为方式；但这些共存因素已经成了它们不断重构、重组、重新填充内容的一个形式。另一方面，偏执狂痛斥那些偷取情报、偷取最隐

---

① Paul Ernest Joset 清楚地指出了初创的秘密结社，即刚果的 Manbela 的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对传统政治领袖的影响，这可以导致社会权力的转换；另一方面是它与 Anioto 的实际关系，后者是由罪犯或豹人党（且与 Manbela 源出不同）组织起来的一个幕后秘密结社。见 *Les sociétés secretes des hommes – léopards en Afrique noire*, *chapter* 5.

秘思想的国际阴谋；要么在组建之前就宣布他们具有感知别人秘密的能力（具有偏执嫉妒心理的人并不通过逃避来理解别人；他们几乎预见不到逃避的意图）。另一方面，偏执狂通过他们放射或接收的辐射发挥作用，不然就忍受辐射带来的痛苦（雷蒙·卢塞尔和施莱伯尔）。通过辐射发生的影响，通过逃避或反响产生的重叠，赋予秘密一种无限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感知和行为都进入了不可感知状态。偏执式判断就像一种感知预示一样，取代了对盒子及其内容的经验探讨：先天就是有罪的，而且必然如此！（比如，《追忆逝水年华》中与阿尔伯丁有关的叙述者的进化。）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精神分析学已经从对秘密的歇斯底里式认识发展到了偏执狂式的认识。① 无休止的分析：分配给无意识的越来越艰难的任务就是把自身看作秘密的无限形式，而不是包含着秘密的简单的盒子。你可以讲出一切，但在讲出一切的同时，你什么也不会说，因为要把内容与纯形式搭配起来，要求具备精神分析学的全部“艺术”。然而，当以这种方式把秘密提高到形式的高度之后，秘密就必然要经历一次冒险。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获得其无限的坚实形式时，其回答必然是什么都未发生，形式和内容都被破坏了。消息传播得很快，人的秘密什么都不是，根本什么都不是。俄狄浦斯，法勒斯，阉割，“肉体中的裂片”——这就是秘密吗？这足以让女人、儿童、精神病患者和分子发笑。

秘密越是具备结构的组织化形式，它就越单薄，越无处不在，其内容就越分子化，同时，其形式也开始消解。如迦卡斯塔所说，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并不因此消失，但却采纳了

① 关于秘密的精神分析学概念，见 *Du secret*, *Nouvelle revue de psychanalyse*, no. 14 (Fall, 1976)；在这个话题上对弗洛伊德观点的发展，见 Claude Girard, “Le secret aux origins,” pp. 55 - 83.

比较女性的地位。在施莱伯尔总统的偏执式秘密背后，如果不是生成女性、生成女人，那还能是什么呢？女人完全不像男人那样操纵秘密（除非在重构一种被颠倒了的男性秘密，即雌蕊的秘密形象时）。男人总是由于卤莽、嘴碎，由于团结、叛逆，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然而，奇怪的是，一个女人就本性而言是透明的、清白的、迅速的，那又何以在不隐藏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保守秘密呢？宫廷爱情中秘密的复杂组合也许是女性的，而且以最透明的方式运作。速度与引力。战争机器的速度与国家机器的引力相抗衡。男人采取严肃的立场，骑士般地保守秘密："你看到了我所承担的压力：我的严肃，我的谨慎。"但结果他们还是讲出了一切——结果证明那根本没有什么。另一方面是女人，她们讲出一切，有时讲出惊人的技术细节，但人们在结尾时所得知的与开始时一样多。她们利用速度、利用透明度而隐藏了一切。她们没有秘密，因为她们自身已经成为秘密。她们比我们更精明吗？依菲琴尼亚。生来就清白无辜。这是女孩对抗男性关于"先天有罪"的判断的辩解。……这就是秘密所能达到的终极状态：其内容被分子化了，它已成为分子，在其形式被肢解的同时成为一条纯粹运动的线条——可以说，一个特定的线条就是画家的"秘密"，一个特定的节奏细胞，一个特定的声音分子（并不构成主题或形式），就是音乐家的"秘密"。

如果曾经有一个作家描写过秘密，那就是亨利·詹姆斯。在这方面，他经历了整个进化过程，如同对艺术的完善一样。他开始时寻找秘密的内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半开放的，转瞬即逝的内容。然后，他提出可能有一种无限的秘密形式，它甚至不再要求什么内容，它已经克服了不可感知的东西。但他提出这种可能性只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秘密存在于内容还是存在于形式之中？回答已经显而易见：既不在形式，也不

在内容。[1] 詹姆斯是彻底卷入不可抗拒的生成女人之中的作家之一。他从未停止放弃追求他的目标，发明必要的技术。把秘密的内容分子化，把秘密的形式线性化。詹姆斯探讨了这一切：从秘密的生成孩子（总要有一个发现秘密的孩子：《梅西所知》），到秘密的生成女人（通过透明的保密，只不过是几乎不留踪迹的纯粹线条；令人瞩目的《黛西·米勒》）。詹姆斯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接近普鲁斯特；正是他提高了那声呼喊："先天的清白！"（黛西所要求的不过是一点尊敬，她甚至能为那点尊敬献出她的爱……），与把阿尔伯丁送入地狱的"先天有罪"对立了起来。这个秘密的关键与其说是其三个状态（儿童的内容，男性的无限形式，纯粹女性的线条），毋宁说是与其相联系的生成，秘密的生成孩子，生成女性，生成分子——这恰恰是在秘密失去其内容和形式时，在不可感知的东西、秘密隐藏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藏、最终被感知的地方发生的。从灰色的外在性到灰色的内在性。俄狄浦斯经历了三个秘密：斯芬克斯的秘密，他渗透到了斯芬克斯的盒子里；沉重地压在他身上的作为自身罪孽之无限形式的秘密；最后是科罗诺斯的秘密，在这里，人们无法接近他，他与纯粹的逃亡和放逐路线交融在一起，已经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了，或如一个能剧老演员那样，只有一个女孩的面具来掩盖他所缺乏的脸了。有些

---

① Bernard Pingaud 基于亨利·詹姆斯的代表性文本"The Figure in the Carpet"（*The Novels and Tables of Henry James*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07 – 1917], vol. 15）表明，秘密是如何从内容跃到形式，并逃避了二者的：Du secret, pp. 247 – 249. 人们常常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评论这个文本；最重要的是 J. – B. Pontalis 的 *Après Freud*（Paris: Gallimard, 1968）。但在界定无意识和语言的层面上，精神分析学仍然是一个必然隐蔽的内容的囚徒，也是一个必然象征的形式（结构，缺场的原因……）的囚徒。这就是在审美和文学应用上它何以没有抓住作者内心的秘密和属于作者的秘密的原因。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俄狄浦斯的秘密：他们关注前两种秘密，而不关注后两种，而后两种却是最重要的。

人说话，不撒谎，不隐藏什么：他们是透明的秘密，像水一样不可渗透，实际上是不可理解的。而另一些人保守秘密，却总被泄露出去，即便给它围上一道厚厚的墙壁或赋予它一个无限的形式，也无济于事。

回忆与生成，点与区。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生成物，但却没有生成人呢？首先，这是因为人是多数的，而生成物是少数的；一切生成都是生成少数。我们所说的多数，指的不是相对的大量，而是指对一个状态或标准的判定，相关于这个状态或标准的较大的量或最小的量都可以说是少数：白人，成年男性，等等。多数意味着一种主导状态，而不是反面。这不是要知道蚊子或苍蝇是否比人还多的问题，而是要知道“人”何以构成了一种宇宙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人必然地（分析地）构成了多数。政府中的多数假定选举权，这个多数不仅是在拥有这个权利的人当中确立的，而且针对不拥有这个权利的人行使的，不管这些人的数量有多大。同样，宇宙中的多数是假定被事先给予了人的权利和权力的。[①] 在这个意义上，妇女、儿童，还有动物、植物和分子，都是少数的。也许正是与人的标准相关的女人的特殊处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生成物，由于是少数的，所以总是要经过一个生成女人的过程。重要的是，不要把作为生成或过程的少数（minoritarian）与作为集合体或状态的少数（minority）混为一谈。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构成少数，但这个少数本身不能使他们成为生成物。在少数状态中，人们重新分域，或允许自身被重新分域。但在生成过程中，人被解域。如黑豹党人所说，甚至黑人

① 关于多数这一思想的模糊性，见 Kenneth Arrow 的两个著名命题：the Condorcet effect 和 theorem of collective decision。

也必须生成黑人。甚至女人也必须生成女人。甚至犹太人也必须生成犹太人（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这就是实况的话，那么，生成犹太人就必然像影响到犹太人一样影响到非犹太人。生成女人就必然像影响到女人一样影响到男人。在某种意义上，生成中的主体总是“男人”，但只有在进入了生成少数的过程时，他才与多数身份分割开来。如在亚瑟·米勒的小说《焦距》或罗塞的影片《克莱因先生》中：正是非犹太人成了犹太人。在与标准身份割裂后，他们就完全卷入了这个生成过程之中。相反，如果犹太人本身必须生成犹太人，如果女人必须生成女人，如果儿童必须生成儿童，如果黑人必须生成黑人，那是因为只有少数才能用做生成的积极媒介，但在这种状况下，它就不再是可以根据多数加以定义的集合体了。因此，生成犹太人，生成女人等等，意味着两个同时性运动，根据一个运动，条件（主体）从多数退出来，而根据另一个运动，条件（媒介或代理者）从少数中诞生。有一个不对称的和不可分解的生成区，一个联合区：两个“克莱因先生，”犹太人的和非犹太人的，他们都进入了生成犹太人的过程（《焦距》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一个女人必须生成女人，但却是在所有男人的生成女人之中。一个犹太人必须生成犹太人，但必须是在非犹太人的生成犹太人之中。生成少数只有在一个被解域的媒介或主体与其因素相似的情况下才存在。生成的主体除非作为一个多数的被解域的变体，否则并不存在。我们可能被任何东西，被最出乎意料的、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抛入生成之中。除非有一些细节开始膨胀，把你带走，否则，你就没有偏离多数。《焦距》的主人公是普通美国人，他由于需要一幅眼镜才使鼻子显得有些像闪族人，而正是因为“这副眼镜”他才被抛入非犹太人生成犹太人的奇怪冒险之中。凡事都可以这样做，但最终都证明是政

治。生成少数是政治，那就必然促成一种权力劳动，一种主动的微观政治学。这是宏观政治学的反面，甚至是历史的反面，历史的问题在于如何赢得或获得多数。如福克纳所说，要避免成为一个法西斯，惟一的选择就是成为黑人。① 与历史不同的是，生成不能根据过去和未来加以概念化。生成革命仍然无视于革命的未来和过去等问题；它在二者之间穿过。每一个生成都是一个共存区。所谓的非历史社会存在于历史之外，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于再生产不可变的模式，或被固定的结构所控制，而是因为它们是生成的社会（战争社会，秘密结社等等）。历史只是多数的历史，或是依据多数定义的少数的历史。然而，就不可感知的东西的进展而言，“如何赢得多数”则完全是一个次要问题。

姑且换一个方式说：不存在生成人，是因为人是一个克分子实体，而生成物则是分子。表面的功能向我们表明了人借以构成多数的形式，或是多数赖以建立的标准：白人，男性，成人，“理性”，等等，简言之，就是普通的欧洲人，表述的主体。根据树状规律，跨越所有空间或整个屏幕的正是这个中心点，它在每一个转弯处都树立一个对立面，表面特征就是根据这个对立面得以保留的：男性—（女性），成人—（孩子），白人—（黑人，黄种人，或红种人），理性—（动物）。这个中心点，或称第三只眼，具有在二元机器中组织二元分配的属性，能在主导的对立条件下繁殖自身，同时，整个对立又在中心点产生共鸣。“多数”的构架是多余的了。人通过中心点的位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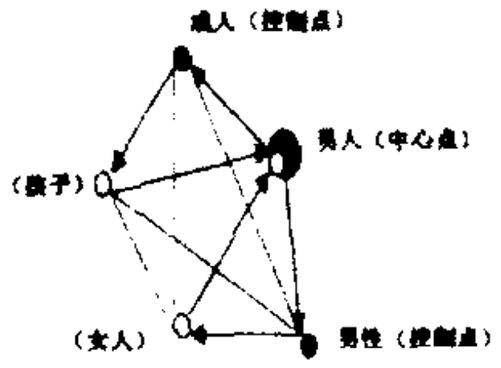
① 见 William Faulkner, *Intruder in the Dust* (New York: Vintage, 1948), p. 216。在谈到内战后的南方白人时（不仅穷白人，还有过去的有钱白人），福克纳写道，“我们正处于 1933 年以后的德国人的处境，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而只有成为纳粹，不然就成为犹太人。”

其频率（它必然要借助每一个主导点来繁殖）、其共鸣（在它内部把所有的点都连结起来）而把自身建构成巨大的记忆。在克分子系统的集合体中，把一点与另一点连接起来的线，都是由符合频率和共鸣等记忆条件的点来界定的，因而都是树状系统的组成部分。①

构成树状的东西就是线对点的从属。当然，孩子、女人和黑人都有回忆；但把这些回忆收集起来的记忆仍然是一种男性的多数动因，把这些回忆当作“童年的回忆，”当作婚姻的或殖民的回忆。确定点的连接或点的共边而非在点与点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是可能的：这样，你所拥有的是幻想而非回忆。比如，一个女人可以有一个女性点毗邻一个男性点，一个男人可以有一个男性点毗邻一个女性点。然而，这些杂点所构成的构架并未使我们在真正生成的方向走出多远（比如，根据精神分析学，双性恋决不排除男性的主导和“法勒斯”的多数）。只要一条线连接着两个相距的点，或由两个毗邻的点构成，那就不能打破树状图式，就不能接近生成或分子。一条生成线不是由它所连接的点界定的，也不是由构成它的点界定的；相反，它在点之间穿过，从中间穿过，垂直地跑向最先看到的点，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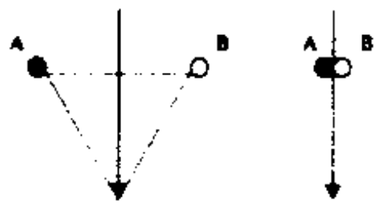
① 线对点的从属显见于树状图式中：见 Julien Pacotte, Le réseau arborescent, schème primordial de la pensée (Paris: Hermann, 1936)，而中心或等级系统的地位，见 Pierre Rosenthiehl and Jean Petitot, “Automate asocial et systèmes acentrés,” *Communications*, no. 22 (1974), pp. 45 - 62. 多数的树状图式有如下图：



相距或共边的点构成局部关系。[①]点总是源点。但一条生成线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出发，也没有到达；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点；要说起源的缺场，把缺场的起源当作起源，这是糟糕的词语游戏。一条生成线只有中间。中间不是平均的；它是快速运动，是运动的绝对速度。生成总是在中间；只能在中间获得生成。生成既不是一，也不是二，更不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它是在中间，垂直逃向或下降到二者的边界或路线。如果生成是一个区（线—区），那是因为它构成了一个临近的和不可辨别的地带，一座无人岛，清扫两个相距或毗邻点的一种非局部关系，把人带入他者的临近性中——而边界—临近性则无视毗邻和相距。把黄蜂和兰花连接起来的生成线或区导致了共享的解域：就黄蜂来说，它成了兰花繁殖系统中的一个被解放了的因素，而就兰花来说，它成了黄蜂体内一种微生物的客体，也从其自身的繁殖系统中解放出来了。两个非对称运动的共存构成了一个区，在逃亡路线上扫清一切选择性障碍。线或区并不把黄蜂和兰花连接起来，正如它也不把它们联合或混合起来一样：它从它们中间穿过，在一个共享的临近性中把它们带走，这里，点的可分辨性消失了。生成的线系统或区系统是与记忆的点系统相对立的。生成是线借以摆脱点、并使点不可辨认的运动：块茎，树状的对立面；是从树状的分裂。生成是反记忆。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分子记忆，但却作为一个组成因素而进入了一个多数或克分子系统。记忆始终具有重新分域的功能。另一方面，解域的向量决不是不确定的；它直接插入分子层面，它越是被解域，其接触就越坚固：恰恰是解域把分子因素的集合体“凝聚在一起”的。从这一观点出

---

① 在 A 与 B（距离）之间连接或共边的一条生成线：



发，可以把一个童年区或生成孩子与童年记忆加以对比："一个"分子孩子诞生了……在一个临近地带或一个生成区，在把我们二者同时带走的一条解域线上，"一个"分子孩子与我们相共存——对立于孩提时的我们，我们回忆或幻想的克分子孩子，他的未来是成人。"这将是童年，但决不是我的童年，"弗吉尼亚·伍尔芙写道。（《奥兰多》已经摆脱了记忆，而是靠区——年龄区、时代区、自然王国区、性区来运作的，在事物之间构成了许多生成物，或许多解域线。）① 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记忆"，其实是错误的；我们实际要说的是"生成，"我们所说的是生成。

如果线与点相对立（或区与记忆相对立，生成与记忆的能力相对立），那也不是绝对的：一个数点系统包括了线的一些用法，而区则赋予点以新的功能。在数点系统中，点基本上指线性坐标。不仅代表水平线和垂直线，而且，垂直线与自身构成平行运动，而水平线则与其他水平线相重合。每一个点都是根据这两个基本坐标来分配的，但也由一条重合的水平线和一条错置的垂直线或平面来标志的。最后，当一点与另一点被一条线连接起来时，两个点便相接了。当线被当成这样的坐标或局部连接时，一个系统就可以说是数点系统。比如，树状系统、克分子系统和一般的记忆系统都是数点的。记忆具有数点组织，因为每一个现在都指时间流动的水平线（运动学），从一个过去的现在到实际的现在的运动，同时又指时间秩序的垂直线（地层学），从现在到过去或到对过去的现在的再现。这当然是一个基本图式，其发展必须经过一些重要的复杂过程，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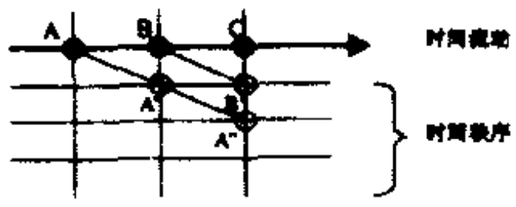
①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3, p.236 (Wednesday, November 28, 1928)。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卡夫卡的作品，其中，童年区是作为童年记忆的对立面发生作用的。普鲁斯特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他把二者混合起来了。精神分析学家则要捕捉记忆或幻想，决不是童年区。

却是建立在构成"说教"系统的艺术再现之上的,换言之,是一种记忆术。一方面,音乐再现画出一条水平的旋律线,低音线,其他旋律线都与这条低音线重合;点就在这些线之间的对位关系之中。另一方面,音乐再现也画出一条垂直的、和谐的线或平面,它沿着水平线运动,但不再依赖于这些水平线;它从高向低运动,界定一个能够与后续其他和音相连接的一个和音。绘画再现也具有类似形式,但是以其自己的方式:这不仅因为绘画具有垂直线和水平线,也因为其特征和色彩均以各自的理由相关于错置的垂直线和重合的水平线(比如,垂直的冷色,或白色,光和色调;水平的暖色,或黑色,色彩学和形态,等等)。仅举相对较近的例子,这显见于康定斯基、克里和蒙德里安的说教系统中,这必然意味着与音乐的偶合。

姑且总结一下数点系统的主要特点:(1)这种系统包括两条基本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它们都被用做分配点的坐标。(2)水平线可以垂直地重合,垂直线可以水平地运动,因此,在水平频率和垂直共鸣的条件下产生和繁殖新的点。(3)从一点到另一点可以(或不可以)画出一条线;如果可以,这条线就是局部连接;因此,对角线在不同层面或时刻的点之间起到连接作用,反过来,这些层面或时刻又在这些水平或垂直、毗邻或相距的点的基础上产生频率和共鸣。[①]这些系统是树状的,记忆的,克分子

---

① 比如,在记忆系统中,记忆的形成是一条对角线,把现在 A 变成相关于新的现在 B 的 A' 的再现。再变成相关于 C 的 A",依次类推:



见 Edmund Husserl, *The Phenomenology of Internal Time – Consciousness*, ed. Martin Heidegger, trans. James S. Churchill, intro. Calvin O. Schra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48 – 50.

的，结构的；它们是分域或再分域系统。线和对角线完全从属于点，因为它们是点的坐标，或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局部连接。

与数点系统相对立的是线性或多元线性系统。摆脱线，摆脱对角线：每一个音乐家或画家都有这个意图。人们精心建构一个数点系统或一个说教再现系统，但目的却是为了拍快照，为了让它经历一次震颤。数点系统最有意义的时候是当一个音乐家、画家、作家、哲学家起而反对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们甚至为了反对这个系统而建构它，仿佛拿它当起跳板。历史只能是那些反对历史的人们创造的（不是那些跻身于历史、甚或再造历史的人创造的）。这不是为了激励别人而做的，而是自然发生的，因为现成的、自行发明的这种数点系统一定允许下面的做法：摆脱线和对角线，画线而不蓄谋画点，生产不可感知的对角线，而不死抱更加精密或改良的垂直线或水平线。此事一旦做成便会被载入历史，而且永远不会脱离历史。历史可能会试图割断与记忆的纽带；它可能使记忆的图式更精密，重合和变换坐标，强调连接，或深化断裂。然而，分界线却不在那里。分界线并不穿过历史与记忆之间，而穿过数点的“历史—记忆”系统与对角的或多元的线性组合之间，但这些决不是永恒的：它们与生成有关；它们是纯粹生成状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超越历史的。任何创造行为都不能不是超越历史的，都不能不经由或从一条被摆脱的线的背后产生出来。尼采不是把历史与永恒相对立，而是与亚历史或超历史相对立：不合时宜性就是个体性，就是生成，就是生成的无辜（换言之，忘却相对于记忆，地理相对于历史，地图相对于踪迹，块茎相对于树状）。“非历史就好比大气，生命只能在大气中产生，破坏了大气，生命就会消失……如果人不首先进入那个非历史的蒸发领

域，他还能干什么呢？”① 创造就好比突变的抽象线条，推掉了再现世界的任务，这恰恰因为它们组合了一种新型现实，历史只能将其重新包括在数点系统之中或将其重新定位。

当布莱兹扮演起音乐历史学家的角色时，他是为了表明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是如何在不同情况下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在和声的垂直线与旋律的水平线之间发明了对角线的。而在每一种情况下，它都是一条不同的对角线，都是一种不同的技巧，都是一种创造。这条斜线实际上是解域线，沿着它运动就会出现一个不再具有起源点的音区，因为它始终而且已经在这条线的中间了；它不再具有水平的和垂直的坐标了，因为它创造了自己的坐标；它不再构成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局部连接了，因为它处于“非脉冲时间”之中：一个被解域了的节奏区，已经抛弃了点、坐标和大小，好比一只醉舟，它或与线相融合，或勾画出一个黏性平面。速度和迟缓自行注入音乐形式当中，有时促使音乐多产，线性的微观多产，有时则加速它的灭绝，嘈杂的废除，内包，或同时导致二者。音乐家最有资格说：“我痛恨记忆功能，我痛恨记忆。”那是因为他或她承认了生成的力量。维也纳学派是这种对角线、这种线—区的典范。但也同样可以说，维也纳学派发现了一个新的分域系统，使它置身于由点、垂直线和水平线构成的历史系统。接踵而来的是另一种尝试，另一种创造行为。重要的是，所有音乐家都始终以这种方式创作：不管多么脆弱，都要在点之外，在坐标之外，在局部连接之外，画出他们自己的对角线，以便让一个声区顺着一条被创造的、被解放了的路线浮动，以便在空间中发放这个活动的、

---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 sec. 1, pp. 63 - 64.

突变的声区，一个个体性（比如，半音体系、集合音、复合音，但这已经有了多声部的资源和可能性了）。[①] 有人谈到与发声器官有关的“倾斜因素”。对角线往往是由声音的极其复杂的线和空间构成的。这是否是一个短句或一个节奏区的秘密呢？毫无疑问，点现在担负起一个新的重要的创造性功能。这不再简单是必然要重构一个数点系统的问题了。相反，现在，点要从属于线；现在，点标志着线的多产，或它的突然偏离，它的加速，它的迟缓，它的愤怒或痛苦。莫扎特的“微观区。”区甚至可以简缩到点，就好比简缩到一个音符（点—区）：伯格在《沃才克》中使用的 B 调，舒曼的 A 调。向舒曼表示敬意，还有舒曼的疯狂。大提琴跨越管弦乐的坐标方格，画出它的对角线，被解域的音区沿着这条对角线运动；或者，一条非常精确的旋律线或多声部构造正在“处理”一种极度冷静的叠歌。

---

① 关于所有这些命题，见 Pierre Boulez.（1）这些斜线何以总是能逃脱音乐的水平和垂直坐标，有时甚至画出“虚线”，见 *Notes of an Apprenticeship*, ed. Paule Thévenin, trans. Robert Weinstock (New York: Knopf, 1968), pp. 231 – 232, 295 – 301, 382 – 383。(2) 关于与这种斜线有关的声区或“绵延区”，见 *Boulez on Music Today*, trans. Susan Bradshaw and Richard Bennet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5 – 59。(3) 关于点与区的区别，“数点组合，”和“集合体，”及其变化的个性，见 “Sonate que me veux – tu?”, *Médiations*, no. 7 (1964)。布莱兹著作中经常表现出对记忆的痛恨；见 “Eloge de l'amnésie,” Musique en jeu, no. 4 (1971), pp. 5 – 14, and “J'ai horreur du souvenir,” in *Roger Desormière et son temps*, ed. Denise Mayer and Pierre Souvtchinsky (Monaco: Ed. du Rocher, 1966)。如果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寻找例子，类似的宣言可见于斯特拉文斯基、凯奇、贝里奥的作品中。当然，有一种维系于坐标的音乐记忆，而且要在社会背景中运作（起床，上床，击鼓撤退）。但对音乐“语句”的认知与其说诉诸于记忆，哪怕是回忆式的记忆，毋宁说诉诸于对冲突型的认知的引申或收缩。应该研究的是每一个音乐家是如何激活可证实的忘却区的：比如，Jean Barraqué 在德彪西的作品中看到的“一片一片的忘却”和“缺场的发展。” *Debussy* (Paris: Seuil, 1977), pp. 169 – 171。此外，还可以援引 Daniel Charles, “La musique et l'oubli,” *Traverses*, no. 4 (1977), pp. 14 – 23。

在一个多线性系统中，所有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线打破了作为起源的点；对角线打破了作为坐标的垂直线和水平线；斜线打破了作为两点之间连接的对角线。简言之，一条区—线穿过声音，用自己不可定位的中间驱动自身。音区就是间奏曲。它是没有器官的身体，充斥于音乐组织的一种反记忆，而且更加响亮："舒曼式身体并非固定不动。……间奏曲是舒曼全部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极端的时候只有间奏曲。……舒曼的节奏是恐慌，但也符号化了……而正是因为那些击打的恐慌显然没有超出温顺语言的范围，它才一般不被人们所感知。……姑且为格调想象两个矛盾的（但又同时发生的）状态。一方面……一个屏幕，一种语言，意欲……根据已知的组织……表现身体。另一方面，格调……自相矛盾地……在它声称要驯服的另一个层面上随时充当击打的鼓手。"①

同样的分析，绝对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绘画吗？点并不制造线；线清扫被解域的点，在外部影响下携点而走；线并不从一点走向另一点，而是在点当中朝不同方向运动，因此使点不可辨别。线成了对角线，已经摆脱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但对角线已经变成了斜线，半对角线或自由直线，断裂的或有棱角的线，或曲线——它始终在这些线当中。在白色的垂直线与黑色的水平线之间是克里的灰色线，康定斯基的红色线，莫奈的紫色线；每一个都构成了一个色区。这条线没有源头，因为它总是在画面外开始，画面只把它的中间部分呈现出来；它没有坐标，因为它与它所创造的、并漂浮其上的黏性平面融合起来了；它没有局部连接，因为它不仅失去了再现功能，而且失去了勾画任何形状的任何功能——正因如此，线变成抽象的了，

---

① Roland Barthes, "Rasch,"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5), pp. 300 - 302, 308 - 309.

真而确真地变成抽象和突变的了，一个虚拟区；在这些状况下，点又作为色—点或线—点而发挥创造性功能了。[①] 线在点之间，在点当中，而不再从一点向另一点运动了。它不再勾勒形状了。“他并不画物，而画物之间。”在绘画中，再没有比深度、尤其是视角更虚假的问题了。视角只不过是占领对角线或斜线的历史方式，是逃亡路线（这里指绘画中的线条向盲点运动——英译注），换言之，是对运动中的视区加以重新分域。我们用“占领”这个词，意思是“占用”，固定一个记忆和一个符号，赋予其一种功能。但是，逃亡路线，斜线，除了这种克分子功能外，还可起到许多其他作用。作为视角线的逃亡路线决不是用来再现深度的，而本身促成了这种再现的可能性，但只在特定时刻于瞬间内产生这种可能性。视角，乃至深度，是对逃亡路线的重新解域，这种重新解域通过使这条线向纵深发展而创造了绘画。人们所说的中心视角把逃亡的多重性和线条的能动性投入到一个数点的黑洞之中。相反，视角的问题的确引发出众多的创造性线条，发放出大量的视区，与此同时又声称控制了这些线条和视区。在各自的创造行为中，绘画和音乐是在从事一种强度相同的生成活动吗？

---

① 画家无论在哪方面都存有许多差别，但也有一种普遍运动：见 Wassily Kandinsky, *Point and Line to Plane* in vol. 2 of *Complete Writings on Art*, ed. Kenneth C. Lindsay and Peter Vergo (Boston: G. K. Hall, 1982), pp. 524 – 700; and Paul Klee, *On Modern Art*, trans. Paul Findlay, intro. Herbert Reed (London: Faber, 1966)。诸如蒙德里安关于垂直线和水平线之绝对价值的类似陈述，目的是要表明垂直线和水平线在何种程度上足以创造甚至不必画出的斜线；比如，薄厚不均的坐标在框架内交叉，并延伸到框架之外，打开了一个斜向运动的“能动轴”（见 Michel Butor's comments in *Répertoire* [Paris: Minuit, 1960 –], vol. 3, “Le carré et son habitant”）。还可以参照 Michel Fried 论波洛克的线条的文章，*Three American Painters* (Cambridge, Mass.: Fogg Art Museum, 1965), and Henry Miller's discussion of Nash's line, *On Turning Eighty* (London: Village Press, 1973)。

生成—音乐。我们试图界定西方音乐中（尽管其他音乐传统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但在不同状况下它们有不同的解决方法）表现层面上的一个生成区，或一个表现区：这个生成区依赖于斜线，它们不断逃避特定时刻作为音乐语码而发生作用的坐标或数点系统。显然，有一个与这个表现区相对应的内容区。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对应；如果本身作为音乐（而非主体或主题）的内容不总是干扰表现的话，那就没有活动的“区”。音乐解决什么问题？与声音表现不可分割的内容是什么？这很难说；但一定是有内容的：一个孩子死了，一个孩子在玩耍，一个女人诞生了，一个女人死了，一只鸟飞来了，一只鸟飞走了。我们想要说，这些并不是偶然的音乐主题（即便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更不是模仿的习作；它们是音乐的本质。为什么是一个孩子？一个女人？一只鸟？因为音乐表现是与构成内容的生成女人、生成孩子、生成动物分不开的。为什么孩子死了？鸟儿像被箭射中一样下落？因为任何一条逃亡路线或创造性的解域都有“危险”：走向灭亡、走向废除的危险。作为一个孩子—女人，一个秘密，梅丽桑德（德彪西歌剧中的人物——英译注）死了两次。音乐从来就不是悲剧的；音乐是欢乐。但是，有时候，它必然要使我们体会到死亡；体会到湮灭，因此不是欢乐之死的那种幸福。它在我们内心里唤醒的决不是死亡本能的一种功能，而是其声音组合、声音机器所固有的一个维度，音乐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时刻，即斜线变成废除路

线的时刻。和平和愤怒。[1] 音乐渴望破坏，每一种破坏，湮灭，断裂，错位。难道这不是音乐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吗？每当音乐家写回忆录时，那都不是灵感或记忆的问题，相反，是在面对自身危险时的生成问题，甚至能为了再生而死亡：一个生成孩子，一个生成女人，一个生成动物，只要这些都是音乐本身的内容，并能持续到死亡的话。

不妨说，叠歌是音乐的正当内容，是音乐正当的内容区。一个孩子在黑暗中自娱，或拍手，或发明一种走路的方式，以适应人行道上的裂缝，或唱“Fort – Da”（精神分析学家没有处理好“Fort – Da”，把它们当作对立语音或语言无意识的象征性因素来处理，而实际上这是一句叠歌）。特拉、拉、拉。一个女人自唱道，“我听到她低声对自己哼着小曲。”一只小鸟突然哼起了它的叠歌。所有音乐都充斥着鸟的歌唱，从雅内坎到米西昂要有上千种方式。Frr，Frr。音乐中到处都是童年区，女性区。音乐中到处都是少数，但却构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儿童的、妇女的、族群的、地域的叠歌，爱和毁灭的叠歌：节奏的诞生。舒曼的作品是由叠歌、由童年区组成的，但却是以极特殊的方式处理的：即他自己的生成孩子，他自己的生成女人，克拉拉。完全可能把音乐史上利用叠歌的斜线或对角线编成目录，还有全部的儿童游戏和儿歌，全部的鸟唱。但这种目录将是无用的，因为它看起来是主题、主体和中心思想的繁殖，而实际上却是最根本、最必要的音乐内容问题。叠歌的中心思想可能是焦虑、恐惧、快乐、爱、工作、散步、地区

---

① “在演奏委婉平和的音乐时，他那善意的胸怀里有一种紧张，愤怒已达到无以容忍的程度。音乐越是悦耳，在纯粹极乐的状态中演奏得越是精湛，他内心里发狂的愤怒就越强烈”；D. H. Lawrence，*Aaron's Rod*（New York：Thomas Seltzer，1922），p. 16.

……，但叠歌本身却是音乐的内容。

我们决不是说叠歌是音乐的起源，或者说音乐开始于叠歌。音乐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仍然不得而知。相反，叠歌是防止音乐、阻止音乐、或抛弃音乐的手段。但音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叠歌也存在，是因为音乐接纳了叠歌，抓住了它，将其作为一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是因为音乐与叠歌一起构成了一个区，以便将它带到别处。孩子的叠歌，虽然不是音乐，但却与音乐的生成孩子构成了一个区：不妨重申，这种非对称性创作是必要的。“啊，妈妈，现在你该知道了，”这是莫扎特的叠歌。C 大调中的一个主旋律，接着是 12 种变体；不仅这个旋律的每一个音符都是重叠的，而且旋律也是内部重叠的。音乐把叠歌从属于对对角线和斜线的这种特殊处理，把叠歌从其领域中根绝出来。音乐是一种创造性的、能动的运作，包括对叠歌的解域。叠歌基本上是地域的，分域的，或重新分域的，而音乐则使它成为一个解域的表现形式的被解域了的内容。暂且不论那个句子：音乐家所做的应该是音乐，应该是音乐创作。反过来，我们先来打个比方：穆索格斯基集于《死亡之歌舞》中的“摇篮曲”表现一个疲惫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病孩子；死神唱着摇篮曲来了，使她得以解脱。摇篮曲中的每一个对句都以偏执式的冷静的叠句结束，只带一个音符的重复节奏，一个点—区：“嘘，我的孩子，睡吧，我的孩子”（这个孩子不但死了，叠歌的解域也由于死神的亲自到来而重叠，死神代替了母亲）。

绘画也有类似情况吗？如果有，那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决不相信美术系统；我们认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相异的艺术中找到答案。对我们来说，艺术是个错误概念，一个纯粹的唯名概念；然而，这并不排除各种艺术同时在一个确定的多

元体内使用的可能性。绘画所“内嵌”的“问题”在于表面风景。而音乐则完全不同：音乐的问题是叠歌。每一个都在特定条件下于特定时刻在其问题线上发生；但二者间不可能有结构的或象征的对应，除非把它们转译成数点系统。我们已经把风景问题分成下列三种状况：（1）身体、影子、姿态、色彩和线条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已经大量出现在动物当中；头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是环境，其对应物是生物小区；这些系统已经表现出了纯粹的线条，如“草茎”行为）；（2）面目组织，白墙/黑洞，面孔/眼睛，面孔的剖面/眼睛的余光（这个面部符号系统把风景作为其对应物：整个身体的面目化和所有环境的风景化，基督是欧洲的中心点）；（3）面目和风景的解域，热衷于探头，因为探头的路线不再勾勒一个形状或一个轮廓，其色彩也不再表示风景了（这是图画符号系统：让面部和风景逃跑。比如，蒙德里安所说的“风景画”：纯粹绝对解域了的风景）。

为方便起见，我们先来论述三个连续而不同的状态，但只是临时的。我们不能确定动物是否有绘画，尽管它们不在画布上做画，但荷尔蒙却能诱导出它们的色彩和线条；甚至在这里，也几乎没有理由把动物与人类截然地区别开来。相反，我们必须承认，绘画并非开始于所谓的抽象艺术，而是再造了身体的影子和姿态，而且已经在面目—风景的系统中充分发挥作用了（画家“描画”基督的面孔，并以宗教符号的形式向四外扩散）。绘画的目的始终是对面部和风景的解域，其方法是要么激活身体，要么是解放线条或色彩，或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绘画中有许多生成动物、生成女人和生成孩子。

如果音乐的问题真的是叠歌，那情况就不同了。给叠歌解域，为叠歌开拓解域的路线，这些程序和建构与绘画毫无关系

（外在于画家常常试图确立的那些模糊的类比）。再者，我们无法确定能否在动物与人类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如米西昂所认为的，难道没有音乐的鸟和非音乐的鸟吗？鸟的叠歌必然是地域的吗？它不是已经用于非常微妙的解域、用于选择逃亡路线了吗？噪音与声音之间的区别固然不能用来定义音乐，甚至不能用来区别音乐的鸟和非音乐的鸟。相反，这是叠歌的劳动：它是否仍然是地域的和分域的？它是否在一个运动区中被带走，在所有的坐标中——在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画出了一条斜线？音乐恰恰是叠歌的冒险：如同音乐不知不觉地退回到叠歌中（在我们的头脑中，在斯万的头脑中，在电视和广播的伪探头上，伟大音乐家的音乐是一种签名乐调，一支小曲）；如同音乐抓住叠歌，使其越来越清醒，将其减缩到几个音符，然后把它放在创造线上，那里如此丰富以至于看不到它的开头和结尾……

勒罗伊－古汗在“手工工具”与“面部语言”的两极之间确立了一种区别和对应关系。但这里有一个区别内容形式和表现形式的问题。这里，我们考虑的是能抓住自身内部内容的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另一种区别：带有视觉对应物（眼睛）的面部与绘画有关；带有听觉对应物（耳朵本身就是重叠，形状也是重叠的）与音乐有关。音乐是对声音的解域，与语言的联系越来越少，而绘画是对面部的解域。声音特征的确可以作为面部特征的索引，如唇读；然而，二者并不是对应的，而随音乐和绘画各自的运动消失。声音远远先于面部，超前很远。因此，给音乐作品起名叫《面孔》就是最大的声音悖

论。[1] 把绘画和音乐的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的惟一方式就是确立一个外在于美术虚构的标准，以比较各自的解域力。音乐似乎具有一股更强的解域力，既集中又具有总体性，而声音则似乎具有更大的解域力。这个特征也许说明了音乐的总体魅力，甚至说明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音乐（鼓、号）把人与军队归为径直走向深渊的一类（比旗帜更有效，旗帜是绘画，是分类和集会的手段）。就个体而言，音乐家也许比画家更具反动性，更具宗教性，而少具“社会性”，但仍然握有一股无限强大的集体力量：“人民集会的合唱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凝聚力……”总是可以用放射和接收音乐的物质条件来解释这股力量，但也可以采取相反的方法；用音乐的解域力来说明这些物质条件。可以说，从突变的抽象机器的角度看，绘画和音乐并不与相同的临界构成对应，或者说，绘图机器和音乐机器并不具有相同的指数。相对音乐而言，绘画比较“落后”，如最具音乐性的画家克里所看到的。[2] 这也许是人们喜欢绘画的原因，甚或是美学把绘画作为特殊模式的原因：毫无疑问，绘画不像音乐那样让人“害怕”。甚至在与资本主义、与社会构型的关系上也完全不属于相同类型。

---

① 尽管鲁西阿诺·贝里奥表明了相反的情况，但在我看来，他的作品《面孔》是根据三种面部状态创造的：首先是健康身体和影子的繁殖，然后是对面孔的简短合成和主导控制，最后是把探头向四方扩散。然而，这里没有音乐“模仿”面孔及其化身的问题，或声音构成隐喻的问题。相反，声音加速了面部的解域，给它一股正当的声音力量，反过来，面部做出音乐的反响，引发出声音的解域。这是一个分子面孔，是由电子音乐生产的。声音先于面孔，它本身为那个瞬间构成了面孔，通过加速活过了面孔，只要它是未表述的、非指意的、非主体的。

② Will Grohman, *Paul Klee*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n. d.): “他似乎自相矛盾地说，至少在形式上把绘画发展到了莫扎特所发展的音乐水平，这也许是他的幸运”(p. 71)。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无疑要同时考虑地域、解域和重新分域的因素。动物和孩子的叠歌似乎是地域的：因此他们不具“音乐性”。但当音乐抓住了叠歌并对其加以解域时，它也在解域声音；而当它抓住了叠歌并以节奏声区迅速将其输送出去时，当叠歌“成为”舒曼或德彪西时，音乐便通过旋律和和声的坐标对作为音乐的自身加以解域。反之，我们将看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动物的叠歌也比动物的影子、姿态和色彩具有更强大的解域力。因此，我们必须把一些因素考虑进来：相对的地域性，其各自的解域，以及集体的重新分域，而且有若干种类型（比如，诸如音乐坐标等内在分域，叠歌堕落成贩卖的公式或音乐堕落成歌谣等外在分域）。事实上，没有特殊的分域就没有解域，这应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克分子与分子之间牢固的相互关系：任何流动，任何生成分子，在没有克分子因素的伴随、为不可感知的过程构成通道或可见风景的情况下，都不能逃离克分子的构型。

音乐的生成女人和生成孩子体现在声音的机器化问题上。把声音变成机器是音乐运作的第一步。如我们所知，在西方音乐中，这个问题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解决的，即意大利方式和英国方式：男高音“超出自己声音”的超高音，其在窦道内部和喉咙与硬腭后部发出的声音，并不依赖隔膜和支气管道；以及阉人的腹音，“更加强烈，更加洪亮，更加倦怠，”仿佛把肉体给了不可感知的、不可触摸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多米尼克·弗南岱兹就这个主题写了一本好书。他表明，音乐中声音的机器化问题幸运地摆脱了精神分析学就音乐与阉割之间关系的讨论，这必然意味着对整个二元机器的废除，换言之，克分子

构型把声音分配给“男人或女人。”① 音乐中不再有男人或女人了。然而，弗南岱兹描写的两性同体的神话是否可信，尚不得而知。这不是神话的问题，而是实际生成的问题。声音本身必须达到生成女人或生成孩子的程度。那是音乐的奇妙内容。如弗南岱兹所看到的，那已不再是模仿女人或孩子的问题了，即便唱歌的是一个孩子。乐音本身在孩子的声音变得洪亮、纯粹洪亮之时变成了孩子。任何孩子都做不到这一点，而即使做到了，那也是通过生成别的什么，而不是生成孩子，孩子属于一个不同的、奇怪的感性或神圣世界。简言之，解域是双重的：声音在生成孩子中被解域，但它所变成的孩子本身也是被解域的、未发生的生成。“孩子长了翅膀，”舒曼说。我们在音乐的生成动物过程中发现了同样曲折的运动：马塞尔·莫雷表明，莫扎特的音乐中充斥着生成马或生成鸟。但任何音乐家都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马或鸟。如果声区把生成动物当成内容，那么，动物就同时在洪亮的声音中变成了别的东西，绝对的东西，黑夜，死亡，欢乐——当然不是一般性或简化，而是个体性，这死亡，那夜晚。音乐把生成动物当作内容；但在生成动物的过程中，马把温柔的击鼓声作为表现，仿佛长了翅膀一样从天堂或地狱中飞出；而鸟儿则在回音、倚音、断音音符中找到了表现，鸟儿也因此而变成了灵魂。② 莫扎特音乐中构成对角线的正是重音，突出的也是重音。如果听不出重音，如果体会不到重音，那就会回到相对贫乏的数点系统。人类音乐家在鸟身上被解域，但被解域的、“被变形的”又正是鸟自身。

---

① Dominique Fernandez, *La rose des Tudors* (Paris: Julliard, 1976)（以及小说 *Porporino* [Paris: Grasset, 1974]）。弗南岱兹认为通俗音乐是向英国声乐的胆怯回归。有必要考虑循环呼吸的技巧，即同时利用呼气和吸气唱歌，也有必要考虑利用共鸣带（鼻子，前额，颧骨——音乐对面孔的正当使用）进行声音过滤。

② Marcel Moré, *Le dieu Mozart et le monde des oiseaux* (Paris: Gallimard, 1971).

一只神圣的鸟所经历的生成与它随之所生成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亚哈船长与大白鲸一道经历了不可抗拒的生成鲸的过程；但那个动物，大白鲸，必须同时变成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纯白，一道闪光的纯白色墙壁，一条银线，“像”姑娘一样伸展和柔软，像鞭子一样弯曲，或像堡垒一样矗立。文学能够赶上绘画、甚至音乐的步伐吗？绘画能够赶上音乐吗？（莫雷引用了克里的鸟，但另一方面又不理解米西昂关于鸟的论述。）任何艺术都不是模仿的，任何艺术都不可能是模仿的或比喻的。假定画家“再现”一只鸟，这事实上是一只生成鸟，它的发生只能说明鸟本身正处于生成别的东西的过程之中，如纯线条或纯色彩。因此，模仿自行毁灭，因为模仿者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生成物，与他或她所模仿的东西的生成物混合起来了。艺术家只有在失败时才模仿。画家和音乐家并不模仿动物，当动物变成了他们想让它变成的东西时，在他们与自然界的最深切协调中，他们是生成动物。[①] 生成始终是双重的，所生成的东西与正在生成的东西没什么两样——所构成的区本质上是活动的，从来不是平衡的。蒙德里安的画是完美的正方形。它在一个角达到平衡，用一条对角线半开半闭地打开了这个封闭的领域，同时带走了两边。

生成从来不是模仿。当希区柯克生成鸟的时候，他没有再造鸟的叫声，而生产了一种电子声音，仿佛一个强度场或一个震颤波，一个连续的变体，仿佛在我们体内喷涌而出的一个可怕的威胁。[②] 而这不仅仅适用于“艺术”：《大白鲸》的效果也

---

① 如我们所看到的，模仿要么是条件的相象，以原型（序列）告终，要么是关系的对应，构成了一个象征秩序（结构）；但生成却不能简化为此二者。模仿的概念不仅不充分，而且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② François Truffaut, *Hitchcock*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7)：“我利用了根本不让鸟尖叫的戏剧特权”（p. 224）。

维系于双重生成的纯粹已然经验，否则，该书也不会具有那种美。塔兰台拉舞是一种奇怪的舞蹈，能魔幻般地医治被毒蜘蛛咬伤的受害者或祛除毒素。但当受害者跳这种舞时，能否说他或她是在模仿蜘蛛吗？或与蜘蛛认同，甚至是通过一种“原型的”或“痛苦的”斗争而达到的认同吗？不。因为受害者，病人，被咬伤的人，只有在蜘蛛自身对于舞蹈者已成为纯粹的影子、纯粹的色彩和纯粹的声音时，才成为舞蹈的蜘蛛。[①] 人并不模仿；人建构一个生成区。模仿只作为对这个区的调节而存在，仿佛结尾时的一笔，一次眨眼，一个签名。但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别处：生成蜘蛛的舞蹈发生在蜘蛛成为声音和色彩、管弦乐和绘画的状态下。举当地的民间英雄“快马”阿列克西斯为例。他“像”马一样跑得飞快，不停地鞭打自己，嘶叫着，用后蹄站立，踢腿，跪倒，如马一样躺倒在地上，在赛马场上与马争高低，并与自行车和火车赛跑。他模仿马是为了取悦于人。但他有一个更深的临近和不可辨别的地带。资料告诉我们，当他演奏口琴的时候，他决不是什么马：恰恰因为他不再需要一种调节性的或次要的模仿了。据说他称他的口琴为“切削破坏器”，演奏时比别人快一倍，加倍了节拍，强行一种非人速度。[②] 当马的因素变成口琴时，阿列克西斯越发成为马了，而马的快步也加倍了速度。如以往的例子一样，这也适用于动物。动物不仅有色彩和声音，而且并不等待音乐家或画家在音乐或绘画中使用它们的色彩和声音，换言之，并不等待着

---

① 见 Ernest de Martino, *La terre du remords* (Paris: Gallimard, 1966), pp. 142 - 170. 但马提诺仍然保留了基于原型、模仿和认同的一种阐释。

② Jean Claude Larouche, *Alexis le trotteur* (Montreal: Ed. du Jour, 1971). 他们引用了这样一段话：“他不像我们这样用嘴演奏音乐；他有一个巨大的口琴，我们甚至无法使用……当和我们一起演奏时，他会突然决定超过我们一倍。换言之，他加倍了节拍；我们奏一个节拍，他奏两个，那需要非凡的风力”(p. 95)。

借助解域因素进入确定的生成色彩和生成声音（我们稍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动物生态学已先进得足以进入这个领域了。

我们根本不是在讨论性质美学，仿佛纯粹的性质（色彩，声音等）是毫无限度的生成的秘诀，如在《菲勒布斯》中一样。纯粹的属性在我们看来仍然属于数点系统：它们是回忆，或是超验的回忆，或是漂浮的回忆，或是幻象的种子。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只考虑一个属性在特定组合中或从一个组合过渡到另一个组合时履行的功能。必须从捕捉到这个属性的生成物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属性，而不是从具有原型或无形发生记忆的价值的内在属性的角度来考虑生成物。比如，白色，色彩，是生成动物的过程所必需的，而这个生成动物的过程可能是画家的，也可能是亚哈船长的；同时，在生成色彩过程中，生成白色的过程也可能是动物本身的。大白鲸的白色是它生成孤独的特殊指数。色彩，影子和动物的叠歌是生成婚姻和生成社交的指数，而这种婚姻和社交也是解域因素。一个属性只能作为一个组合的解域路线或在从一个组合过渡到另一个组合时才发挥作用。一个动物区之所以不是无形发生的记忆，一个儿童区之所以不是童年记忆，原因就在于此。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一个属性决不为自身或作为记忆发生作用，而是对它于中被解域的组合加以矫正，反过来，它又为之提供一条解域路线。比如，童年时的教堂尖塔变成了城堡的塔，进入了不可辨别的地带（“在参差不齐的城垛，断垣残壁中摸索着”），并开拓出一条逃亡路线（仿佛其中一个租户“从房顶跳将出来”）。[①] 如果在普鲁斯特那里，事物更加复杂而不太清晰的话，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属性包含着回忆或幻想，然而，即使在普鲁斯特那里，这

---

① 见 Kafka, *The Castle*, trans. Willa and Edwin Muir (New York: Knopf, 1976). ——英译注。

些属性也同样是功能区，但不是作为回忆或幻想，而是作为生成孩子，生成女人，作为从一个组合向另一个组合过渡的解域因素。

对我们在前面（讨论面孔时）遇到的简单解域的定理，[①] 我们现在可以加上普遍双重解域的定理。定理 5：解域总是双重的，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主要变量和一个次要变量在一个同时生成过程中的共存（一个生成的两个条件并不交换位置，也不认同，反而进入一个非对称区，在这个区内，二者发生相同的变化；这构成了它们的临近地带）。定理 6：在非对称性的双重解域中，可能有一个解域的力和一个被解域的力，即便同一个力也可以根据所论的“时刻”或方面发生价值转换，即从解域的力转换到被解域的力；此外，引发最大解域元素的解域的恰恰是最小的被解域元素，而后，前者将尽最大努力反拨后者。定理 7：解域元素起到相对的表现作用，被解域元素起到相对的内容作用（这显见于艺术中）；但是，不仅内容与外部主体或客体毫无关系，因为它与表现构成了一个非对称区，而且，解域还把表现和内容带到一个临近地带，在那里，二者之间的区别已经无足轻重了，或者说，在那里，解域促成了二者的不可辨别性（比如，作为音乐表现形式的声音对角线，和作为音乐固有的内容、作为叠歌的生成女人、生成孩子、生成动物）。定理 8：一个组合与另一个组合并不拥有相同的解域力或解域速度，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根据所论的生成区和抽象机器的内部变化计算指数和系数（比如，与音乐相关的绘画的某种迟缓，某种黏性；但不能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划一条象征性界限，而只能计算和比较解域的力量）。

---

① 见本书：7，“Year Zero: Faciality,” pp. 167 – 191. ——英译注。

弗南岱兹表明了声乐中出现的生成女人和生成孩子。然后，他谴责器乐和管弦乐的兴起。他特别讨厌威尔地和瓦格纳对声音重新进行了性别化处理，为满足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恢复了二元机器，即让男人成为男人，女人成为女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声音：威尔地声音，瓦格纳声音，都在男人和女人的问题上被重新分域了。他解释了罗西尼和贝里尼的过早消失（前者的退休和后者的逝世），是因为他们感到歌剧的声音生成已不再可能了。然而，弗南岱兹并没有质疑这是在什么状况下、以哪些新型的对角线发生的。首先，声音的确不再用简单的器乐伴奏自为地机器化；它已不再是独立的表现层面或线条了。可为什么呢？音乐跨越了新的解域临界，跨越了这个临界，就是把声音机器化的乐器，声音和乐器被带到同一个平面上来，有时形成对抗，有时构成互补，有时又相互交换和补充。歌曲，尤其是舒曼的歌曲，也许标志着这种纯粹乐曲的第一次出现，把声音和钢琴置于同一个黏性平面上，把钢琴变成了谵妄的乐器，为瓦格纳的歌剧铺平了道路。甚至可以举威尔地为例：人们常说他的歌剧是抒情的，声乐的，尽管破坏了美声唱法，尽管在后期作品中配器相当重要。然而，声音还是被乐器化了，在应用音域或延长方面获得了非凡成就（威尔地的男中音，威尔地的女高音）。无论如何，问题不在于特定的作曲家，尤其不在于威尔地，或特定体裁，而在于影响音乐的比较普遍的运动，乐器的缓慢变化。如果声音回归到两性的二元分配，那就关系到配器中乐器的二元组合。音乐中总是有用做坐标的克分子系统；在声音的层面上再次出现的这种按性别划分的二元系统，这种克分子和数点分布，为新的分子流动奠定了基础，这种新的分子流动将切割、联合、并在一种器乐化和配器中被荡涤干净，而这本身就是创造的组成部分。声音可能在两性的分布中被重新分域，但连续的声音流动仍将作为潜在的差

异在两性之间穿过。

这把我们带到第二点上来：关于声音解域的这个新的临界，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正当的声音生成女人或生成孩子，而在于生成分子，声音本身在这种生成中被乐器化了。当然，生成女人和生成孩子也同样重要，甚至具有了新的重要性，但只是在传达另一个真理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已经是一个分子孩子，一个分子女人……我们只需以德彪西为例：他作品中的生成女人和生成孩子是强烈的，但却是与思想主题的分子化分不开的，通过配器获得的一种可证实的“化学”。孩子和女人现在已与大海和水分子不可分割（《海妖》恰恰代表了把声音与管弦乐器相融合的首次圆满尝试）。瓦格纳已经由于其音乐的“元素”性质，对水的利用，或思想主题的“原子化”，即“细分成无限小的单位，”而受到了谴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生成动物，这个问题就更加清楚了：鸟仍然同样重要，然而鸟儿王国似乎被昆虫时代取代了，因而有了更多的分子震颤，唧唧声，沙沙声，嗡嗡声，咔哒声，刮嚓声和嘎嘎声。鸟是发声的，而昆虫是乐器的：鼓和小提琴，吉他和钹。[①] 生成昆虫取代了生成鸟，或与昆虫构成了一个区。昆虫距离较近，更容易

---

① André Tétry, *Les outils chez les être vivants* (Paris: Gallimard, 1948)，论“乐器”的一章，备有参考书目。动物的运动或劳动可能制造噪音，但我们说，当动物使用器具时，那就是乐器，它的惟一作用就是生产各种声响（具有音乐属性，甚至是明确的，易变的，如鸟的声带器官一样；可以证明昆虫中有许多精湛的表演。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区别出：(1) 刺耳的发声器，属于弦乐器类型：粗糙的表面与另一个表面相摩擦发出的声响（昆虫，贝壳类，蜘蛛，蝎子，须肢动物）；(2) 打击的发声器，属于鼓、钹、木琴之类：肌肉直接接触震颤膜（蟋蟀和一些鱼）。不仅器官和声音的种类是无限的，同一个动物的节拍、音调、强度也据其神秘的迫切性而不同。“因此有愤怒、焦虑、恐惧、傲慢和爱的歌。当极度兴奋时，刺耳的节拍发生变化：在 Crioceris lilii 中，摩擦的频率从每分钟 228 次增加到 550 次或更多。”

使人听到一切生成都是分子这一真理（参照马特诺的海浪，电子音乐）。分子有能力让元素与宇宙交流：恰恰因为它促成了形式的分解，把最多样的经度与纬度、最变化多端的速度和迟缓连接起来了，通过把变体延伸到极限之外而保证了连续。重新研究莫扎特，就会发现“主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变体。瓦莱斯解释说，声音分子（区）可分成根据可变的速度而进行不同排列的许多元素，但也可分成向全宇宙辐射的一种声能的许多波或流，一条头朝下的逃亡路线。他就这样让戈壁滩住满了昆虫和星星，构成了一个生成音乐的世界，或为宇宙构成了一条对角线。米西昂表现了众多色彩绵延的联合，“在最长和最短的绵延之间交替，以便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星星和山脉的无限长的绵延是与昆虫和原子的无限短的绵延相关的：一种宇宙的元素力量……主要产生于有节奏的劳动。”① 使音乐家发现鸟的情况也可以使他发现元素和宇宙。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区，一个宇宙纤维，一条对角线，或一个复杂空间。音乐发放分子流动。当然，如米西昂所说，音乐并不是人类特有的：宇宙，世界，都是由叠歌构成的；音乐的问题在于，自然、动物、元素和沙漠与人一样也拥有解域的力量。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类所拥有的非音乐性在自然中已经是音乐了。此外，米西昂在音乐中发现的与生态学家在动物身上所发现的相同：除了进行编码、制定数点系统的手段外，人类几乎不占任何优势。那甚至是占优势的反面；通过生成女人、孩子、动物或分子，自然把它的力量、音乐的力量与人类的机器对立起来，即工厂和炸弹的吼叫。有必要达到那一点，人类的非音乐声音有必要与生成音乐的音响构成一个区，让它们相互对抗，相互拥

---

① Gisèle Brelet, “Musiqu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in *Histoire de la musique*, ed. Roland Manuel, “Pléiade” (Paris: Gallimard, 1977), vol. 2, pp. 1166.

抱，像两个摔跤手一样难解难分，并沿着一条斜线滑下去："让合唱代表幸存者……人们恍惚听到了知了的声响。然后是云雀的音符，接着是嘲鸫。有人大笑……一个女人在哭泣……一个男人发出一声大喊：我们迷路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们得救了！斯塔卡托喊道：迷路！得救！迷路！得救！"①

① 亨利·米勒为 Varèse 写的一个文本，*The Air – Conditioned Nightmare*（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45），pp. 176 – 177.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①]

原理 I. 战争机器外在于国家机器。

命题 I. 这种外在性首先在神话、史诗、戏剧和游戏中得到验证。

乔治·杜梅西尔在对印欧神话的确定性分析中表明，政治主权或统治有两个头领：一个是魔术师—国王，另一个是法官—牧师。王和祭司，国王和婆罗门，罗穆卢斯和努马，伐楼拿和米特拉，君主和立法者，立约者和组织者。毫无疑问，这两极的对立是针锋相对的，如同模糊与清晰，暴力与和平，敏捷与笨重，无法无天和规规矩矩，“约束”和“合同”，等等。[②]但这种对立只是相对的；它们作为变换的一对儿，仿佛表现了一的分化，或本身构成了一个主权统一。“同时既是对抗的又是互补的，相互需要，因此没有敌意，没有冲突的神话：在任何一个层面上的详细描述都自动要求另一个层面上的同源描

---

① Selected from Gilles Deleuze and Féle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y Brian Massumi (London an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351 – 423. Notes from pp. 552 – 564.

② Georges Dumézil, *Mitra – Varuna* (Paris: Gallimard, 1948). 关于约束与合同，见 pp.. 118 – 124.

述。二者合起来穷尽了功能场。”它们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因素，通过一对一的步骤运作，分配二元差异，构成一个内在性环境。这是使国家机器变成层次等级的一种双重表述。

将要看到的是，战争并不包括在国家机器中。国家要么支配不通过战争渠道的暴力——用警察和狱卒代替军队，没有武装，也不需要武装，通过直接的、魔幻般的抓捕、“捕捉”和“绑缚”来防止一切战斗；要么就建立一支军队，但前提是依法把战争与军事组织的功能融合在一起。① 至于自在的战争机器，似乎不能化简为国家机器，它外在于国家主权并先于法律；它源于别处。战神因陀罗与伐楼拿作对，就如同与米特拉作对一样。② 他不能被化简为一个或另一个，就如同他不能构成第三个战神一样。他就像一个纯粹的无法衡量的多元体，一个帮伙，转瞬即逝的变形力量的一次突发。他解开绳索就像背叛帮伙一样。他用喧闹抵抗主权，用快速抵抗引力，用秘密抵抗公开，用权力抵抗主权，用机器抵抗装备。他是另一种正义的见证，有时令人难以置信地残酷，有时又无与伦比地仁慈（因为他解开了绳索……）。③ 最重要的是，他是与女人、与动物等其他关系的见证，因为他看到了有关生成的全部事物，而不是把二元分配置于“国家”之间：它证实了武士的一种生成动物，一种生成女人，这既外在于条件的二元性，又外在于关

---

① “国家的第一极（伐楼拿，天王，罗穆卢斯）通过魔幻般的束缚、抓捕和直接捕捉运作：它不展开战斗，没有战争机器，它束缚，仅此而已。其另一极（米特拉，宙斯，努马）利用军队，但用法律和制度规则限制军队，使之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因此，玛尔斯－提瓦兹并不是战神，而是‘司战争之神’。”见 Dumézil, *Mitra – Varuna*, pp. 113ff., 148ff., 202ff.

② Dumézil, *The Destiny of the Warrior*, trans. Alf Hiltebe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③ 关于战神“解开绳索”、与魔幻束缚和法律合同作对的功能，见 Dumézil, *Mitra – Varuna*, pp. 124 – 132. 又见杜梅西尔著作中对“喧闹”的分析。

系的对应性。无论在哪方面，战争机器都属于有别于国家机器的另一类、另一本质和另一本源。

姑且举一个有限的例子，在博弈论的语境下比较战争机器与国家机器。我们且从棋子的角度来看象棋和围棋中棋子与其所用空间的关系。象棋是国家游戏，宫廷游戏：中国皇帝下象棋。象棋的棋子是被编码的；它们具有内在性和各种内在属性，由此而衍生出它们的运动、处境和对峙。它们是有个性的；马就是马，卒就是卒，象就是象。每一个都是被赋予了相对权力的陈述的主体，这些相对权力在表述的主体身上，即在下棋者或游戏的外在形式上集中体现出来。对比之下，围棋是弹丸，是圆片，是简单的数学单位，只具有一种无名的、集体的或第三人称的功能："它"下一步棋。"它"可能是男人，女人，一只虱子，一头大象。围棋棋子是一个非主观化的机器组合的各个因素，没有内在属性，只有环境属性。因此，这两种情况下的关系非常不同。在内部环境中，象棋棋子相互之间以及与对方棋子之间的关系是双向单声部的，起着结构的功能。另一方面，围棋棋子只有外部环境，或与星云或星座的外在关系，它根据这种关系履行插入或定位的功能，如划定边界，围攻和突破重围等。一个围棋棋子可以匹马单枪共时地攻破整个星座。而一个象棋棋子却不能（或只能历时地打败对方）。象棋的确是战争，但却是制度化了的，有规则的，被编码了的战争，有前线、后方和战斗。但围棋却是没有战线的战争，既没有对峙也没有撤退，甚至没有战斗：纯粹的策略，而象棋则是符号学。最后，空间也决非相同：在象棋中，问题是为自己安排一个封闭的空间，是要从一点走向另一点，是要以最小量的棋子占领最大数量的方格。在围棋中，问题是要把自己安排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占据空间，保持在任何一点上都能跳起的可能性：运动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永久的，没有目标或

目的地，没有起点或终点。围棋的“平滑”空间与象棋的“条纹”空间相对立。围棋的诺摩斯（nomos，法则）对立于象棋的国家，法则对立于城邦。其差别在于，象棋给空间编码和解码，而围棋则全然不同，对空间进行分域或解域（把外部当作空间地域；通过建立第二个临近地域加固第一个地域；通过从内部打破敌人的地域而对敌人进行解域；通过放弃、去往别处而对自己解域……）。另一种正义，另一种运动，另一种时空。

“他们来了，仿佛命运之神，没有理由，没有考虑，没有借口……”“在某种意义上，那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径直攻入首都。不管怎么说，他们就在这里；他们的人数好像每天早上都在增加。”① 卢克·德·休什分析了一个班图神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同的阴谋：空格罗是土著皇帝和公共事务管理者，公务员和警察，把他的同父异母妹妹们送给了狩猎者比迪，比迪帮助他后，离开了。比迪的儿子心怀叵测，与父亲一起走了，回来时从外部带来了那个想象不到的东西，一支军队。他杀死了空格罗，建立了一个新国家。② 在魔幻的君主国家与包括军队制度在内的法制国家“之间”，我们看到了来自外部的战争机器的闪现。

从国家角度看，战争人的创新性及其怪癖必然以否定的形式出现：愚蠢，畸形，疯狂，不合法性，篡权，罪孽。杜梅西

---

① 第一句引文出自尼采，*The Genealogy of Morals*，second essay，sect. 17，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1967), p. 86. 第二句出自卡夫卡，“An Old Manuscript,” The Complete Stories, ed. Nahum N. Glazer (New York: Schocken, 1983), p. 416.

② 卢克·德·休什强调了空格罗行动的公开性，以对立于比迪父子的秘密行动；尤其明显的是，前者在公开场所吃饭，而后者在用餐时从不露面。以后我们将看到战争机器与秘密的重要关系，这既是原则问题，又是结果：间谍活动，策略，外交。评论家们常常强调这一关联。*Le roi ivre ou l'origine de l'État* (Paris: Gallimard, 1972).

尔分析了印欧传统中武士的三条“罪过”：反国王，反牧师，反国家法律（比如，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的性犯罪，甚至对国家制定的战争法的违背）。① 武士所处的位置使他能背叛一切，包括军事功能，不然就什么都不懂。结果，历史学家，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苏联的，都遵循这一否定传统来说明成吉思汗何以什么都不懂：他“不懂”城市现象。这并不难启口。问题就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上，战争机器的外在性显见于各处，但仍然难以概念化。仅仅证明战争机器外在于国家机器是不够的。有必要把战争机器看作一个纯粹的外部形式，而国家机器则构成了我们习惯上当作模式的内在形式，或我们借以构成思维习惯的模式。其复杂的原因在于，战争机器的这种外部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与国家机器的两个头领之一相混淆。有时，它与国家的魔幻暴力相混淆，在另一些时候则与国家的军事制度相混淆。比如，战争机器发明了速度和保密制度；但这与国家的速度和保密制度完全相同，尽管是相对次要的。所以，把政治主权的两极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两极的互动关系，与战争权力混为一谈就是极其危险的。杜梅西尔对罗马皇帝的谱系进行了综述：首先是在整个序列中反复发生的罗穆卢斯－努马的关系，在这两种同样合法的统治者之间还有一些变体和交替。但还有一种与“坏国王”的关系，图鲁斯·霍斯提里乌斯，塔奎尼乌斯·苏波布斯，不安定的、不合法的武士骤然兴起。② 这也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国王：甚至暴力、谋杀和罪恶都没有妨碍国家生产“好”国王；但像理查三世这样

---

① 关于印度神因陀罗、斯堪的纳维亚英雄斯塔卡瑟鲁斯和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的三种罪孽的分析，见杜梅西尔，*Mythe et epopee*，vol. 2，pp. 17 – 19（Paris: Gallimard，1971）. 见 *The Destiny of the Warrior*.

② Dumézil，*Mitra – Varuna*，p. 135。杜梅西尔分析了这些混淆的危险和原因，这是由经济变量造成的。见 pp. 153，159。

令人不安的人物溜了进来，从一开始就宣告了他要重新发明战争机器并要推行战争机器的意图（畸形的，阴险的，背叛的，他宣布的“秘密封闭意图”完全不同于对国家权力的征服，[①] 与女人的另一种——一种另外——的关系）。简言之，无论何时，一旦战争力量的爆发与国家统治路线相混淆，麻烦就出现了；这时，只能通过否定的范畴来理解战争机器，因为在国家之外一切都已荡然无存。但是，一旦回到外部环境，战争机器就被看作另一类，另一性质，另一来源。必须认为它位于国家的两个头领之间，位于两种表述之间，而要想从一种走向另一种，就必须经过战争机器。但在二者“之间”，在那个例子中，即便是昙花一现，它也宣告了它的不可简约性。国家不拥有自己的战争机器；它只能挪用以军事制度为体现的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会接二连三地给它带来麻烦。这说明国家之所以不信任军事制度，是因为军事制度继承了一种外在的战争机器。卡尔·封·克劳斯维茨概述了这种情况，他把绝对战争的流动看作国家出于政治需要而片面采纳的一个理念，而且或多或少是合格的“导体”。

身陷政治主权的两极之间，战争人似乎是过往时代的、遭谴责的、没有未来的人，只是以自己的愤怒对付自己。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然后是埃阿斯，他们的后代以足够的力量宣布独立于阿伽门农，那个旧城邦之人。但在尤利西斯面前，他们却无能为力。尤利西斯属于新兴的现代国家人，第一个现代国家人。正是尤利西斯继承了阿喀琉斯的武装，把它们用于其他方面，使之服从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埃阿斯。埃阿斯由于

① *Richard III*, act I, scene I, line 158.

蔑视女神而受诅咒，而犯罪。[①] 把战争人的境遇描写成怪异和遭罚者的，最好的作家莫过于克莱斯特。在《彭忒西勒亚》中，阿喀琉斯已经摆脱了权力：战争机器已经传给了亚马孙人，一个没有国家的女族，她们的正义、宗教和爱都是专以战争方式组织的。作为斯库忒斯人的后代，亚马孙人像闪电一样在希腊和特洛伊这两个国家“之间”崛起。她们扫清一切障碍。阿喀琉斯被带到他的对手彭忒西勒亚面前。在不明不白的斗争中，阿喀琉斯无法抵制他对彭忒西勒亚的爱，无法抵制与战争机器结婚，因此也无法不同时背叛阿伽门农和尤利西斯。然而，他早已属于那个希腊国家了，而对彭忒西勒亚来说，如果她本人不背叛本族的集体律法，防止“选择”敌人、因此也防止进入一对一的关系或二元差异系统的帮伙律法，她也无法与阿喀琉斯进行那场情感战争。

在整个作品中，克莱斯特赞扬了战争机器，把它与国家机器对立起来，进行一场从一开始就失败了的斗争。毫无疑问，阿米尼乌斯歌颂打破了帝国联合武装的日耳曼战争机器，将其与罗马国家永远对立起来。但洪堡王子却只生活在梦中，由于几乎成功地违背了国家法律而遭世人唾骂。至于克尔哈斯，他的战争机器充其量不过是土匪。在国家胜利时，战争机器的命运只能是下面这种选择吗？要么是由国家机器规训的军事机构，要么把矛头对准自己，成为孤独的男人和孤独的女人的双重自杀机器？歌德和黑格尔都是论述国家的思想家，都把克莱斯特视为怪物，而克莱斯特从一开始就失败了。那么，何以说他身上存在着最异乎寻常的现代性呢？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包

---

① 关于埃阿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见 Jean Starobinski 的分析，*Trois Fureurs* (Paris: Gallimard, 1974)。斯塔罗宾斯基清楚地提出了战争和国家的问题。

含着秘密、速度和情感的因素。① 在克莱斯特的作品中，秘密已不再是以内在性为形式的内容了；相反，它变成了一种形式，与总是与外在于自身的外在性的形式相认同。同样，感觉也从“主体”的内在性中根绝出来，被疯狂地抛向外部，进入纯外在性的环境，这种环境赋予它们难以置信的速度，一股飞流急下的力量：爱或恨，都不再是感觉而是情感。而这些情感都是武士（熊，母狗等）生成女人、生成动物的例子。情感就像箭一样穿透身体，它们是战争武器。情感速度的解域。甚至梦（洪堡的梦，彭忒西勒亚的梦）也被一个接力和插入系统外化了，被属于战争机器的外部联系外化了。破碎的指环。这个外在性因素——这个主导一切的、克莱斯特在文学中发明的、他第一个发明的因素——将赋予时间以新的节奏：无休止的连续紧张或昏迷，突发的紧张或繁忙。紧张症是：“这种情感对我来说太强烈了，”而突发的紧张则是：“这股情感力量占据了我，”所以，自我现在不过是一个映像，它的行动和感情都失去了主体，也许到了死亡的程度。这就是克莱斯特的个性公式：一连串的疯狂逃亡和紧张的僵化，其中，主体的内在性已经荡然无存。克莱斯特作品中有许多东方的东西：日本相扑摔跤手，看起来纹丝不动，而出手又太快让人难以看见。围棋棋手。现代艺术中有许多因素来自克莱斯特。歌德和黑格尔是紧次于克莱斯特的老人。有没有可能在战争机器停止存在、被国家征服的时刻，它却又最充分地展示了它的不可简约性，又分散在思想、爱情、死亡或创造机器之中，而这些机器又以生命力或革命力量向征服它们的国家发起挑战？已经被攻克、遭谴责、被利用的战争机器是否已经在这个过程中采纳了新形式，

① Mathieu Carrière 在一篇尚未发表的克莱斯特研究中分析了这些主题。

改头换面，证实了自身的不可简约性和外在性，并利用了纯粹外在性的环境，致使西方的国家人或西方的思想家继续简约为自身之外的某物呢？

问题 I. 有没有防止国家机器（相当于国家机器的集体）构成的方法？

命题 II. 战争机器的外在性也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验证（纪念皮埃尔·克拉斯特）。

原始的分隔式社会往往被界定为没有国家的社会，也就是独特的权力机构还没有出现的社会。但人们得出的结论却始终认为，这些社会还没有达到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政治分化的水平，而没有这种经济发展和政治分化，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形成：其含义在于，原始人“不懂得”这么复杂的机器。皮埃尔·克拉斯特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打破了这种进化论假设。他不仅怀疑国家是一种有归属的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认为原始社会很有可能故意避免或防止我们认为他们所不理解的那个怪物的诞生。防止国家机器的形成，不让这种形成成为现实，可能是一些原始社会机制的目标，即便它们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原始社会有头人。但头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国家是由权力机构的保持或保留来界定的。国家的主要关注是保留。因此，有必要建立特殊结构以使头人成为国家人，但分散的、集体的机制也同样必要，以防止头人成为国家人。预防机制，妨碍机制，是头人制的组成部分，使有别于社会整体的一种机器未能实现。克拉斯特描写了头人的境遇，他没有制度化武器，只有声望，除了集体欲望感外，没有其他说服手段和规则。头人与其说是掌权者，毋宁说是领导者或明星，总是处于被人们否定或抛弃的危险之中。但克拉斯特

进而把原始社会的战争看作是抵制国家形成的最有效机制：战争维护了分散的割据群体，武士本人也陷入了累积战利品的过程，最终将走向孤独，走向有名无权的死亡。① 克拉斯特因此在援引自然规律的同时颠倒了它的主要命题：正如霍布斯所清楚地看到的，国家反对战争，所以战争是针对国家的，并使国家无法实现。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恰恰相反，战争是用来避免和防止国家形成的一种社会模式。原始战争并不产生国家，正如原始战争并非起源于国家一样。而用交换来解释则与用国家来解释没什么两样：甚至在允许交换失败的情况下，战争非但源自交换，反倒限制了交换，把交换限制在“联盟”的框架内；战争防止交换成为国家的一个因素，成为群体融合的导线。

这个命题的重要性首先是使人注意到了集体的禁止机制。这些机制可能微不足道，起着微观机制的作用。这在团伙或帮伙现象中清晰可见。比如，雅各·莫尼埃引用了波哥大的街头孩子帮，他们用三种方法防止头儿获得固定的权力：帮伙成员聚在一起，共同进行偷窃活动，集体分享赃物，但却分开吃住；第二，而且尤为特殊的是，帮伙的每一个成员都伴有一个、两个或三个其他成员，这样，如果他与头儿发生争执，他便不会孤立，而能建立自己的联盟，使整个帮伙面临解体的危险；最后是松散的年龄限制，大约在 15 岁时，其成员就必须

① Pierre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Urizen, 1977), and “Archéologie de la violence: la guerre dans les sociétés primitive” and “Malheur du guerrier sauvage” in Recherches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80), pp. 171 – 208, 209 – 248. 在后一篇文章中，克拉斯特描写了原始社会中武士的命运，分析了防止权力集中的机制（Mauss 也以相同方式表明了互赠礼物的社交聚会也是防止财富聚敛的一个机制）。

离开帮伙。[①] 如果不抛弃进化论的视角，即把这些帮伙或团伙看作基本的、缺乏组织的社会形式，就不能理解这些机制。甚至在动物帮伙中，领导权也是一个复杂的机制，不是用来巩固强者的地位，而是用来禁止建立稳固的权力的，热衷于内在关系的构架。[②] 我们很容易就能把“高度社会性的生活”形式与最高度进化的男人和女人的“社会性”形式加以比较：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群体类似于帮伙，通过声誉的扩散而非权力的集中运作，比如社会团体（普鲁斯特清楚出地表明了这种高度社会性的价值与社会价值并不是对应的）。尤金·苏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纨绔子，正统派谴责他经常光顾奥尔良家族，他常说：“我不是站在那个家族的一边，而是站在帮伙的一边。”帮伙，团伙，是块状团体，与围绕权力机构的树状团体相对立。所以，一般团伙，甚至从事盗匪或高度社会性生活的团伙，都是战争机器的变形，它们在形式上有别于国家机器或同类，但却建构了中央集权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说战争机器是由纪律界定的：当国家挪用了军队之后，纪律就成了军队不可或缺的特点。战争机器也遵循其他规则。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些其他规则更好些，而只是说它们激活了武士本质上的无纪律性，对等级专制的质疑，通过抛弃或背叛进行的永久讹诈，和极具挥发性的荣誉感，所有这些再度阻碍了国家的形成。

但这一论证何以不能令我们完全信服呢？我们且来看一看

---

① Jacques Meunier, *Les gamins de Bogotà* (Paris: Lattès, 1977), p. 158 (“black-mail for dispersion”) and p. 177: 如果必要的话，“其他街道上的孩子们可以通过复杂的相互侮辱和沉默，把他必须离开的想法转告给他。”莫尼埃强调了成员在退出帮伙后命运所受危害的程度：不仅是健康原因，而且因为他发现很难融入犯罪团伙，那是一个等级森严、权力集中、过分注重权力机构的社会，他感到极不适应。(p. 178) 关于儿童帮伙，另见 Jorge Amado 的小说，*Capitães de areia* (Sáo Paolo: Livraria Martins, 1944)。

② 见 I. S. Bernstein, “La domininance sociale chez les primates” in *La Recherche*, no. 91 (July 1978).

克拉斯特的论点。他表明既不能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用政治力量的分化来解释国家。相反，正是国家促进了大规模项目的进行，制定了剩余法，组织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国家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别开来。我们不知道如何用国家的先决条件来解释国家，哪怕依靠辩证法。国家似乎是以帝国的形式拔地而起的，而不是逐渐构成的。它在当时当地的出现就好比天才的绝笔，如同雅典娜的诞生。克拉斯特还表明，战争机器是针对国家的，要么针对它事先就防止的潜在国家的形成，要么针对它旨在毁灭的实际国家。毫无疑问，战争机器在游牧武士“半开化的”组合中比在原始社会“未开化的”组合中得到了更全面的体现。无论如何，国家不可能是战争的结果，在战争中，征服者借助他们的胜利把新的律法强加在被征服者身上，因为战争机器的组织是针对实际的或虚拟的国家形式的。战争结果就如同经济进步或政治力量一样不能说明国家的起源。克拉斯特正是在这里看到了断裂：即在“原始的”反国家社会与“恶魔的”国家社会之间，它的形成已无法解释了。克拉斯特按照拉博埃西的方法着重探讨了“自愿服务”的问题：人民为什么想要或渴望服务？这种愿望当然不是本能的或不幸的战争的结果。他们的确拥有反国家的机制：那么国家何以产生呢？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国家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呢？克拉斯特越是深刻地追问，就越感到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①] 他有意把原始社会

---

①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p. 169: “国家的出现导致了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巨大的形态分化；它造成了一道不可弥补的鸿沟，据此，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对面，时间变成了历史。”为了说明国家的出现，克拉斯特首先举出人口的因素（“但用人口决定论代替经济决定论已是无可置疑的了”；p. 180），然后又提出战争机器疯狂杀人的可能性；更出乎意料的是，他还举了某种预言话语的作用，这种话语最先是用来对付“头人”的，产生了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但我们显然不能事先判断克拉斯特可能从这个问题中得出的详尽结论。关于预言话语可能起到的作用，参照 Hélène Clastres, *La terre sans mal, le prophètisme tupi - guarani*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5)。

看作是实体，自足的实体（他坚信这一点）。他把原始社会形式的外在性变成了一种真实的独立性。因此，他仍然是进化论者，并假设一种自然状态。按照他的说法，只有这种自然状态才是实在的社会现实，而非纯粹的概念；进化是突变，而非发展。一方面，国家拔地而起，一下子成熟起来；另一方面，反国家的社会却使用非常特殊的机制防止国家的诞生，阻止国家的兴起。我们认为，这两个都是合理的，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有一句老话说："从氏族到帝国，"或"从帮伙到王国。"但没有人说这就是进化，因为帮伙和氏族与帝国一王国一样都是有组织的。我们不能在这两个术语之间造成断裂，从而把进化的假设抛在后面，就是说，赋予帮伙以自身的充足性，而赋予国家以更加神奇、更加怪异的层创进化。

我们不得不说，国家始终是存在的，相当完美，相当完整。考古学家的发现越多，就有更多的帝国被挖掘出来。关于原始国家的假设似乎得到了证实："国家显然可以追溯到人类最远古的时代。"很难想象在边远或难以控制的地区里会有与宗主国家没有联系的原始社会。但重要的是相反的假设：国家本身总是与外部保持着某种关系，而独立于那种关系则是不可思议的。国家的律法并不是整体（国家社会）或虚无（反国家社会）的律法，而是内部与外部的律法。国家是主权。但主权只统治能够内化的、能够局部占有的东西。不仅没有普遍国家，国家的外部也不能被简约为"外交政策，"也即各个国家间的关系。外部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出现的：巨大的世界规模的机器在一个特定时刻向整个世界扩展开去，这与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如"跨国"商业组织，综合产业，甚至像基督教、伊斯兰教、某些预言或救世运动等宗教构型）；但也有帮伙、边缘或少数族群等局部机制，肯定了分隔式社会与国家权力机构相对抗的权利。今天，现代世界给我们提供了这两个方

向长足发展的例子：世界规模的宇宙机器，以及一种新原始主义，马歇尔·麦克卢汗描写的一种新的氏族社会。这两个方向在所有社会领域、所有时期都同样存在。它们甚至部分融合。比如，一个商业组织也是一伙劫匪或海盗，他们的部分发展或许多活动都是重合的。宗教也是以帮伙形式开展活动的。显而易见的是，帮伙，与世界性组织一样，也暗示了不可简约为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外在性的形式必然呈现为松散的、多形态的战争机器。它是迥异于“律法”的一种法则。国家形式是一种内在性的形式，具有再造自身的倾向，它超越变体而与自身相认同，在其极限内很容易辨认，而且总是寻求公共认可（不存在带面具的国家）。但战争机器的外在性的形式在于它仅仅存在于自身的变形之中；它既存在于产业革新之中，也存在于技术发明之中；既存在于商业流通之中，也存在于宗教创造之中，因此也存在于仅在次要程度上允许国家挪用的一切流动和潮流中。它不依赖于独立，而依赖于在一个永久的互动领域内的共存和竞争，我们必须构想外在性和内在性，变形的战争机器和认同的国家机器，帮伙和王国，宏大机器和帝国。同一个领域也在国家中划出内在性的界限，但却以国家无法捕捉的或与国家相悖的语言描写它的外在性。

命题 III. 战争机器的外在性也受到认识论的验证，这暗示了一种“游牧科学”或“少数科学”的存在和保持。

有一种科学或科学的处理方法似乎很难加以分类，其历史甚至更难追溯。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但也不是历史上的官方科学或法律意义上的“科学”。据米歇尔·塞勒斯最近发表的一本书，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的原子物理

学，阿基米德的几何学，都是这种科学的标志。[①] 这种怪异科学的特点似乎有如下述：

1. 首先，它用水的模式，而非固体理论，把流体当作特殊案例；古代原子论离不开流动，流体就是现实本身，或黏性。

2. 所论的模式是一种生成和异质性，与稳定的、永恒的、同一的、不变的因素相对立。把生成本身当作模式，不再是次要特点，不再是模仿，这是一个“悖论”。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但只是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才提出的，并用官方科学的名义把它驱除出去了。对比之下，在原子主义中，这种异质性的模式，异质性中的通道或生成模式，恰恰是由著名的原子偏差来提供的。作为最小角度的克利纳门（clinamen）只有在直线与曲线、曲线与其切线之间才有意义，并构成了原子运动的最初曲度。克利纳门是原子偏离直线的最小角度。[②] 它是导向极限的通道，一次穷尽，一个似是而非的“穷尽”模式。这也适用于阿基米德几何，其中，被界定为“两点之间最短距离”的直线恰好是微积分中界定曲线长度的一个方法。

3. 在层流中，已不是从直线到其平行线的运动了；[③] 而是

---

① Michel Serres, *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 Fleuves et turbulences* (Paris: Minuit, 1977). 塞勒斯是最先提出文中前三点的，第四点是从前三点中推导出来的。

② 据塞勒斯，克利纳门，或原子的偏差，是“导致旋涡形成的最小角度、而且是在层流中偶然出现的”（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p. 14）。克利纳门是一条曲线与其切线之间的角度，或“所能制造的最小角度，防止从构成它的两条线之间产生任何东西……换言之，这个角度与曲线同时出现”（p. 18）。“克利纳门是一个微分”（p. 12）。

③ “当我们用层来划分流动时，不管层多么小，它们之间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平行运动，这时，流动就变成了层流。”Serres, ibid., p. 12.

从曲线偏差到旋流和涡流在一个斜面上的形成：相对于最小角度的最大斜面。从旋流到涡流：换言之，从原子的团伙或帮伙到大旋涡式的组织。[①] 这个模式是涡流；它在开放的空间里运作，在整个过程中，物流是被分配的，而不是为线性物和固体物划分封闭的空间。这是平滑的（向量的、投射的、拓扑的）空间与条纹的（长度的）空间之间的差别：在第一种情况下，“空间在不计算的情况下被占领，”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为了占领而计算空间。”[②]

4. 最后，这个模式是问题的，而非原理的：数只是从它们所受影响的角度来考虑的：分段，消融，添加，投射。不必从种到类进行细致划分，或从固定性质到派生属性进行演绎，而是从问题到决定和解决问题的事故。这涉及各种肢解、变形、走向极限，在这些运作中，每一个数都指一个“事件”，而非仅仅一个性质；正方形不再独立于面积而存在，立方体不再独立于体积而存在，直线不再独立于长度而存在。原理属于理性秩序，而问题是情感的，离不开在科学内部的变形、生产和创造。尽管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会说，问题不是“障碍”，而是跨越障碍，是投射，换言之，是战争机器。这种运动恰恰是官方科学要努力加以限制的，因此，它便尽可能缩小“问题因

---

① 旋流（Turba）“指多，大量，混淆，和骚乱。”涡流（Turbo）“是圆形运动……旋转的锥型或旋涡式螺旋。”“物的起源和秩序的开端仅仅包括从旋流到涡流的微妙运动。”Serres, ibid., pp. 38 - 39.

② 这是布莱兹在音乐的两种时空之间所做的区别：在条纹空间里，测量可以是规则的，也可以是不规则的，但总是可以指定的；在平滑空间里，间隔或断裂是“可以随意制造的。” *Boulez on Music Today*, trans. Susan Bradshaw and Richard Bennet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85.

素”的范围，将其附属于“原理因素”。①

这种阿基米德式科学，这种科学观念，在一个本质方面与战争机器密不可分：问题就是战争机器本身，而且与斜面、极限通道、涡流和投射是分不开的。战争机器似乎被投射到一种抽象知识当中，这种知识在形式上不同于与国家机器相重合的那种知识。整个游牧科学似乎怪异地发展，与官方或帝国科学完全不同。此外，这种游牧科学一直受到国家科学的要求和现状的“阻碍”、禁止或驱逐。被罗马国家征服的阿基米德已经成了一个象征。② 事实是，这两种科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化模式，而国家科学不断把其主权形式强加在游牧科学的发明之上。国家科学只保留了游牧科学所能为它利用的东西；它把其余的变成了一套受严格限制的公式，而没有真正的科学地位，不然就轻率地加以压制和禁止。游牧科学的“科学家”仿佛掐在了一块岩石与一个坚硬的地方之间，在给他们以滋养和灵感的战争机器与强加给他们理性秩序的国家之间。工程师这个人物（尤其是军事工程师）就其全部的矛盾情感来说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边界现象，其中，游牧科学给国家科学施加压力，反过来，国家科学有利用和改造游牧科学

---

① 希腊几何集中体现了问题与原理这两个极端的对立，并以前者的相对占上风为标志：普罗克鲁斯在 *Commentary of the First Book of Euclid's Elements*, trans. And intro. Glenn R. Murrow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中，分析了这两极之间的差别，把 Speusippus – Menaechmus 的对立作为例子。数学也常常标志着这种张力：比如，原理总要面对问题，“直觉主义者”或“构成主义者”强调问题的微分非常不同于原理或原理方法。见 Georges Bouligand, *Le déclin des absolus mathématico – logiques* (Paris: Ed.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1949)。

② Paul Virilio, *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 (Paris: Stock, 1975), p. 120：“我们知道，几何学的青春，自由创造性探讨的几何学以阿基米德告终……罗马士兵的剑斩断了这条线索。在扼杀了几何学的创造的同时，罗马国家为西方的几何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的一些因素。露营技术，或“扎营学”就属于这种情况。扎营总是要利用抛面和斜面：国家在利用战争机器的这一维度时总要将其服从于政府和衡量规则，严格限制、控制和规定游牧科学，避免让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引起反响（在这方面，沃邦似乎重演了阿基米德的失败）。这是描写性和投射性几何学的真实情况，官方科学将这种几何学变成了依赖于分析的纯粹实践科目，即所谓的高等几何（于是就有了蒙格和庞斯莱作为“科学家”的两难境地）。① 这也是微积分的真实情况。长期以来，微积分只具有超科学地位，被标识为“哥特式假设”；官方科学只看到了它使用方便和合理虚构的价值。伟大的国家数学家们尽最大努力改善它的地位，但恰好是以下列为条件的：一切能动的游牧观念——如生成，异质性，无限小，极限通道，连续变体等——都必须清除，同时将政府的、静止的、顺序的规则强加其上（于是就有了卡诺的两难境地）。最后，水利模式也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国家确实需要水利科学（关于大规模水利工程对于宗主国的重要性，不必再追溯威特福格尔的论纲了）。但国家需要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水利，因为国家需要让水服从于渠道、管道和堤坝，以防止泛滥，以限制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运动，对空间本身进行条纹化控制，使流体依赖于固体，按平行的层流流动。另一方面，游牧科学和战争机器的水利模式包括在平滑平面上的混乱分布，使之产生一种既控制空间同时又能影响各点的运动，而不是由空间所控制的从一个特

① 对于蒙格，尤其是庞斯莱，感性的、甚至空间再现（条纹空间）的确被克服了，但与其说是在抽象的象征权力方面，毋宁说在超空间想象或超直觉的（连续）方面。见 Léon Brunschvicg 关于庞斯莱的评论，*Les étapes de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Paris: PUF, 1947）。

定点到另一个特定点的局部运动。[①] 德谟克利特，梅纳什姆斯（Menaechmus），阿基米德，沃邦，德扎尔格，伯努利，蒙格，卡诺，庞斯莱（Poncelet），派罗奈特（Perronet）等：对他们每个人的特殊境遇都需要用一部专著来论述，国家科学只有在对这些科学家进行限制和规训之后，在压制了他们的社会或政治观念之后，才利用他们。

作为平滑空间的大海是战争机器的一个特殊问题。如维里利奥所表明的，关于现存舰队的问题正是针对大海提出来的，换言之，这是以在任何一点上都可能发生的旋涡运动占领一个开放空间的任务。在这方面，关于节奏、关于节奏之起源的最新研究似乎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我们得知，节奏与波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指一般“形式”而言，尤其是“有格律的、有节奏的”运动的形式。[②] 然而，节奏与格律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尽管原子主义者德谟克利特是在形式的意义上谈论节奏的作者之一，但应该记住，他是在非常准确的浮动条件下讨论节奏的，而且原子构成的形式基本上是没有节奏的大集合体，平滑的空间，如空气，大海，甚至地球。有格律的节奏这种东西的确存在，通常与堤坝之间河水的流动或条纹空间形式有关；但

---

① Michel Serres（*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pp. 105 – 107）从这一观点出发分析了 Alembert – Bernoulli 对立。一般说来，重要的问题在于两种空间模式之间的差别：“地中海盆地缺水，因此，善用水者就是统治者。于是出现了以导体为主导的物理学界，克利纳门也似乎成了自由，因为那恰恰是拒绝被迫流动的泛滥。这是科学理论所不能理解的，是水利大师们所不能理解的……于是阿基米德就成了伟大人物：浮体和军事机器的大师”（p. 106）。

② 见 Benveniste，“The Notion of Rhythm in Its Linguistic Expression” in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 Mary Elizabeth Meek（Carol Gables，Fla.：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pp. 281 – 288. 这个文本常常被认为是定论的，但在我们看来似乎模棱两可，因为它使人想起德谟克利特和原子主义，但没有提及水利问题，还因为它把节奏看作是对身体形式的“次要的特殊处理”（p. 286）。

也有没有格律的节奏，这往往相关于一股流水的上涨，也就是流体占据平滑空间的方式。这两种科学——游牧、战争机器科学和官方、国家科学——之间的对立或张力极限在不同时刻、不同层面反复出现。安妮·凯里恩的著作使我们辨别出两个这样的时刻：一个是 12 世纪哥特大教堂的建设，另一个是 18 和 19 世纪桥梁的建设。① 哥特建筑的确是与一种意志分不开的，那就是要建立比罗马教堂更久远、更高大的教堂。更久远，更高大……但这个区别不仅仅是量上的；它也标志着质的变化：静止关系，即形式问题，已渐渐进入背景，让位于能动关系，即物质力量。切割技术将石头变成了能够固定和协调冲力、建造更长、更高拱型的材料。拱型已不再是形式，而是石头连续变化的一条线。这就仿佛哥特式建筑征服了平滑空间，而罗马建筑则仍然部分位于条纹空间之内（其中，拱型依赖平行支柱的并置）。但是，石头切割一方面与地面上的平面投射不可分割，这种投射起到平面极限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与一系列连续的近似值（平方）或大面积石头的不同放置方式不可分割。当然，要想找到这种做法的基础，就必须诉诸于欧几里得的原理科学：数和等式被认为是能够组织面积和容积的智力形式。但是，根据传说，伯纳德·克莱尔沃很快就因为太“难”而放弃了这一尝试，转向了可操作的阿基米德几何，当时被界定为小科学的一种投射性和描写性几何，它与其说是数理学（matheology）毋宁说是数理描写（mathegraphy）。他的徒工，那位僧侣泥瓦工加林·德·特洛伊斯谈到一种可操作的运动逻辑，能使“新手”学画，然后“穿透空间”切割容积，这样，“切

① Anne Querrien, *Devenir fonctionnaire ou le travail de l'Etat* (Paris: Cerfi). 我们援引了这部书以及凯里恩未发表的研究成果。

割线就能推动平衡”（le trait pousse le chiffre）。[①] 不是再现，而是生成和穿越。这种科学的特点不是缺乏等式，而是等式起到的不同作用：它们不是组织质料的绝对优秀的形式，而是由材料在最佳条件下的质的微分中“生成”“冲力”。17 世纪著名数学家德扎尔格把阿基米德几何的整个潮流推向了顶峰，但也使其暂时停滞。和大多数同人一样，德扎尔格很少著述；但通过行动和留下的纲要、草图和设计而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都集中在问题—事件上：“哀悼，”“切割石头的草图，”“解决锥体与平面相遇时发生的事件的草图，”……然而，德扎尔格遭到了巴黎议会的谴责，受到国王大臣们的抵制，他的视角实践遭到查禁。[②] 官方或国家科学只通过模板（平方的对立面）容忍和利用石头切割，条件是要恢复固定的形式模式、数和测量法的重要性。官方科学只容忍和利用静止的视角，这个视角服从于一个中心黑洞，因而失去了探测和流动能力。但德扎尔格的这次冒险或事件与那位“哥特”徒工在集体层面上经历的事件没什么两样。因为不仅以帝国形式出现的教会需要严格控制这种游牧科学运动（它让圣殿骑士负责决定教堂的位置和材料，管理工地，掌管建设），而以皇族形式出现的世俗国家却反过来把矛头对准圣殿骑士，出于许多理由禁止行会，其中至少有一条是禁止这种可操作的小几何的。

安妮·凯里恩在 18 世纪的桥梁建造中看到的同一个故事的

---

① 见 Raoul Vergez, *Les illumines de l'art royal. Huit siécles de compagnonnages* (Paris: Julliard, 1976), p. 54. [英译者注：在当下的语境中，trait 指艺术家遵循的切割线和正在进行的建构的草图。Vergez 做了下列界定：“trait 是衍生于几何的一种绘图诗，用地面上画出的准确草图指示建筑计划，表明各个部分，高层和其他投射的部分，一个容积的三维度。” p. 86.]

② Gérard Desargues, *Oeuvres* (Paris: Leiber, 1864). 见 Michel Chasles, *Aperçu historique sur l'origine et le développment de methods en géométrie* … (Brussels: M. Hayez, 1837) ——trans. 该书在德扎尔格、蒙格和庞斯莱等“现代几何学创始人”之间确立了连续性。

另一个版本是否正确呢？毫无疑问，条件已经非常不同了，因为根据国家标准的劳动分工到此时已成为既定事实。但事实仍然是，负责桥梁和公路建设的政府部门仍然在中央管理的严格控制之下，桥梁仍然是积极的、能动的、集体实验的客体。特鲁丹在家里组织了非凡的、开放的“全体会议”。派罗奈特把源自东方的一个灵活模式作为灵感：桥梁不应该阻塞河流。至于沉重的桥体，粗而均匀的桥墩构成的条纹空间，他用细而不均匀的桥墩、矮矢拱和拱顶代替，减轻了桥的重量，使整体发生了连续性变化。但他的尝试很快就遇到了原则性反对。国家任命派罗奈特为该校的董事长，采用的往往是过时的方法，禁止实验，而非鼓励已经取得的成就。桥梁和公路学校的整个历史表明这个旧的平民“身体”是如何服从于矿业学校、公共旅游学校和技术学校的，同时，它的活动也越来越规范化。① 于是，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集体身体？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大的集体身体是各相区别的等级机制，他们一方面喜欢权力或功能垄断，另一方面又派出地方代表。他们与家庭有特殊关系，因为他们把位于两端的家庭模式和国家模式连接起来，视自身为官员、职员、经理或农民的“大家族”。然而，在这些大的集体身体中，还有某种不适合这种图式的东西在起作用。这不仅仅是对特权的固守。还有把自身构成战争机器、遵循其他模式的才能——甚至严重畸形的才能，这是另一种动力，一种抵抗国家的游牧野心。比如，一个非常古老的“游说”问题，带有流动轮廓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立场非常模糊，

① Anne Querrien, *Devenir fonctionaire*, pp. 26 – 27：“国家是建立在实验的废墟之上的吗？……国家并非在建设中，其建设场所一定是短命的。设备是要发挥功能的，而不是由社会来建造：从这个观点出发，国家的建设只涉及那些为工资而实施或指挥的人，有义务遵循既定实验模式的人。”

一方面想要“影响”国家，另一方面又要促进战争机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①

一个身体（corps）不能简约为一个机体（organism），正如身体的精神不能简约为机体的灵魂一样。精神并非好于灵魂，而是挥发性的；而灵魂有重量，是引力中心。我们是否要回想一下集体的身体和身体的精神的军事起源呢？“军事”并不是重要的部分，重要的是遥远的游牧起源。伊布恩·卡尔登把游牧战争机器定义为：家族或谱系外加身体的精神。战争机器与家族的关系非常不同于它与国家的关系。在战争机器中，家族是一个帮伙向量，而不是基本细胞；一个谱系据特定家族在特定时刻的才能从一个家庭传到另一个家庭，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男性家族的团结”。这里，决定家族在国家机体中的位置的不是家族的公开影响，而恰恰相反；决定它在战争身体中之重要性的恰恰是其秘密力量，或团结的力量和相应的谱系流动性。② 这与对有机权力的垄断或局部再现都没有关系，但却与

---

① 见 Daniel Desert and Jean - Louis Journet, “Le Lobby Colbert. Un royaume, ou une affaire de famille?” *Annales*, 30, no. 6 (November - December 1975), pp. 1303 - 1336.

② 见 Ibn Khaldū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rans. Franz Rosentha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这部杰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问题及其含混性。伊布恩·卡尔登把游牧主义（游牧生活方式，而非族群）与定栖或城市生活方式加以对比。这种对比的第一个方面是被颠倒了的公开与秘密的关系：游牧战争机器不同于国家城市居民的公开性相反，不仅有保密制度，而且，在第一种情况下，“名望”是以秘密的团结为基础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秘密服从于社会名望的需要。第二，游牧主义保持了家族及其谱系的纯洁和流动性，而城市生活则导致了家族的不纯洁，同时又死板和固定：团结对这两极具有不同的意义。第三，而且是主要的一点，游牧家族调动一种团体精神，并融入其中，即他们所说的 asabîyah，或 ikhtilât，阿拉伯语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就派生于此（Ibn Khaldūn 强调指出部族头领其实没有什么“权力”，他不支配任何国家束缚）。另一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团体精神成了权力的一个方面，并为“独裁”所用。

游牧空间中一个涡流身体的潜力有关。当然，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伟大身体几乎不能视为亚哈族。相反，我们要说的是，集体的身体总是有一些边缘或少数，重新构成了相当于战争机器的东西——有时以难以预测的形式，存在于建造桥梁或大教堂、表现判断、谱曲或制定一门科学、一门技术等组合中……船长的集体身体通过军官组织和高级军官的机体下达命令。作为机体的国家总有与自己的集体身体发生矛盾的时候，当这些身体要求某些特权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东西，一个短暂的革命时刻，一次实验性起义。一种混乱局面：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都有必要分析倾向和极端，运动的性质。突然间，公证员的集体身体一下子像亚哈或印第安人一样兴起来了，接着就是重新组合和重新组织：你决不会知道接着还会发生什么的一出喜剧（有时甚至会听到“警察和我们在一起！”的呼喊）。

胡塞尔谈到一种讨论模糊性的原几何学，也就是讨论流浪和游牧等形态本质的科学。这些本质不同于感性事物，也不同于理想的、官方的或帝国的本质。研究这些本质的原几何学本身就是模糊的，就词源意义上说是“漫游者”：它既不像感性事物那样不准确，也不像理想的本质那样确切，而是既模糊又精确（“在本质上而非偶然地不准确”）。圆是一个有机的、理想的、固定的本质，但圆的性质却是模糊的、不稳定的，不同于圆或圆的东西（花瓶，车轮，太阳）。一个定理数是一个固定本质，但它的变形、扭曲、消融、增大，它的一切变体，都构成了问题数，既模糊又精确，是“透镜状的，”“伞状的，”或“锯齿状的。”可以说，模糊的本质从物中抽取一种不仅仅

是物性的决定性，这就是形体存在，它甚至暗示着身体的精神。[①] 但是，胡塞尔为什么将其看作一种原几何学呢？看作一种不彻底的观点而非一门纯科学呢？他为什么把纯本质屈从于向极限的过渡，而任何向极限的过渡又都属于这种模糊呢？毋宁说，我们有两种形式上不同的科学观念，而就本体而言，在一个单一的交互作用的领域内，官方科学在继续利用模糊或游牧科学的内容，而游牧科学则继续切削官方科学的内容。在极限处，最重要的是不断变化的界限。在胡塞尔（以及康德的著作中，尽管取向相反：圆的性质是圆的“图式”）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对游牧科学之不可简约性的非常准确的理解，但同时也有对国家人的关注，或对支持国家的人的关注，以保持官方科学在立法和宪法方面的重要地位。每当这个地位得到承认时，游牧科学便被说成是前科学或超科学或亚科学。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无法理解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了，因为游牧科学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或实践，而是一个科学领域，它提出了这些关系的问题，并以完全不同于官方科学的观点解决了这些问题。国家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理想的圆，但战争机器也有必要制造圆的东西。因此，有必要确定游牧科学的特点，以便理解它所遭遇的压制和“包括”它在内的互动关系。

---

① 胡塞尔的主要文本包括 Ideas, trans. W. R. Gibson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6), part I, sec. 74, and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John P. Leavey, Jr., ed. David B. Allison (Stoney Brook, N. Y.: N. Hayes, 1978)（德里达写了重要评论，pp. 118 – 132）。关于模糊而又精确的科学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援引 Michel Serres 的公式，尤其是他关于叫做 salinon 的几何数的评论：“它精确，模糊。不是准确、确切或不确切。只有度量学是确切的。”（*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p. 29）Gaston Bachelard 的著作 *Essai sur la connaissance approchée*（Paris: Vrin, 1927）仍然是关于模糊的精确性在步骤、程序及其在科学中的创造性作用方面的最佳研究。

游牧科学和工作的关系与官方科学和工作的关系并不一样。这不是说游牧科学中的劳动分工还不那么彻底；而是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国家与熟练工人、以及由泥瓦工、木匠、铁匠等游牧或巡回身体之间存在的问题。稳定的室内办公劳动力调节着劳动流动的运动，给它提供渠道和管道，构成了有机意义上的公司，而其他劳动则依赖于当场（劳役队）或在土著（慈善工厂）雇佣的强迫人力——这一直是国家的重要事务之一，主要是为了征服帮伙流浪和身体游牧运动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哥特建筑的例子，回想一下熟练工人广泛的旅行，在远近建筑大教堂，分散在各地的建筑工地，利用国家所不方便利用的积极和消极劳动力（流动和罢工）。国家的反应就是接管这些建筑工地，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异为模式，把所有的劳动分工综合划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理论劳动和实践劳动。在游牧科学中，如在官方科学中一样，我们看到了“平面”的存在，但决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哥特建筑工人的基础平面对立于建筑师的测量平面，后者不是在场地，而是在纸上。黏性或构造平面与另一个平面相对立，那就是组织或构型。面积石头切割与模板石头切割相对立，后者意味着再生产模式的确立。可以说，不仅不再需要熟练或合格的劳动，而且反倒需要一种非熟练的或不合格的劳动，即解除资格的劳动。国家并不授权给知识分子或概念工作者；相反，国家迫使他们成为严格的从属器官，他们只有一种想象的但却足以剥夺其权力的自治性，他们的工作只是再生产或行使权力。这并不能保证国家平安无事，这次是它自己生产的知识分子的身体，但却断言提出新的游牧和政治主张。无论如何，如果国家总是发现有必要压制游牧和少数科学，如果国家反对模糊科学和那种可操作性几何，这不是因为这些科学的内容不准确或不完善，或因为它们的魔幻或独创性，而是因为它们意味着与国家标准相对立的

一种劳动分工。其差别不是外在的：一种科学或科学观念参与社会组织的方式，尤其是导致劳动分工的方式，也是那种科学的组成部分。官方科学是与“形式质料”模式分不开的，这种模式一方面暗示一种组织质料的形式，另一方面意味着一种为形式准备好了的质料。事实表明，这个图式与其说源自技术或生活，毋宁说源自被分化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后来又分化为知识分子与手工劳动者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一切质料都被赋予了内容，同时，一切形式都付诸于表现。游牧科学似乎更易于内容与表现之间的联系，而这两个术语每一个都包含着形式和质料。因此，在游牧科学中，质料决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因此也不是同质化的质料，而本质上潜伏着相异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内容的一种形式）。它们都不是规范的表现，因此与相关的特点不可分割（这些特点构成了表现的质料）。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图式。通过回忆最一般的游牧艺术的特点，我们可以对这一境遇有所准备。在游牧艺术中，支柱与装饰之间的互动关联取代了质料—形式的辩证关系。从既是技术又是艺术的游牧科学的观点出发，劳动分工是绝对存在的，但并不利用形式—质料的双重性（哪怕是在一对一对应的情况下）。相反，它遵循质料的各个特性与表现的特点之间的关联，并寓于这些关联的层面，不管这些关联是自然的还是强迫的。[①] 这是另一种工作组织和通过工作组织的社会场。

---

① Gilbert Simondon 在分析和批判形式—质料图式及其社会前提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形式对应于发号施令者对自身的看法，当他发号施令时，这种形式的表现必须是肯定的：因此形式是可表现事物的秩序”）。Simondon 把形式—质料图式与一种能动图式对立起来，这就是被赋予了独特力量的质料或以某一系统为基础的积极条件。其结果则完全不同于关于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观念。见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 - biologique* (Paris: PUF, 1964)。

按照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论说方式把这两种科学模式加以对比是有所裨益的。[①] 一种可以称作比较模式，另一种可以称作对比模式。比较模式是官方科学采用的合法或立法模式。寻找规律包括抽取恒量，即便这些恒量仅仅是变量（等式）之间的关系。表现变量的一个不变形式，恒量的一个可变质料：这就是形式质料图式的基础。但对于作为游牧科学因素的对比模式来说，相关的区别是质料力量而非质料形式。这里，问题并不在于从变量中抽取恒量，而在于把变量置于一种连续变化的状态中。如果仍然有等式，那也是变化等式，不等式，区别性等式，不能简约为代数公式，与变化的可感直觉不可分割。它们决定质料中的特性，而不是构成一般形式。它们通过事件或个体性达到个性化，而非通过作为质料和形式之合成的“客体”。模糊的本质也不外乎个体性。在所有这些方面，在逻各斯与诺摩斯之间、在法律与诺摩斯之间有一种对立，从而引发出这样一种评论，即法律仍然具有“道德色彩”。[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模式丝毫不懂得力和力的作用。法律懂得力和力的作用，这在与比较模式相对应的同质空间中显而易见；同质空间决不是平滑的空间；相反，它是条纹空间。支柱的空间。它由于身体的下落、垂直的引力、质料在平行层的分布、以及流层和流层的运动而留下了条纹。这些平行的垂直线

---

① 在《蒂迈欧篇》第 28 – 29 节中，柏拉图兴致勃勃地谈到了生成不简单是模仿或再生产的必然特征，而本身是把同一性（the Identical）和一致性（the Uniform）加以对立的模式。他说，这种假设的目的在于拒斥它自身；因为，如果生成真的是一个模式，那么，所要消失的不仅仅是模式和模仿、模式和再生产的双重性，而且，模式和再生产的概念也会失去意义。[德勒兹在“柏拉图与幻象”中发展了这一观点——英译者注]

②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 630 (1885), p. 336.

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维度，能够四下扩散，形成各种其他维度，在各个方向给所有空间留下条纹，从而使其达到同质化。两点之间的垂直距离为另外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提供了比较模式。普遍引力成了法中之法，为两个身体之间的一对一对应制定了规则。每当科学发现新领域时，它都以同样的方式把它作为引力场来加以形式化。甚至化学也仅仅由于对重量观念的理论阐述而成了官方科学。欧几里得空间是以著名的平行假设为基础的，但所论的平行线首先是引力平行线，与引力投向假定填满那个空间的一个身体的所有因素的力相对应。当这些平行力的共同方向被改变时，或当身体旋转时，仍然不动的则是这些平行力的应用点（引力中心）。简言之，引力似乎位于带条纹的、同质的、核心空间的一个流层的基础之上；它为叫做衡量标准和树状的繁殖奠定了基础，这些繁殖的维度独立于所处环境，借助于单位和点（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运动）得以表现。这不是形而上学的关怀，而是有效的科学关怀，经常让 19 世纪的科学家追问是否所有的力都不能简约为引力，或简约为给引力以普遍价值（所有变量的恒量关系）和一对一的规模（一次只两个身体）的吸引形式。这是一切科学的内在形式。

诺摩斯或称对比模式则全然不同。但这不是说其他力拒绝引力或抵制吸引。尽管这些力的确不与引力项背，但也不是产生于引力和吸引的；它们并不依赖于引力和吸引，但却证实了总是补充的或“可变影响的”事件。每当科学开拓出一个新领域——在一定条件下使其成为比形式或客体观念更重要的一个观念时，它便证明是不可简约为引力场和引力模式的，尽管并不与它们相矛盾。它证明了“更多”或“过度”，并寓于那种“过度”之中，寓于那种偏离之中。当化学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时，它总是给重力附加另一种束缚（比如电），这种束缚改变

了化学等式的性质。① 但我们将看到，只要稍稍考虑一下速度，就能看到克利纳门的区别形式中，或最小的偏离中，或极小限度的过度中垂直下降与曲线运动之间的差异，或直线与曲线之间的差异。平滑空间恰恰是最小偏离的空间：因此，除了在无限近似的点之间，它没有同质性，而近似点的连接又是在独立于确定路线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一个接触空间，是小触角或手工接触活动的空间，而不是和欧几里得式条纹空间一样的视觉空间。平滑空间是没有导体或渠道的一个场。一个场，一个异质的平滑空间，与一种非常特殊的多元性相结合：非长度的，无中心的，块状的多元性，它在不“计算”的情况下占据空间，“只能靠实地跑腿来探讨。”它们并不符合从某一外在空间点所能观察到的视觉条件；声音系统，甚至色彩系统，都是在这方面与欧几里得空间相对立的例子。

当我们与速度和迟缓、快速与重量、加速与引力相对抗时，决不能将此看作是量的对抗，或看作神话结构（尽管杜梅西尔已经确定了这种对抗的神话重要性，而且是依据与国家机器及其自然引力的关系确定的）。这种对抗既是质的，又是科学的，因为速度不纯粹是一般运动的抽象特点，而且体现为从其下落直线或引力偏离（不管多么微小）的一个运动体。缓慢与快速不是运动的量，而是两种合格的运动，无论前者有多快，或后者有多慢。严格说来，不能说一个下落的物体有速度，不管它下落得有多快；而根据下落物体的规律，它具有一

① 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引力并不是主导模式的惟一特性：除了引力外，还有热（在化学中，燃烧始终伴随着重量）。尽管如此，问题还是在于懂得“热力场”是在何等程度上偏离引力空间的，或相反，在何等程度上与引力空间相融合的。Monge 是个典型例子：他开始时把热、光和电归为“可变的影响体”，是“特殊物理学”关注的对象，而一般物理学则关注广延性、引力和运动。只是在后来他才把所有这些场归在一般物理学的名下（Anne Querrien）。

种无限减速的迟缓。构成条纹空间、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层流运动是重量；但快速、迅速只用于最小限度偏离的运动，因此呈现为涡流运动，它占据一个平滑空间，实际上是自身形成的平滑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物流不再被切割成平行的层面，运动也不再局限于点与点之间的一对一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引力—速度、重轻、慢快之间质的对抗就不是科学上可以量化的对抗，而是与科学相共延的一种状况，它能调节两个模式的分离和混合，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渗透，一个对另一个的控制，以及它们的相互替换。而最佳公式，即米歇尔·塞勒斯的公式，的确寓于相互替换之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混合或综合："物理学可以简化为两种科学，关于路线和道路的一般理论，和关于波浪的全球理论。"①

必须在两种科学或两个科学步骤之间加以区别：一种包括在"再生产"之中，另一种包括在"追随"之中。第一种涉及再生产、重复和再重复；第二种涉及巡回，是巡回、流动科学的总和。流动随时都可以归结为技术形态，或归结为科学的应用和证实。但这不是所要说明的情况：追随与再生产根本不是一回事，人们决不是为了再生产而追随。再生产、推导或演绎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官方科学的组成部分，它把时空差异当作众多的变量，其恒定形式恰恰是由规律抽象出来的：为了让相同现象在引力和条纹空间内反复发生，就必须获得相同的条件，或在不同条件和可变现象之间保持相同的恒定关系。再生产意味着某一固定观点的永久性，它外在于所再生产的东西：即在堤坝上观看水的流动。但追随的理想目标并不是再生产。仅仅有别于、而非优好于所生产的东西。当寻找某一质料、或某一

---

① Serres, *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p. 65.

质料的“奇点”，而不能去发现一个形式时；当逃避引力而进入一个速度场时；当不再思考流层朝固定方向的流动而卷入涡流时；当献身于变量的连续变化而非从中抽取恒量时，你必须追随。于是，大地的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围绕某一观点，在某一领域，依据一套恒定关系，不断以合法的模式重新分域；但随着流动模式的出现，解域的过程构成并扩展了地域本身。“先去看看你那棵老植物，仔细观察雨水的流向。现在雨水已经把种子冲走了。注意雨水冲出来的沟壑，确定水的流向。然后，找到离你那棵植物最远的一棵植物。在这两棵植物之间的全部野生植物就都是你的了。以后，……你可以扩大你的地盘。”① 巡回的、流动的科学包括在一个向量场上追随一股流动，奇点就像许多“事故”（问题）一样撒播在这个向量场上。比如，原始金属学何以成为给予铁匠以准游牧地位的一种流动科学？可以反驳说，在这些例子中，问题仍然是通过中间渠道从一点走向另一点（即便是奇点），而且仍然可能把流动切割成流层。但这只能把流动的步骤和过程与一个——总是被官方科学规范化了的——条纹空间相联系，这个空间剥夺了这些步骤和过程的模式，将其用于自己的模式，仅仅将其局限于“技术”或“应用科学”的范围内。作为一般规则，一个平滑空间，一个向量场，一种非长度的多元性总是可以译成、而且必然译成一种“比较”：不断把一个拥有足够维度的欧几里得的相切空间置于平滑空间的每一点之上，借此重新把平行引入两个向量之间，仿佛多元性就潜伏在这个同质的、条纹的再

① Carlos Castaneda, *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88.

生产空间中一样，而不是继续在“实地探讨”中去追随它。[①] 这是逻各斯或律法对诺摩斯的征服。但这种基本运作的复杂性证明了它必须要克服一些抵制。无论何时，只要流动步骤和过程回归自己的模式，点就会恢复奇点的位置，排除所有一对一的关系，流动就会重新产生曲线和涡流运动，排除向量之间的任何平行，而平滑空间则再次征服接触的属性，阻止它保持同质和条纹状态。总是有一股潮流阻止流动或巡回科学在再生性质的官方科学中达到完全内化。有一种流动科学家总要接受国家科学家的挑战、整合或联合，甚至要接受科学和技术的合法系统内的某一低微地位。

这不是说流动科学浸透着更多的非理性步骤、神秘和魔幻的方法。它们只在有待于确定归属时才那样做。而就官方科学而言，它们也给自己环绕上一道圣洁和魔幻的光环。而这两个竞争模式之间最明显的东西则是，流动或游牧科学并不打算让科学拥有自治权，哪怕一种自治的发展。它们没有自治发展的工具，因为它们的一切运作都服从于直觉和建设的感性条件——追随物流，规划和连接平滑空间。一切事物都位于一个客观的、与现实本身共延的浮动地带。不管多么精密或严格，“近似性知识”都取决于感性的和可感的评价，这种评价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问题框架依然是其惟一的模式。对比之下，官方科学的正当任务，它在理论或原理上的权力是把所有运作与直觉条件隔绝开来，使其成为真正的内在概念或“范畴”。这恰恰是解域在这种科学中意味着在概念机器中重新分

---

① Albert Lautman 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黎曼空间是如何容纳欧几里得连接的，使其在任何时候都能限定两个相邻向量的平行；在这种不去实地探讨多元性的情况下，多元性就“仿佛潜伏在拥有足够维度的欧几里得空间”中一样。见 *Les schemas de structure* (Paris: Hermann, 1938), pp. 23 – 24; 43 – 47.

域的原因。如果没有这种范畴的、绝对命题的机制，区别性运作就会限于追随现象的进化；此外，由于实验是开放的，是基础建设，所以，将其确立为稳定模式的坐标将永远不会出现。这些要求中有些是依据“安全”状况来转译的：奥尔良和博韦的两座大教堂在 12 世纪末倒塌了，而控制计算又很难启动流动科学的建设。尽管安全是国家理论规范和政治理想的基本因素，但仍有其他重要因素。由于其全部步骤，流动科学很快就超越了计算：它们寄寓超越再生产空间的那个“多余”空间里，很快就遇到了从那个观点来看不可逾越的问题，而最终通过真实生活的运作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的办法来自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使问题变成非自治性的了。对比之下，只有官方科学才有随意支配的衡量权，并用这种权力限定概念机制或科学的自治性（包括实验科学的自治性）。因此，才必须让同质性空间伴随流动空间，否则，物理学就将依赖空间中的特定点。但这与其说是转译，毋宁说是建构：恰又是流动科学所不从事、也没有工具从事的那种建构。在这两种科学的互动场上，流动科学局限于制造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一系列集体的非科学活动，而科学的解决却取决于官方科学，通过将其引入理论机制和工作组织而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这相似于柏格森理论中的直觉和理智，在此，直觉提出问题，只有理智才具有在形式上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直觉只满足于将这种问题投放到人类追求质料的质的活动中。①

① 在柏格森的著作中，直觉与理智的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处于永久的互动之中。布立干的命题也与此相关：两个数学元素的二元性，即“问题”和“总体综合”，只有在进入互动场后才能发展，在这个场内，总体综合界定“范畴，”而没有这些范畴，问题就能得到普遍解决。见 *Le déclin des absolus mathématico – logiques*.

问题 II. 有没有从国家模式中抽取思想的方法?

命题 IV. 战争机器的外在性最终得到了精神学的证实。

思想内容有时由于过于墨守成规而受到批判。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形式本身。这种思想已经与它从国家机器借来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标和道路，导体，渠道，机构等整个研究方法都是由国家机器界定的。于是就有了掩盖一切思想的思想映像；这是“精神学”（noology）的特殊对象，仿佛由思想发展而来的国家形式。这个映像有两个头，与主权的两极相对应：一个是真实思想的绝对统治，以魔幻的抓捕、围攻或束缚为运作方式，构成了某一基础（虚构信仰模式）的效率；另一个是自由精神的共和国，根据条约或契约运作，构成了立法和执法组织，执行某一本原（逻各斯）的律法。这两个头在古典思想映像中总是相互干扰：“自由精神共和国的王子就是最高存在的理念。”而如果这两个头相互干扰，那不仅仅因为它们之间有许多中介和转化，因为第一个为第二个铺平了道路，第二个利用和保存了第一个，而且因为它们相互间既是对抗的又是互补的，相互不可或缺的。然而，为了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它们“之间”就并非不可能发生性质完全不同的、把映像隐藏在外部、并于外部发生的事件。[①] 但当我们了解到真理的绝对统治和自由精神的共和时，把自身局限于这个映像就似乎不简单

---

① Marcel Detienne, *Les maîtres de vérité dans la Grèce archaïque* (Paris: Maspero, 1973)。他清楚地表明这两个思想极端与杜梅西尔提出的主权的两个方面相对应：君主或“海上老人”具有宗教魔力的讲话，以及城市的对话式讲话。在这两极关系中，不仅有希腊型思想的主要人物（诗人，物理学家，哲学家，诡辩学家等等），Detienne 还在两极间插入了一个特殊团体，即导致过渡或进化的军人。

是隐喻的问题了。这是思想作为原则、作为内在性的形式、作为一个地层而构成的必要条件。

很容易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是什么：永远不会自治的一种引力，制造了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的一个中心，它似乎是依靠自身的效率或依照自身的法令而存在的。但国家也获得了同样多的东西。实际上，通过以这种方式在思想中发展，国家形式获得了本质的东西：一整套舆论。只有思想能够发明具有普遍权利的一个国家，并把国家抬高到普遍律法的水平。这就仿佛把主权独自抛在世界上，跨越整个世界范围，而现在只涉及实际的或潜在的主体了。这已不是权力的外在组织的问题了，也不是陌生帮伙的问题了：国家成了分离叛逆主体的惟一原则，这些主体从自行维护国家形式的赞同主体而被迫回归自然状态。如果支持国家对思想本身是有利的，那么，国家在思想中发展，并作为独一无二的普遍形式而受到思想的认可，就也同样是有利的。国家的特性不过是一个偶然事实，就如同其可能的堕落或不完善一样。现代国家在理论上定义为“一个群体的理性和合理的组织”：一个群体拥有的惟一特性就是内在性或道德（民族精神），同时，这个群体也由于其组织而趋于普遍和谐（绝对精神）。国家给思想赋予了一种内在性的形式，而思想给那种内在性赋予了一种普遍性的形式：“世界性组织的目标是要满足特定自由国家内部的理性个体。”国家与理性之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交换；但那种交换也是一个分析命题，因为实现了的理性是与法制国家相认同的，正如国家是理性的

生成一样。[①] 在所谓的现代哲学中，以及在所谓的现代或理性国家中，一切都是围绕立法者和主体进行的。国家必须区别立法者和主体，在正当条件下允许思想把立法者和主体的身份概念化。永远服从。你越是服从，你就掌握得越多，因为你只能服从纯粹理性，也就是服从你自己……。自从哲学承担起本原的角色以来，它就始终在保佑既定权力，把能力学说追溯到国家权力的机体上去了。常识，被统一在由我思所构成的中心之上的全部能力，就是被抬高到绝对地位的国家舆论。这是最著名的康德“批判”的伟大运作，并在黑格尔主义那里得到了更新和发展。康德不断批判坏风俗，而崇尚功能。毫不奇怪，这位哲学家成了一位公共教授或国家公务员。那是国家形式激发思想映像的时刻。全面的互动。毫无疑问，这个映像本身根据这个形式的不同变体而呈现不同轮廓：它并不总是描写或指称哲学家，也不会永远描写他。从一种魔幻功能过渡到理性功能是可能的。远古帝国时代的诗人能够发挥形象训练者的作用。[②] 在现代国家里，社会学家成功地取代了哲学家（比如，涂尔干和他的信徒们开始给共和国赋予一种凡俗的思想模式）。甚至在今天，精神分析学在一种魔幻般的回归中声称普遍意识

---

① 有一种关于权利的黑格尔主义，它依靠官方的政治哲学生存，并把思想的命运与国家联系起来。亚历山大·柯耶夫（“Tyranny and Wisdom,” in Leo Strauss, On Tyranny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和埃里克·韦尔（*Hegel et L'Etat. Philosophie politique* [Paris: Vrin, 1974]）都是其近代的代表。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是一整条反映现代国家与理性之间关系的线索，即作为理性技术和合理人类的国家和理性。如果有人反驳说这种理性在远古帝国中早已存在，是统治者的最佳状况，那么，黑格尔主义者就会回答说，合理的理性在没有每个人最小限度的参与的情况下是不会存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合理理性的形式是否不是从国家抽取出来的，并非必然使其正确，赋予其“理性”。

② 关于古代作为“宗主国公务员”的角色，见 Dumézil, *Servius et la Fortune* (Paris: Gallimard, 1943), pp. 64ff., and Detienne, *Les maîtres de vérité*, pp. 17ff.

的作用就是法律思想。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竞争者和伪造者。精神学不同于意识形态，它的研究对象恰恰是思想映像及其历史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没什么意义，思想除了可笑的引力之外，其实什么都没有。但那就是它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不必严肃对待之。因为那使其更容易为我们思考，并将永远产生新的公务员。人们越是不认真对待思想，他们就越是按国家要求去思想。的确，哪有国家人不梦想着扮演那个微不足道但又不可能的角色——即思想家的呢？

但精神学与对抗思想相对立，这些对抗思想采取暴力行动，时隐时现，在历史上是流动的。这是“私下思想家”的行动，与吉尔凯郭尔、尼采、甚或谢斯托夫等公共教授截然相反。不管他们定栖何处，那都是大草原或荒漠。他们破坏形象。尼采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也许是针对思想映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的最伟大批判。然而，“私下思想家”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词儿，因为它夸大了内在性，而实际上却是外部思想的问题。① 把思想直接与外部联系起来，与外部力量联系起来，简言之，把思想当作战争机器，是一种陌生的做法，其确切步骤详见尼采（比如，警句完全不同于原理，因为在文字的王国里，原理就仿佛有机的国家行动或权威判决，而警句总是等待着一个新的外部力量赋予其意义，这是必将征服它、破坏它、利用它的最后一股力量）。还有一个理由说明“私下思想家”这种说法为什么不好。尽管这种对抗思想的确证实了一种绝对孤独，但却是极端的民众孤独，就仿佛荒漠一样，是已经与即将到来的一个民族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孤独，它召唤、等

① 见米歇尔·福柯对伯朗肖以及思想的内在性的形式的分析，“La pensée du dehors,” *Critique*, no. 229 (June 1966), pp. 523 - 548。

待着那个民族，只能通过那个民族才能存在，尽管它还没有到来。“我们缺乏那股终极力量，缺乏一个能够承受我们的民族。我们正在寻找那种民众支持。”每一个思想都已然是一个民族了，即国家的对立面。而思想的这种外在性的形式与内在性的形式根本不是对称的。严格说来，对称只存在于内在性的不同的极或焦点之间。但思想的内在性的形式——总是外在于自身的那股力量，或终极力量，那个 n 次幂——根本不是与国家机器所激发的映像相对立的另一种映像。相反，它是毁灭那个映像及其复制品、那个模式及其繁殖、把思想从属于真理、正义、权利（笛卡儿的真理、康德的正义、黑格尔的权利等）模式的每一种可能性的一股力量。“方法”是普遍意识的条纹空间，指出了必须从一点到另一点所要遵循的路线。但外在性的形式把思想置于一个平滑空间之中，它必须毫无顾忌地占据这个空间，对此，没有可能的方法，没有可构想的再生产，而只有接替、间奏、再生。思想就如同吸血鬼；它没有映像，不能构成模式，也不能复制。在禅的平滑空间中，箭头不是从一点指向另一点，而是在任何一点上，有待于指向任何其他一点，而且随着箭手和靶子的更换而改变。战争机器的问题是接替的问题，哪怕用简陋的工具进行接替，而不是建筑学模式或丰碑的问题。一个不断接替的流动民族，而不是一个模式化社会。“自然推动像箭头一样的哲学家进入人类；它没有目标，但希望箭头将扎在某处。但它无数次落空，并为这个事实感到沮丧。……就自然所采用的手段而言，艺术家和哲学家证明了自然的目的性，尽管他们也卓越地证明了这种目的的智慧。他们只击中了少数人，尽管他们应该击中每一个人——甚至对这些

少数人，也不是用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力量击中的。”①

我们特别想到了两个激发情感的文本，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文本中，思想具有真正的伤感力（反逻各斯和反民族精神的）。一个是阿尔托的文本。在给雅克·瑞维埃尔的信中，他解释说，思想的运作依据中心的塌倒，它只能由于无能采纳某种形式而存在，只在质料中释放表现的特点，在纯粹外在性的环境中边缘地发展，如同不可能普遍化的奇点和不可能内在化的环境那样发生作用。另一个是克莱斯特的文本，“论言语中思想的逐渐形成。”文中，克莱斯特把概念的中心内在性谴责为控制工具——不但控制言语，控制语言，而且控制情感、环境、甚至机会。他把这种思想与作为进程和过程的思想区别开来，一种怪异的反柏拉图式对话，一种兄妹之间的反对话，其中，一方在不知情的时候说话，另一方在还不明白的时候接话：克莱斯特说这是情感的思想，就仿佛战争机器中的一位将军，如同充满电荷的一个纯粹强度的物体。“我混合无法表现的声音，延长过渡的时期，在不必要的时候使用同位语。”争取一些时间，然后也许放弃，或等待。不控制语言的必要性，在母语中充当外国人的必要性，是为了把言语引向自身，“把不可理解的东西带到世界上来。”这就是外在性的形式，兄妹之间的关系，思想家的生成女人，女人的生成思想：拒绝控制的情感，构成战争机器的情感。思想在与外在力量搏斗，而非聚集在一个外部形式之下；思想接力式地运作，而非构成一种映像；一种事件—思想，一种个体性，而非主体—思想；一种问题—思想，而非本质—思想或原理；吸引一个民族的思想，

① 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不合时宜的沉思》，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pp. 177 - 178。

而非用于政府管理的思想。每当“思想家”射箭的时候，是否总要有一个国家人，国家人的影子或映像，来给他建议和忠告，并给他设立一个靶子或“目标”呢？雅克·瑞维埃尔毫不犹豫地回答阿尔托说：努力研究，不间断地研究，形势会好起来的，你会成功地找到一种方法，学会清楚地表现你的实际思想（普遍意识）。瑞维埃尔不是国家首脑，但在《新法语杂志》上他决不是最后一个错把自己当成文字王国里的秘密王子的人，或权利国家中德高望重的老翁。楞次和克莱斯特都反抗歌德，那位了不起的天才，所有文人中可证实的国家人。但那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克莱斯特和阿尔托的文本本身变成了丰碑，成了激发模仿灵感的模式——比其他模式要阴险得多的一个模式——因为它们相当于人为的口吃和无数的踪迹。

思想的古典映像，它所造就的条纹化的精神空间，渴望普遍性。它实际上以两种“普遍性”运作：一个是作为存在之终极本原或包容一切的地平线的整体，另一个是作为把存在改变成我们的存在的原则的主体。[①] 绝对统治与共和。在这两个之间，现实与真理的全部变体都在条纹的精神空间中找到了位置，都被置于存在与主体的双重视点之下，致力于实现一种“普遍方法。”现在，我们就不难描写拒绝这种映像、以其他方式行事的游牧思想了。游牧思想拒绝一种普遍思维的主体，相反，它与一个单一种族结盟。它并不置身于一个包容一切的总体，相反，置身于一个没有地平线的环境之中，如平滑空间，草原，荒漠，或大海。这里所确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充足性，即在界定为“氏族”的种族与界定为“环境”的平滑空间

---

① 卡尔·雅斯帕尔的一本奇书《笛卡儿与哲学》（Berlin: W. de Gruyter, 1956），讨论这一观点，并接受了它的含义。

之间。荒漠上的一个氏族，而非在包容一切的存在的地平线之内的普遍主体。肯尼思·怀特最近强调了种族—氏族（凯尔特人，感到是凯尔特人的人）和环境—空间（东方，戈壁滩……）之间的这种非对称的互补性。怀特表明，这个奇怪的合成，凯尔特人与东方人的结合，激发了一种正宗游牧思想，它贯穿于英国文学，构成了美国文学。① 我们即刻看到了危险，伴随这种做法而来的深刻含混，仿佛每一种努力和每一种创造都注定臭名远扬一样。怎样才能防止把种族的主题变成种族主义、统治和包容一切的法西斯主义、或一个教派、一种民间故事等微观法西斯主义呢？怎样才能防止东方的一极变成一种幻觉，不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激活各种法西斯主义，还有各种民间故事、瑜珈、禅和空手道呢？当然，旅行并不足以能逃避幻觉，而诉诸于真实或神话的过去也当然不能避免法西斯主义。但恰恰在这里，进行区别的标准是简单的，实际混合的不管是什么，都必将在特定层面上、特定时间内将他们混淆起来。种族—氏族只存在于被压迫种族的层面，忍受着压迫的痛苦：只有低级的、少数的种族；没有统治的种族；种族不是依纯洁性界定的，而是依一个主导系统给予它的不纯洁界定的。杂种和混血是种族的真实姓名。兰波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一直属于低贱的种族……我永远属于低贱的种族……我在布列塔尼海岸……我是一个野兽，一个黑鬼……我属于一个遥远的种族：我的祖先是古斯堪的纳维亚人。"② 同样，种族不是可以重新发现的东西；东方不是可以模仿的东西：它只存在于对一

① Kenneth White, *Intellectual Nomadism*. 这部未发表的著作的第二卷叫《诗歌与氏族》。

② Arthur Rimbaud, *A Season in Hell*, trans. Louise Varése (Norfolk, Conn.: New Directions, 1952), pp. 9, 13, 17, 39).

个平滑空间的建构之中，正如种族存在于对栖居和跨越某一平滑空间的氏族的建构之中一样。所有思想都是一种生成，一种双重生成，而非主体的属性和整体的再现。

原理 II. 战争机器是游牧民的发明（它外在于国家机器，有别于军事机构）。这样，战争机器就有三个方面：空间地理方面，数学或代数方面，和情感方面。

命题 V. 游牧生存方式必然使战争机器的空间条件成熟起来。

游牧民有一个领域；他遵循习惯的路线；他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他并非无知于点（水点，居住点，聚会点，等等）。但问题是，游牧生活的本质是一条原则，不过是一个结果。首先，虽然点决定路线，但却严格地从属于它们所确定的路线，是固定不动的事物的反面。到达水点只是为了被抛在后面；每一个点都是一个驿站，而且只能作为一个驿站而存在。一条路线总是在两点之间，但这个之间已经全部协调起来，获得了自治和自身的取向。游牧民的生活是间奏曲。甚至居住的条件也是根据永远赶他们上路的轨道来构想的。① 游牧民从根本上不同于移民；移民原则上是从一点走向另一点，即便第二点是不

---

① Anny Milovanoff, "La secinde peau du nomade," *Nouvelles littéraires*, no. 2646 (July 27, 1978), p. 18: "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边界上的拉巴游牧民使用 trigā 这个词，一般指道路，也指织带，用来固定帐篷绳索的带子……在游牧思想中，居住与某一地域无关，而相关于某一巡回路线。游牧民拒绝占有他们所路过的土地，而用绵羊毛和山羊毛建构一个环境，在暂时占据的地盘上不留一丝痕迹……因此，羊毛，柔软的质料，便给予游牧生活一种统一性……游牧民停留于旅行的再现，而非停留于所跨越空间的组织。他们从空间走向空间……羊毛多形态主义。"

确定的，未曾预见的，或未曾定位的。但游牧民只是作为结果，作为实际的必然，才从点走向点；原则上，点对他来说是轨道上的驿站。游牧民和移民在许多方面是相混的，可以构成共同体；他们的原因和条件也没有明显的差别（比如，在麦地那与穆罕默德会合的人可以选择发游牧或流浪的誓约，也可以发逃亡或移民的誓约）。①

其次，尽管游牧路线遵循小道或惯行路线，但却不能发挥固定路线的功能。固定路线是要把一个封闭空间分配给人，每人分得一份，并调节份与份之间的交流。游牧路线恰好相反：它把人（或动物）分布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内，一种不确定的、没有交流的分布。诺摩斯代表律法，但那是因为它原来就是分布，就是一种分布模式。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布，并不分成份儿，在一个空间内没有边界，也没有封闭。诺摩斯是一个大惊小怪的集体的凝聚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与法律或城邦相对立，而是落后的山村，山坳，或围绕城市周围的模糊地区（“或是诺摩斯或是城邦”）。② 因此，这也是第三点，在不同空间之间存有重大差别：固定的空间是条纹状的，有墙，封

---

① 见 W. Montgomery Watt, *Mohammed at Medin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85 - 86, 242.

② Emmanuel Laroche, *Histoire de la racine "Nem" en grec ancien* (Paris: Klincksieck, 1949). 词根“Nem”表示分布，不是分配，即便二者是有联系的。在田园的意义上，动物的分布是在一个无限界的空间内进行的，意味着没有土地的分配：“在荷马时代，牧人的占地与土地分配无关；在梭伦时代，当农业问题突出之时，那是用完全不同的语汇表现的。”“到草原上去”不是指分配，而是指分散，指动物的重新划分。只是在梭伦时代之后，诺摩斯才用指法律和权利基础上的原则，后来就与法律成为一体了。在此之前，在法制的城市或城邦与诺摩斯控制的郊区之间还有一种选择。在 Ibn Khaldūn 的著作中也谈到一种类似的选择：作为城市生活的 hadara，与作为诺摩斯的 badiya（不是城镇，而是城市时代之前的乡村，平原，草原，山脉，或沙漠）。

闭的圈子，圈子之间有道路；而游牧空间是平滑的，只有被轨道涂抹和取代的“特点”。甚至沙漠上的薄层也相互滑动，发出一种不可模仿的声音。游牧民自行分布在一个平滑空间内；他占据，居住，拥有那个空间；那是他的地域原则。因此，根据运动来定义游牧就是错误的。汤因比非常正确地指出，游牧民恰好是不运动的人。移民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无形或充满敌意的环境，而游牧民则不离开，不愿意离开；他固守着由渐小的森林遗留下的平滑空间，草原或荒漠在扩大，而面对这种挑战，他发明了游牧生活方式。① 当然，游牧民也移动，但却是坐着移动，他移动时坐着（贝都因人在马背上奔驰，膝盖顶着马鞍，坐在竖起的脚底上，“绝妙的平衡”）。游牧民知道如何等待；他具有无限的耐力。不动与速度，紧张与冲锋，一个“静止的过程”，作为过程的静止——克莱斯特提出的这些特点也是游牧民的突出特点。因此，有必要把速度与运动区别开来：运动也许非常快，但并不说明它有速度；速度也许非常慢，甚或是不动的，然而仍然是速度。运动是外延的；速度是内包的。运动表指一个被看成“一”的物体的相对性质，从点走向点；相反，速度构成一个物体的绝对性质，这个物体的不可简约的部分（原子）以涡流的方式占据或填充一个平滑空间，而且可能在任何一点上一跃而起。（因此，没有相对运动而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精神旅行，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这是游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简言之，我们通常说只有游牧民才有绝对的运动，也就是说，有速度；涡流或旋涡运动是

---

①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abridged by D. C. Somerwell, vol. 1, pp. 164 – 186: “他们投靠草原，不是要逃到草原的边界以外，而是要在那里安居乐业”(p. 168)。

其战争机器的本质特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游牧民没有点、路或土地，尽管在表面上似乎拥有这些。如果可以把游牧民称作被解域者，那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像移民那样此后还有分域，或像长期居民一样依靠别的东西（长期居民与大地的关系是以别的东西为媒介的，如财产制度，国家机器）。相反，对游牧民来说，正是解域构成了与大地的关系，甚至达到依赖解域进行分域的程度。大地解域的是它自身，从而给游牧民提供了地域。大地不再是大地了，而成为纯粹的土地或支撑。大地不是在根据地球的相对运动解域的，而是在特定地点，在森林退缩、草原和荒漠延扩的地方。胡巴克认为，用普遍的气候变化（这是移民迁徙的原因）来解释游牧生活方式，不如用“地方气候的蔓延”，这是正确的。[①] 游牧民就在大地上，在向四面八方侵蚀扩张的平滑空间里。游牧民在这些空间里栖居；他们不离开那里，亲手扩展它们；他们造就了荒漠，就如同荒漠造就了他们一样。他们是解域的向量。他们通过一系列局部运作、不断变换方向而造就了一片又一片荒漠，一片又一片草原。[②] 荒漠不仅有绿洲，那就像固定的点一样，而且有临时的块状植物，根据局部降雨情况而改变地点，不断地改变着巡回的方向。[③] 用来描写沙漠的术语也用来描写冰川：大地与天空之间没有分界

---

① 见 Pierre Hubac, *Les nomads*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48), pp. 26-29（尽管胡巴克往往把游牧民与移民相混淆）。

② 关于海上或群岛上的游牧民，José Emperaire 写道：“他们并没有抓住整个巡回路线，而只是抓住了局部，把不同的连续阶段按顺序并置起来，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旅行。他们在每一个阶段都估计巡回的长度和连续的方向变化。” *Les nomads de la mer* (Paris: Gallimard, 1954), p. 225.

③ Wilfred Thesiger, *Arabian Sands*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9), pp. 112-113, 125, 165-166).

线；中间没有距离，没有视角或轮廓；可视性受到了限制；然而，一种非常精密的类型学靠的不是点或物体，而靠的是个体性，以及关系的组合（风，雪或沙的波动，沙的沙沙声或冰冻的吱嘎声，以及二者的触觉性质）。这是一个触觉空间，确切说是“多触觉”空间，比视觉空间要响亮得多。① 方向的可变性和多声部性是块状平滑空间的一个本质特点，这个特点改变了方向的绘制。游牧民，游牧民空间，是局部确定的，而不是受限制的。既被限制又进行限制的是条纹空间，相对全球的空间：它的各个部分是受限制的，它们的方向是不变的，取向是相互的，界限是可分的，也是可相互关联的。起限制作用的东西（城垛或城墙，而不再是边界线）就是与它所“包含”的平滑空间相关的这个集合体，它减缓或阻止平滑空间的发展，限制它或将其置于外部。甚至当游牧民达到这种全球效果时，他也不属于这个相对的全球，人们在那里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从一个地区走向另一个地区。相反，他处于绝对的局部地区，以局部显示的绝对地区，而且是在一系列变换方向的局部运作中生产出来的，其中包括沙漠，草原，冰川和大海。

让绝对的东西在特殊的地方出现——这难道不是非常一般的宗教特点吗（宗教表面现象的性质、其合法性以及使其得以再生的形象的缺乏都是有待于讨论的）？但宗教圣地基本上是排斥模糊的诺摩斯的一个中心。宗教的绝对主要是包容一切的地平线，而如果这个绝对本身出现在一个特殊地点，那是为了给地球确定一个固定和稳定的中心。一神教包容一切的平滑空

---

① 见 Wilfred Thesiger 关于沙漠和 Edmund Carpenter 关于冰川的精彩描写，*Eskimo*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4)：风，触觉和沙漠的性质；视觉数据的次要特点，尤其是游牧民对作为正统科学的天文学的漠视；但总是有少数科学的全部性质变量和踪迹。

间（沙漠，草原或海洋）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简言之，宗教改变了绝对。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就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在形式上属于“契约”，“帮伙或联盟”），即便它在自身内部有权把这种模式提高到普遍的高度，或构成一种绝对统治。但对游牧民来说，提出问题的术语却是完全不同的：局部是不受限制的；因此，绝对不在特殊的地方出现，而成为一个不受限制的局部；地点与绝对的重合不是在一个有中心的、定向的全球化或普遍化中达到的，而是在局部运作的一个无限序列中达到的。只要局限于观点的这种对立，我们就能看到游牧民并未给宗教提供一个有利的平台；战争人总是冒犯牧师或神。游牧民信奉模糊的、流浪的“一神教”，并满足于这种宗教，满足于他们那流动的火焰。游牧民有一种绝对感，但显然是无神论的绝对。与游牧民有关的普世论宗教——摩西，穆罕默德，甚至与聂斯脱利异端有关的基督教——在这方面总是遇到麻烦，与他们所说的顽固亵渎发生冲突。这些宗教实际上离不开一个坚定不变的方向，离不开一个专横的法制国家，甚至缺乏一个实际存在的国家。它们提倡的理想是固定化，因此更加推崇移民而非游牧生活。甚至连早期的伊斯兰教也推崇逃亡或迁徙，而不喜欢游牧。恰恰由于一些分裂运动（如 Khāriji），伊斯兰教才征服了阿拉伯或柏柏尔游牧民的。①

然而，仅仅在宗教与游牧生活方式这两种观点之间确立简单的对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对一神教来说，其最深层的意向就是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普世或精神国家，但也不是不存在着矛盾或冲突地区。它甚至超越了国家的理想限制，甚至超越了

① Emile Félix Gautier, *Le passé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Payot, 1952), pp. 267 - 316.

宗主国，进入一个更加模糊的地带，在国家之外的一个地带，能够发生突变或归化的地带。我们所谈的宗教是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圣战的思想则是那台机器的动力。与国王的国家人格和牧师的宗教人格相对立的是先知，在他的指导下，宗教变成了战争机器，或站在了战争机器的一边。常听人说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完成了这种宗教皈依，建立了一种真正的精神实体：按乔治·巴塔耶所说，“早期伊斯兰教是从事军事活动的一个团体。”这是西方为证明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敌意而诉诸的一种说法。然而，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也许就是这种类型的冒险。先知们完全可能谴责游牧生活；战争机器完全可能推崇移民运动和定栖的理想；一般宗教完全可能以精神的、甚至质料的分域补偿其特殊的解域，就圣战的情况而言，这就是对作为世界中心的圣地的征服。尽管如此，当宗教发展成战争机器时，它就能够调动和释放一股可怕的游牧或绝对解域的力量，让游牧民陪伴着移民，而在潜在的游牧民的陪伴下，移民便进入了生成的过程之中，最后，它便用一种绝对国家的梦想来对抗国家形式。① 而这种反抗与那个梦想一样也是宗教的“本质”部分。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标志着一系列惊人的方向变化：要到达作为中心的圣地的坚定方向往往只是个借口。但要说自私自利或经济、商业或政治因素使圣战偏离了方向，却可能是错误的。圣战这个思想本身意味着方向的可变性，即中断和变化，在把宗教变成战争机器、同时利用并促成了相应的游

---

① 按照这一视角，Clastres 对印度先知的分析就可以概括为：“一方是酋长，而另一方是与他们作对的先知……先知机器运转得很好，因为 karai 能够荡涤步他们后尘的惊奇的印度民众……先知反抗酋长的叛逆行为通过一种奇怪的颠倒而给予前者一种无限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后者所掌握的权力。”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pp. 184 - 185.

牧生活之时，它就具备了所有这些因素或所有这些变量。[1]在定居民、移民和游牧民之间保持最严格划分的必要性并不排除实际存在的混合，反倒使这些混合显得更为必要。要思考定居生活方式征服游牧生活方式的一般过程也不能不看到局部游牧化卷走固定居民和双重移民的情况（这显然有利于宗教）。

平滑空间或游牧空间位于两个条纹空间之间：这就是带有垂直引力的森林空间，和带有网格和普遍平行线、现已独立的植树、具有间伐艺术的农业空间。但在“之间”也意味着那个平滑空间受控于两侧，它们限制它，抵制它的发展，尽可能多地分配给它交流的任务。或相反，在“之间”也意味着它与两侧对抗，在一边烦扰森林，在另一边获得耕地，肯定一股非交流力量或像“楔子”一样掘进来的发散力量。游牧民首先把矛头对准森林和山民，然后下山对付农民。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与国家形式相对立的形式或外部形式——但该怎样解释呢？作为一个全球空间和相对空间，这个形式包含着许多成分：在森林中间伐以开发农田；设置农业网格；附属于农业和固定食物生产的畜牧业；以城乡交流为基础的商业。当历史学家探讨西

---

① Paul Alphandéry 在其经典著作（*La chrétienté et l'idée de croisade*，[Paris: Albin Michel，1959]）中提出的一个精彩命题是，过程中的变化、停止和迂回是圣战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支圣战军队在我们看来是一支现代军队，如同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军队，绝对被动地行军，遵守一个外交官和其他官员的意志。这样一支军队知道自己的去向，而当犯错误时，却又不是由于缺少反思。一部注重差异的历史接受比较现实的圣战军队的形象。这支圣战军队无拘无束地、有时无政府地生存下来……这支军队从内部获得动力，借助一种复杂的一致性而未发生任何偶然事故。征服君士坦丁堡肯定是有原因的，也是必然的，具有宗教意义的，与其他圣战没什么两样”（vol. 2，p. 7）。Alphandéry 特别表明，无论在哪里，攻打异教徒的思想都是早期出现的，与解放圣地的思想相伴而生。（vol. 1，p. 219）

方征服东方的原因时，他们基本上都提到下列使东方处于劣势的特点：砍伐而非间伐，因此极难获取甚或发现树木；“稻田和花园”式的耕种，而非植树和农田；大多数不在固定居民控制之内的畜牧业，结果造成动物劳力和肉食品的缺乏；交流量低下的城乡关系，结果使商业缺乏弹性。① 结论不是说东方缺少国家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保留和重组各种外流因素，就更加需要一个更严格的代理机构。国家的构造总是相同的；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惟一正确的观点就是：每一个国家内部都携带着重要的生存时刻。国家不仅是由人民构成的，而且还由树木、田地、花园、动物和商品。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合成的统一体，但是，国家的发展和组织却大不相同。在东方，这些成分要松散得多，相互脱节，因此必然造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以把它们聚拢在一起：亚洲或非洲的“独裁构型”面对着不断的反叛、分离和王朝更替，但却没有影响到其固定形式。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成分之间的紧密关联使国家形式的革命改造成为可能。当然，革命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含混的。迄今为止，只有西方进行过国家改造，而东方则预示着国家的消亡，国家的废

① 从中世纪起，现代历史学家对东西方的这种矛盾进行了精彩分析（而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而非其他地方?）。见 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 – 1800, trans. Miriam Koch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pp. 97 – 108; Pierre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du Xve siécle* (Paris: PUF, 1969), pp. 334 – 339 (“Why Europe? Why not China?”); Maurice Lombard, *Espaces et réseaux du haut Moyen Age* (The Hague: Mouton, 1971), chapter 8 (and p. 219: “东方的砍伐在西方叫做间伐。因此，统治中心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的第一个深刻原因是地理上的：森林间伐证明比荒漠—绿洲更有潜力”)。

除。[1] 东方、非洲和美洲的大帝国起而抵抗渗透进来的开阔的平滑空间，保持各成分之间的距离（诺摩斯没有成为农村，农村与城市没有交流，大规模的畜牧业是游牧民主要从事的事业，等等）：东方国家与游牧战争机器形成了直接对峙。这部战争机器可能会回归到统一的道路上来，只能通过叛逆和王朝的更替向前发展；然而，正是作为游牧的战争机器发明了废除国家的梦想和现实。西方国家大多躲在条纹空间的掩盖之下，因此有更大的余地把各个成分聚拢在一起；它们只是通过移民的中介间接地面对游牧民，而游牧民的立场则由移民那里激发或全盘采纳而来。[2]

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给它统治的空间加上条纹，或把平滑空间用作交流工具，使其服务于条纹空间。不仅要征服游牧生活方式，而且要控制移民，更普遍地说，是要建立控制整个“外部，”控制横亘全世界的所有流动的一个权利地带。如果能够容忍，国家不会从各种流动捕捉的过程中分离出来，包括人

---

① Max Gluckman（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Glencoe，Ill.：Free Press，1959]）对非洲专制国家的分析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亚洲专制国家的思考：固定形式与长期叛乱的共存。国家“转型”的思想似乎的确是西方的。而另一个思想，即国家“消亡”的思想大多属于东方，属于适合游牧战争机器的状况。有人试图把这两个思想作为革命的连续阶段，但它们之间存有很大差别，很难调和起来。它们反映了19世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股潮流的对抗。西方的无产阶级本身持有两个观点：夺取政权，改造国家机器（劳动力的观点），和立志或希望国家消亡（游牧化权力的观点）。甚至马克思也不仅仅把无产阶级定义为异化的，而且也定义为解域化的。从第二个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是西方游牧民的后代。不仅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诉诸于起源于东方的游牧思想，而且连资产阶级也很快就把无产阶级与游牧民等同起来，把巴黎比作游牧民经常光顾的一座城市（见 Louis Chevalier，*Labo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in Pari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rans. Frank Jellenck [New York：H. Fertig，1973]，pp. 362－366））

② 见 Lucien Musset，Les invasions. Le second assaut（Paris：PUF，1965），如丹麦人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分析，pp. 135－137。

口、商品或商业、金钱或资本等流动。方向明确后，仍然需要固定的路线，以便控制速度，调节流通，相对稳定运动，细致地衡量主体和客体的相对运动。保尔·维里利奥的命题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他表明，“国家的政权是城邦（polis），即对公路的管理，”城市的大门，征税和收费都是设置的障碍，过滤流动的人群，“抵抗”包括人、动物和货物在内的“移民帮伙的渗透力量。”① 引力（gravitas）就是国家的本质。这决不是说国家根本不懂速度；而是说，它要求运动，甚至最快的运动，也不要成为占领平滑空间的一个运动物体的绝对状态，而要成为在条纹空间内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一个“被运动物体”的相对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解，重组和改造运动，或调节速度。国家成为城市勘察员，改造者，或公路交通：从这个观点看，国家承担了工程师的角色。速度和绝对运动并不是没有规律的，但那是诺摩斯的规律，是利用诺摩斯的平滑空间的规律，是居于这个空间的战争机器的规律。如果游牧民构成了战争机器，那就是通过发明绝对速度，通过与速度“同日而语”而构成的。每当出现与国家相对立的运作——不服从、骚动、游击战或革命行为——时，都可以说战争机器复活了，一股新的游牧潜力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平滑空间或在仿佛平滑的空间中生存的恢复（维里利奥探讨了“占据街道”的骚乱和革命命题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

---

① Paul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trans. Mark Polizzotti (New York: Semiotext[e], 1986), pp. 12 – 13 and *passim*.. 离开与之相接触的外部流动，和它所调节的流通，“城市“就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特殊的建筑群，如城堡，也是有据可查的改造者，它们的内部空间允许对运动的分析、延长和恢复。维里利奥结论说，问题与其说是关闭公共道路，毋宁说是管理或控制运动。福柯已经选择了这个方向，分析了作为手术者和过滤器的海军医院；见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1975), pp. 143 – 146.

家对一切有可能超越它的力量的反应就是给空间加上条纹。国家在挪用战争机器的时候不能不赋予其相对运动的形式：作为运动调节器的堡垒就是这种情况。堡垒正是游牧民遇到的障碍，绝对涡流运动就是被这种障碍和躲闪破坏的。反之，当一个国家未能成功地给内部和相邻空间加上条纹时，横亘那个国家的流动就必然采取与它开战的战争机器的姿态，即平滑空间里的敌意和叛逆（尽管其他国家也能够渗透它们的条纹）。这就是中国走过的道路：在 14 世纪末，尽管在造船和航海业技术非常高明，但中国拒不理睬巨大的航海空间，目睹商业流动与海盗联手，致使自身无法行动，只能在政治上故步自封，大规模地限制商业，而这只能进一步加强商业与战争机器的联手。①

实际情况要比我们所揭示的复杂得多。在平滑空间中，海洋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典型的水利模式。但在所有平滑空间中，海洋是第一个被条纹化的，被改造成了陆地的附属，有固定的路线，恒定的方向，相对的运动，和一整套逆水的渠道和管道。西方争得海上霸权的一个原因是它利用国家机器给海洋加上了条纹，把北方的技术与地中海结合起来，吞并了大西洋。但这种做法导致了一个最出乎意料的结果：即相对运动的繁殖，条纹空间中相对速度的强化，其结果是平滑空间或绝对运动的恢复。如维里利奥所强调的，海洋成了存在中的舰队的场所，在那里，人们不再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占领从某一点开始的空间：不但没有给空间加上条纹，反倒以永远运动的解域向量占据了它。这一现代策略从海洋转到了天空，那是一个

① 关于中国和阿拉伯的航海，它们失败的原因，以及这个问题在东西方“档案”中的重要性，见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pp. 300 – 309, and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p. 145 – 147.

新的平滑空间，但也转到了被视作沙漠或海洋的整个地球。作为改造者和捕捉手，国家并不仅仅使运动相对化，而且重新开始了绝对运动。它并不仅仅从平滑空间走向条纹空间，而且重建了平滑空间；在条纹空间之后重建了平滑空间。当然，这种新的游牧生活方式是伴随着全球规模的战争机器而来的，而战争机器的组织超过了国家机器，发展成能源、军事工业和跨国集团。我们说这是一个备忘录，提醒我们平滑空间和外部形式并不具有不可抗拒的革命号召力，但却据其相互作用和具体的实施条件或设施而发生根本的意义变化（比如，整体战争、民众战争，甚或游击战争相互借用方法的情况）。①

命题 VI. 游牧生存必然暗含着战争机器的数因素。

① 维里利奥给存在中的舰队及其历史意义下了精彩的定义："存在中的舰队……是永远出现在海上的一支不可见的舰队，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击……新的暴力观念是暴力不再来自直接的对峙……而来自不同团体的不平等属性，在选定时刻内对一定数量的运动的评价，对这些运动的动力效应的永久证实……因此，这已不是跨越大陆或海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的问题。存在中的舰队……创造了没有时空目的地的错置观念……战略潜水艇不必开往特定的地方；在控制海洋的同时，它仍然保持不可见的状态……实现绝对的、不受干扰的、循环的航海，因为它既不涉及出发，也不涉及到达……如列宁所说，如果'策略意味着选择应用力的点，'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这些'点'已经不是地缘策略的据点了，因为从任何特定地点来看，我们可以到达任何其他点，不管它在哪里……局部地理位置似乎绝对失去了战略价值，相反，这同一个价值也被归属于向量的局部地理位置的解除，而这又是一个永久运动的向量"；*Speed and Politics*，pp. 38，40 – 41，134 – 135。维里利奥的文本在每一方面都具有重要性和创新性。对我们来说，惟一的难点就是他把在我们看来非常不同的三组速度同化起来了：（1）游牧民的速度，或革命倾向（骚乱，游击战争）；（2）由国家机器调节的、转化的、挪用的速度（公路管理）；（3）由世界性的整体战争组织或星球多元武装所重申的速度（从存在中的舰队到核策略）。维里利奥根据其互动关系把这些速度等同起来，概括了速度的"法西斯"性质。然而，使这些区别成为可能的正是他自己的分析。

十，百，千，无数：所有军队都保留这种十进制的组合，以至于每当它们相遇时都要假定一个军事组织的存在。难道这不是军队给自己的士兵解域的方式吗？军队是由排、连、营组成的。数量可据功能、组合而各不相同。它们可能采纳完全不同的策略；但数总是与战争机器相关的。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组织或构成。当国家创造军队时，它总是把这条原则应用于数组织上，但它所做的一切就是采纳这个原则，同时利用战争机器。如此奇特的一个思想——人的数组织——却来源于游牧民。征服了游牧民的希克索斯人把这个思想带到了埃及。当摩西带领子民出埃及时，他听从了身为游牧民的岳父叶忒罗的劝告，从而构成了战争机器，其各个成分在《圣经·民数记》中均有描写。诺摩斯从根本上说是数的，代数的。当希腊几何学与印度—阿拉伯的数学形成对比时，后者显然意味着与逻各斯相对立的一种诺摩斯：这不是因为游牧民“会”数学或代数，而因为数学和代数起源于深受游牧民影响的一个世界。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三种主要的人类组织：线性的，区域的，数的。我们依靠线性组织定义所谓的原始社会。氏族谱系实际上是各个行动环节；它们连接又分化，根据所论的祖先、任务和环境而有所变化。当然，数在决定谱系或创造新谱系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同大地的作用一样，因为一个氏族环节与一个部落环节重合了。大地首先是动力谱系得以刻写其上的质料，而数则是刻写的工具：谱系刻写在大地上，并用数构成了一种“大地测量学”。随着国家社会的到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常说地域原则变成主导原则了。人们还可以说解域化，因为大地变成了一个物体，而非与谱系相结合的一个积极的质料因素。财产恰恰是人类与大地之间的解域化关系；无论财产构成了属于国家的、由线性群体连续占有的货物，还是本身变成了属于私人的、因而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

的货物，它都属于这种解域化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依据国家的两极），对大地的一种多元符码化取代了大地测量学。当然，谱系非常重要，数也具有了自身的重要性。但运动到前台的是一种“地域”组织，所有环节，无论是谱系，大地，还是数，都被吸纳到对它们进行符码化的一种天文空间或几何扩展之中——但决不是以古代帝国或现代国家的方式。古代国家给空间盖上一个顶部，一个有深度和层次的等级空间，而（始于希腊城邦的）现代国家则以内在的中心、可分化的同质成分、对称和可逆转的关系发展了一种同质性延伸。不仅仅天文的和几何的两种模式紧密地混合起来，甚至在未混合之前，它们也意味着谱系和数向衡量权力的屈服，如帝国空间或政治扩展所表明的。[①] 数学，数，总是在国家机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早在官僚帝国时代就如此，而且拥有人口普查、征税和选举这三种联合运作。这甚至对现代的国家形式也是事实，现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应用了介于数学科学与社会技术之间的全部计算技术（有一整套以政治经济学、人口学、工作组织等为基础的社会微积分）。国家的这个数学成分在对各种质料的处理上发挥了特殊威力：包括基本质料（原材料），精选的次要质料，或由人口构成的终极质料。因此，数始终控制着质料，控制着质料的变体和运动，换言之，使其服从于国家的时空框架——或

---

① Jean – Pierre Vernant 特别分析了希腊城邦与同质性集合扩展之间的关系，*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Paris: Maspero, 1971 – 1974），vol. 1，part 3. 一旦与古代帝国关联起来，或与古典城邦之后的构型关联起来，问题必然要复杂得多了。这是因为所论的空间非常不同。但数仍然服从于空间，如 Vernant 就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暗示的。毕达哥拉斯或新柏拉图派的数观包括帝国的天文空间，而非同质性扩展，但仍然把数置于从属地位；正因如此，数才是理想的，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计算”。

是帝国空间，或是现代扩展。[①] 国家具有地域原则，或解域原则，从而把数与衡量量值联系起来（逐渐复杂的衡量方法导致了多元符码化）。我们不认为在国家中会发现数的独立或自治状态，尽管会看到其发展的全部因素。

计算的数，换言之，自治的算术组织，既不是最高的抽象，也不是非常大的量。它只与游牧生活方式构成的或然状况和由战争机器构成的有效状况相关。正是在国家军队中，才出现了与其他质料相关的处理大数量的问题；但战争机器则通过计算的数处理小量的运作。当人们在空间分配某物而不是划分空间或分配空间本身时，这些数就出现了。数变成了主体。数之于空间的独立不是抽象的结果，而是平滑空间的具体性质造成的，这个空间在本身不被计算的情况下被占领。数不再是计算或测量的工具了，而成为运动的工具：正是数本身在平滑空间中运动。的确存有一种平滑空间的几何学：但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种小的操作型几何学，一种特征几何学。空间越是独立于测量学，数就越独立于空间。作为正统科学的几何学对于战争机器并不重要（它只对国家军队是重要的，对固定堡垒是重要的，但却使将军们惨遭失败）。[②] 无论何时，只要占据一个平滑空间，数就成为一条原则，并在内部被用作主体，而非用来测量一个条纹空间。数是活动的占据者，平滑空间中可运动的因素，与条纹空间中不动的几何因素相对立。游牧民的

---

① 杜梅西尔强调了数学在政治主权的早期形式中起到的作用。他甚至将数学说成是主权的第三极。见 *Servius et la Fortune* 和 *Le troisiéme souverain* (Paris: Maisonneuve, 1949)。但数学是用来组织质料的；因此将质料屈从于两个主极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② Karl von Clausewitz 强调了几何学的次要作用，即在战略策略方面的作用：*On War*, trans. Michael Howard, Peter Paret, and Bernard Brodi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14 – 216 ("The Geometrical Factor").

数单位是流动的火，而非帐篷，因此也是相当固定的："火优越于帐篷。"计算的数不再服从于长度决定或几何面积了，而只与地理方向保持着一种能动的关系：它是方向的数，而非面积或长度的数。游牧组织具有无法消除的数学性和方向性；数量无处不有，有十，有百；方向无处不有，有左，有右：数的头也是左或右的头。① 计算的数是有节奏的，不是和谐的。它与节拍或韵律无关：只有在国家军队之内，由于纪律和表演的缘故，人们才踏着节拍行军；但自治的数组织在别处发现了意义，无论何时，都有必要在平原、在沙漠——在森林人和国家人的谱系失去重要性的地方——建立移位秩序。"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脚步声与沙漠融为一体。路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有人从这里走过。这种走路的方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中，以至于他想都不必想。脚步自动迈出，无从测量步伐的节奏。"② 在战争机器和游牧生活中，数不再被计算了，而成为一个密码，正是由于这种能力，数才构成了"团队精神"，发明了秘密及其副产品（策略，间谍，战争计谋，埋伏，外交，等等）。

一种解码的、节奏的、方向的、自治的、可动的、计算的数：战争机器就仿佛游牧组织的必然结果（摩西曾经历过这种组织及其一切后果）。现在有些人急着要批判这种数组织，将其谴责为军事的、甚或集中营一样的社会，在那里，人只不过是被解域了的"数"。但那是骗人的。为恐怖而恐怖。人的数

---

① 见把数和方向与战争机器相关联的最深刻的古代文本之一，Ssu - ma Ch'ie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vol. 2, pp. 155 - 193 ("The Account of the Hsiung - nu")。

② Frank Herbert, *Children of Dune* (New York: Berkley Books, 1977), p. 212. 我们可以援指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在界定计算的数时提到的特征："排列，""多元与偶然的分布，""无穷一点，""严格的近似值"等。*Seme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Seuil, 1969), pp. 293 - 297.

组织当然不会比线性的或国家的组织更残酷。比之把人民当作将要修剪的树木或将要构型的地理形状，把人民当作数还不算太坏。此外，把数当作数字，当作统计数字，这适合国家的被计算的数，而不适合计算的数。集中营的世界既靠谱系和地域，也靠计算来运作。问题不在于好坏，而在于特殊性。数组织的特殊性取决于游牧生活方式和战争机器的功能。计算的数既不同于谱系符码，也不同于国家的多元符码。一方面，数组合从谱系中选择、抽取能进入游牧生活方式和战争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引导这些因素对抗国家机器，把一种机器和一种生活方式与国家机器对立起来，以一种解域化切割国家的线性地域和地域或解域。

计算的数，游牧或战争的数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总是复数，清楚表现的数。每一次都是数的复合体。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它不指大的、同质化的量，与国家的数或被计算的数一样，但却以准确清楚，换言之，以其在自由空间内的异质分布产生了巨大效果。甚至当国家军队在处理大数时（尽管基数“10”占绝对优势）也不放弃这个原则。罗马军队是由数字构成的一个数，清晰的表现致使各个部分都变成活动的了，几何图形也在不断变化、改造。复数或清楚的数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武器、动物和运输工具。因此，基数单位就是集合单位，比如，人—马—弓，1x1x1，锡西厄人就是按照这个公式取胜的；而这个公式变得越发复杂，以至于有些“武器”聚集或表示若干人或动物，如战车需要两匹马和两个人，一个人驾车，另一个人射箭，2x1x2 = 1；或如重甲步兵改革中著名的双柄盾，它把人链焊接在一起。无论单位多么小，表现都是清楚的。计算的数总是同时有若干基数。它也必然考虑到外在的但却包含在数字之内的代数关系，表示一个谱系或部落成员中战士的比例，后备军的作用，人员、质料和动物的保养。后勤学

就是处理这些外在关系的技术，这些外在关系与内在的策略关系一样都是战争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是相互关联的战斗组织的构成。这两方面一起构成了表现战争数字的科学。每一个集合体都具备策略的一面和后勤的一面。

但是，计算的数还有一个更加秘密的特点。无论在哪里，战争机器都表示代数复制或加倍的一个奇异过程，仿佛它沿着两个非对称的、不相等的序列运作。一方面，谱系的确是按照数组织来改组的；一组复合数被强加在谱系之上，以便让新原则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人是从各个谱系中同时抽取出来的，以构成一个特殊的数团体——仿佛谱系—团体的这个新的复合数，如果不构成本身也是数的团体，就不能成功一样。我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战争机器的本质，是数的自治所必需的运作：团体的数必须有其对应物，即数的团体；数必须据两种互补运作而加倍。为了使社会团体数字化，数必须构成一个特殊团体。当成吉思汗在草原上进行他的伟大组合时，他按照数字安排谱系和每一宗族的战士，把他们置于一个密码和一个头人的领导之下（十人队由十人队队长领导，百人队由百人队队长领导，千人队由千人队队长领导）。他还从每一个数字化的宗族中抽取了少数人，组成他个人的卫队，也就是包括部下、代表、信使和外交官在内的一个能动组织（antrustions）。[①] 一个永远不能没有另一个：双重解域，第二个是对较高权力的解域。当摩西进行建设荒漠的伟大工作时——他当时受游牧民的影响比来自耶和华的影响还大——他统计了每一个部落的人口，按数量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还颁发了一道

---

① Boris Iakovlevich Vladimirtsov, *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 trans. Michel Carsow (Paris: Maisonneuve, 1948). 术语 antrustions 借自撒克逊政权，其国王的护卫是由法兰克人组成的。

法令，规定在那个特殊时代，部落里第一个出生的婴儿属于耶和华。由于这些初生婴儿太小，他们在数中的角色就转给了特定的部落，即利末人，这些利末人组成了数团体来特别保护方舟；又由于利末人在数量上少于各部落初生婴儿的总数，所以，部落可以通过赋税买回多余的初生婴儿（这是最基本的后勤学）。战争机器如果没有这个双重序列就不会发生作用：这种复合数既能取代线性组织，又能驱除国家的地域组织。战争机器的权力是根据这个双重序列定义的：权力不再以局部和中心为基础，不再依靠中心的潜在共鸣和各个局部的多元编码，而取决于数内部的关系，并独立于量。冲突或权力斗争也是这个双重序列的结果：在摩西的部落与利末人之间，在成吉思汗的 noyans 和 antrustions 之间。这不仅是各个宗族为获得以前的自治而提出的抗议，也不是为控制国家机器而计划的斗争。这是战争机器固有的一种冲突，存在于它的特殊权力之中，存在于加之“头人”权力的特殊限制之中。

因此，数字构造，或计算的数，包含着几种运作：最初集合或组合的计算（谱系），被抽取出来的亚组合的联合（十人队、百人队等的组成），和通过替换对应于联合组合的另一组合的构型（特殊团体）。在游牧生活方式中，这最后一种运作最多样化和最具创新性。当战争机器被国家挪用时，甚至国家军队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对社会团体的代数化把特殊团体的构型作为其对应物，那么，本身具有代数性质的特殊团体就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得以建构：（1）从特殊的宗族或部落，其统治权最终将具有新的意义（如摩西与利末人的情况）；（2）从每一个宗族的代表，他们最终将充当人质（初生婴儿，实际上，亚洲和成吉思汗都属于这方面的例子）；（3）从一种完全不同的因素，外在于基础社会的人，奴隶、外国人或另一种宗教的信徒（早在撒克逊时代，国王就用法兰克奴隶

组成特殊团体；但伊斯兰教是最好的例子，甚至激励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范畴，即“军事奴役”：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来自大草原的奴隶，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苏丹购买的高加索人，或来自基督教社区的土耳其禁卫军）。①

难道这不是“作为儿童扒手的游牧民”这一重要主题的来源吗？显然，尤其在最后一个例子中，特殊团体是作为战争机器中权力的决定因素来建构的。战争机器和游牧生活方式必须要同时避免两种情况：宗族贵族地位的恢复和宗主国职员的构成。国家本身往往把奴隶当作高级职员来使用，这使所有事情复杂化了。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做法的原因有多种，而且，尽管军队集两种倾向于一身，但这两种倾向却来自不同的出处。源自游牧民的战争机器中，奴隶、外国人或俘虏与宗族贵族和国家的职员和贵族截然不同。他们是“代表，”使者，外交官，间谍，战略家和后勤人员，有时也是铁匠。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说成是“苏丹的怪念头。”相反，有可能产生怪念头的是战争头领，这种特殊的数团体，只在与诺摩斯相关时才具有价值的这种密码，其客观存在和必要性就说明了这一点。战争机器本身既是一种解域，又是一种生成。特殊团体，尤其是奴隶—异教徒—外国人构成的团体，在变成士兵和信教者的同时，在之于宗族和国家的关系上又是被解域者。你只有生来是个不信教者，才能变为信教者；你只有生来是个奴隶，才能变为士兵。人为了这个目的建立了特殊学校和机构：特殊团体是战争机器本身的一个发明，国家始终在利用它，将其完全用于

---

① 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是图阿雷格人的一个特殊的铁匠团体，叫做伊那登（“他者”），原来人们以为伊那登是苏丹奴隶，在撒哈拉的犹太人或圣路易的骑士的后代。见 René Pottier, “Les artisans sahariens du métal chez les Touareg,” in *Techniques et civilizations*, vol. 1 (*Métaux et civilizations*), no. 2 (1945), pp. 31 – 40.

自己的目的，因而变得难以辨认，要么就以贵族职员的形式，或以特别团体的技术专家的形式，或以既抵制同时又同样服务于国家的“团队精神”，或在既服务于同时又替代国家的代表中恢复这个发明。

诚然，游牧民没有历史；他们只有地理。而且，游牧民被如此彻底地征服，以至于历史成了记载国家胜利的历史。结果，我们目睹了一种普遍批判的兴起，说游牧民不能进行任何革新，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冶金术上的，政治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或苏维埃分子（Grousst 或 Vladimirtsov），都认为游牧民是人类值得可怜的一部分，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对技术不闻不问；对农业、城市和国家只知道破坏或攻占。然而，如果游牧民没有高超的冶金技术的话，就很难理解他们何以在战争中取胜（认为游牧民从宗主国的叛徒那里获得技术武器和政治咨询，这极不可能）。除了以游牧组织和战争机器的名义，很难理解游牧民何以能从事破坏城市和国家的活动，而游牧组织和战争机器在定义上又不是无知的，而具有肯定的特点，特殊的空间，以及打破谱系和排除国家形式的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构型。历史始终把游牧民排除在外。曾有人尝试把战争机器归属一个军事范畴（“军事民主”的范畴），把游牧生活方式归属一个固定栖居的范畴（“封建主义”的范畴）。但是，这两种假设设定了一个地域原则：要么宗主国挪用战争机器，把土地分给武士，作为地位的俸禄（假采邑），要么财产本身在成为私有之后在拥有者中设定从属

关系，建立军队（真采邑和领地）。[①] 在这两种情况下，数都从属于一种固定的“财政”组织，以便决定哪一片土地该割让出去，也决定受益者本人所应交付的税额。毫无疑问，游牧组织和战争机器处理的都是相同的问题，都涉及土地和税收（在这方面，游牧武士是大革新家，尽管在理论上却相反）。但他们发明了一种地域性和一种“活动的”财政组织，以证实数字原则的自治性：这两种制度可能会混淆或综合，但游牧制度的特殊性仍然是把土地服从于被移位和利用的数，把税收服从于这些数的内在关系（比如，在摩西制下，税收就在数团体与数的特殊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简言之，军事民主和封建主义决不能说明游牧民的数建构，反而证明了它们在固定政权中的幸存。

命题 VII. 游牧生活方式具有战争机器的武器的“影响力”。

总是可以根据用法（毁灭人类或生产物品）来区别武器和工具。但是，尽管这种外部区别说明了某种技术客体的次要用途，但并未排除这两个组合之间的可逆性，以至于难于在武器与工具之间分辨出内在差异。按照安德鲁·勒罗伊－古尔汗的定义，双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击打工具。“多少年来，农业工具

---

① 封建主义与所谓的军事民主一样都是军事制度；但这两种制度都把军队融入到某种国家机器中（对封建主义来说，那是卡洛林王朝的土地改革）。Vldimirtsov 提出了对草原游牧民的封建阐释，而 Mikhail Griaznov（*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Siberia*，trans. James Hogarth，New York：Cowles，1969）则倾向于军事民主。但 Vldimirtsov 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游牧民的组织之所以是封建的，原因恰恰在于其分化的程度，或融入它所征服的帝国的程度。他本人谈到，开始时，蒙古人并没有把夺取的土地组织成采邑，无论真假。

和战争武器始终都是相同的。”① 有些人谈到被置于源头的一个“生态系统”，其中，工作工具和战争武器在作用上是互换的：仿佛二者共用同一个机械群。然而，我们仍然感到有许多内部差异，即便不是固有的，就是说，不是逻辑的或概念的，即便与逻辑和概念相近似。作为第一个近似值，武器具有一种特殊的投射关系。可以投射或被投射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都是武器，而其关键是推进。武器是发射的；“问题”这个概念与战争武器相关。工具的投射机制越多，它就越像是武器，无论在潜力上还是在简单的象征意义上，都如此。此外，工具常常弥补它们所具有的投射机制，否则便用于其他目的。当然，无论投射的还是被投射的，弹道武器在严格意义上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但是，甚至手动武器也要求手和胳臂的使用不同于工具所要求的那种使用，如武术中的投射动作。另一方面，工具总是内向的，内投的：它在一段距离外准备好质料，以便使其处于平衡状态，或把它用作一种内在性的形式。这两种情况指的都是一段距离外的行动，但其中一种是向心的，另一种是离心的。也可以说工具遇到了阻力，被征服或被使用，而武器则与反攻有关，被避开或被发明（反攻实际上是战争机器中加速和发明的因素，甚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量的对抗或防御队形）。

其次，武器和工具（大概）并不“倾向于”拥有相同的运动和速度关系。保尔·维里利奥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强调了武器—速度的这种互补性：武器发明了速度，或者说，速度的发现发明了武器（武器的投射性质就是其结果）。战争机器释放了速度的向量，它如此特殊以至于需要一个特殊的名称；它不仅具有破坏力，而且是“流动的”（等于诺摩斯）。这种观点有

① J. F. C. Fuller, *Armament and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5), p. 5.

许多优势，其中之一就是提出了区别狩猎与战争的一个新模式。不可否认的是，战争并非衍生于狩猎，狩猎也没有促进武器的生产：战争要么产生于武器与工具相互混淆和逆转的领域，要么就以自身的优势与日常应用已经区别开来的、已经构成的武器。如维里利奥所说，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决不是狩猎者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恰恰相反，当人捕捉到被猎动物的力时，他便进入了与人的一种全新的关系，即战争关系（敌人，而不再是猎物）。因此，说战争机器是畜牧的游牧民的发明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动物的饲养和训练既不能与原始狩猎相混，也不能与固定的家畜相混，而实际上是投射和弹道系统的发现。战争机器不是进行一打一击的暴力，也不是构成“一劳永逸”的暴力，而是通过饲养和训练而构成了一整套暴力经济，换言之，是持续暴力，甚至是使其无限延续的一种方式。“流血，直接杀害，与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也即与暴力经济相悖……暴力经济不是畜牧狩猎者的经济，而是被猎动物的经济。骑在马背上时，人保存着运动能量，即马的速度，而不再保存蛋白质（动力，而非肉体）……而在狩猎中，狩猎者的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屠杀阻止野生动物的运动，驯猎者［开始］通过训练保存运动，骑马者参与运动，掌握方向，加快马的速度。”技术动力将促进这种倾向的发展，但是，“骑马是武士的第一种投射，他的第一种武装。”① 于是就有了战争机器中的生成动物。这是否是说战争机器在骑马和骑士出现之前并不存

---

① Paul Virilio, “Métempsychose du passager,” *Traverses*, no. 8 (May 1977), pp. 11 – 19. 然而，维里利奥断言，狩猎间接地过渡到了战争：当妇女充当了“运输或搬运”动物时，这已经使狩猎者进入了超越狩猎的一种“同性争斗”的关系。但维里利奥本人似乎让我们在速度与位移之间加以区别：速度是投射者和抛射者，而位移则是运输和搬运。战争机器是根据第一种观点定义的，而第二种则与公共领域有关。比如，马不是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如果它只用来驮人，即人必须下马战斗的话。战争机器是由行动而非运输来定义的，即便运输反作用于行动。

在呢？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战争机器意味着速度向量的释放，而且，这个向量已经变成了自由的、独立的变量。这在狩猎中并不发生，在狩猎中，速度基本上相关于被猎的动物。这种竞赛向量完全可能在步兵中得到释放，而不依靠骑马。此外，骑马也是可能的，但却是作为运输工具，甚至搬运工具，而与自由向量无关。无论如何，武士从动物身上借鉴的是动力的观念，而非猎物的模式。他不把猎物的观念概念化而应用到敌人身上，而把动力的观念抽象化，应用到自身上来。

这即刻引出两种反对意见。根据第一种，战争机器具有的重力和引力与速度同样重要（重与轻的区别，防御与攻击的不平衡，松弛与紧张的对立）。但要表明战争中非常重要的“时间推延”现象，甚至僵持和紧张等现象在某些情况下与纯粹速度的关系，其实并不难。而在非战争期间，它们又与国家机器利用战争机器的状况相关，即通过安排一个条纹空间而把对立的力平衡起来。速度是可以作为弹道的属性，一颗子弹或炮弹的属性而被抽象出来的，这本身宣告了武器、士兵和僵持的末日（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僵持）。但力的平衡是一种抵制现象，而反攻则意味着用突发的速度变化打破平衡：对所有的速度向量加以重新组织、通过消灭人员和武器而重新创造运动的平滑空间的，正是坦克。①

与此相对的意见更加复杂：它认为，速度的确似乎是工具以及武器的组成部分，决不是战争机器所特有的。动力的历史

---

① J. F. C. Fuller, *Armaments and History*, pp. 137ff. 福勒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设想是以大炮为基础的防御战。但炮口对准了炮口，形成了僵持局面。通过“不断加强的炮火”（p. 138）来调动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弹坑使战地更加难以平复。英国人、尤其是福勒将军得出的结论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即用坦克：坦克，也就是“大地飞船”（p. 139），在陆地上重建了一个海洋或平滑空间，“把海洋战术用于陆地作战”（p. 140）。作为普遍规律，军事反拨从来不是按种类的：坦克是对大炮的反拨，直升机是对坦克的反拨，等等。这弥补了战争机器中的革新因素，它与工作机器中的革新因素完全不同。

不仅仅是军事的历史。但这也许太过于依据运动的量来思考问题，而不是寻求质的模式。两种理想的动力模式是工作和自由行动。工作是克服阻力的动力原因，它作用于外部，为了结果而消耗，而且不停地更新。自由行动也是动力原因，但没有要克服的阻力，它只作用于运动物体自身，不为了结果消耗，而且不停地连续进行。无论其程度如何，第一种情况下的速度是相对的，第二种情况则是绝对的（永久运动的思想）。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力的应用点，这股力是被认为“—”（引力）的一个物体的重量的结果，同样重要的还有这个应用点的相对位移。在自由行动中，最重要的是物体的诸因素逃避引力、绝对占据一个连续空间的方式。武器和武器的运用似乎与自由行动的模式相关，而工具则与工作模式相关。线性位移，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构成了工具的相对运动，但构成了武器的绝对运动的，却是对一个空间的涡流式占领。这就仿佛武器在运动，自我推动，而工具则是被运动的。工具与工作之间的这种关联是模糊的，除非是我们刚刚定义的那种动力的或真正的工作。工具并不限制工作，而恰恰相反。工具决定着工作。还必须说，武器显然意味着原因的更新，在结果中的消耗或消失，对外来阻力的抵制和力的位移等。赋予武器以魔力，使之与工具的束缚形成对比，这是徒劳的：武器和工具服从于相同的规律，而正是这些规律决定着它们的共同领域。但一切技术背后的原则都是要表明技术因素是抽象的，完全遭到破坏，只要不将其与它事先假定的组合相关的话。与技术因素构成基础关系的是机器：不是技术机器，技术机器本身就是诸因素的集合，而是社会或集体机器，在特定时刻决定技术因素，及其用法、扩展、理解等的机器组合。

机械群正是通过这些组合的中介进行选择，归类，甚至发明技术因素的。因此，只有对其建构组合加以定义之后才能谈

论武器或工具。我们之所以说武器和工具不仅仅在外部形态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也没有相互区别的内在特点，原因就在这里。它们具有与各自的组合相关的内部（而非内在）特点。促成自由行动模式的不是武器本身及其物理方面，而是作为武器之形式因的“战争机器”的组合。促成工作模式的不是工具，而是作为工具之形式因的“工作机器”的组合。当我们说武器与速度向量不可分割时，当工具与引力状况相关时，我们不过是在说明两种组合之间的一种差异，一种站得住脚的区别，即便在它本身的组合中，工具在抽象意义上“更快些，”武器在抽象意义上“更重些。”工具本质上相关于力的生成、位移和消耗，其规律寓于工作之中，而武器只涉及力在时空中的实施和显示，与自由行动是一致的。武器并非飞来之物，显然需要生产、位移、消耗和对抗。但这方面相关于武器和工具的共同领域，并不涉及武器的特殊性，当只考虑力自身，不再将其与别的因素而只与数、运动、空间或时间，或当给位移附加上速度时，武器的特殊性才出现。[①] 具体地说，这样的一件武器与工作模式无关，而与自由行动模式有关，其前提是，工作的条件是在别处完成的。简言之，从力的观点来看，工具相关于引力位移、重量和高度系统，而武器则相关于一个速度永久运动的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速度本身就是一个“武器系统”）。

无论对工具还是对武器，集体的和机械的组合一般来说都比技术因素重要。武器和工具是结果，不过是结果而已。人们常常说一件武器一旦脱离了与其紧密相关的战斗组织之外，便

① 关于这两个模式之间的一般区别，“自由行动，”“消耗的力/保存的力，”“真实效果/形式效果”等，见 Martial Guéroult's *Dynamique et métaphysique leibnizienn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34), pp. 55, 119ff., 222 – 224.

什么都不是。比如，“重甲步兵”的武器只依靠作为战争机器之一种变化的方队而存在：当时惟一的新武器，双柄盾牌，是由这种组合创造出来的；其他武器以前就存在，但在其他组合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性质。① 构成武器系统的始终是组合。矛和剑是在青铜时代根据人—马组合的需要出现的。人—马组合加长了匕首和矛头，造出了最早的步兵武器，晨星球和砍斧便过时了。马镫的出现又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马组合，导致一种新型的矛和新武器；而这个人—马—镫的组合本身是可变的，依据是否相关于游牧时代的普遍状况，或是否于后来重新用于封建时代的定居状况，而产生不同效果。工具的情况完全相同：一切都取决于工作的组织以及人、动物和质料的组合。因此，重犁只是“深耕”占主导的组合的特殊工具，马作为役用动物而取代了牛，土地也历经三年一次的替耕，而经济也成为社区的了。在此前，重犁也可能存在，但在其他组合的边缘而没有显出任何特殊性，它与浅耕的区别性特征也没有开发出来。②

组合是充满激情的，是欲望的合成。欲望与自然或自发的决定没什么关系；欲望只有进行组合和被组合之分。一种组合的理性，其效率，如果不是组合所激活的激情在发生作用，就根本不存在。欲望构成激情，激情也构成欲望。德田已经表

---

① Marcel Detienne, “La phalange, problèmes et controverse,” in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no*. 11), ed. Jean-Pierre Vernant (The Hague: Mouton, 1968), pp. 119-143: “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是内在于社会和精神的。”(p. 134)

② 关于马镫和犁，见 Lynn Townsend White, Jr., *Medic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pters 1 and 2。同样，亚洲的旱稻种植也属于这种情况，其掘棍、锄和犁也取决于集体组合，而集体组合也依人口密度和歇耕时间而定。这使布罗岱尔得出结论：“根据这种理论，工具是结果，而不再是原因了”；*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p. 116.

明，希腊方队与价值的全部逆转不可分割，也与从根本上改变了欲望与战争机器之间关系的情绪变化不可分割。这是人下马的情形，人与动物的关系被步兵组合中人之间的关系所取代，预示了农民士兵、市民士兵时代的到来：整体的战争性爱本能发生了变化，一种集体的同性本能将要取代马人的动物性本能。毫无疑问，当一个国家挪用战争机器的时候，它总是要对公民进行教育，如同训练工人和士兵一样。但是，如果一切组合真的都是欲望组合，那么，问题则是，战争和工作组合本身不能从根本上调动不同阶层的激情。激情是欲望的实现，而且据组合的不同而不同：正义不是相同的正义，残酷不是相同的残酷，怜悯也不是相同的怜悯。工作领域离不开形式的组织和发展，而与此相应的是主体的形成。这是“作为工人形式”的激情的领域。感觉（feeling）意味着对质料的评价与其抵制，形式的方向（和“意义”）与其发展，力的经济与其位移，即一整个引力场。但战争机器的王国恰好相反，是情感（affects）的王国，只与自在的运动物体相关，与速度和速度在各元素之间的构成相关。情感是情绪（emotion）的主动宣泄，是反攻，而感觉则是始终被位移、被推迟的一种抵制情绪。情感是像武器一样的外抛射；感觉是像工具一样的内接收。情感与武器之间有一种关系，这不仅见于神话，也见于武功歌，以及武侠或言情小说。武器就是情感，情感就是武器。从这个观点来看，最绝对的不动性，纯粹的紧张，就是速度向量的组成部分，由这个向量携带着，把行为的僵化与运动的加速联系起来。骑士上马时还在睡觉，然后像离弦的箭一样飞驰而去。克莱斯特最卓越地把这些突发的紧张、昏厥、悬念与战争机器的最快速度融合在一起。他向我们呈现了技术因素的生成武器，这是与激情因素的生成感情同时发生的（彭忒西勒亚的公式）。武术总是让武器服从于速度，而更重要的是服从于精神（绝对）速

度；因此，它们也是紧张和僵持的艺术。情感经过这两个极端。因此，武术并不像国家事务那样固守某一法典，而是依照路数，也就是情感的许多道路；按照这些路数，人们学习使用武器，也学习“不用”武器，仿佛情感的力量和培养是组合的真正目标，武器仅仅是附带工具。学习消解物体，消解自己，这是战争机器的固有因素：武士的“不做，”主体的消解。一种解码运动贯穿战争机器，而多元编码则把工具与工作组织和国家组织连接在一起（工具决不可以不学；人们只能弥补所缺乏的工具）。的确，武术不断发掘引力中心和位移的规律。那是因为这些路数不是最终的路数。不管他们走得多远，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存在的领域，而只是把另一种性质的绝对运动转译成普通空间——不是在虚无而是在虚空中，在平滑的虚空中实现的空间，那里已不再有什么目标：攻击，反攻和冲锋陷阵了。①

还是从组合的观点来看，工具与符号之间存有一种本质联系。那是因为界定工具的工作模式属于国家机器。常听人说原始社会的人严格说来是不工作的，即便工作，也只从事一些非常有限的、有规律的活动；而战争人，就其作为战争人的能力而言，也不工作（赫拉克勒斯的“劳动”是为国王而做的）。技术因素一旦从其领域中抽取出来就变成了工具，应用于作为客体的大地；但与此同时，符号不再刻写在身体上了，而刻写在一个不动的客观质料之上。因为只要有工作，就必然有国家机器的抓捕活动，以及文字的符号活动。于是，组合的符号工

---

① 论武术的论文使我们想起那些路数虽然仍然服从于引力规律，但在虚空中一定会被超越。克莱斯特的 *About Marionettes*，trans. Michael Lebeck（Mindelheim: Three Kings Press, 1970）无疑是西方文学中最具自发创新意义的文本之一，描写了一种类似的运动：引力中心的线性位移仍然是“机械的，”相关于更“神秘的”、与灵魂有关而与重量无关的东西。

具与工作的文字组织的符号就构成了亲和力。武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武器与珠宝存有本质联系。珠宝经历了许多次二手转用，因此，我们已经无从识别它的真相。但一旦有人告诉我们它是“原始的”或游牧的优秀技术，当我们亲眼看到这些微小的艺术杰作时，我们便豁然开朗了。这些胸针，这些金银饰物，这些珠宝，都系于一些小的可动的物体，不仅容易搬运，而且相关于只作为运动物体的物体。这些饰物构成了纯粹速度的表现，携带着本身可动的和运动的物体。它们之间不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而是动机与支持的关系，在那里，大地不再是土地，甚至根本不再有什么土地了，因为支持已与动机一样是运动的了。它们赋予色彩以光速，变金为红，变银为白光。它们刻写在马鞍，剑鞘，盔甲，武器的把柄上；它们甚至装饰只用过一次的物体，如箭头。且不管它们所暗示的努力或劳作，它们属于自由行动的秩序，与纯运动相关，而不属于工作秩序及其引力、抵抗和消耗状况。流动的铁匠把金属制作与武器联系起来，武器也把金属制作与铁匠联系起来。金银还有许多其他功能，但除了战争机器促成的这种游牧贡献外，便不可理解了。在战争机器中，金银不是质料，而是适于武器的表现特征（整个战争神话不仅固存于金钱之中，而且是金钱的活跃因素）。珠宝是与武器相对应的情感，被同一个速度向量飞快地卷走了。

金属制作，珠宝制作，装饰，甚至装潢，都不构成文字，尽管它们都具有一股抽象力，在每一方面都等同于文字的抽象力。但这种抽象力是以不同方式组合的。就文字而言，游牧民不需要创造自己的制度，而借用了固定的宗主国邻居的制度，

这些邻居甚至给游牧民提供了语言的音译。① “金匠和银匠都掌握优秀的原始艺术；金丝装饰和镀金镀银……锡西厄艺术，都相关于游牧和战争经济，都利用又拒绝为外来人保留的一种商业，现在趋向这种奢侈的装饰性工作了。野蛮人……不必拥有或创造一种准确的符码，如一种基本的图象表意文字——更不需要自己拥有一种字母文字，这的确会使更加先进的邻居的文字构成竞争。到了公元前 4 和 3 世纪，黑海地区的锡西厄艺术在形式上自然形成了图象格式，因此更具有线性装饰而非原型文字的性质。”② 当然，你可以在珠宝、金属饰物、甚或武器上写字，但只能把一个事先存在的文字系统应用到这些物体上。如尼文字就很麻烦，因为它的起源只相关于珠宝、饰针、金属制作和小的活动物体。问题是，在早期阶段，如尼文字只具有很小的交流价值，和非常有限的公共功能。其神秘性质曾使许多人将其阐释为魔幻文字。相反，它是一种特殊构成的情感符号：（1）签名，作为拥有者或制作者的标志，和（2）简短的战争或爱情信息。它构成一种文本，装饰性的而非经典性的文本，“几乎没什么用途、一半流产了的发明，”一种替代文字。只在第二个时期，当碑文出现时，它才具有了文字价值，随着公元 9 世纪丹麦的改革，它与国家和工作联系起来了。③

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工具、武器、符号和珠宝实际上在普通领域无处不有。但问题并不在此，也不是要一一追根溯

---

① 见 Paul Pelliot, “Les systèmes d'écriture en usage chez les anciens Mongols,” *Asia Major* 2 (1925), pp. 284 - 289；蒙古人用 Uighur 手稿，叙利亚字母（是西藏人发明了 Uighur 书写的语音理论）；流传至今的《蒙古秘史》的两个版本中一个是汉语译本，另一个是汉语的音译。

② Georges Charrière, *Scythian Art* (New York: Alpine Fine Arts Collection, 1979), p. 185.

③ 见 Kucien Musset, *Introduction à la runologie* (Paris: Aubier - Montaigne, 1965).

源。问题是要给组合分类，换言之，是要确定一些区别性特征，据此判断某一因素在形式上属于一种组合而非属于另一种。也可以说，建筑和烹饪与国家具有明显的亲和性，而音乐和药品则具有区别性特征，被归于游牧战争机器一类。① 因此，要用一种区别性方法确定武器与工具之间的区别，这至少要从五个角度来看：方向（意义）（外抛射—内接收），向量（速度—引力），模式（自由行动—工作），表现（珠宝—符号）和激情或欲望色彩（情感—感觉）。毫无疑问，国家机器想要通过规训军队，把工作规定为基本单位，也就是把它自身的特征强加其上，而把这些领域统一起来。但是，武器和工具也完全可能被新的变形组合所利用，加入其他联盟。战争人有时会组织农民或工人联盟，但对产业或农业工人来说，最常见的是重新发明战争机器。农民为大炮制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胡斯战争期间，齐士卡用牛车拉着便捷大炮筑成了活动堡垒。当工人—士兵、武器—工具、感觉—情感具有了亲和性时，革命和人民战争的时机就已成熟，不管多么短暂。对工具的一种精神分裂式的鉴赏使工具逐渐脱离工作，走向自由行动；对武器的一种精神分裂式鉴赏把武器变成了追求和平、获得和平的工具。这同时既是反攻，又是抵抗。一切都是含混的。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含混使厄恩斯特·容格的分析失去了说服力：他把“叛逆者”描写成一个超越历史的人物，一只手拖着工人，另

① 当然，有些建筑和烹饪本身就是游牧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属于另一种“特征”，区别于定居者的建筑和烹饪。比如，游牧民的建筑，爱斯基摩人的拱型圆顶小屋，或匈奴人的木头宫殿，都缘起于帐篷：它对定居者艺术的影响体现为拱顶和半拱顶，而最重要的是起于非常的空间，犹如帐篷一般。至于游牧民的烹饪，它一般包括早餐（食羔羊的传统源自游牧民）。正是由于这个特征，它才成为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比如，土耳其禁卫军把饭锅作为联合的点；厨师也分不同等级，帽子上还插着一根木制羹匙。

一只手拖着士兵，走上了一条共同的逃亡路线，在那里，你既要说“我在寻找一件武器，”又要说“我在寻找一件工具。”划定这条路线，或任何类似的东西，跨越它，走过它，因为它只有通过超越分离的路线才能划定这条路线。① 毫无疑问，战争人是最不合时宜的人：他早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同性质的人，军人。而工人也经历了如此多的不幸冒险……然而，战争人重又以众多的含混性出现了：他们都懂得暴力的无用性，但又维系于将要重新创造的一种战争机器，主动反攻的革命的战争机器。工人也重新出现，他们不再相信工作，而附属于将要重新创造的一种工作机器，主动反抗和技术解放的工作机器。他们不是再生的古老神话或古典人物，而是跨越历史组合的新人物（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不合适宜的人物）：游牧武士和流动工人。在他们之前已经出现了一幅冷静的漫画，雇佣兵或流动的军事顾问，技术专家或季节性游牧民的分析家，中央情报局和 IBM。但是，跨历史人物必须既抵制古老的神话，又要抵制事先建立的预示性损毁。“人们并不走回头路去抵抗神话，而是当时间震动了极其危险的帝国的基础时去重新遭遇神话。”武术和最新技术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够把工人和武士聚集起来构成一个新的类型。武器和工具共有的一条逃亡路线：一种纯粹的可能性，一次变动。天上、地下、水中的技术员相继崛起，他们或多或少都属于世界秩序，但他们不情愿地发明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行动，这些知识和行动是为别人所用的，极易为新的组合所获得。战争与军事机

---

① 在 *Traité du rebelle*（Paris: Bourgois, 1981）中，容格最清楚地表明了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立场，提出了 *Der Arbeiter* 中的一些观点：主动从老士兵和现代工人中间逃亡的“路线”，到另一种组合中寻求另一种命运（海德格尔对路线的探讨是题献给容格的，但却丝毫不见容格“路线”的影子）。

器之间、工作与自由行动之间的借用总是朝两个方向发展的，总是趋向于一场更加多样化的斗争。

问题 III. 游牧民如何发明或发现武器？

命题 VIII. 金属制作本身构成了必然与游牧生活方式汇流的一种流动。

草原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不像他们的战争发明、防御和进攻的武器、组合和策略与技术因素（马鞍，马镫，马掌、马具等）那样为世人所知。历史检验了每一种发明，但无法抹去游牧民的踪迹。游牧民所发明的是人—动物—武器，人—马—弓的组合。这种速度的组合标志着各个金属时代的发明。希克索斯的青铜战斧和赫梯人的铁剑可以比做微型原子弹。对草原上的武器进行准确的分期是完全可能的，能够表明轻重武器的变化（锡西厄型和萨尔马西亚型）及其混合形式。铸造的钢剑往往短而弯曲，是用边刃进行侧面攻击的武器，与用尖进行正面攻击的铸铁剑包含着不同的动力空间。锡西厄人将其带到印度和波斯，后来被阿拉伯人所用。人们一致认为火药的出现，尤其是大炮的出现，使游牧民的发明无用武之地了。但这不是说他们不懂如何使用火药和大炮。土耳其军队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游牧传统，但他们广泛使用火药，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而且，更为特别的是，轻炮已经装在了活动的战车、海盗船等运输工具上。如果说大炮限制了游牧民的发展，那么，其原因则恰恰相反，这是只有国家才能进行的一种经济投资（甚至商业城市也不足以进行这种投资）。事实是，对于武器而非火药、甚至大炮来说，特定的技术谱系中总有游

牧民的影子。①

显然，每一种情况都是有争议的，如关于马镫的争论。② 问题在于，一般很难把游牧民的发明与他们从所交往的、征服的或吞并的宗主国接受的东西区别开来。在宗主国的军队与游牧民的战争机器之间有如此多的灰色区域、中间地带和综合，以至于许多事物都是源自宗主国的。马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且与马镫不同的是，这已没有什么疑问了。当然，锡西厄人是马刀的传播者，将用法教给了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但他们也是最初的受害者，是在接受的时候开始使用的。马刀始于中国的秦汉代，是当时惟一能铸钢和炼钢的国家。③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困难。甚至考古学家也难免对游牧民持有仇恨或轻蔑的态度。就马刀的情况而言，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宗主国来源，最好的评论家都认为无论如何不可能是锡西厄人——穷苦的游牧民——发明的，而熔铸钢铁必然是在定居的环境里进行的。但为什么还要遵循古老的中国官方的说法呢？即军队里的逃兵向锡西厄人泄露了秘密。如果锡西厄人根本不懂怎么使用的话，那么“泄露秘密”又有什么意义呢？谴责逃兵吧，为什么不呢？你不可能秘密地制造原子弹，就如同你没有能力仿制、在不同条件下使用、或将其移交给其他组合，却还要制造马刀一样。宣传和传

---

① Lynn White, Jr. 实际上不倾向于把革新归于游牧民，有时也把广泛的技术谱系追溯到惊人的源头上来：他认为热气和叶轮技术源自马来亚（*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 95 and note）：“因此，一系列技术激励可以通过中世纪晚期重要的现代科学和技术追溯到马来亚的森林。一种次要的但却相关的马来亚发明，即火活塞，可能对欧洲关于气压及其应用的理解发生过重大影响。”

② 关于特别棘手的马镫问题，见 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Chapter 1.

③ 见 A. Mazaheri, “Le sabre contre l'épée,” *Annales* 13, no. 4 (October – December 1958), pp. 669 – 686.

播是发明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条路线上的一个转折点。熔铸钢铁首先是金属制作者的发明，那又何以说必然具有定居的或宗主国的主体的属性呢？一般认为，这些金属制作者必然受国家机器的控制，但也享有某种技术的自主权和在社会上的秘密生产，所以，即便在受控制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属于国家，就如同他们不属于游牧民一样。没有什么泄露秘密的逃兵，而只有金属制作者，他们传出了消息，使其使用和宣传成为可能：一种全然不同的“背叛。”最后，使这种讨论如此艰难的（有争议的马镫和没有争议的马刀），不仅由于对游牧民的偏见，还由于缺乏翔实的有关技术谱系的概念（从特定角度界定一条技术路线或连续及其多样发展的是什么呢?）。

说金属制作是一种科学，这毫无意义，因为它发现了恒定规律，如金属的熔化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金属制作与几条变体路线密不可分：陨石与本土金属之间的变体；矿石与金属比例之间的变体；天然合金与人工合金之间的变体；对金属进行的各种运作之间的变体；实施具体运作的各种属性之间的变体，或产生于具体运作的结果的变体（比如，根据产地和冶炼程度可以确定有 12 种铜的变体源自苏美尔）。[①] 所有这些变体都可以归为两类：不同秩序以及与这些秩序相关的作为毁形或变形过程的运作的个性或时空个体性；与这些个性和运作相对应的不同层面的情感属性或表现特点（硬度，重量，色彩等）。姑且回到马刀或铸钢的例子上来。这意味着第一个个性的实现，即高温下铁的熔化；然后是第二个个性，即连续的碳化；与这两个个性相对应的是表现的特点——不仅有硬度、尖锐和平滑，还有具体操作留下的以及铸钢

① Henri Limet, *Le travail du metal au pays de Sumer au temps de la IIIe dynastie d'Ur*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0), pp. 33 – 40.

的内在结构所导致的起伏不平的图案。铁剑与各种不同个性相关，因为它是锻造的，不是铸造的或模制的，是淬火的而不是气冷的，是单件而不是批量生产的。它的表现特点也必然相当不同，因为它刺穿而不是切削，从正面而不是从侧面攻击；甚至表现的设计也完全不同，即镶嵌。① 只要我们发现一组个性，可以通过某种运转延长，并且聚敛，使那些运作聚合在一个或若干可指定的表现特点之上，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机械群，或技术谱系。如果这些个性或运作在不同的质料或相同的质料中分散而非聚合，我们就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群：这恰恰是源自匕首的剑和源自刀的钢马刀的情形。每个群都有自己的个性和运作，自己的属性和特点，这决定着欲望与其技术因素的关系（马刀产生的影响不同于剑产生的影响）。

但是，总有可能在个性层面上进行分析，把一个群延长到另一个群，并把二者连结起来。在极限处，总要有一个单独的种系发生谱系，处于理想的连续状态的一个单独的机械群：质料运动的流动，质料在连续变体中的流动，传达了个性和表现的特点。这种运作和表现的流动既是天然的，也是人工的：就好比人与自然的统一。但与此同时，如果不加以划分和区别，它就不会在此时此地实现。我们将把一个组合称作一组个性和特点，它们衍生于流动，经过选择、组织和分层而达到天然和人工的聚合（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组合就是可证实的发明。组合也可以构成极大的星群，如“文化，”甚或“时

---

① 根据这些路线，Mazaheri 卓有成效地表明了马刀和剑属于两个不同的技术谱系。尤其是带波纹的大马士革钢根本不是产于大马士革，而源自希腊或波斯语，意思是钻石，指对铸钢的处理方法，试图使它与钻石一样坚硬，而这种钢表面的图案则源自水泥（“真正的大马士革钢是在从未受过罗马统治的中部地区生产的”）。但在另一方面，大马士革的金银镶花的确产自大马士革，只用指金属（或构架）镶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模仿大马士革钢的处理方法。

代”；在这些星群内，组合仍然在区分群或流动，将其分成许多不同的群，但属于特定的秩序和特定的层面，在理想的质料运动的连续中引入选择性断裂。组合把群切割成不同的被区别的谱系，同时，机械群又跨越所有这些谱系，抛下一个，再拣起另一个，或使其共存。嵌入群侧的某一个性，如碳化合物，将由一个特定的组合带到表面上来，对它进行选择、组织和发明，在这个过程中，群的全体或部分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得以通过。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区别出一些不同的谱系。其中有些是种系发生谱系，在不同年代和文化的组合之间跨越了漫长的里程（从吹矢枪到大炮？从祈祷轮到螺旋桨？从瓦罐到发动机？）；其他的是个体发生谱系，它们内在于一个组合，与其他因素连接，不然就让某一因素在一段延搁之后进入另一个性质不同但却属于同一个时代或文化的组合（比如，马掌就遍及所有农业组合）。因此，有必要考虑组合对群的选择行为，而群的进化反应则是从一个组合到另一个组合的地下线索，或者停止组合，将其拉向前来打开。生命的冲动吗？勒罗伊－古尔汗走得最远而趋于建立一种技术生机论，把一般的生物进化作为技术进化的模式：一种普遍倾向，嵌有全部的个性和表现特点，跨越对其进行折射或甄别的技术和内部环境，而每一个个性和特点则进行保留，选择，聚合，引起聚敛，和发明。[①] 的确有一个变化着的机械群，它创造了技术组合，而组合又发明了不同的群。是利用群，还是利用组合，一种技术谱系将据此而发生很大变化；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

① André Leroi－Gourhan, *Milieu et techniques* (Paris: Albin Michel, 1945), pp. 356ff. Gilbert Simondon 在讨论短序列时曾提及“技术谱系的绝对来源”问题，或“技术本质”的创造问题：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c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 1969), pp. 41－49.

那么，我们该怎样界定进入组合又离开组合的这种质料运动，这种质料能量，这种质料流动，这种变化着的质料呢？这是一种抵制分层的、解域的质料。我们认为，胡塞尔把思想向前推进了决定性的一步，他发现了一个模糊而物质的本质领域（换言之，本质是不定的，次准确的，然而又是严格的），将其与固定的、公制和形式的本质区别开来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模糊的本质明显区别于有形的质料，正如它们明显区别于形式本质一样。它们构成了模糊的集合体。它们相关于一种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不能混同于智力的、形式的本质，也不同混同于感性的、有形的、看得见的物质状态。这种物质性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与通往极限的通道不可分割，这些通道表示状态的变化；与毁形或变形的过程不可分割，这些过程在一个本身次准确的时空里运作，以事件的方式行动（摘除，添加，投射……）；另一方面，它与表现的或内涵的属性不可分割，这些属性可能在程度上有高有低，而且是根据可变的情感（抵制，硬度，重量，色彩……）生产的。因此，有一种流动的重叠，事件—情感，它们构成了模糊的质料本质，但又与定居者无关，即与“衍生于本质的事物的固定本质，”“形式本质构成的事物”无关。毫无疑问，胡塞尔倾向于把模糊的本质说成是本质与感觉、事物与概念之间的中介，与康德的图式颇为相象。圆形是不是圆形的可感事物与圆的概念本质之间的中介，一种图式的或模糊的本质呢？实际上，原形只作为一个入口情感（不是平的，也不是尖的）并作为一个极限过程（生成圆形）而存在，必须经过可感的事物和技术代理、磨石、车床、轮、纺车轮槽等的中介才能存在。但它仅仅是“中间的”，而“中间的”东西往往都是自治的，一开始就在事物之间、在思想之间自行延伸，从而在思想与事物之间确立一种全新的关系，二者间的一种模糊的同一性。

西蒙登提出的一些区别可以与胡塞尔的区别相提并论。西蒙登揭示了质料—形式模式在技术上的不足，因为这种模式假定一个固定形式和一个被认为是同质的质料。规律的理念保证了这种模式的连贯性，因为规律把质料服从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反之，又在质料中实现了从形式推导出来的一个特定属性。但西蒙登表明，这种形式质料模式把许多能动的、情感的事物抛在了一边。另一方面，对有形的或可构型的质料来说，我们必须加上一整个运动的能量物质性，携带着个性或个体性，而这些个性或个体性似乎已经成了类型学的而非几何学的隐含形式，并与毁形的过程结合起来：比如，锯木头时引导锯木运作的纤维的起伏和扭转。另一方面，对衍生于形式本质的质料的本质属性来说，我们必须加上可变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时而产生于运作，时而反倒使运作成为可能：比如，木头或多或少都有孔洞，或多或少都有弹性和抵抗力。无论如何，这是向木头屈服的问题，然后，按着它的方向把运作与一种物质性联系起来，而不是把一种形式强加在质料上：人们所说的话与其说是服从规律的一种质料，毋宁说是具有诺摩斯的一种物质性。人们所说的话与其说是能够把属性强加在质料之上的一种形式，毋宁说是构成情感表现的物质特点。当然，总有可能把逃避模式的东西“翻译”成那种模式；因此，可以把物质性的变化力与适于固定形式和恒定质料的规律相互联系起来。但这必须经过某种曲解才能做到，包括从连续变化的状态根除可变的因素，以便从中抽取固定点和恒定关系。于是摆脱了可变量，甚至改变了等式的性质，这些等式已不再内在于物质运动了（不平等性，不充分性）。问题不在于这种转译是否在概念上合理——实际上是合理的——而在于在转译中失去了那些直觉的东西。简言之，西蒙登批判了形式质料说，因为这种模式把形式和质料当作两个各不相关的术语，仿佛两根半条锁链的

头不再能连接一样，仿佛一种简单的模制关系，在其背后是永远变化和连续的调整，而这已经不再可能掌握了。① 对形式质料模式的批判是以“形式与质料之间一个中介和中间维度的地带”为基础的，这是一个能量的分子维度，是通过质料利用自身的物质性向自身敞开的一个空间，是通过形式推出自身特点向自身敞放的一个数。

我们总是再回到这样一个定义上来：机器群是物质性，或是天生的，或是人为的，或同时既是天生的又是人为的。它是运动中的质料，流动中的、变化中的质料，携带着表现特性和特点的质料。这具有明显的结果：就是说，只能追随这种质料流动。毫无疑问，追随所包含的运作只能在一个地方进行：建造平面的艺术家追随木料，追随木料的纤维而不改变地点。但这种追随只是一个更普遍的过程之中的一个特殊序列。匠人有义务以另一种方式追随，也就是去寻找木料所在的地方，而且是寻找带有正确纤维的那种木料。否则，就必须让人把木料带给他们：仅仅因为商人接管了反向旅行的一个环节，匠人就免去了那次旅行。但匠人只有在同时也是勘探者时才是完整的，而把勘探者、商人和匠人区别开来的那种组织为了把匠人变成“工人”而早已损毁了他们。因此，我们将把匠人定义为决心要以这种方式追随质料流动的人，一个机器群。匠人是巡回者，是流动者。追随质料的流动就是巡回，就是流动。那是行动本能。当然，存在着二级巡回，在二级巡回中已不再是人们勘探和追随的质料的流动了，而是，比方说，一个市场。然

---

① 关于模制—调整关系，以及模制隐藏或收缩作为物质运动之本质的调整运作，见 Simondon，*Du mode d'existence*，pp. 28 – 50（“调整就是以连续永久变化的方式进行模制，” p. 42）。西蒙登清楚地表明，形式质料模式不是从技术运作获得力量，而是从包括那种运作的工作的社会模式中获得力量。（pp. 47 – 49）

而，所追随的总是一次流动，即便流动不总是质料的流动。最重要的是，存在着派生于另一种“状况”的二级巡回，即便必然是由那种“状况”所引起的。比如，一个季节性畜牧者，无论是农场主还是饲养者，都必须在土地贫瘠之后改变土地，要么就随季节改变；但是，季节性畜牧者只能把追随土地流动放在第二位，因为他们从事的轮作意味着他们从一开始就要回到他们所离开的点上去；当森林再生，土地复原，气候发生变化之后，他们必须回去。季节性畜牧者并不追随流动；他们循环；他们只追随进入循环的那个流动部分，即便是逐渐加宽的部分。季节性畜牧者只就结果而言是巡回的，或当他们的土地或草原枯竭之时，当轮作如此宽泛以至于流动逃避了循环之时，才是巡回的。甚至商人也是季节性畜牧者，因为商人的流动服从于出发点与到达点之间的轮作（去取—带回，进口—出口，买—卖等）。不管相互含义是什么，在流动与循环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已经看到，移民又属于另类。游牧民基本上不被定义为巡回者或季节性畜牧者，也不被定义为移民，即便游牧民最终也将成为这些人。游牧民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占据和拥有一个平滑空间：正是这方面决定了他们作为游牧民的本质。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只有在迫于平滑空间的需要时，他们才成为季节性畜牧者或巡回者。简言之，不管游牧、巡回和季节性畜牧之间混合的事实如何，这三种情况的基本概念却都是不同的（平滑空间，质料流动，轮作）。只有依据不同概念，我们才能对这种混合加以判断——就生产的时间，生产的形式和生产的秩序加以判断。

但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游离了这样一个问题：机器群，质料的流动，何以本质上是金属的或金属制造的？我们再次看到，只有基于不同的概念，我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表明在巡回与金属制造（解域）之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基本

关系。然而，我们引自胡塞尔和西蒙登的例子既关系到金属，也关系到木料和泥土。此外，难道草、水、牧群的流动不也构成了那么多的运动群或质料吗？现在，我们更容易回答这些问题了。这就仿佛金属和金属制造把隐藏或埋藏在其他质料和运作中的东西强加给意识、提交给意识一样。差别在于，在别处，运作是在两个临界之间发生的，一个临界构成了为运作准备的质料，另一个则是将要具体实现的形式（如泥土和模子）。这个形式质料模式由此产生其普遍价值，因为标志着运作之结束的具体形式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运作的质料，但在固定秩序中却标志着一系列的临界。另一方面，在金属制造中，运作总要跨越这些临界，致使一种有力的物质性从准备的质料中充溢而出，而一种质的变形或形变则从形式中充溢而出。[①] 比如，淬火在铸造之后，在形式固定之后发生。或举另一个例子。在模铸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金属匠是在模型内部工作。再如，熔化而后模铸的钢材要经历一系列的脱碳。最后，金属制造可以选择熔化和重新使用质料，给质料以铸模的形式：金属的历史是与这种特殊形式分不开的，而这又不能混同于存货或商品；金融价值于此产生。更普遍地说，金属制造的“还原”思想表现了与所准备的质料相关的一种物质性，以及与所实现的形式相关的一种变形的双重解放。质料和形式在金属制造中呈现最坚硬的形式；然而，连续的形式将被连续发展的形式所取代，而质料的多样性将被连续变化的质料所取代。如果金属制

---

① 西蒙登感到金属制造的问题没有什么吸引力。他的分析实际上不是历史的分析，而喜欢处理电子方面的例子。但是，从历史上说，没有金属制造就没有电子。因此，西蒙登尊重金属制造：“金属制造并不完全是应用形式质料模式进行的分析。形式的固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而要经过几次连续的运作；钢的铸造和淬火在严格意义上分别先于和后于形式的固定；然而，铸造和淬火都是构成客体的运作。”（L'individu，p. 59）

造与音乐具有本质关系，那不仅是因为铸造的声音，也因为在这两种技艺中，有一种超越形式而把形式的连续发展带入自身、超越可变的质料而把质料的连续变化带入自身的倾向：一种加宽了的色差保存了音乐和金属制造；音乐工匠是第一位“改造者”。① 简言之，金属和金属制造所揭示的是质料本身的生命，质料的生命状态，毫无疑问，这是到处都存在的一种质料生机论，但一般情况下却被形式质料说隐藏或覆盖起来，使之无法辨认和分解了。金属制造是质料流动的意识或思想，而金属是这种意识的对应物。正如泛金属论所表现的，金属与质料的整体是共延的，而质料的整体又与金属制造是共延的。甚至水、草和各种木料，动物，都含有盐和各种矿物质。并非一切都是金属，但金属无处不在。金属是所有质料的导体。机器群是金属制造，至少有一个金属头，如巡回探测针或导向装置。而思想更多地产生于金属，而非产生于石头：金属制造就人头而言是小科学，“模糊”科学，或质料的现象学。无机生命的惊人思想——也就是沃林格所思考的野蛮思想② ——是发明，金属的本能。金属既不是物，也不是有机体，而是无器官的身体。“北方或哥特的线”主要是一条界定这个身体的矿物或金属线。金属制造与炼金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容格所认为的那样，依赖于金属的象征价值，及其与有机灵魂的对应，

---

① 不仅要把神话考虑进来，而且还要考虑实证历史，如在音乐形式的进化中“铜管”的作用；再如，电子音乐中“金属合成”的构成（Richard Pinhas）。

② 威廉·沃林格根据几何线定义哥特艺术，认为它是有生命的“原始”艺术。但这种生命力不是有机的，如在古典世界中那样：线“不表示有机表现……但却是最大的生命力……因为线缺乏所有的有机材料，作为一种表现，它的生命表现必须脱离有机生命……在这种被赋予生命的几何——哥特建筑被赋予生命的数学的前奏——中，运动的伤感力把我们的感性聚焦于一种非自然的努力。” *Form in Gothic* (London: Putnam's and Sons, 1927), pp. 41 – 42.

而依赖于所有质料中内在的身体力量，依赖于伴随着质料的身体精神。

第一个也是最原始的巡回者是匠人。但匠人既不是狩猎者，农民，也不是畜牧者。他们也不是扬场者或陶工，这些人只把技艺当作次要活动。匠人是追随质料流动，把质料流动当作纯粹生产活动的人：因此采取金属形式，而非植物或动物形式。他们不属于土地，或表层土壤，而属于底土。由于金属是纯粹的质料生产活动，所以，追随金属的人都是物体的生产者。如 V. 戈登·恰尔德所表明的，金属制造者是第一个专业匠人，并在这方面构成了一个集体（秘密结社，行会，雇佣工协会）。匠人—金属制造者是巡回者，因为他们追随底土的质料流动。当然，金属制造者与“其他人”有关，与属于土壤、大地、天空的人有关。他们与固定群体的农民有关，与给这些群体制定多元法典的宗主国的天朝官员有关。事实上，他们要生存就离不开这些人；他们要维持生计就必须依靠宗主国的农业存货。[①] 但在工作中，他们又与森林居民有关，并部分依赖于他们：他们必须在森林附近建立厂房，以便获得必要的木炭。在他们的空间里，他们与游牧民有关，因为底土把平滑空间的表层与条纹空间的大地联合起来了：在由宗主国统治的农民居住的冲积山谷里没有矿场；因此有必要跨越沙漠，走近山区；控制矿场的问题总是与游牧民有牵连。每一个矿场都是一条逃亡路线，都与平滑空间相沟通——今天也有类似的原油问题。

---

① 这是 V. 戈登·恰尔德的主要论点之一。*The Prehisto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London: Cassell, 1962)：金属制造者是第一个专业匠人，他靠创造农业剩余维持生计。铁匠与农业的关系不仅与工具的制造有关，而且与他们拿取或接受的食物有关。如 Griaule 所分析的多更神话的变体一样，多更神话就体现了这种关系，神话中，铁匠接受或偷取粮食，将其藏于锤子当中。

考古学和历史奇怪地对控制矿场的问题保持沉默。有些宗主国拥有强大的金属制造组织，但没有矿藏；近东缺少锡，所以有必要制造青铜。大量的金属以铸模形式运来，而且是从非常远的地方运来的（如锡是从西班牙甚至康沃尔运来的）。这种复杂情况不仅意味着一个强大的宗主国贵族阶级和长距离的商业流通；而且意味着一种变幻的政治，其中，国家面对一个外部，各相迥异的民族相互对峙，要么就在控制矿藏的某些特殊方面（如采掘，烧炭，厂房，运输）达到共识。只说有战争和采矿远征，“从中国的疆土到不列塔尼的海岬，到处都是一种欧亚综合的游牧民矿场，”并说“自从史前时代起，游牧民就与古代世界主要的金属制造中心有联系，”① 这还不够。所需要的是更好地了解游牧民与这些中心的关系，与他们自己雇佣或经常接触的铁匠的关系，与作为金属制造的民族或群体的邻居的关系。高加索山脉和阿尔泰山脉的情况怎样？西班牙和北非如何？矿藏是流动、混居和逃亡的根源，历史上很少有相同的情况。甚至当宗主国严密控制它们的时候（如中国和罗马帝国），也同样存在着秘密开采的运动，矿工与游牧民、野蛮人或农民联合造反的情况。神话研究，甚至对铁匠地位进行的民族学研究，都使我们偏离了这些政治问题。神话和民族学在这方面都没有正确的方法。最常提出的问题就是别人对铁匠的“反应”如何，结果，人们只能得出普通的结论，即感情的复杂性。据说铁匠既受到尊敬，又为人们所惧怕，同时又遭到嘲弄——或多或少受到游牧民的嘲弄，或多或少受到定居者的崇

① Maurice Lombard, *Les métaux dans l'ancien monde du Ve au XIe siécle* (The Hague: Mouton, 1974), pp. 75, 255.

敬。[①] 但这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没有看到铁匠的特殊性，也没有看到他们与游牧民和定居者的非对称关系，这是他们所造成的那种情感（金属情感）。在检验其他人对铁匠的感情之前，有必要评价作为他者的铁匠本身；以及他们与定居者和游牧民的不同情感关系。

不存在游牧或定居的铁匠。铁匠是流动的，巡回的。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铁匠生活的方式：他们的空间既不是定居者的条纹空间，又不是游牧民的平滑空间。铁匠可能有一个帐篷，可能有一幢房子；他们把它们当作“矿床”（藏身之所，家，矿物储藏），他们就和金属一样，藏身于洞穴，他们的工棚一半或全部建在地下。他们不是天生的穴居人，但技艺和需要使他们成了穴居人。[②] 埃利·富尔的一篇名文描写了印度巡回民族的地下发展，他们在空间中打孔，创造了与这些突破相对应的奇异形式，也就是非有机生命的生命形式：“在海岸，在山下，他们遇到了一道巨大的岩石墙。然后，他们走进去；他们在那块岩石里生活，恋爱，工作，死亡，出生，过了三四个世纪后，他们再从里面走出来，成群结队，跨过大山。他们留下了一块空洞的岩石，里面的走廊四通八达，墙壁上斧凿刀刻，在自然或人工的柱子上留下了上万个可怕或迷人的图象。……这里，人顺从地表白了他的力量和他的虚无。他没有苛求

---

① 铁匠的社会地位曾是人们详尽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对非洲铁匠的研究，见 W. B. Cline, “Mining and Metallurgy in Negro Africa,” *General Series in Anthropology*, no. 5 (1937)；和 Pierre Clément, “Le forgeron en Afrique noire,” *Revue de géographie humaine et d'ethnologie*, no. 2 (April - June 1948), pp. 35 - 58. 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没有结论；较严密的定义——“蔑视，”“满意，”“惧怕”等反应——也更加模糊和重叠，见 Clément 的表格。

② 见 Jules Bloch, *Les Tziganes*, Que sais - je?, no. 580 (Paris: PUF, 1969). Bloch 确切地表明了与穴居人相比，定居者与游牧民之间的区别是次要的了。

确定的理想形式。……他从无形中抽取出粗糙的有形，悉听无形的安排。他利用了岩石的突凹表面。”① 金属制造的印度。穿透大山，而不是攀越山峦；挖掘土地，而不是条纹占据；在空间中钻洞，而不是保持它的平滑，把大地变成了瑞士奶酪。[爱森斯坦] 影片《打击》中的一个镜头展示了一个有孔洞的空间，令人不安的一群人站起身来，一个接一个地从自己的洞里钻出来，仿佛来自一个全方位矿场一样。该隐的符号就是底土的肉体和情感符号，穿越定居者空间的条纹土地和平滑空间的游牧地表，而不在任何一个空间里停留，巡回者的流浪符号，金属制造者的双重偷窃和双重背叛，在躲避农业的同时也躲避畜牧业。我们要为这些在历史中探幽的金属民族保留该隐的名号吗？史前的欧洲曾留下了战斧人的足迹，他们来自大草原，仿佛一支脱离游牧生活的金属民；还有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宽口陶器人，他们以铃状陶器著称，是脱离石器农业的一个分支。② 奇怪的民族，长头人和圆头人，混杂而散居于整个欧洲。是他们保存了矿场，在欧洲的空间里四处钻孔，构成了欧洲的空间吗？

铁匠不是游牧民中的游牧民，也不是定居者中的定居者；不是游牧民中的半游牧民，也不是定居者中的半定居者。他们与别人的关系产生于他们内部的巡回性，产生于他们的模糊本质，而非相反。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特殊性，他们的这种巡回性，他们所发明的带孔洞的空间，他们才能够与定居者沟通，与游牧民沟通（也与其他人沟通，与季节性畜牧者和森林人沟

---

① Elie Faure, *Medieval Art*, vol. 2 of *History of Art*, trans. Walter Pach (Garden City, N. Y.: Garden City Publishing, 1937), pp. 12 – 14.

② 关于这些民族及其秘密，见 V. Gordon Childe 的分析，*The Pre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 Chapter 7 (“Missionaries, Traders and Wariors of Temperate Europe”), and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Knopf, 1958).

通)。他们本身就是双重的：一种杂交，一种合金，一种孪生构型。如格里奥尔所说，多更铁匠不是“不纯”而是“混杂，”而正是因为混杂，所以才同族通婚，才不与纯者通婚，纯者拥有简化的后代，而他们则重新构成一种孪生的后代。① 恰尔德表明，金属制造者必然是双重的，他们存在两次，一次被东方帝国的机器所捕捉，并在那里维持生计，另一次是在爱琴海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比较自由，流动性较大。但这两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简单地把他们与各自的特殊环境相联系。金属制造者属于某一宗主国，是工人，因此必定先有一个金属勘探者，不管他在多远的地方；这个勘探者与商人联系，由商人把金属带给第一个金属制造者。此外，金属要经过每一个部分的加工，而铸模是他们普遍共有的：我们必须想象一些联系紧密的部分，而不是从一个孔到另一个孔构成的一条变化路线，一个长廊的流动的连锁矿场。这样，金属制造者与游牧民和定居者的关系就也能建立他们与其他金属制造者的关系。② 混居的金属制造者，武器和工具制造者，都与定居者沟通，同时也与游牧民沟通。孔洞空间本身也与平滑空间和条纹空间沟通。实际上，机器群或金属线穿过所有这些组合：再也没有比这种质料运动更解域的了。但是，其方式却大相径庭，而这两种沟通并不是对称的。在美学领域，沃林格认为这条抽象线采取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种是野蛮的哥特艺术，另一种是有机的

---

① Maurice Griaule and Germaine Dieterlen, Le renard pale, vol. 1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1965), p. 376.

② Robert James Forbes 的著作，*Metallurgy in Antiquity* (Leiden: Brill, 1950)，分析了不同的金属时代，以及生存于“矿物阶段”的各种金属制造者：“采矿者，”负责勘探和采矿；“冶炼者，”[生产原金属或合金]；和“金属工作者，”[生产小器具，如金银匠] (pp. 74 – 76)。在铁器时代，专业系统越加复杂了，在游牧民、巡回者和定居者中都有变体。

古典艺术。这里，我们认为，机器群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联合方式：它总是与游牧空间相关，而同时又与定居者空间结合。在游牧组合和战争机器这一边，它是一种块状，有空隙，轮廓，地下通道，枝干，开口，特征，孔洞等。在另一边，定居者组合和国家机器实施一种对群的捕捉，把表现特征变成一种形式或符码，使所有孔洞发出共鸣，堵住了逃亡路线，把技术运作从属于工作模式，把树状联合的整个政体强加在这些关联之上。

原理 III. 游牧战争机器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巡回金属制造则是与其相对应的内容的形式。

	内　　容	表　　现
质　　料	孔洞空间（机器群或质料流动）	平滑空间
形　　式	巡回金属制造	游牧战争机器

命题 IX. 战争不必把战斗作为目标，更重要的是，战争机器不必把战争作为目标，尽管战争和战斗可能是其必然结果（在特定条件下）。

我们现在依次来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战斗是战争的“目标”吗？也可以问：战争是战争机器的“目标”吗？最后，在何种程度上说战争机器是国家机器的“目标”？前两个问题的语义含混当然是由“目标”这个术语引起的，但暗示了它们对第三个问题的依赖。我们还是逐个来谈这几个问题吧，哪怕只是举例子。第一个问题，即战斗的问题，要求即刻区别两种

情况：一是战争机器寻求战斗时，二是战争机器实际上避免了战斗时。这两种情况决不是指进攻和防御。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根据以福熙为发展顶峰的一种观念）的确是以战斗为目标的，而游击战显然是以非战斗为目标的。然而，战争向运动战、向总体战的发展也从进攻和防御的观点对战斗观念提出质疑：非战斗的概念似乎能够表示闪电战的速度，以及即刻反攻的反速度。① 相反，游击战的发展意味着战斗所必须有效地寻求的一个时刻和各种形式，与外部和内部的“支持点”有关。当然，游击战和战争本身往往在方法上相互借鉴，而这些借鉴对双方都是相同的（比如，陆地游击战往往借鉴海战战术）。我们只能说，战斗与非战斗是战争的双重目标，根据一种标准这与进攻和防御、甚至与战争本身和游击战并不偶合。

正因如此，我们才把问题进一步回溯，追问战争本身是否是战争机器的目标。这一点并不明显。战争（不管有无战斗）都旨在消灭或俘虏敌人力量，战争机器大可不必以战争为目标（比如，“突袭”可以是另一个目标，而不是特殊的战争形式）。但更普遍地说，我们已经看到，战争机器是游牧民的发明，因

---

① T. E. Lawrence 的著作 *Seven Pillars of Wisdom*（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35）and “The Science of Guerilla War,”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1929）, vol. 10, pp. 950 - 953，仍然是最重要的论游击战的著作；它们都自称是“反福熙”理论，详尽阐述了反战斗的概念。但这种反战斗有一段历史并不完全依赖于游击战：（1）传统上对战争中的“战斗”与“演习”的区别，见 Raymon Aron, *Penser la guerre. Clausewitz*（Paris: Gallimard, 1976）, vol. 1, pp. 122 - 131；（2）运动战在所论战斗中起到的作用和重要性（早在 Marshal de Saxe 时代，以及拿破仑战争中关于战斗问题的争论）；（3）最后，近代对以核武器为名的战斗的批判，起到了阻挠的作用，传统力量现在只能进行“试验”或“演习”；见戴高乐派的非战斗观点，以及 Guy Broesollet, *Essai sue la nonbataille*（Paris: Belin, 1975）。近来向战斗观念的回归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战略核武器发展等技术因素，而意味着政治上的考虑——战争中战斗（或非战斗）的作用正是依此而定的。

为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平滑空间的构成因素，是对这个空间的占领，是在这个空间之内的位移，以及民族的相应构成：这是战争机器惟一可证实的正面目标（诺摩斯）。让荒漠和草原扩展；不要驱赶那里的人民。如果必然要引起战争的话，那是因为战争机器与国家和城市发生了冲突，作为（条纹）力量与其正面目标发生对峙：从那时起，战争机器就把国家、城市、国家和城市现象看作敌人，把消灭它们作为目标。正是在这个时刻，战争机器变成了战争：消灭国家力量，毁灭国家形式。阿提拉或成吉思汗的冒险都清楚地展示了从正面目标到反面目标的这种进展。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战争既不是战争机器的条件，也不是战争机器的目标，而必然伴随或完成战争机器；从德里达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战争是对战争机器的“增补”。甚至可能发生的是，这种“增补”是通过进步的、充满焦虑的感悟理解的。摩西的冒险就是很好的证明：由于把埃及国家抛在后面而进入了荒漠，他开始借鉴希伯来游牧民的过去，听从岳父的建议，建构战争机器。这是正义的机器，已经具有了战争机器的性质，但还没有把战争作为目标。摩西逐渐地、分阶段地意识到，战争是那个机器的必然增补，因为它将遭遇或必须跨越城市和国家，因为它必须派遣特务（武装观察），然后也许做出极端的事来（灭绝种族的战争）。犹太人民对此感到疑惑，恐怕他们不够强大；而摩西也有疑虑，因此在实现这种增补之前就退却了。所以，担负起战争重任的是约书亚，而不是摩西。最后，从康德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战争与战争机器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但却是“综合的”（耶和华使这种综合成为必然）。

反过来，战争的问题进一步回溯，并从属于战争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国家并不是第一个制造战争的机器：当然，战争也不是自然的普遍现象，一种非具体的暴力。但是，战争不

是国家的目标。恰恰相反，最古老的国家甚至没有战争机器，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的统治是基于其他代理之上的（反而用来协调警察和监狱）。可以毫不冒昧地说，古老但却强大的古代国家之所以突然灭绝的神秘原因就在于一种外部的或游牧的战争机器的介入。但国家很快就吸取了教训。从普遍历史的角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国家将如何挪用战争机器，也就是说，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幅员、统治和目标为自己建构战争机器？担冒了哪些风险？（我们所说的军事机构或军队本身根本不是战争机器，而是国家挪用战争机器时所采用的形式。）为了理解这样一种运作的悖论性质，我们必须重申其全部假设。（1）战争机器是那种游牧发明，战争不是其主要目标，而是其次要的、增补的或综合的目标，它决心要毁灭与它发生冲突的国家形式和城市形式。（2）当国家挪用战争机器时，后者的性质和功能显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它后来被用来破坏游牧和所有国家，不然就表示国家之间的关系，致使一个国家独自使用战争机器去毁灭另一个国家，或将其目标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之上。（3）正是在国家挪用了战争机器之后，战争机器才把战争作为其直接的、主要的目标，作为其“分析的”目标（而战争则把战斗作为其目标）。简言之，国家机器挪用战争机器，战争机器把战争作为目标，战争服从于国家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这个挪用的问题在历史上如此变化多端，因此必然引起各种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运作的可能性：恰恰因为战争仅仅是游牧战争机器的增补或综合目标，它才经历了那种致命的犹豫，国家机器才能够利用战争，反过来用战争机器对付游牧民。游牧民的犹豫是传奇式的：如何使用所征服的和跨越的土地？将其归还荒漠？归还高原？归还开放的草原吗？不然就让国家机器幸存下来，它能直接利用这些土地，但早晚要建立

属于那个国家机器的新王朝：因为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能够长时期地扩张，融入所征服的帝国，同时又能保持草原上的一个平滑空间，使所有宗主国中心服从于它。这是他们的天才，蒙古的世界和平。事实仍然如此，游牧民融入了被他们征服的帝国，这种融入成了国家机器挪用战争机器的最有力因素之一：这是游牧民面对的不可避免的危险。但还有另一个危险，当国家挪用战争机器时威胁到自身的危险（所有国家都感到这种危险的重压，也感到了这种挪用给它们带来的危害）。泰摩兰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不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而恰恰是他的对手：正是泰摩兰建立了了不起的战争机器，掉转枪口，对准游牧民，但恰恰由于这个事实，游牧民才有义务建立一个更沉重的、更没有生产能力的国家机器，因为它的存在仅仅是作为挪用那个机器的一个空洞形式。① 把战争机器掉转过来对准游牧民，正如游牧民把战争机器对准国家一样，也暗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

第二类问题涉及挪用战争机器所采取的具体形式：金钱的还是地域的？职业军队还是征集的军队？特种部队还是国民军？这些形式不仅不是平等的，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可能的混合。最相关的、最普遍的区别也许是：仅仅是战争机器的“铸造”还是正常的“挪用”？国家机器捕捉战争机器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为社会铸造军人（或来自外部，或产生于内部），或相反，根据整个公民社会的规则创建战争机器。这里仍然存在着从一种公式向另一种公式的过渡问题。最后，第三类问题涉及挪用的手段。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考虑与国家

① 关于泰摩兰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区别，见 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trans. Naomi Walford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17 – 419.

机器的基本方面有关的各种数据：地域，工作或公共工程，税收。军事机构或军队的建立意味着对战争机器的解域，也就是授予（“殖民地的”或本国的）土地，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与此同时，财政决定着受益军人所拥有的服务和税收的性质，尤其是民政税收，在这方面，整个或部分社会都有责任维护军队。国家的公共工程必须按照“地域的分配”重新组织，其中，军队起到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修筑工事和巩固城市方面，而且在策略沟通、后勤结构、工业基础等方面（在这种挪用形式中它扮演了工程师的角色和功能）。①

姑且把这整个假设与克劳斯维茨的公式做个比较：“战争是以其他方式继续的政治。”如我们所知，这个公式本身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历史的和超历史的集合体中抽取出来的，这个集合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着的。（1）作为绝对的、无条件的战争的纯战争概念，经验中没有的一个理念（使敌人气馁或“不安”，敌人已经没有其他决定，没有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介入）。（2）服从于国家目的的真正战争；国家是称职的或糟糕的绝对战争的“导体”，无论如何都决定着战争的经验实现。（3）真正的战争在两极之间摇摆，这两极又都服从于国家政治：一极是毁灭性战争，它可以上升为总体战争（依所要毁灭的目标而定），通过上升到极点而接近无条件的概念；另一极是有限战争，它不“小”于战争，但却下降到限定性条

---

① 见 *Armées et fiscalité dans le monde antique*, ed. A. Chastagnol, C. Niclolet, and H. van Effenterre (Paris: CNRS, 1977)；这种学术讨论最充分地容纳了财政方面，但也涉及到其他两个方面。分配给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土地问题在每个国家里都存在，并起到重要作用。它以一种特殊形式为采邑和封建制度奠定了基础。但它已经在全世界奠定了“虚假采邑”的基础，最明显的是希腊文明中的殖民者和殖民地。Claire Préaux, *L'économie royale de Lagides* (Brussels: Ed. de la Fondation Egyptologique Reine Elisabeth, 1939), pp. 463ff.

件，可以变成纯粹的“武装观察。”①

首先，作为理念的绝对战争与真正战争之间的区别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只能用不同于克劳斯维茨的标准来衡量。纯粹理念并不是指抽象地消灭敌人，而是指不以战争为目标的战争机器，只与战争有一种潜在的或增补的综合关系。因此，游牧战争机器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克劳斯维茨所论述的一场真正战争的案例，相反，是那个理念充分体现的内容，那个理念的发明，及其目标、空间和诺摩斯的构成。然而，它仍然是一个理念，必然保留着纯粹理念的概念，尽管这种战争机器是游牧民实现的。而游牧民却仍然是一个抽象理念，真实而非实际的东西，这有几个理由：首先，如我们所看到的，游牧生活方式的诸因素实际上与迁徙、巡回和季节性畜牧混合了起来；这并不影响概念的纯洁性，但总是引入一些混合的客体，或空间与构型的综合，它们从一开始就反作用于战争机器。其次，甚至在纯粹的概念中，游牧战争机器也必然促成它与战争的综合关系，作为对战争的增补，显示与国家形式的对抗，其任务就是毁灭国家形式。但确切的情况则是：如果没有国家，它不能促成这种增补目标或综合关系，国家总是在寻找机会挪用战争机器，旨在把战争变成这个已转向的机器的直接目标（因此，游牧民向国家的融入从一开始就是贯穿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向量，其第一个行动就是反对国家）。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战争的实现，而在于战争机器的挪用。同时，国家机器也在挪用战争机器，将其服从于“政治”目的，把战争作为其直接目标。也正是这同一个历史倾向使国

① Clausewitz, *On War*, 尤其是卷八，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又见 Raymond Aron, *Penser la guerre*, vol. 1（尤其是 pp. 139ff., “Pourquoi les guerres de la deuxième espèce?”）.

家自三个视点演变而来：从铸造的图形到挪用的形式，从有限的战争到所谓的总体战争，并改变了目的和目标的关系。使国家战争成为总体战争的诸因素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如对设备、产业和战争经济的固定投资，以及对人口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可变投资（作为战犯和战争牺牲品的人口）。① 总体战争不仅是一场灭绝性战争，而且不仅把敌军或敌国，而且把整个人口及其经济作为灭绝的“中心”。这种双重投资只能在有限战争的先在条件下进行，这个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具有发动总体战争的不可抗拒的倾向。② 因此，总体战争的确服从于国家的政治目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家机器对战争机器的挪用。而同样真实的是，总体战争也成了挪用战争机器的目标，而在这个层面上，在所有可能的条件下，目的和目标进入了新的关系之中，达到矛盾的程度。这说明了克劳斯维茨的摇摆不定：他一方面断言总体战争是以国家的政治目的为先决条件的战争，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无条件战争的理念。实际上，战争目的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治的，是由国家所决定的，但是，目标本身却是不受限制的。我们可以说，挪用改变了方向，甚或可以说，国家释放、重构了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在这台机器中，各个

---

① Erich Ludendorff, *Der totale Krieg* (Munich: Ludendorff Verlag, 1935)，注意这种发展越来越注重战时的“人民”和“国内政策”，而克劳斯维茨则把重点放在了军队和对外政策上。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克劳斯维茨的几个文本除外。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了类似批评（尽管他们在关于人民和国内政策方面显然迥异于 Ludendorff)。有些作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无产阶级也具有军事渊源，尤其是海军，如具有产业渊源一样；见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pp. 38, 40 – 41, 134 – 35.

② 如 John Ulric Nef 所示，正是在伟大的有限战争期间（1640 – 1740）出现了财产集中、积累和投资的现象——这些现象后来决定了“总体战争”的发生。见 *War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Norton, 1968)。拿破仑的战争法典代表了一个转折点，把总体战争的诸因素归结到了一起：如演习，运输，投资，情报等。

国家只不过是相互碰撞或并置的部件。这台世界规模的战争机器是所有“国家”重新生产的，它展示了两个连续的形象：第一个是法西斯的形象，使战争成为只为战争的一场无限制运动；但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个粗犷的形象，而第二个，即后法西斯的形象，则是把和平作为其直接目标，作为恐怖或生存的和平的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改良一个声称控制、包围整个地球的平滑空间。总体战争本身被超越了，但所趋向的和平形式却越加恐怖。战争机器承担了实现那个目的的任务，即实现全球秩序，而国家现在不过是那台机器采纳的目标或手段。克劳斯维茨的公式正是在这里发生了逆转；说政治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还不足以颠倒词序，仿佛正说或反说都合理一样。必须依据真正的运动得出结论，由于挪用了战争机器，由于把战争机器用于其他目的，国家又给予一台战争机器，让它承担那项任务，挪用国家，并发挥越来越广泛的功能。①

毫无疑问，目前的形式是相当令人气馁的。我们已经看到战争机器越来越强大，如同在科幻小说中一样。我们已经看到它确立的和平目标比法西斯的死亡还可怕。我们已经看到它维护或发动了最可怕的局部战争，并将其作为自身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它把目光盯在了新型敌人身上，它已不再是另一个国家，甚至不是另一个政权，而是“不明敌人”。我们已经看到它已经熟悉了各种游击战术，所以，它只能被袭击一次，而没有第二次。然而，使国家或世界战争机器成为可能的条件，也就是固定投资（资源和设备）和人的可变投资，正在不断创造出其不意的反攻，孕育着不可预见的革命的、民众的、少数的、突变的机器。“不明敌人”的定义证明了这一点：“多

①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这种“超越”和总体战争，以及克劳斯维茨的转折点，见 Virilio，*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尤其是第一章。

种形式的、运动的、无所不在的……道德、政治、经济的颠覆秩序，等，”不明的物质破坏者或人类的叛逃者正呈现出最多样的形式。① 第一个理论要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战争机器具有多重意义，而这恰恰因为战争机器与战争本身具有一种非常可变的关系。战争机器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不断增大的力量。我们曾试图定义战争机器的两极：在一极上，它以战争为目标，构成了一条破坏路线，这条路线延长到宇宙的极限。但在它所呈现的全部形状——有限战争，总体战争，世界规模的组织——中，战争根本不代表战争机器所应有的本质，而不管机器的威力如何，它只代表国家挪用战争机器的条件，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把它投射出来，作为世界的地平线，或主导秩序，而国家本身则是这个秩序的组成部分。另一极似乎是本质。具有无限低的“量”的战争机器不以战争为目标，反而划定了一条创造性的逃亡路线，构成一个平滑空间，并让人们在那个空间里运动。在这一极，战争机器确实遭遇战争，但却是作为增补或综合的目标，矛头是针对国家以及由国家所表达的世界性原理的。

我们认为，把战争机器的发明归结于游牧民是可能的。这样的战争机器是发明出来的，尽管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含混性，从而使其进入了另一极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朝那个方向发展，只有以这样的历史兴趣才能证明上述结论。然而，就本质而言，游牧民并不保守秘密：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的，或艺术的运动能够成为潜在的战争机器，在与群的关系上，它可以划出一个黏性平面，一条创造性的逃亡路线，一个位移的平

---

① Guy Brossollet, *Essai sur la non – bataille*, pp. 15 – 16. “不明敌人”的原理概念在论国防、国际法的官方和非官方文本中，以及在司法和治安领域，都有充分论述。

滑空间。界定这个特性星群的并不是游牧民；而是这个星群界定了游牧民，同时也界定了战争机器的本质。如果游击战、少数族群的战争、革命或民众战争都与这个本质相一致，那是因为它们以战争为目标，因而更有必要成为纯粹的“增补”：只有在同时创造出别的东西之时它们才制造战争，即便那仅仅是新的无机社会关系。两极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尤其是从死亡的观点来看：逃亡路线创造了或变成了毁灭路线；黏性平面一块一块地构成了或变成了组织和控制的平面（规划）。经常有人提醒我们，这两条路线或两个平面之间存在着沟通，它们相互吸取营养，相互借鉴：最糟糕的世界战争机器重新构成了一个平滑空间以包围和封闭地球。但地球本身拥有解域力量，逃亡路线和平滑空间，它们生存，为新的地球开拓道路。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两种战争机器中两极之间相互对抗的量的不可通约性。战争机器是为了抵制挪用战争机器的国家机器而形成的，并以战争为事业和目标：它们联合力量对抗国家机器捕捉或统治的大联合。